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叔河编订

（一九三八——一九四三）

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周作人散文全集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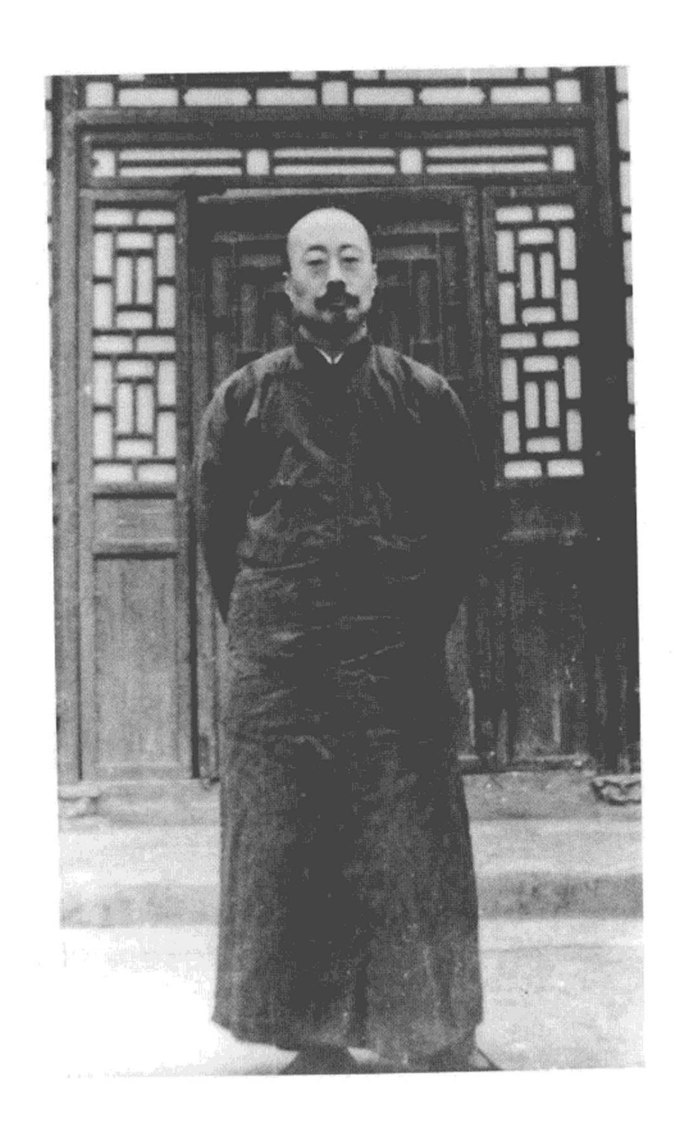
1938～1943

周作人散文全集 8

（一九三八—一九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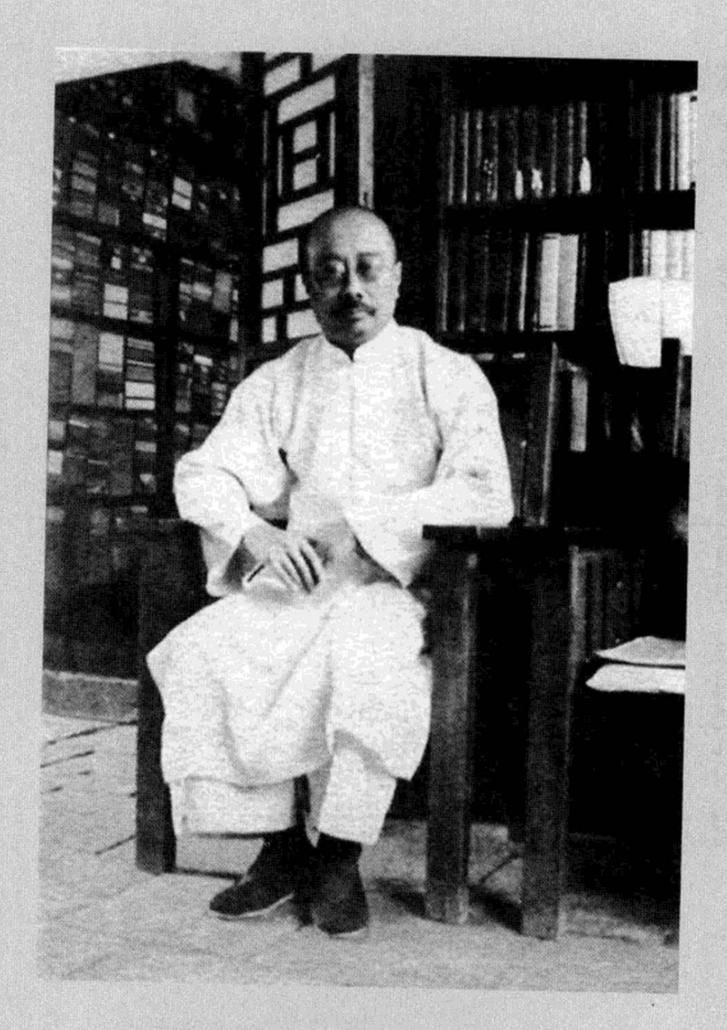
钟叔河编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摄影

（遇刺后三天在本宅西厢房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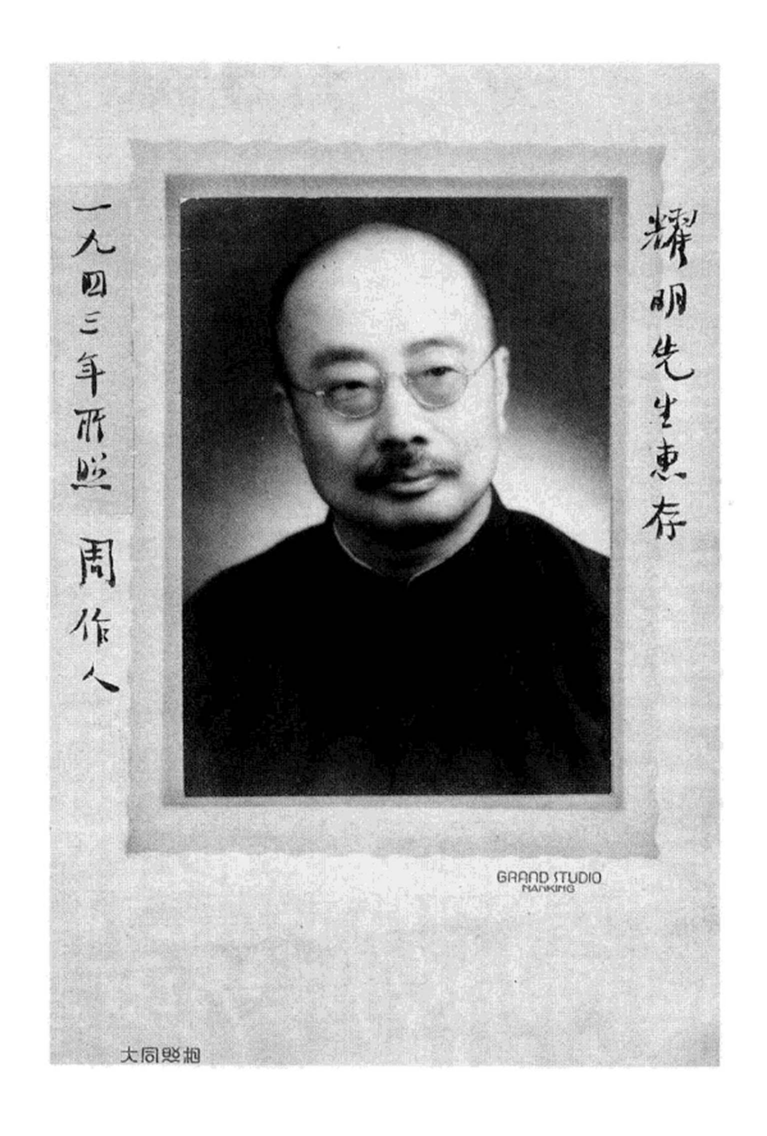


一九四零年摄于苦雨斋中





- **（上）武者小路实笃来访**
  （参阅本卷 43 · 022《武者先生和我》）
- **（右）武者小路实笃赠画**
  （画上题语意云，交情很好不亦美哉，见十四卷 63 · 005）



● 一九四三年摄影

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八卷

目录

(1938～1943)

1938

1939

【看书馀记】

1940

1941

1942

1943



复某君函促南行

1938年3月20日刊《戏言》创刊号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昨得快信，欣慰无似，承垂念尤感厚意。唯鄙人此刻不能移动，因家中人多，北大方面亦特准留平，俟日后再看情形。

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在沪，妻儿四人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并非上海的那位）亦在，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近来在译希腊文之古神话，向编译会支点款（前有《希腊拟曲》一册已由该会出版），目下聊可敷衍过去，殊不能有远大计划耳。

琐屑家事，不宜妄陈，唯此系实在理由，故述一二。



关于范爱农

1938年5月1日刊《宇宙风》第67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页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

> 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幽[①]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

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
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
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洌水，能否洗愁肠。

---

① “幽”原作“出”。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

微醉自沉沦[①]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

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

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

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

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

---

① “沦”原作“伦”。

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诗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廿七号。
>
> 《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实[①]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廋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馀，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槻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当[②]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荪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荪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

---

① "实"原作"别"。

② "当"原作"常"。

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1]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平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搂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猥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遂即住笔。

（廿七年二月十三日）

---

① 此处原衍"得"字，已删。



偶　记[①]

1938年5月作
未署名
收入《过去的工作》

日前见报记，大秦之酋训谕母人者，令多生育，以供战斗，又载其像，戟手瞋目，张口厉齿，状甚怪异。不佞正在译注希腊神话，不禁想起克洛诺斯吞其子女事，亦见古陶器画则所图乃是瑞亚以襁褓裹巨石代宙斯以进，而大神之貌亦平平耳。又想到《古孝子传》，郭巨埋儿，颇具此意。帝尧尝曰，多男子则多惧。此言大有人情，又何其相去之远耶。不佞自居于儒，但亦多近外道。我喜释氏之忍与悲，足补儒家之缺，释似经过大患难来的人，所见者深，儒则犹未也。尝思忍者忍己，故是坚忍而非残忍，悲者悲他，故是哀怜而非感伤。悲及妇孺，悲他之初步，忍于妇孺，则是忍他之末流矣。读德意志人希耳息菲尔特著书，谆谆以节育为言，对于东方妇女尤致惓惓，此真不忍人之心，中国本儒而受释之熏习，应多能了知者，然而亦不敢断言也。

---

① 自《凡人的信仰》(45·041)中辑出。

《诗经》中的雀与鼠

1938年6月21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小时候在书房里念《诗经》，见"厌浥行露"章有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又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觉得颇有趣，后来到北京才真懂得其意思，以前所知都未确实。以雀本常有之物，但在南方时所感到的，雀只是依人小鸟，如《埤雅》卷九引《雀赋》云："头如颗蒜，目如擘椒"，很是好玩的东西，虽然知道他一名瓦雀，言其宿檐瓦间，实在却不大感觉到，因为这与室内居人仍无甚交涉也。老鼠是可憎物之一，从小就觉得讨厌他，不过这也只是他的啮木，如东坡《黠鼠赋》中云："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无论如何，说他们穿屋穿墉，似非实在，或只是诗人比喻的话，但是在北京的人却知道这都是事实，而且是日常见到的事。麻雀在屋檐间作窠，他其实还从椽子中间挖开填塞的石灰，钻到里边去，把那屋瓦下的泥土簌簌的落在承尘上，非但听了讨厌，实在还要使得屋漏。老鼠则不很啮木，却善于掘土，往往从宅外墙根钻穴

进人家里来，屋内通路亦常在墙内或地下，与南方之盘屋栋者大不相同。有这种事情在目前，再看行露之诗，便知道诗人本来不是在用什么词藻或假设，乃是老实的记其见闻。郑渔仲在《通志》的《昆虫草木略》序中云：

> 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扁[①]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此天籁也。雎鸠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识鹿，则安知食草之趣与呦呦之声乎？凡牛羊之属有角无齿者则其声呦呦，驼马之属有齿无角者则其声萧萧，此亦天籁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声如是，又得蒌蒿之趣也。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关关呦呦之奥乎？若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谓瓜苦引蔓于篱落间，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者，谓桑叶最茂，虽未落之时而有沃若之泽。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奥乎？

郑氏此略二卷未能充实如其所言，但是这一节话却是说得很好，引用在这里，姑且当作有诗为证罢。

---

① “扁”原作“褊”。

关于《南浦秋波录》[1]

1938年7月2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得《南浦秋波录》抄本四册，分为纪由、宅里记、习俗记、岁时记、琐事记、纪人各篇，文笔既佳，亦颇有见解，在此类书中不可多得。题曰华胥大夫著，谢枚如在《赌棋山庄诗集》中有《〈南浦秋波录〉题后》六首，自注云，是录张亨甫所著，盖述台江冶游之事。亨甫又著有《金台残泪记》三卷，今收入《清代燕都梨[2]园史料》第一辑中，据我看去殊不及《秋波录》，盖文情实不足，不尽由于鄙人恶男倡之偏见也。《秋波录》所记习俗琐事多可备考究，文字简洁，又殊有见地，如"习俗记"中所云：

诸姬皆不缠足。（原注云，案缠足或以为始于六朝，始于中唐，始于齐东昏，始于李后主，其说不一，然前明被选入宫之

① 《晨报·药草堂题跋二十》。
② "梨"原作"黎"。

女尚解去足纨，别作宫样，可知不缠足原雅装也。）所穿屦，墙纵不过四寸，横不过二寸，底高不过二寸，长不过三寸，前斜后削，行袅娜以自媚，视燕齐吴越缠而不纤，饰为假脚者，觉美观矣。

尝阅崔东壁[①]《读〈风〉偶识》，见卷二“伯兮”章下有云：

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

一谈冶游，一讲经学，而此处意见甚相似，觉得很有意思。谢在杭著《文海披沙》卷五有“缠足”一条，末有云：

乐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谢灵运言素足之妇而不及短足之姝，即东昏玉奴步生莲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缠实佳。

张亨甫对于谢君的话盖亦多佩服，在“琐事记”中曾屡次称引，末一节云：

谢在杭又云，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伎哉，六

① “壁”原作“璧”。

朝以声[1]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染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

案原文见《五杂组》卷三地部一，在正经人看了或者以为不足为训，我却喜其平易近人情，胜于假道学，虽然歌伎的制度本来也不是我所赞成的。《赌棋山庄词话》卷六云：

去省会南门十里，地曰洲边湾里，皆水阁诸姬所居，详张亨甫《南浦秋波录》。……道光辛巳洲边灾时，太守王君楚常禁人扑救，延烧殆尽，后虽屡有兴作，而壮丽终逊从前，非必严禁知敛迹，盖亦一时财力之不及。吾友张任如仁恬尝言，神而五帝则人无不媚之者，人而娼妓则人无弗溺之者，故二处为销金巨壑，至五帝叹寂寞，娼妓多贫窭，则民穷财殚可知矣。乙巳予游连江，填《金缕曲》寄芑川，中云："官府催租声不断，误几家红粉飘零死。乐游曲，犹佳耳。"盖亦本此意也。嗟乎，论治者亦知歌舞为太平之象哉！

这意思与上文相似，谢枚如盖亦知言者也。我们又因此得知太守王某的故事，此人必是道学家，故能有此断然处置，如俞理初所谓虐无告也。《秋波录》"琐事记"中又有一则云：

《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所撰，《四库全书》无完本，而日本固有之，其于唐赵光远颇致讥词，以其作《北里志》故也。然

① "声"原作"盘"。

> 光远此书能流传异代，远播绝域，视著书千万言一旦灰飞烟灭，幸而存者又徒供人覆酱瓿，则犹愈矣。

此言盖是作者为自己解嘲，道理却亦不错。——不过远播绝域一语稍有误解，西域人见到《北里志》恐亦还是在中国也。二书同是述青楼红粉之言，正如文房所说，但《秋波录》出于近代，所记琐屑事尤多，都是风俗史上的很好资料，我觉得更有意思。近来想稍收集关于冶游之书，而既不专精，又复吝啬，结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的书中看去，则此册要算是很好的一种了。此类书籍的搜集保存责在图书馆，个人力量终是有限，寒斋收藏至今亦总不过二十馀种而已。

孙耀卿编《丛书目录拾遗》卷三云，《华胥大夫杂著》，建宁张际亮撰，光绪庚寅刊，其首二种即为《金台残泪记》与《南浦秋波录》，各三卷。高坐庵主人近从海王村得《秋波录》刊本，较抄本多人表数叶，又有自序，计百五十字，末署太岁庚寅送春日。案录中说及道光壬午后八年事，正是庚寅，乃道光十年，距刻书之年已甲子一周矣。（六月十九日记）



与某君书[①]

1938年8月1日刊《宇宙风》第72期
原件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承朱叶诸公远念，甚为感谢，唯惭愧实无善状可以相告耳。东方文化在芦沟桥以前已声明不懂，可不再谈，深自侥幸，即亦别无可谈者。目下拟专弄这一部神话……近来与燕大旧友说，想找数小时的功课，仍要翻译，且国文亦实非所知，只希望有二或四小时，并希望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尚未知能办到否。钱公前次曾以天下见让，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

---

① 自胡马《关于周作人》辑出，收信人不详，信亦不全。



谈关公[①]

1938年8月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秉烛后谈》

《越缦堂日记补》第五册咸丰八年戊午正月下云：

> 初七日甲申晴。下午进城至仓桥书肆，借得明人张青父丑《清河书画舫》十四册，归阅之，其论书画颇不减元人，间附考证亦多有据，又全载昔人题跋及诸评论，皆有意致可观，丑自赘者亦楚楚不俗，最宜于赏鉴家。昔钱思公尝言于厕上观杂书，未免太亵，若此者正当携之舟中马上耳。

乾隆时池北草堂刻本《书画舫》原有一部，看了这篇批评便找了出来，我不是赏鉴家，没有什么用处，也只是看看题跋之类罢了。卷一开首是"钟繇"，对于他的兴趣却并不在法书，还是由于《世说新语》所载司马昭嘲钟会的话："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

① 《晨报·药草堂笔记一》。

至。”其次是因为书。《画舫》上所录的一篇《贺捷表》，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二十四根据《绛帖》录有全文，今转抄于下：

>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仰[1]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同[2]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捷，馘灭凶逆。贼帅关羽已被矢刃，傅方反复，胡修背恩，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憙，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臣繇诚皇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3]臣繇上。

此文在《书画舫》中也有，但是有缺文，贼帅关羽四字都是墨钉，后面引广川书跋云：“永叔尝辩此，谓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关羽未死，不应先作此表。”又张丑注云：

> 《东观馀论》考《魏志》是年十月羽为徐晃所败，表内只云被矢刃，时羽为流矢所伤，未始言其死也，此表非伪，表云闰月是十月，非九月也。

上边三处羽字均非空格，与表文并看，可知是避讳无疑，盖是吴氏刻书时所为，张丑原本当不如是。查陈寿《三国志》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记关羽事凡九百馀言，所可取者唯报曹归刘一事耳，传末评曰：

---

① “仰”原作“伫”。

② “同”原作“回”。

③ “侯”原作“候”。

>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这是很得要领的话。张飞传中亦云，“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那么这两位实在也只是普通的名将，假如画在百将图里固然适宜，尊为内圣外王则显然尚无此资格。人家对张飞的态度也还是平常，如称莽撞人曰猛张飞（其实猛恐即是莽，今照俗音写），又吾乡有鸟，颊上黑白纹相杂，乡人称之曰张飞鸟（Tsangfi-tiau），亦不详其本名。若关羽便大不相同了，听说戏台上说白自称吾乃关公是也，这是戏子做的事，或者[①]可以说是难怪，士大夫们也都避讳，连《书画舫》这种书里也出现了，这不能不算是大奇事。论其原因第一当然是《三国志演[②]义》的传播。沈涛的《交翠轩笔记》卷四有一则云：

> 明人作《琵琶记》传奇，而陆放翁已有满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传《三国演[③]义》亦明人所作，然东坡集记王彭论曹刘之泽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文钱，会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嚬[④]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觉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云云。是北宋时已有演说三国野史者矣。

---

① “者”原作“若”。

②③ “演”原作“衍”。

④ “嚬”原作“吨”。

东坡时已说三国，固是很好的考证资料，但我所觉得有意思的还在别一件事，即是爱护刘皇叔的心理那时已如此普遍，这与关羽的被尊重是很有关系的。那时所讲的内容如何，现在已无可考，我们只看元至治刊本《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可以知道故事总是幼稚的很，一点都看不出五虎将怎样的了不得，可是有一件奇事，全相中所画人物身边都写姓名，就是刘皇叔也只能叫声玄德，唯独关羽却都题曰关公，似乎在六百年前便已有点神圣化了，这个理由很不容易了解。至治本《平话》不必说了，便是弘治年《三国志通俗演义》以至毛声山评本，里边讲的关羽言行都别无什么大过人处，至多也不过是好汉或义士罢了，无论怎么看没有成神的资格，虽然去当义和团等会党的祖师自然尽够。——义和的本字实系义合，这类点号至今在北方还是极常见，盖是桃园结义的影响，如刘关张之尚义气而结合，他们也会集了来营商业或练武技耳。关羽在民间所受英雄的崇拜我们可以了解。若神明的顶礼则事甚离奇，在《三国演义》的书本或演辞中都找不出些须理由来，我所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一件事。关羽封神称帝的历史我未能仔细查考，唯据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四云：

关庙之见于正史者唯《明史》有之，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按《元史祭祀志》，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与众祓除不祥，抬舁监坛汉关某神轿。夫曰抬舁神轿，则必塑像，有塑像则必有庙宇矣，然则庙始于元之先可知也。

又云：

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日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四十五年丁巳五月福藩常洵序刻洛阳关帝庙签簿曰，前岁予承命分封河南，关公以单刀伏魔于皇父宫中，托之梦寐间，果验，是以大隆徽号，由是敕闻天下而尊显之云云。予见各省关庙题旌皆同此号，殆始于明神宗时。

可知关圣帝君的名称起于万历，万历[①]是一位大昏君而其旨意在读书人中发生了大效力，十足三百年里大家死心塌地[②]的信奉。因为是圣是帝而又是神，所以尊严的了不得，避讳也正是当然，犹如不敢写丘字玄字一样，却不知道他原来是骄于士大夫的，读书人的丑态真是毕露了。他们又送“志在春秋”的匾额给他，硬欲引为同类，也很可笑。据本传裴松之[③]注云：

“羽为《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那么其程度似亦颇浅，后人如欲于武人中求《春秋》学者，何不再等几年去找那项下有瘿的杜预乎。阮葵生云，“雍正四年增设山西解州五经博士一人。”此亦是送匾之意，或可为读书人解嘲。不佞非敢菲薄古人，只因看不出关羽神圣之处何在，略加谈论，若是当他一条好汉，则当然承认，并无什么不敬之意也。（廿六年八月五日）

① “万历”原作“禹斋”。
② 原无“地”字，今增。
③ “裴松之”原作“裴山松”。



谈劝酒[①]

1938年8月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秉烛后谈》

因为收罗同乡人著作，得见兰亭陈廷灿的《邮馀闲记》初二集各二卷，初集系抄本，二集木刻本，有康熙乙亥年序，大约可以知道著书的时日。陈君的思想多古旧，特别是关于女人的，如初集卷上云："人皆知妇女不可烧香看戏，余意并不宜探望亲戚及喜事宴会，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归宁不可过三日，斯为得之。"但是卷下有关于饮酒的一节，即颇有意思：

古者设酒原从大礼起见，酬天地，享鬼神，欲致其馨香之意耳。渐及后人，喜事宴会，借此酬酢，亦以通殷勤，致欢欣而止，非必欲其酩酊酕醄，淋漓几席而后为快也。今若享客而止设一饭，以饱为度，草草散场，则太觉索然，故酒为必需之物矣。但会饮当有律度，小杯徐酌，假此叙谈，宾主之情通而酒

① 《晨报·药草堂笔记二》，又于11月10日刊《朔风》第1期，署名知堂。

> 事毕矣，何必大觥加劝，互酢不休，甚至主以能劝为强，客以善避为巧，竟能争智之场，又何有于欢欣哉。

又见今人钱振锽著《课馀闲笔》补中一则云："天下第一下流莫如豁拳角酒，切记此等闹鬼万不可容他入席。"二君都说得有理，不佞很有同意，虽然觉得钱君的话未免稍愤激一点，简单一点，似乎还该有点说明。本来赌酒也并无什么不可，假如自己真是喜欢酒喝。豁拳我不大喜欢，第一因自己不会，许多东西觉得不喜欢，后来细细推想实在是因为不会之故，恐怕这里也是难免如此。第二，豁拳的叫声与姿势有点可畏，对角线的对豁或者还好，有时隔着两座动起手来，中间的人被左右夹攻，拳头直出，离鼻尖不过一公分，不由不感到点威吓。话虽如此，挥拳狂叫而抢酒喝，虽似粗暴，毕竟也还风雅，我想原是可以原谅的。不过这里当然有必须的条件，便是应该赢拳的人喝酒，因为这酒算是赏品。为什么呢？主人请客吃酒，那么酒一定是好东西，希望大家多喝一点，豁拳赌酒，得胜[①]的饮，正是当然的道理。现在的规矩似乎都是输者喝酒，仿佛是一种刑罚似的，这种办法恐怕既不合理也还要算失礼吧。盖酒如是敬客的好东西，不能拿来罚人，又如是用以罚人的坏东西，则岂可以敬客乎。不佞于此想引申钱君的意思，略为改订云：主客赌酒，胜者得饮。豁拳虽俗，抢酒则雅，此事可行。如现今所为，殊无可取，则不佞对于钱君之说亦只好附议耳。

陈君没有说到豁拳，所反对的只是劝酒，大约如干杯之类。主与客互酬，本是合理的事，但当有律度，要尽量却也不可太过量，到了酩酊酕醄，淋漓几席，那就出了限度，不是敬客而是以客人为快

---

① "胜"原作"酒"。

了。这里的意思似乎并不以酒为坏东西，乃因为酒醉是苦事的缘故吧。酒既是敬客的好东西，希望客人多喝，本来可以说是主人的好意，可是又要他们多喝以至于醉而难受，则好意即转为恶意了。凡事过度就会难受，不必一定是喝酒至醉，即吃饭过饱也是如此。我曾听过一件故事，前清有一位孝子是做知府者，每逢老太太用饭，站在旁边侍候着，老太太吃完一碗就够了，必定请求加餐，不听时便跪求，非允许添饭决不起来。老太太没法只好屈服，却恳求媳妇道，请你告诉老爷不要再孝了，我实在是受不住了。强劝喝酒的主人大有如此情形，客人也苦于受不住，却是无处告诉。先君是酒量很好的人，但是痛恨人家的强劝，祖母方面的一位表叔最喜劝酒，先君遇见他劝时就绝对不饮，尝训示云，对此等人只有一法，即任其满斟，就是流溢桌上也决不顾。此是昔者大将军对付石崇的方法，我虽佩服却不能实行，盖由意志不坚强，平常也只好应酬一半，若至金谷园中必蹈[①]王丞相之复辙矣。

酒本是好东西，而主人要如此苦劝恶劝才能叫客人喝下去，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大抵因为酒这东西虽好而敬客的没有好酒的缘故吧。不佞不会喝酒而性独喜喝，遇酒总喝，因此颇有阅历，截至今日为止我只喝过两次好酒，一回是在教我读《四书》的先生家里，一回是一位吾家请客的时候，那时真是抢了也想喝，结果都是自动的吃得大醉而回。此外便都很平常，有时也会喝到些酒，盖虽是同类而且异味，这种时候大约劝酒的手段就很是必须了，输了罚酒的道理也很讲得过去。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云：“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极诚且敬，必不能不终

① “蹈”原作“踏”。

席，此生平之一劫也。”此寥寥数语，盖可为上文作一疏证矣。

（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在北平）

〔附记〕　阮葵生著《茶馀客话》卷二十有一则云：“俗语云，酒令严于军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尔招集，必以令为欢，有政焉，有纠焉，众奉命唯谨，受虐被凌，咸俯首听命，恬不为怪。陈几亭云，饮宴苦劝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气，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仆役以逼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士人而效斯习，必无礼无义不读书者。几亭之言可为酒人下一针砭矣。偶见宋人小说中酒戒云，少吃不济事，多吃济甚事，有事坏了事，无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语浅而意深。又几亭《小饮壶铭》曰，名花忽开，小饮。好友略憩，小饮。凌寒出门，小饮。冲暑远驰，小饮。馁甚不可遽食，小饮。珍酝不可多得，小饮。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湎流连，俾昼作夜，尤非向晦息宴之道。亭林云，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见星而行者非罪人即奔父母之丧。酒德衰而酣饮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所系岂浅鲜哉。法言云，侍坐则听言，有酒则观礼。何非学问之道。”

这一节在戴氏选本卷十，文句稍逊，今从王刊本。所说均有意思，陈几亭的话尤为可喜，我们不必有壶，但小饮的理想则自极佳也。　　（八月七日记）

〔附记二〕　赵氏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中有《遁翁随笔》二卷，山阴祁骏佳著，卷上有一则云：“凡与亲朋相与，必以顺适其意为敬，唯劝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强

之，百计以苦之，则何也。而受之者虽觉其苦，亦不以为怪，而且以为主人之深爱，又何也。此事之甚戾而举世莫之察者，唯契丹使臣冯见善云，劝酒当观其量，如不以其量，犹徭役不以户等高下也，强之以不能，岂宾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于契丹使臣之口。”

遁翁是明末遗民，故有此感慨，其实冯见善大概也仍是汉人，不过倚恃是使臣故敢说话，平常也会有人想到，只是怕事不肯开口，未必真是见识不及契丹人也。社会流行的势力很大，不必要有君主的威力压在上面，也就尽够统制，使人的言论不能自由，此事至堪叹息，伊勃生说少数总是对的，虽不免稍偏激，却亦似是事实。我想起李卓吾的事，便觉得世事确是颠倒着，他的有些意见实在是十分确实而且也平常，却永久被看作邪说，只因为其所是非与世俗相反耳。劝酒细事，而乃喋喋不休，无乃小题而大做乎，实亦不然。世事颠倒，有些小事并不真是小，而大事亦往往不怎么大也。

（八月二十八日再记）

〔附记三〕　近日承兼士见赐抄本《平蝶园先生酒话》一册，凡四十七则，不但是说酒而且又是越人所著，更是可喜。妙语甚多，今只录其第二十四则云：“饮酒不可猜拳，以十指之屈伸，作两人之胜负，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酒以为人合欢，因欢而赌，因赌而争，大杀风景矣。且所谓赢也者，以吾手指所伸之数合于彼指所伸之数，而适符吾口所猜之数，则谓之赢，反是则谓之输，然而甚无谓也。所谓赢者，其能将多馀之指悉断而去之乎？所谓输者，其能将无用之指终身屈而不伸乎？静言思之，皆不可也，皆不能也。天下得酒甚

难，得酒而逢我辈饮则更难，得酒而能与我辈能饮之人共饮则尤其难。夫以难得之酒而遇难饮之人，且遇难于共饮之人，吾方喜之不遑矣，又何必毒手交争为乐耶。盘中鸡肋，请免尊拳，无虎负嵎，不劳攘臂。”

《酒话》有嘉庆癸酉自题记，又有咸丰元年辛亥朱荫培序，称从蝶园子筠士得见此稿，乃应其请写此序文。寒斋有朱君所著《芸香阁尺一书》二卷，正是平筠士所编刊者，书中收有与筠士札数通，虽出偶然，亦是难得。芸香阁原与秋水轩有连，前曾说及，今又见此序，乃知其与吾乡有缘非浅也。

（十月三十日记于北平苦住庵）



药草堂记[1]

1938年8月1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阅涵芬楼印本《顾氏文房小说》，见唐子西文录中有一节云：

> 关子东一日寓辟雍[2]，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剉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

吾甚喜此言，尝欲取室名为养性堂，颇似药店的名字，假如我有资本，倒不妨索性开他这么一爿大店，就只可惜的是无此财力，所以连这名字也不好要了。又阅《茶馀客话》，见记有古圣先贤的小名字，神农氏居首，则与贱名相同。案据小时候所读《鉴略》，神农氏乃是尝药辨性的一位神人，从一方面说，鄙人不合犯其圣讳，但是

---

① 《晨报·药草堂笔记五》。

② “雍”原作“雝”。

从又一方面说，却也是三生有幸了。鄙人与药可知很有一种缘分，假如要取一个别号，则药字实大可用得。昔者我先人居于季彭山之故里，有园一区，锡嘉名曰百草，乃及吾身而失之，今所居无园矣，堂屋则尚存，遂称之曰药草堂，聊以寄意。民间传说神农有水晶肚皮尝百草，故能识别其功用，鄙人岂有此力量，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耳。鄙人所喜读的书之一为《本草》，那么即以此为堂中陈设，佐以《诗疏》《尔雅疏》，俨然医而儒者，不亦可乎。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五日，药堂叟自记。



读《笑赞》[1]

1938年8月1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笑赞》一卷七十二则，明清都散客著，即赵梦白，曾参劾严嵩之赵忠毅公是也。其第五十一则云：

>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

案卓吾老子对于此事不曾有什么表示，盖因无人问他之故，甚为可惜，但他的意见在别的文章中亦可窥见一点，如《焚书》卷二

① 《晨报·药草堂笔记六》。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即此可知卓吾之意与赵世杰妻相同，以为男子妇人有甚差别者也。此在卓吾说出意见或梦白提出疑问，固已妙矣，但还不算甚难，若赵世杰妻乃不可及，鄙人涉猎杂书，殊未见第二人，古今富贵人有恃其富贵而大胆胡行者如武则天，则虽入《无双谱》，却不能与此相比也。至于被打盖是当然，卓吾亦正以是而被打，梦白隐于笑话，亦幸而免耳。若赵世杰者乃是正统派也，正统派在社会上是正统，但在笑话书中便是笑话了。笑话乃是草里春秋，鄙人之所以不敢轻看滑稽文学者盖以此耳。（七月十日）



卖糖

1938年9月1日刊《宇宙风》第74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崔晓林著《念堂诗话》卷二中有一则云："《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箫，今鸣金。予考徐青长诗，敲锣卖夜糖，是明时卖饧鸣金之明证也。"案此五字见《徐文长集》卷四，所云青长当是青藤或文长之误。原诗题曰《昙阳》，凡十首，其五云：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仓。善哉听白佛，
梦已熟黄粱。托钵求朝饭，敲锣卖夜糖。

所咏当系王锡爵女事，但语颇有费解处，不佞亦只能取其末句，作为夜糖之一佐[①]证而已。查范啸风著《越谚》卷中饮食类中，不见夜糖一语，即梨膏糖亦无，不禁大为失望。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

① "佐"原作"左"。

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因形似龙眼故,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色,每粒价一钱,若至大路口糖色店去买,每十粒只七八文即可,但此是三十年前价目,现今想必已大有更变了。梨膏糖每块须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问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茄脯与梅饼。以沙糖煮茄子,略晾干,原以斤两计,卖糖人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茄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币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竞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架夹胁下,左臂操筐,俗语曰桥,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此锣却又与他锣不同,直径不及一尺,窄边,不系索,击时以一指抵边之内缘,与铜锣之提索及用锣槌者迥异,民间称之曰镗锣,第一字读如国音汤去声,盖形容其声如此。虽然亦是金属无疑,但小说上常见鸣金收军,则与此又截不相像,顾亭林云卖饧者今鸣金,原不能说错,若云笼统殆不能免,此则由于用古文之故,或者也不好单与顾君为难耳。

卖糕者多在下午,竹笼中生火,上置熬盘,红糖和米粉为糕,切片炙之,每片一文,亦有麻餈,大呼曰麻餈荷炙糕。荷者语助词,如萧老老公之荷荷,唯越语更带喉音,为他处所无。早上别有卖印糕者,糕上有红色吉利语,此外如蔡糖糕,茯苓糕,桂花年糕等亦具备,呼声则仅云卖糕荷,其用处似在供大人们做早点心吃,与炙糕之为小孩食品者又异。此种糕点来北京后便不能遇见,盖南方重米食,糕类以米粉为之,北方则几乎无一不面,情形自大不相同也。

小时候吃的东西，味道不必甚佳，过后思量每多佳趣，往往不能忘记。不佞之记得糖与糕，亦正由此耳。昔年读日本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三有讲朱舜水的几节，其一云："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原本汉文。）

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馀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唯不佞可解。馀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了也无人懂之故欤。但是我又记起《陶庵梦忆》来，其中亦不谈及，则更可惜矣。

（廿七年二月廿五日漫记于北平知堂）

〔附记〕《越谚》不记糖色，而糕类则稍有叙述，如印糕下注云："米粉为方形，上印彩粉文字，配馒头送喜寿礼。"又麻糍下云："糯粉，馅乌豆沙，如饼，炙食，担卖，多吃能杀人。"末五字近于赘，盖昔曾有人赌吃麻糍，因以致死，范君遂书之以为戒，其实[1]本不限于麻糍一物，即鸡骨头糕干如多吃亦有害也。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食品很是重要，不但是日常饭粥，即点心以至闲食，亦均有意义，只可惜少有人注意，本乡文人以为琐屑不足道，外路人又多轻饮食而着眼于男女，往往闹出《闲话扬州》似的事件，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滋味，大可谈谈也。

（廿八日又记）

---

① "实"原作"食"。



友情的通信

1938 年 9 月 16 日刊《宇宙风》第 75 期
署知堂译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 武者小路实笃怀周作人文

近来时常想起周作人的事来。周作人在新村刚成立的时候来村相访,又在北京给我们办新村支部。现在对于新村恐怕没有以前那么的热意了吧,但前几年来东京时事情很忙也特地来赴村的东京支部的会。现在这个时候,假如村里有点钱,本来想叫谁去一趟慰问周作人。我自己也未尝没有想去的意思。可是我又想这或者于他反有妨碍吧。不过正如我爱日本一样,周作人之爱支那是当然的事,我的友情不会得使他人对于周作人之爱支那的事引起什么疑惑的。但是我又想,在这个时候还是慎重一点好吧,但是当作友人想慰问他那也是事实。

周作人以文学者的立场似很尊敬藤村,但别人的著作也是爱读,对于新村的事业却在最深的一点上加以赞成,种种的介绍给本

国人。村的工作是大家都是友人的办法，却并不是说对于敌人也应无抵抗的那种主义。爱国心既然是自然的，我们也承认。实际有些支那的青年人同我一起到村里去的时候，谈别的话可以很愉快的谈，讲到日支战争，那支那的青年友人与村里的青年人之间便发生颇剧烈的议论。我承认爱国心是美的，默然的对于双方都怀着好意地听着，可是说到支那似乎是很强的国，就是和俄国或英国对抗也不会失败，我也有点出惊了。

我和周作人互相尊重感情，不曾提及这种事情。周作人是有品格的镇静的和平的人。他和哥哥鲁迅性质似不同，我觉得鲁迅也是好的人，但同周作人可以自在地说话，日本话能说也很方便。

我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什么。听了反正也不能有什么用，但是我想到，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至少我想关于一身上的事情，想替代了亲族的人种种地询问看。我想在这些时候所谓村的兄弟正该有用吧。

新村现在还是太贫弱。但是对于周作人怀着敬意与爱，在这时候发表了，周作人不会感到什么妨碍的吧。

我们以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至少愈益感到友情，这总是事实。我们是衷心祈望他的幸福的人。

（二）周作人寄武者小路书

启者，久未问讯，甚歉。日前承友人注意，始借读《日本评论》，得见尊著随笔，关于鄙人多蒙垂念，感何可言。夙承高谊，不独感谢，且亦感动，唯别无一事可酬高谊者，不胜[1]遗恨。现今中日两民

---

① “胜”原作“堪”。

族正在战斗中。既然别无道路，至于取最后的手段，如再讲什么别的话，非但无用，亦实太鄙陋矣。如或得晤面，则或当说废话发牢骚，亦未可知，但现今写却是不想了。读尊作后甚想奉书，又恐多言，如或使更感到寂寞则亦甚抱歉，故只此不赘，诸希谅察。匆匆。

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案］ 武者小路原文见三月号《日本评论》中，系《牟礼随笔》之一。一个多月以前纪生来说起有这一篇文章，问要看么，我说看看也好。后来纪生拿来，我当时翻阅一过，随即还了他。下一次纪生来时又说及此文，问曾写文回答么，看武者小路也是很寂寞的样子，不妨回答他一下。我口头唯唯，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但礼仪上或者也该寄一封信去吧，于是再向纪生借那册杂志看。不久杂志送来了，我再读了一遍之后，回答益感困难，盖其重要之点我均无词以对也。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一则我向来很喜欢，所谓俗即鄙陋也，日本语云野暮。迟延数日始拟信稿，及写时仍删削去其六七，生怕语太俗也。我的本意只在谢其见念之意，即此已足，但此回信能否减少或是否更增多其寂寞，此则我自己也不能知道了。

廿七年四月三十日译了后记。



《燕都风土丛书》序

1938年10月8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

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馀年，则最久矣。在杭州时才十三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无物作纪念也。

世变既亟，此类无益之书恐已为识者所屏弃，以时务言似亦正当，唯不佞犹未能恝然，非欲以遣有涯之生，实由心喜之故，此外亦

无可解辩，但生计困难，欲读无书，正无奈何耳。此时忽得张次溪先生书，云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将次第刊行。张先生岭表世家，寄居北京有年，研究地方掌故，著述甚多，今又有此盛举，可谓难能可贵矣。在史学上价值如何重大，自有学者能言之，非闲汉所宜插嘴，不佞则但喜得有如许好书汇为一集，供爱好者之披览，此固不限于今日，唯在今日自更足珍重也。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八日旧中秋风雨中，周作人记于北平知堂。



儿时杂事

1938年11月1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秉烛后谈》

偶读史震林《西青散记》，此书太漂亮，有才子气，非不佞所喜，但其中也有几节可取，如卷二《记儿时诸事》即其一。文云：

事有小而不忘，思之不可再得，与人言生感慨者。忆三四岁时最喜猬。猬刺如栗房，见人则首尾相就如球，啼时见猬即喜笑，以足蹴之辘辘行。获乳兔二，抱而眠，饲以豆叶，不食而死，哭之数日。八九岁独负筐采棉，怀煨饼，邻有兄名中哥，长一岁，呼中哥为伴，坐棉下分煨饼共食之。棉内种芝麻，生绿虫，似蚕而大，捻之相恐吓，中哥作骇态，蹙额缩颈以为笑。后虽长，常采棉也。采棉日宜阴，日炙败叶，屑然而脆，粘于花，天晴每承露采之，日中乃已，或兼采杂荻，棉与荻相和筐中，既归乃别之也。幼时未得其趣。前岁自西山归湖上，携稚儿采棉于村北。秋末阴凉，黍稷黄茂，早禾既获，晚菜始生，循田四

望，远峰一青，碎云千白，蜻蜓交飞，野虫振响，平畴良阜，独树破巢，农者锄镰异业，进退俯仰，望之皆从容自得。稚儿渴，寻得馀瓜于虫叶断蔓之中，大如拳，食之生涩。土蝶飞掷，翅有声激激然，儿捕其一，旋令放去。晚归，稚儿在前，自负棉徐步随之，任意问答，遥见桑枣下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

卷一又述王澹园语云：

迩者幼儿学步，见小鸟行啄，鸣声啁啾，引手潜近，欲执其尾。鸟欺其幼也，前跃数武，复鸣啄如故焉。凝睇久立，仍潜行执之，则扈然而飞。鸟去则仰面嘲哰而呕哑，鸟下复然。观此自娱也。

此是闲看儿童捉柳花的说法，却亦精细有情致，似易而实难也。沈三白《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首节云：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年长思之，二虫之斗，盖图奸不从也。

古语云，奸近杀，虫亦然耶。贪此生涯，卵（原注云吴俗呼阳曰卵）为蚯蚓所哈，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妪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惊而大哭，传为话柄。

舒白香《游山日记》卷二，嘉庆九年六月辛巳条下有一节云：

予三五岁时最愚，夜中见星斗阑干，去人不远，辄欲以竹竿击落一星代灯烛。于是乘屋而叠几，手长竿撞星不得，则反仆于屋，折二齿焉，幸犹未龀，不致终废啸歌也。又尝随先太恭人出城饮某淑人园亭，始得见郊外平远处天与地合，不觉大喜而哗，诫御者鞭马疾驰至天尽头处，试扪之，当异常石，然后旋车饭某氏未迟。太恭人怒且笑曰，痴儿，携汝未周岁自江西来，行万里矣，犹不知天尽何处，乃欲扪天以赴席耶。予今者仅居此峰，去人间不及万丈，顾已沾沾焉自炫其高，其愚亦正与孩时等耳。随笔自广，以博一笑。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卷六有云：

犹记儿时读《博物志》云，五月五日取青蛉头，正中门埋，皆成青珠。因于天中节扑得青蛉，将取锄以瘗。顾先生见而诃之，具以实告。先生笑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孺子太不解事。斯语可为读死书者下一针砭也。

钱振锽《课馀闲笔》中有一则云：

余稚时性暴厉不堪，戕物尤甚。尝杀池中巨螺数百，尸而

> 陈之，被塾师所见，怒其暴殄天物，大加让斥。又尝有群蚁千百至案上，余杀之无遗。家中九峰阁尝有群蜂入焉，借以御冬也，余又烬[1]而歼之，至千百计。种种罪案，难以悉数。至今不过三五年，性气大变。时值十月，阁中群蜂百族相聚，诸弟年幼尝欲歼之，皆被余拦阻。一日援笔作诗未竟，蜂从颈后猛刺数下，大为所苦，余不过诛其罪魁一耳，他不及问也。

以上数节，虽文章巧拙有不同，其记述儿童生活都颇有意思。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发达的地方，这样的东西原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们中国，就不能不说是难得而可贵了。不过大抵难免有小毛病，即其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追记儿时生活，多少另有作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滦阳消夏录》卷五有云：

> 余两三岁时尝见四五小儿，彩衣金钏，随余嬉戏，皆呼余为弟，意似甚相爱，稍长时乃皆不见。后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无子，每令尼媪以彩丝系神庙泥孩归，置于卧内，各命以乳名，日饲果饵，与哺子无异，死后吾命人瘗楼后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后来为妖，拟掘[2]出之，然岁久已迷其处矣。

这是很好的一例。纪君喜言鬼怪，其笔记五种共二十四卷，不说到妖异的大约不及百一，日前检阅一过，备近代随笔之选，可取者才八则而已。上文所引尚有大半，意在叙说前母显灵，此只是陪衬，

① “烬”原作“尽”。
② “掘”原作“拙”。

但我们如断章取义，亦可作儿童生活考察之资料。小儿感觉与大人异，或有时自有幻景，即平时玩弄竹马泥人亦是如此，如沈三白所说可为例证，纪晓岚则更进一步耳。泥孩为妖，不佞不以为可能，在古人原自无怪，且纪君若不为此便不涉笔，正亦赖有此种迷信，乃得留下一点资料，在民俗志中求子与祈年固是同样的重要者也。往见外国二三歌咏儿童的文学之总集，心甚喜爱，惜中国无此类书物，欲自行编辑则无此时光与力量，只就所见抄录一二，以自怡悦。范啸风自传已别有摘录，兹亦不再抄入矣。

（廿六年九月廿一日录于北平）

〔附记〕 森鸥外著《伊泽兰轩传》第一百三十九节引用北条霞亭所著《霞亭涉笔》，有云："记二十年前一冬多雪，予时髫龀，喜甚，乃与稚弟彦就庭砌团雪，塑一布袋和尚，坐之盆内，爱玩竟日，旋复移置寝处，褥卧观之。翌日起问布袋和尚所在，已消释尽矣。弟涕泣求再塑之不已，而雪不可得，母氏慰谕而止。后十馀年，彦罹疾没。尔来每雪下，追忆当时之事，其声音笑貌，垂髦之葳蕤，彩衣之斑斓，宛然在耳目，并感及平生之志行，未尝不怆然悲苗而不秀矣。"案，霞亭生于日本安永九年（一七八〇），《涉笔》作于文化戊辰（一八〇八），即舒白香著《游山日记》的后四年也。所云二十年前，盖是一七八八年顷，霞亭时年九岁，其弟彦则五岁也。

（九月二十二日再记）



谈搔痒

1938年12月10日刊《朔风》第2期
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周栎园著《书影》卷四有一则云：

有为爬痒庋[1]语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闻之捧腹，因谓人曰，此言虽戏，真可喻道。及见杨道南《坐坐爬痒口号》云，手本无心痒便爬，爬时轻重几曾差，若还不痒须停手，此际何劳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学道如同痒处爬，斯言犹自隔尘沙，须知痒处无非道，只要爬时悟法华。栖霞寺云谷[2]老衲曰，二先生不是门外汉。予谓二公之言尚落拟议，不若庋辞之当下了彻也。

《北平笺谱》卷一载淳菁阁罗汉笺十六幅，末幅画一人以爪杖搔背，

① "庋"原作"庋"。
② "谷"原作"各"。

题词云：

上些不是，下些不是。搔着恰当处，惟有自己知。

这里不是谜语，说得更为明白，意思却是一样，未必真能喻道，或者可以作学与文的一个说明罢。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十七《啇翁繁史》中有一则云：

人之于学虽根器不同，要须自证自悟始得，靠人言语，终落声闻。故程氏云，不能存养，只是说话。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于诤。吾夫子云，朝闻道。亦自闻耳，不待人也。故曰，说食不饱。

普通常引《传灯录》里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二语自多风趣，但搔痒之喻更为直截明了，自证自悟，正是如此耳。俗称议论肤泛为隔靴搔痒，又笑话中说胡涂人搔同卧者腿至于血出，都也说得有意义，盖如世人所说，痛可熬痒不可熬，痒得搔是大快乐，而过中又与痛邻，其间煞费斟酌也。《太平御览》三百七十引《列异传》云：

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得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

神仙发怒固然难怪，蔡经见长爪而思搔痒，虽未免不敬，却也是人情。曹庭栋著《老老恒言》卷三杂器条下有"隐背"一则，文云：

隐背，俗名搔背爬，唐李泌取松樛枝作隐背，是也。制以

> 象牙或犀角，雕作小兜扇式，边薄如爪，柄长尺馀，凡手不能到，持此搔之，最为快意。有以穿山甲制者，可解瘌痒，能解毒。

据《格致镜原》五十八引《稗史类编》转引《释藏音义指归》云：

> 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背脊有痒，手不到，用以搔爬之，如人之意。

又《云仙散录》中有"陶家瓶馀事"一则云：

>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叹曰，妨吾声律半工。

以如意为搔背具颇有意思，虽然一般对于如意的解说并不如此，如屠隆著《考槃馀事》卷四文房器具笺云：

> 如意，古人用以指画向往或防不测[1]，炼铁为之，长二尺有奇，上有银错，或隐或现。近有天生树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凿者，亦佳。

又游具笺"衣匣"下云：

> 匣中更带搔背竹钯并铁如意，以便取用。

---

[1] "测"原作"侧"。

可见如意与爪杖分而为二。宋释道诚著《释氏要览》卷中云：

> 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指归云云，故曰如意。诚尝问译经三藏通梵大师清沼，字学通慧大师云胜，皆云，如意之制盖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状如云叶，又如此方篆书心字故，若局爪杖者，只如文殊亦执之，岂欲搔痒也。又云，今讲僧尚执之，多私记节文祝辞于柄，备于忽忘，要时手执目对，如人之意，故名如意，若俗官之手板，备于忽忘，名笏也。若齐高祖赐隐士明僧绍竹根如意，梁武帝赐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伦王敦皆执铁如意，此必爪杖也。因斯而论，则有二如意，盖名同而用异也。

诚公所说大抵是对的，有如高僧或是仙人手执拂子，成为一种高贵法物，但其先本只是蝇拂耳，在俗人房中仍用以赶蚊子，儿时见有批棕榈叶为之者，制甚古朴，实胜于马尾巴也。讲经时的如意今已不见，搔背竹钯则仍甚通行。日本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卷二十六爪杖下云：

> 案爪杖用桑木作手指形，所以自搔背者，俗谓之麻姑手。麻姑，仙女名也，《五车韵端》载麻姑山记云，王方平降蔡经家，召麻姑至，年若十七八女子，指爪长数寸，经意其可爬痒，忽有铁鞭鞭其背，以此故事名耳。

麻姑手读作 Makonote，今音转为 Magonote，可解作孙儿手，或与老人更为适切，但其原语盖出于麻姑，古今解说均如此云。北平市上今亦有售者，竹制如手状而多有六指，虬角制者稍佳，但所谓化

学制造者品终不高耳。此物终古流行，可知搔痒之亦是一急务也。《释氏要览》卷下论剪爪引《文殊问经》云："爪许长一横麦，为搔痒故。"此意甚可喜。释家戒律虽极严密，却亦多顺人情处。《礼记》内则中记子妇在父母舅姑之所的规矩，有"痒不敢搔"之语，殊令人有点为难，想起王景略辈时更不禁深为同情也。

〔附记〕 吾乡茹三樵著《越言释》二卷，卷下有乖脊一条，即是释痒字者，其文云："曰乖曰脊，皆背也，而今人谓痒曰乖脊，以痒不可受而背痒为尤甚也，所以背痒谁搔，汉光武至形之诏旨，为能极人情之至。然头痒而曰头乖脊，脚痒而曰脚乖脊，未免失其义矣。或曰疥脊也，凡牛马驴骡之属多疥其脊，即《传》所谓瘯蠡者。或又以疥终不可以为乖，则又以乖加疒，今字书有𤵷字，则愈求而愈远。又痒亦作癢，其实只是养，诗言中心养养是也。古人往来通问必曰无恙，恙者病也，或曰恙者虫也。然物不病不痒，不虫亦不痒。蛘，搔蛘也。"

茹君以易学名家，著有《周易二闻记》等十馀种，唯不佞最喜此《越言释》，曾得乾隆原刻，又光绪中啸园葛氏刊巾箱本，据杜尺庄道光中原序知当时尚有家一斋公刊本，即葛氏所从出，惜未能得。以背痒释俗语乖脊之义，很有意思，唯越语亦有分别，搔痒云搔乖脊，若呵痒则仍曰呵痒，故乖脊与痒是两种感觉，此在别的地方不知如何分说也。

（二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再记）

［案］ 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七有《不求人铭》三首，即咏爪杖者，此名亦自佳，但少风趣而有头巾气，不及如意远矣。编校时记。



读《东山谈苑》[1]

看书馀记(一)

1938年6月2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灯下记于苦茶庵西厢。

---

① 1938年6月起在《晨报》陆续发表的《药草堂题跋》,至8月易名《药草堂笔记》,《书房一角》统称《看书馀记》,今从之。

〔附录一〕

关于《东山谈苑》

启者:读贵刊三十三号关于影印东山谈苑记事,中云,“唯自清初至今尚无刻本,学者憾之”,此似与事实稍不符。玉琴斋词末有戊辰(民国十七年)陈散原先生跋云:“东山谈苑者为余家旧藏抄本,笔致娴雅,疑亦澹心所手录,早岁侍先公居长沙,曾用坊肆铅制字印行,今垂五十年矣,印稿既散尽,原抄本亦失。”此种印本鄙人曾于戊戌前后购得一册,题页背面云,“光绪丁丑酉腴仙馆仿聚珍牍”,即一八七七年,距戊辰(一九二八)盖五十一年矣,然在三十五六年前则普通书坊中固常能见到也。

此上

图书副刊编辑部台鉴　　　　六月三十日,周作人启。

〔附录二〕

寄甘山

手书诵悉。承示文章,颇有兴趣。昨晚偶读余澹心《东山谈苑》,随笔写一小文,另纸录呈,以发一笑。无兴趣亦无闲暇写长篇文字,随手作百许字题记,聊可自娱,但苦于不能惬好,大抵不难于巧而难于拙,阁笔自思,往往惭愧与快乐夹杂也。

上午方录好一纸,开元师兄来便尔持去,饭后重抄,恐字益草率矣。不具。　　　　二月二十一日,药堂白。

读《大学》《中庸》[1]

看书偶记（二）

1938年6月24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难懂，懂得的地方都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矣。不知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异，此其三也。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复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　　　　（三月五日）

---

① 《晨报》题《读〈礼记〉》，入集时改，附录《寄法明》一则文集未收。

〔附　录〕

寄法明

偶写小文，录出呈览。此可题曰《读大学中庸》，题目甚正经，宜为世间所喜，惜内容少差，盖太老实而平凡耳。唯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给朋友们一看，虽是在家人亦不打诳语，此鄙人所得之一点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到，匆匆，不多赘。

三月六日晨白。



读《经律异相》

看书馀记(三)

1938年6月29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阅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四十八"禽畜生部十"，"千秋"条下引《婆须蜜经》第八卷云："千秋人面鸟身，生子还害其母，复学得罗汉果，畜生无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中国旧说，鸟兽中之不孝者有枭与破镜，破镜不知为何物，枭则世间多有，只会吞吃小鸟及老鼠等，不能食他鸟也，而久蒙食母之恶名，千秋人面鸟身，岂亦其同类耶。印度事情不能知悉，惟其体察物情，开遮合理，先贤博大之精神可想也。中国儒生严于人禽之辨，而此等处又缠夹不清，有愧和尚们多矣。（三月九日晨记）



读《柳崖外编》

看书偶记（四）

1938年6月29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徐崑后山著《柳崖外编》十六卷，笔意学聊斋，世又传其为蒲留仙后身，论其位置，大抵也就是如此。卷十五《断肠草》一则，辨证名物，别有意思，案语第二节中，辩《兼明书》谓蔓菁即萝菔之非，有云："如黄鸟亦名仓庚，亦名黄鹂，《诗经》屡见，而乡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乡，时春日双桐斋畔黄鸟睍睆可听，而乡人呼之曰黄瓜娄，盖即黄栗留之转讹，若非羽毛声音显然可辨，又乌知黄瓜娄之即黄鸟也。世儒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未有不如《齐民要术》及《兼明书》之自以为是者。"此数语说尽笺注虫鱼之通病，只郝兰皋一人或可称例外耳。现代博物学家可以有兴趣来提倡古文，却无意于考订文史上的名物，此是别一种鄙陋，而其病源则一也。博雅之士，才真能使学术与艺文接触，中国到何时始有此希望，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思之怅然。



读《云仙散录》

看书馀记（五）

1938年6月29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云仙散录》三百馀条，一读即可知是冯氏所自造，大抵爱华丽纤巧，与陶縠之《清异录》鼻息相通也。援引虽不足凭信，后世即据此为故实，通用至今者亦复不少。卷中三出《渊明列传》，所写却都不似，犹不如《庐阜杂记》所说攒眉一事，能具陶公面目。其记孟浩然的两节，如苦吟至眉毫尽落，又看视鱼竹，均颇有可喜处，虽然竹有几节，鱼有几鳞，不佞亦是不知，本来笑不得孟君也。

（三月廿一日）



题《藤阴杂记》

看书偶记(六)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戴菔塘《藤阴杂记》十二卷，清末有重刊本。数年前曾求得其原刻，自序署嘉庆丙辰，题叶只写书名，不记年岁。近日又得一部，则左右有字两行云，嘉庆庚申增辑，石鼓斋镌。校阅本文，计卷一末多一则，卷八多两则，卷十二多一则，原板补刻者也。昔尝与饼斋戏语，模拟书中所记，大抵如云，朱竹垞迁居至南横街，中途覆车，损一书簏。惟事虽琐屑，亦复有可喜处，只可惜诗多而记事少耳。　　　　（四月十三日烛下记于北平知堂）

重刊板现存湖州会馆，民国初年有董君新印若干以赠人，寒斋因亦有其一部。董君时为部吏不得意，一日访乡先达于积跬步斋，大发牢骚，意欲蹈海。先达倾听良久，徐答曰，我看可以慢慢的来。本系方言，难以记录得恰好，惟此应答极有意思，前辈风度俨然如见，可以收入民国的《世说》中去。因《藤阴杂记》辄复忆及，附记于此，亦复可备吴兴掌故之一也。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读《孔子集语》

看书馀记(七)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孙星衍辑《孔子集语》卷二,据《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二引师觉授《孝子传》云:

>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黡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黡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黡持蒲弓木戟,而与子崔战而死。

此文重在记子崔之孝,但是我们看过去留在眼里的,却是狐黡。此等人盖是周时所特有,如《孟子》里的庾公之斯,《檀弓》里的工尹商阳,武士而有儒雅气,殆是儒家理想的传说英雄,与《史记》刺客列传中人气味又不相同也。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未必实有,但于此可以见造作者的心情愿望,亦是有趣味的事。我所以喜欢此故事者,盖亦为此故耳。　　(廿七年四月十四日)



题《乡言解颐》

看书余记(八)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乡言解颐》五卷，十年前在孔德学校见书估挟此书，隅卿谓尚可看，劝以薄值收得。内有缺叶，去年夏从石君借得一本，抄补卷末所缺两纸，卷三则仍缺一叶也。书中不出撰人姓名，惟自序称瓮斋老人，据本文知其姓李，宝坻人，号朴园而已。前日在南新华街得《虚受斋诗钞》十二卷，附《朴园感旧诗》一卷，宝坻李光庭著，乃知即是此人。《乡言》中之造室十事(庚子)，消寒十二事之八(己丑)，新年十事(丁亥)，杂物十事(己亥)，金银钱三事(戊戌)，各诗均见集中，注有年岁。诗抄止于庚子，《乡言》题署庚戌，盖又十年后矣。朴园诗虽卷卷有张南山批点题咏，以余观之，其可喜终不及《乡言》，而《乡言》中之记述注解亦比所收韵语为可贵。余喜得诗抄，因其为瓮斋之作，实犹屋上之乌鸟耳。《乡言》在隆福寺街又陆续得二部，卷三缺叶如故，殆真是板缺，无可如何，至今亦未能借得全本抄补之也。 (四月二十六日)

题《会稽三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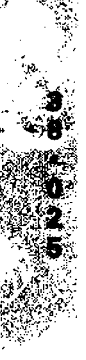
看书馀记（九）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会稽三赋》为越中一重要文献，诚如陈春氏所云，吾郡人家置一编，只可惜寒斋所收不多，亦无珍本耳。此章石卿刊本，系乡人所刻，且字大疏朗可喜，较惜阴轩刻尤便于观览，惟原本有陶歇庵序，南姜泉后序，今乃悉不存，未审何故，岂或偶脱落耶。

（四月二十七日记）

案《会稽三赋注》通行有两本。甲一卷本，宋周世则史铸注，有史序，萧山陈氏山阴杜氏均有重刊本。乙四卷本，明南逢吉尹坛注，有南跋，凌弘宪陶望龄序，天启中吴兴凌氏刊朱墨印本。此本因有歇庵眉批及总评，颇为周郑堂不满，惟此后好些刻本从此出，惜阴轩本即是而删凌序，章氏本则并去陶序，虽曰渐就雅正，而别无题记说明其来源与变革。刻书固是好事，而未免缺少诚实，近于市人所为，稍可惜耳。（三十二年秋分前日，雨中附记）



题十种古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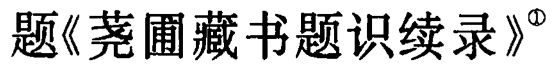
看书偶记（十）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三十年前曾有《茆氏十种》一部，竹纸旧印，心甚喜之，惜久已失去，欲再买，终因循未果。前日有书估携此一部来，白纸而书品不佳，以价不昂，乃收得之。辑录古书，本多可喜，惟余所惓惓于此书者，殆有故友之思，如《毛诗品物图考》类耶。十种中觉得最有意思者是《古孝子传》，因其收罗特备，便于观览，原本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所以可取也。尝欲取《列女传》《孝子传》以至《东山谈苑》，以意点定之，亦可消遣，只可惜中选者恐不能多，未免扫兴，以是迟迟耳。（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顷又得一部竹纸印者，有"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珍藏"印，板心较高大，当是原刊本。此翻刻不知系何时所刊，苟非得别本比较，一时亦不易看出。首叶序文第九行，原文云，所赖于后来者，今误赖为颖，此或是一种后刻之证明欤。

（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再记）



题《荛圃藏书题识续录》[①]

看书馀记(十一)

1938年7月2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此《续录》两册价奇昂,在此时尚有人刻木板印连史纸,已属难得,价昂可原谅也。惟其纸乃横折,触手即知,余最所不喜。能刻书而不知用纸,何耶?　　　　　　(五月三日记于北平)

① 《书房一角·看书馀记》于"题"字下增"王氏刻"三字。



读《眉山诗案广证》

看书馀记（十二）

1938年7月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眉山诗案广证》卷六附载中，录东坡祭黄州太守徐君猷文，张秋水案语中有一节云：

> 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原来是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宴，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

余读之颇有感，东坡之不能忘君猷，与胜之之不记得，岂不皆宜哉。又见《东坡事类》卷十二引《宋稗类钞》云：

> 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酒，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丽，家世住京师。坡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

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此言甚柔和，却是极悲凉。嗟乎！此正与胜之大笑相表里也。吾不解儒者何以不能懂得此意，不佞非学佛人，于此稍有知识，盖亦半从儒出者耳。审如是，则儒之衰久矣，吾辈乃得其坠绪而维系之者也。此语奇矣，我却相信是不错的，但知者自知，若勉强告示，犹如嚼饭哺人，或敲头劝学，殆无用处也。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知堂记）



读袁中郎《解脱集》[①]

看书馀记（十三）

1938年7月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袁中郎与江进之书云："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居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假事作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若兄决定绝倒也。"此语殊不虚，但如《鉴湖》一篇中所言，亦有失之颠处。要知此不必一定是解脱，盖颠狂也会有谱，反而不解脱也。前半说贺家池实佳，其夸石篑语则真大大的落了套矣。大家却亦笑不得中郎，只可默识之以自镜耳。诗不敢说，贺家池诗中自称袁阿宏，诗文中又常提及阿宾，偶尔见之亦觉得有风致。中郎殁后，小修为订定全集，乃于其《西湖一》中改去觅阿宾旧住僧房一句，此等处均颇有情趣，思之亦复可笑可喜也。

（五月八日晨书于旧苦雨斋东窗下）

---

① 《书房一角》删去"袁中郎"三字。

题古槐书屋制笺[1]

看书偶记（十四）

1938年5月2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昨晚平伯枉顾，以古槐书屋制笺一匣见赠，凡四种，题字曰：“何时一尊酒”，“拜而送之”，“企予望之”，“如面谈”，皆曲园先生自笔书画，木刻原板，今用奏本纸新印，精雅可喜。此数笺不见于《曲园墨戏》一册中，岂因篇幅稍大，故未收入耶，而乃特多情味，于此可以见前辈风流，不激不随，自到恰好处，足为师范。观市上近人画笺，便大不相同。老年不一定少火气，青年亦不一定多润泽味，想起来极奇，或者因不会与会之异乎。此笺四十枚，随便用却亦大是可惜，当珍藏之，因题数语为识。　　　　（五月二十日）

① 本篇未刊《晨报》，按写作时间编列。

读《养和轩随笔》

看书馀记(十五)

1938年7月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陈伯雨著《养和轩随笔》云：

> 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云，蟹受汤镬之苦比他物为甚，未尝不触君子远庖厨之心。及阅俞曲园《茶香室丛钞》，引骈蕖道人《姜露庵杂记》云，蟹生而母死，争食其肉，水族之枭也，则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

案骈蕖道人即吾乡施山，著有《通雅堂诗钞》十二卷，其《杂记》六卷有申报馆印本，后又有家刻木板本，在说部中尚非下乘，而卷二说蟹及鳣乃极可笑。越中老年人[1]食湖蟹，尚须备木墩铁椎，用以敲壳，不知小蟹如何得食，此即不合物理；若其谈及虫鱼的伦常，不能如印度大师之明智，却尚在其次耳。关于鳣鱼则云，鳣生而母盲，

① “老年人”原作“老人年”。

以身饲母，水族之乌也。如既已以身饲母，世间便无有小鳢矣；且渔人常捕乌鳞鱼，货之于市，亦未尝见有盲者。施寿伯当是居于直乐施一带的水乡人，对于水族之事似殊不甚了了，亦可异也。

（五月廿一日）



读《陶庐五忆》

看书馀记（十六）

1938年7月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金武祥著《陶庐五忆》有“踏青更带小鸡钱”之句，注云：“昔人诗云，杖头间挂百钱游。吾乡则有‘踏青须带小鸡钱’之谚，盖暮春田家伏卵哺雏，巷陌皆满，举步偶一不慎，致伤微禽，或须给钱以偿之耳。”沈同芳评乃云，“小鸡钱亦曰小饥钱，谓携钱购食以充饥也。”案金注自是事实，江浙情形相去不远，读之如见春日长闲光景，住民以门前为其院落，鸡豚游行自在，固与石板地改为马路后迥不同耳。沈评盖后起附会之说，小饥钱固嫌不词，且如此说便索然无味，真是点金成铁手也。注解家好出奇制胜，往往如此，鸡尸牛从，即其好例。但天下佳妙事又多在寻常中，若懂得这一点，则读书作文当可以无大过矣。　（五月廿三日漫记）

题《阮庵笔记》

看书偶记(十七)

1938年7月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廿七年戊寅端午前三日,隆福寺书估携此书来,乃收得之。在此时尚买闲书,奇矣,但不看书又将如何?

《阮庵笔记》素所喜爱,惜《餐樱庑随笔》等尚未收入耳。其好处第一是不记怪异,谈报应。谈报应是明清文人一大毛病,虽阮伯元亦不能免,但如一染此病,百事便都不足观矣。

《蕙风簃二笔》卷二注云,余撰笔记,雅不喜撮抄近人词诗,惟于乡邦文献,则未忍概从弃置。此意亦可喜,而其文笔朴实,风趣闲雅,自有胜地,近代著作中少见其匹。粟香室亦有五笔,而持与比校,显有上下床之别,此中固自有确实可据者在也。

五月三十一日晨风雨晦冥中,坐旧苦雨斋东窗下记,庭院中水已没阶,有巨蛙鸣声出自草里,忽断忽续也。



记海瑞印文

看书馀记（十八）

1938 年 7 月 15 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读《论印绝句》，查药师诗有注云：

> 海忠介公印，以泥为之，略煅以火，文曰司风化之官。观之觉忠介严气正性，肃然于前。见周栎园《印人传》。

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是酷吏，而因缘以为名，可畏更甚。观印语，其肺肝如见，我不知道风化如何司，岂不将如戴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姚叔祥《见只编》卷上云：

> 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女即[1]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

[1] “此女即”原作“此即女”。

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周栎园《书影》卷九所记与此同，余读之而毛戴。海瑞不足责矣，独不知后世啧啧称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　　　　　　　　（六月八日，知堂书）



读《泊宅编》

看书馀记（十九）

1938年7月15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泊宅编》卷上有一则云：

> 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任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曰，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

《四库提要》乃议之曰，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案原文明系泽做了副元帅开封府尹后所说的话，而《提要》乃以为在其功名未盛时，故施轻诋，可笑甚矣，此无他，亦只是要统制思想耳。宗岳诸公既奉为偶像，便不能再说，即记其从前好杀好掠，亦是是非未允了。这里更有感触

的，乃是胜残止杀还得求之于佛书，读圣贤书，登进士科，而尚不能知人命之重，念之郁郁不快者久之。　　　（六月八日记）



《白石诗词》题记

看书馀记（二十）

1938年7月15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白石诗词集》，寒斋有四印斋王氏，榆园许氏，野水闲鸥馆倪氏，涵芬楼影印陆氏各本，同出一源。此外有一本，诗词各止一卷，末有跋，署康熙甲午秋禊日玉几山人陈撰书。同时别得一本，原板后印，前有序署雍正丁未四月，歙陔华洪正治书，陈跋末康熙甲午云云十四字，则改刻为"陔华先生服奇道古，雅喜是编，爰为开雕，冀垂永久，盖其表章之功匪细也。丁未清和，钱塘陈撰玉几书。"盖陈本系原刊，其后十数年板归洪氏，乃改窜旧跋，未免可笑。其实玉几山人与陔华先生实在有何情分，亦尚不可知也。洪氏刊有《证人堂人谱》二册，甚精好，序署雍正丙午，正是前一年事，而白石诗词乃如此苟且，奇矣。况周仪《香东漫笔》卷一，列记所藏白石集，有歙洪正治本，无陈撰名字，四印斋榆园各刻亦只举洪本，然则悉未曾见玉几山人原本耶。此一册有康熙甲午跋者，虽经裁截改订，书品不佳，盖亦难得而可宝矣。（六月十五日）



题《四奇合璧》

看书馀记(二一)

1938年7月2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四奇合璧》四卷,光绪八年刊,题花下解人编,卷首有三借庐主人序,称吾友慕真山人所作。案邹弢著《三借庐赘谭》卷四有俞吟香一则,中云:

> 君姓俞名达,自号慕真山人,中年累于情,余以惜玉怜香才人常事,未敢深惩其失也。比来扬州梦醒,志在山林,而尘绁羁牵,遽难摆脱,甲申初夏遽以风疾亡,为之叹息不已。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书,诗亦清雅不俗。

《申报》馆光绪四年间刊有《青楼梦》六十四回,亦是慕真山人著,有邹弢序文,而《赘谭》中并不说及。《四奇合璧》岂即《花间棒》耶,疑未能明。所谓四奇,乃是美谈韵语痴想绮愁各一卷,盖是李

笠翁《闲情偶寄》，张山来《幽梦影》之馀绪，而本来力弱，又是学步，遂愈见竭蹶，大有秀才岁考之概矣。光绪初吴下多才人，如王韬蔡尔康邹弢皆是，而一样才薄，此派盖已成弩末，亦是大势所趋也。书中自称《四奇合璧》，王廷学题字乃于其上加品花二字，其实本非谈冶游者，如时式说法，当云香艳小品耳。　　（七月十六日）

读《小柴桑喃喃录》

看书余记(二二)

1938年7月2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陶石梁的声名虽然不及他老兄石篑的大,他的文集也未得见,但是我读所著《小柴桑喃喃录》二卷,却很觉得佩服。此书自序中云:"余年已望七。"其时为崇祯乙亥,在明亡前十年,阅历既多,忧深思远,而文笔朴实,令人想起《颜氏家训》来,每展卷不胜感叹。卷上有一则云:

> 吾辈治家,于凡五谷果茹之类,皆须自为料理,至于下人偷窃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则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尝步至蔬圃,谓园丁曰,吾蔬每为人盗取,何计防之。园丁曰,须拼一分与盗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顾某曰,此园丁吾师也,作家者亦宜知此意。

语甚平淡,却不能轻轻看过去。不佞亦是附和陶君之一人,但是如

此世间如此办法，究竟是好是坏，难道在中国儒与法竟不能用，惟黄老之术乃可耶。不佞虽曾思索，终未能明白也。

（七月十六日）

去年得石梁集于杭州，名曰《赐曲园今是堂集》，现存诗十卷，词一卷，其后或当有文集，今无存。卷首有崇祯壬午刘念台序，称私谥文觉先生，已在石梁卒后。查诗集卷十最后为己卯，时年六十九，盖其卒年，因此可知其生于隆庆五年辛未，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也。目录首行下有长行朱文印曰，吕晚村家藏图书，真伪亦不可辨。

（民国癸未九月廿四日秋分节记）



读《南阜山人诗集》

看书偶记(二三)

1938年7月26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幼时读《板桥诗钞》中绝句二十三首，乃于音五哥图清格之外记得有高西园。近阅鲍辛甫著《稗勺》，见有题曰《真雅文俗》，其文云：

> 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

觉得南阜山人洵是妙人，出诗集七卷，读之，虽有可喜处，惜实不解诗，总无可说。不佞最善傅青主，可谓真雅，若南阜者当在次位。诗集卷二中有《儿童诗》《小娃诗》各四首，此类文字非俗士所能下笔也。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



读《毛诗草木疏》

看书馀记(二四)

1938年8月1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唐子西《文录》云:"《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茶馀客话》卷十一云:"宜圣训学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予尝[①]谓《尔雅》是一部好诗料,他如陆玑《诗草木疏》,刘杲《离骚草木疏》,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文饶《山居草木疏》,皆诗家之碎金也。"就作诗而言,这些话都不错,欲求诗料本来须得向自然里去找也。但是《诗疏》这书却实有可喜处,在此类古书中自当占第一位。刊本颇多,不佞最喜焦理[②]堂所编本,毛子晋《广要》亦佳,则取其繁富耳,原刻本虽不难得,不佞以为青照堂重刊本更便,李时斋有眉评,亦时有佳语也。

(七月廿二日雨后)

---

① "尝"原作"当"。

② "理"原作"里"。



读《舒艺室随笔》

看书偶记(二五)

1938年8月1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张文虎著《舒艺室随笔》六卷，考证经史文字，非不佞所甚解，但亦买得一部，盖贪其纸大而字清疏也。卷一关于《尔雅》有一则，却甚喜欢，文云：

> 蚬缢女，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案此虫当秋后作茧，吐丝自悬，非死也，久之乃化蛾蝶之类飞去，盖亦蚕之一类，然如蛄蟖尺蠖皆如此，不知何以独擅此名。蚬疑即绲之异文，《六书故》引唐本《说文》云即茧字，是也。

郝懿行在《尔雅义疏》此条下云：

> 案今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旧说

殊未了也。《尔雅翼》云，有虫半寸以来，周围植丝[1]以自裹，行则负以自随，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债虫。罗愿说此于蛄蟖下。不知此乃蚬缢女也。

查《尔雅翼》卷二十四，"有虫半寸以来"六字原作"今石榴上复有一种，聚短梗半寸以来"，郝氏所引盖脱落"聚短梗"三字，故语意稍不明。此种虫小时候常看见，俗称袋皮虫，袋皮者麻编米袋也。小儿捕得之，辄迫之出袋以为游戏，并无上吊的联想，孙炎乃至谓此虫多民多缢死，则何耶。古人观察物情或多谬误，此亦不足怪，但后人往往因袭旧说，不知改正，乃为可笑耳。张君知道缢女非缢，与郝兰皋的意见相合，可谓难能矣。不佞考据非所知，但觉得即此一节已大可取，盖自然之考据在中国学士文人间最为希有可贵也。

（七月廿三日晨记）

① 原无"丝"字，今增。



记嫁鼠词

看书馀记(二六)

1938年8月3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清白居士集》第五条云:

杭俗谓除夕鼠嫁女,窃履为轿。《蜕稿》中有《嫁鼠词》,中有警语云,好合定知时在子,以履为车鼠子迓,鼠妇新来拜鼠姑,鼠姑却立拱而谢。运用自然。

萧山寅半生编《天花乱坠》二集卷五有王衍梅《鼠嫁词》,小引云:

《虞城志》正月十七夜民间禁灯,以便鼠嫁。

诗凡二十五韵,有云:

颠当守门防客走,拱鼠前揖将进酒,小姑艳过鼠姑花,厨下先尝侬洗手。

与梁作近似,但我又喜其他四句云:

> 啾啾唧唧数聘钱,香车飞驾雕梁边,娇羞蟢镜一相照,
> 不许灯花窥并肩。

此与以履为车纯是童话意境,在诗文中殊不易见到。鼠嫁女也是有趣的民间俗信,小时候曾见有花纸画此情景,很受小儿女的欢迎,不知现今还有否也。王衍梅著有《绿雪堂集》二十卷,查阅两过,却找不着那篇《鼠嫁词》,寅半生或别有所据欤。

(七月廿三日)



读黄生《义府》

看书馀记（二七）

1938年8月3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黄生著《义府》卷下《穷袴》一则云：

> 晋无名氏乐辞，爱惜加穷袴，防闲记守宫。穷袴字出《汉书》上官后传，师古注，今之裩裆袴。穷袴守官皆防闲之具，惟其爱惜，故加防闲也。又云，今日牛羊上丘陇，当年近前面发红。盖女子幼时情事尚带羞涩，至盛年则不复然，譬之丘陇牛羊所便，其进前唯恐不速矣。以其为上陇之牛羊，此穷袴守宫之所以不能已也。

案世俗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或以入之请旌节母之文中，传为故实，黄生亦大有此意，其大胆处可喜也。大凡说太新奇，也就容易不能确立，如《诗》"采绿"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毛传云，妇人五日一御。大毛公说诗至此盖有邪心矣，无怪郑君之笺即已别立

异说，后世可与之同意者其唯罗典乎。　　　　（七月廿四日）

日前得罗典著《读诗管见》十四卷阅之，其中妙论虽甚多，“五日为期”乃解为昏期，詹同占，谓筮而詹其期之吉也，则其说亦不奇也。又闻江叔海说，“视尔如荍”罗氏以为比喻生支，今案亦不确，《管见》以荍为荞麦，谓其花秾丽而可爱，与朱晦庵之荆葵相差无几，唯罗氏谓子仲之子为丈夫子，《东门之枌》乃是男色之诗，则是其特见耳。　　　　（八月一日又记）

近阅梁章钜著《试律丛话》，卷三举吴谷人“腐草为萤”诗三四句云，今宵萤熠熠，前度草离离，谓是逆挽法。又引纪晓岚说，李义山《马嵬》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亦用此格，最为跳脱。晋乐辞正其前例，所谓丘陇鄙意以为盖实是丘陇也。此是普通讲法，不辞迂阔，聊记于末。　（九月七日晨记于苦雨斋）



记爱窝窝

看书馀记(二八)

1938年8月3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爱窝窝为北京极普通的食物，其名义乃不甚可解，载籍中亦少记录。《燕都小食品杂咏》中有《爱窝窝》一首，注中亦只略疏其形状，云回人所售食品之一而已。

阅李光庭著《乡言解颐》，卷五载刘宽夫《日下七事诗》，末章中说及爱窝窝，小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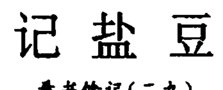
> 窝窝以糯米粉为之，状如元宵粉荔，中有糖馅，蒸熟外糁薄粉，上作一凹，故名窝窝。田间所食则用杂粮面为之，大或至斤许，其下一窝如臼[①]而覆之。茶馆所制甚小，曰爱窝窝，相传明世中宫有嗜之者，因名御爱窝窝，今但曰爱而已。

说甚详明，家窝窝与窝窝头的关系得以明了，所记传说亦颇近理，

① “臼”原作“旧”。

近世不有仿膳之小窝窝头乎，正可谓无独有偶。诗为丙午作，盖是道光二十六年，书则在三年后所刊也。

（七月廿七日记于北平）



记盐豆

看书馀记(二九)

1938年8月30日刊《晨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乡言解颐》卷三人部“食工”一篇中,记孙功臣子科烹调之技,有云:

> 其所作羹汤清而腴,其有味能使之出者乎。所制盐豆数枚可下酒半壶,其无味能使之入者乎。

有味者使之出二语,李瓮斋云出于《随园食单》,所说殊妙,此理亦可通于作文章,古今各派大抵此二法足以尽之矣。但是孙科的盐豆却更令人不能忘记。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十枚,乃是黄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此未知于孙豆何如,及今思之,似亦非是凡品,其实只是平常的酒店官所煮者耳。至于下酒,这乃是大小户的问题。尝闻善饮者取花生仁掰为两半,去心,再拈半片咬一口细吃,

当可吃三四口，所下去的酒亦不在少数矣。若是下户，则恃食物送酒下咽，有如昔时小儿喝汤药之吮冰糖，那时无论怎样的好盐豆也禁不起吃了。（同日所记）



题《谋野集删》

看书偶记（三十）

1938年10月15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谋野集》尺牍本非上乘，读一二首可知其色味均不正，盖是秋水轩之先河，更益犷悍耳，而后世颇得虚名，岂即喜其火气耶。日本有覆刻本，题曰《谋野集删》，凡一卷，田子舒编，有江忠囿腾忠充二序，署享保乙卯，即清雍正十三年，距今已二百年矣。《晨风阁丛书甲集》有此书，乃朱衣点所选，析为二卷，尽去原序而自题记其上，愈见伧俗，铅字油光纸却尚其次也。王生之尺牍，本有如圣叹所说，何必删者也，而删之不已。不佞昔日搜集尺牍，苦《谋野集》太贵不能得以备数，乃得其删，及今日重看细想，其多事岂不相等乎。（廿七年十月十五日）



读《带经堂诗话》

看书偶记(三一)

1938年11月3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余有《带经堂诗话》，原刻稍后印，系叶焕彬遗书，卷首有藏书印一方。王渔洋文笔颇佳，此书编集有法，便于缙读，余甚喜之，惟展卷常见有墨丁，盖剜除钱谦益名氏，《渔洋诗话》则改为圆圈，见之每为气闷。余非有厚于蒙叟，只觉得书册如此，有如歌女面黥陈诜字样，令见者不得过耳。著书刻书都是雅事，乃弄得如此乌烟瘴气，此正与避讳及改削同是人间丑事之一也。

(十一月三日夜漫书)



读李氏《见物》

看书偶记（三二）

1938年11月14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从估人得《见物》五卷二册，明李苏所撰，惜阴轩刊本也，万历辛巳吕坤序。书分叙禽兽鳞介昆虫，各系以论及赞，多借题发挥，不脱文人旧习。夫人诚宜以物为师，但此事要有眼光有胆力，通物理，顺人情，乃能有所见耳，鄙意此等处当有天分限之，不可强为也。李君论虽无谓，其所记叙却有可取处，又不信鹤鹊等以声交，果蠃负子，腐草化萤火诸说，均颇有见识。其论蜉蝣曰，“朝生暮死，亦谓其微耳，谁适见之”，则殊有滑稽之趣矣。五卷书中以《虫物》一编为最佳，盖由易见故耶。　（十一月十四日晨书）



《桥》

看书馀记（三三）

1939年1月22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昨夜拿出废名的《桥》来读，看到第十八节曰《碑》，上篇就完了。不知怎的有点怅然，似乎是觉得缺少什么似的，还不大够。废名在自序中也说过：

> 本来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

这里缺了一部分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著者也说过补不成了，但缺少总是缺少，仍是不禁怅然。这册《桥》我是读过一回的，到现在才明了的感觉这缺少的惆怅，可知是不无些少长进，这一岁也还不算白增加。《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诗不大懂，画是喜看的，只是恨册页太少一点，

虽然这贪多难免有点孩子气，必将为真会诗画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爱的也就是《桥》里的儿童，上下篇同样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间的空气，而上篇觉得尤为可爱，至于下篇突然隔了十年的光阴，我似乎有点一脚跳不过去。这样说来，《碑》以后的三分之一可见得还是个缺少，假如这个补上了，那么或者也就容易追随得上，我这样想，却还未敢相信。中国写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桥》不是少年文学，实在恐怕还是给中年人看的，但是里边有许多这些描写，总是很可喜的事。（廿八年一月廿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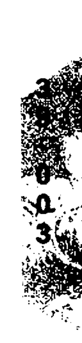


题《留我相庵诗草》

看书馀记（三四）

1939年1月28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不佞不懂诗，故买诗集往往不以其诗而以其人，犹搜集手迹之意耳。吕光晨不知为何人，因见卷首有钱振锽序盛称之，故从厂甸摊头买得，此则更是间接因钱君的关系，反正诗原是不懂，亦无耳食之嫌也。共读楼辑本《室名索引》不免尚多阙略，而留我相庵则已著录，可知此事亦有因缘，寒斋未有许多大家别集，却存此二册诗草，正是同样的实例也。（一月廿八日）



《思元斋续集》

看书馀记（三五）

1939年5月8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得《西斋三种》后，稍搜集八旗人著作，此中健者自当推法式善，百龄、铁保虽亦与于三才子之列，抑又其次矣。诗文集颇不少，一时难以悉收，因先以板刻佳好者为限。《苌楚斋随笔》中举高斌《固哉草亭诗》，高其倬《味和堂集》，以为至佳，此二者固亦不恶，近得《思元斋续刻诗文集》乃亦别有风趣。案《八旗文经》五十九，作者考丙云：

> 宗室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裔，封辅国公。尝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通西蕃语，谓佛经皆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雠，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十馀箧，悉存于家，伯熙云犹及见之。著有《思元斋全集》、《续集》。

据所记可知其为非凡人，观《续集》亦正如是。全书皆手写精刻，《东行吟钞》稍工整，作亦平平，《沈居集咏》《枣窗文续稿》二种则用行楷，皆潇洒出俗，诗亦有佳语而文尤胜，虽只十四小篇，足以胜人多多许矣。《二桃杀三士论》、《邓攸弃子存侄论》、《韩昌黎盘谷序论》、《厚葬薄葬论》，均可读，见识通达，文士中不可多觏，若《试金石砚记》、《鳣说》，则又是别一类佳作也。《集咏》自序满是牢骚，而以诙诡出之，颇疑其当初以文字得祸，序首自称于嘉庆癸酉岁十月获谴居东，作序时在道光戊子，文稿序在庚寅，可知其谪居沈阳盖已历十七年矣。查《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条下有云，“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然则其获谴乃因林清一案。文盖以穷而工，其诗文之奇气与居沈自当有关，惜未得其前集六种阅之，一证其异同如何耳。《文经》所收文不见佳，盖出前集中者，其不能赏识《续稿》之文，殆亦不足怪也。　　（五月八日）

龚定盦《己亥杂诗》中有一首，题曰《别镇国公容斋居士》，注云，“居士睿亲王子，名裕恩。好读内典，遍识额纳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又核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或三存之，自释典人震旦以来未曾有也。”案此与思元斋主人甚相似。定盦既与容斋交好，而盛伯熙又曾亲见思元之校本，则均当无误。惟二人名字同有一裕字，不无可疑。不佞颇疑此本是一人之事，或盛氏所见即是裕恩物，因名近似讹，但是天下奇事往往有偶，故亦未敢随意决定也。（廿五日又记）



《曲成图谱》

看书偶记（三六）

1939年5月23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从纸裹中找出俟堂抄本《曲成图谱》一册，题钱唐夏鸾翔造，无序跋，本文六十五半页，首为图板，以后每半页列二图式，共一百二十八种，图名两两相对，惟其中方背椅之对方无图，当系原缺也。此盖是七巧图之流亚，图板增至十三，凡大小三角四对，大小牙璋形二对，方一，排成各图，较七巧更复杂，而善用不等边形相，故仍具大方之气度。尝见童叶庚所著《益智图》全帙，图样繁富，新奇可喜，但总似乎太细巧些，图板十五块中所谓四象最能见巧，也最是缺点，故觉得反不能及《曲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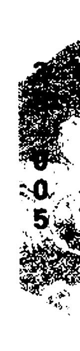
夏君列图题名又颇多诙谐之趣，如一幅出腰鼓式灯笼，柄上有钉，题曰"公务"，对叶则曰"私窠"，乃是一屋而斜开其门，又"同偕到老"为男女履各一，比《益智续图》之出同样的绣鞋两只，亦更为有意思矣。其模写品物，如虾米蛏干，猫笋蚕豆，皆颇有风趣，盖不

独能具神韵[1]，古拙而不方板，惜因此亦令人难以划分排列耳。七巧图简易，然其生命固自存在，重看儿时熟识的莲叶百合游鱼诸图，还觉得流连不忍弃，惟佳谱难得，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所云一斋主人真本，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读之令人歆羡，不知现今尚有此书存在否也。（五月廿三日大风中记）

《复堂日记》卷七，光绪戊子年间记有夏凤翔鸾翔兄弟事，鸾翔字紫笙，通畴人术业，诗不多作，高华朗诣，步武唐贤，有《春晖草堂集》二卷，《复堂文续》卷一有序。紫笙之子即夏穗卿曾佑，民国初年曾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此图谱或系夏氏家藏，俟堂故得借抄一本，世间似尚无流传也。（六月三日又记）

---

① “韵”原作“味”。



凌厚堂[①]

看书偶记（三七）

1939年5月25日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得嘉业堂刻《台湾郑氏始末》六卷，有凌福镜跋，云所据系传经堂刻本，凌厚堂堃于道光咸丰间刻“传经堂丛书”，未藏事而遭乱板毁，故世间流传绝少。我因此想起凌君的事来，觉得这也是清末的一个奇人。陈子庄在《庸闲斋笔记》卷二中有一则记述颇详，厚堂以道光辛卯举人，大挑选授金华教谕，咸丰辛酉居湖州，城陷为长发军所杀。其为人甚怪僻，俯视一切，工古文，善奇门，星卜星相无所不能，著有《德舆子外集》数十万言。汤伯述著《槩蕅纪事初稿》卷二中有《书凌堃》一则，云撰《尚书周易春秋说》十万言，究经史大业，著《德舆子》，论时政甚核。陈氏记厚堂为人相面，又自诩水火遁法，汤氏传其少年时异事，善技击，为侠客，盖非常人。《谪麟堂遗集》文中有《凌教谕墓志铭》，亦如是说，戴子高为厚堂女夫，所言

---

① 1939年11月15日曾刊《学文月刊》第1期，为“药草堂随笔”之一，有附记，今作为《〈药草堂随笔〉附记》（39·080），另为一篇。

当可信，各家传说似亦多出于此。《传经堂全书》希贵不能得，只得其零种数册，有《相地指迷》十卷，乃集刊前人地理书，《学春秋理辩》卷三，《凌氏易林》卷一凡四分，皆其经说残本，《告蒙编》《德舆子》《德舆集》各一卷，《告蒙编》凡七十六页，皆答人问，最可读，惟喜谈律历，外行人听之茫然。陈氏记其论学直宗孔孟，于宋儒一概抹杀，尤恶朱子，极口肆骂，至谓朱子名与秦桧子熺无异。尝在金华府署中，与其同郡孙柳君孝廉谈及考亭，孙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案《告蒙编》中有一处论及《大学》，谓晦庵妄改“在亲民”等句，结云：

> 此皆窜乱经典，慢侮圣言之尤，唐以前说经诸儒所断断不敢出此者，有圣贤作，当诛殛之不暇，而元明人妄以为表章圣学，是犹子弟支解其父兄而以为孝也。

此可为前事作证，平心论之亦本合理，惟措辞稍负气耳。《德舆子》细看不觉得好，虽有郝氏序加以揄扬，只是文颇古奥，蒋氏跋谓读数十过而后始解，不佞则于玄学无兴趣，只翻阅一过而已，终不能甚解也。

《德舆集》页数未全刻，共收文四十编，读之亦只是寻常古文，不见凌厚堂的什么奇气，此在吾辈非为文而读，乃欲于文中求得其人者，读竟不免失望，或反不如残本《易林》，意思虽是难懂，而文尚奇诡可喜也。（五月廿五日）



孟心史

看书偶记(三八)

1939年10月24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孟心史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多年，廿六年冬留北平，已卧病矣。十一月十六日访诸协和医院，赠以《风雨谈》一册，以其中引及孟先生著作也，廿九日又一至孟宅，后遂不相见，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只默默行礼而已，不佞撰一联挽之曰：

野记偏多言外意；
遗诗应有井中函。

因字数太少不好写，亦不果用。孟先生著作甚多，但我所最记得最喜欢读的，还是民国五六年所出《心史丛刊》三集。偶阅《屑玉丛谈》，见许元仲著《绪南笔谈》中有一则云：

乾隆六年扬州王张氏代其夫入闱作文，为夫弟告讦，夫被斥，张氏亦遣戍。此事督臣本拟正法，上恩旨免之，得减死。

因记《心史丛刊》记科场案，多感慨语，如云：

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

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所说均甚的当。今观《绪南笔谈》所记，则尤有甚者，如古人言，正是人伦之变，而其端由于八股科举，此事实可以深长思也。

（十月廿四日记）

黄晦闻[①]

看书偶记(三九)

1939年10月刊《中国文艺》1卷2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翻阅明清人所作地方名胜诗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苏杂咏》二卷，乃是黄晦闻先生遗物。《杂咏》诗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编入《大全集》，此尚系原本，后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傅跋，盖是青丘被害后二十四年也。前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印”，“敬斋”，又曰“陈天爵印”，“天士”，两册首别有印曰“黄节读书之记”。晦闻卒于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余送一联挽之曰：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附以小注云：

---

① 本篇即《姑苏杂咏》(39·013)的第一节，因文字稍有出入，又曾单独收入《书房一角》，故两存之。

近来先生常钤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晦闻没后,藏书多散出,偶在书肆见此册,遂以六元买得之,惜因虫已蛀经裱过,稍嫌臃肿耳。青丘原书固不多见,无意中得到故人手泽,亦可纪念也。



女人骂街

1939年1月10日刊《朔风》第3期
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阅《桟鼻山房小稿》，只有《东游笔记》二卷，记光绪辛巳壬午间从湖南至江苏浙江游居情况，不详作者姓氏，文章却颇可读。下卷所记以浙东为主，初游台州，后遂暂居绍兴一古寺中，十一月中有记事云：

> 戊申，与寺僧负暄[①]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移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忽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

① "暄"原作"喧"。

回视，截[1]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

这一节写得[2]很好玩，却也很有意思。民间小戏里记得有《王婆骂鸡》一出，可见这种情形本是寻常，大家也都早已注意到了，不过这里犊鼻山人特别提出来与古文辞并论，自有见识，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女人过去的光荣，不禁感慨系之。我们且不去查人类学上的证据，也可以相信女人是从前有过好时光的，无论这母权时代去今怎么辽远，她的统治才能至今还是潜存着，随时显露一点出来，替她做个见证。如上文所说的泼妇骂街，是其一。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政治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中国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卒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账王八旦，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其次则妇女的挽歌，亦是一例。尝读法国梅[3]里美所作小说《科仑巴》，见其记科仑巴临老彼得之丧，自作哀歌，以歌代哭，闻之足使懦夫有立志，至今尚不忘记。此不独科耳西加岛为然，即在中国凡妇女亦多如此，不过且哭且歌，只哭中有词，不能成整篇的挽歌而已。以上所举虽然似乎都是小事，但我想这就已够证明妇女自有一种才力，为男子所不及，而此应付与组织则又正是政治本领之一也。

---

① "截"原作"戴"。

② "写得"原作"得写"。

③ "梅"原作"美"。

对妇女说母权时代的事，这不但是开天以前，简直已是羲皇以上，桑田沧海变化久远，遗迹留存亦已微矣。偶阅陈廷灿在康熙初年所著《邮馀闲记》初集，卷上有关于妇女的几节云：

> 人皆知妇女不可烧香看戏，余意并不宜探望亲戚及喜事宴会，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归宁不可过三日斯为得之。
>
> 居美妇人譬如蓄奇宝，苟非封藏甚密，守护甚严，未有不入穿窬之手。故凡女人，足不离内室，面不见内亲，声不使闻于外人，其或庶几乎。
>
> 余见一老人，年八十馀，终身不娶。及问其故，曰，世无贞妇人，故不娶也。噫！激哉老人之言也，信哉老人之言也。——然不可为训。世岂无贞妇人哉，顾贞者不易得耳。但能御之以礼，闲之以法，而导之节义，则不贞者亦不得不转而为贞矣。

要证明近世男尊女卑的现象，只用最普通的《女儿经》的话也已足够了，我这里特别抄引兰亭陈君的文章，不但因为正阅看此书，顺手可抄，实因其说得显露无隐讳耳。这一段落，不知道若干千年，恐怕老是在连续着，不佞幸而不生为妇人身，想来亦不禁愕然，身受者未知如何，而其间苦乐交错，似乎改变又非易易，再看世上各国也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可知此种成就总当在黄河清以后吧。

明末有清都散客，即是赵忠毅公赵梦白南星，著有《笑赞》一卷七十二则，其第五十一则云：

>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会，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

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夜半起来打差别。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

案卓吾老子对于此事不曾有什么表示，盖因无人问他之故，甚为可惜，但他的意见在别的文章中亦可窥见一点，如《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

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即此可知卓吾之意与赵世杰妻相同，以为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也。此在卓吾说出意见或梦白提出疑问，固难能可贵，但尚不能算很难，若赵世杰妻乃不可及，不佞涉猎杂书，殊未见第二人，武则天山阴公主犹不能比也。至于被打则是当然，卓吾亦正以是而被弹劾，梦白隐于笑话，亦幸而免耳。至赵世杰者乃是正统派，其学说流传甚远，上文所引《邮馀闲记》诸条，实即是打差别的注疏札记，可以窥豹一斑矣。

李卓吾以后中国有思想的人要算俞理初了。《癸巳存稿》卷四有一篇小文，题曰《女》，末云：

《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敖[1]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

① “敖”原作“虐”。

《癸巳类稿》卷十三“节妇说”中云：

> 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二者口气不一样，意思则与卓吾同。李越缦在日记中评之曰：

> 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这一句开玩笑的话，我觉得却是最好的批评。盖以周公而兼能了解周姥的立场，岂非真是圣人乎？卓吾理初虽其学派迥不相同，但均可以不朽矣。（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在北平记）



最后的十七日[①]

钱玄同先生纪念

1939年5月26日刊《实报》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味集》

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摊纸执笔，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这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馀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是很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

① 《药味集》改题《玄同纪念》。

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廿八年一月三日，玄同的大世兄秉雄来访，带来玄同的一封信，其文曰：

知翁：元日之晚，召诒坐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旬日以来，雪冻路滑，弟懔履冰之戒，只好家居，惮于出门，丘道亦只去过两三次，且迂道黄城根，因怕走柏油路也。故尚须迟日拜访，但时向奉访者探询尊况。顷雄将走访，故草此纸。龥闇白。廿八，一，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几个名词。丘道即是孔德学校的代称，玄同在那里有两间房子，安放书籍兼住宿，近两年觉得身体不好，住在家里，但每日总还去那边，有时坐上小半日。龥闇是其晚年别号之一，去年冬天曾以一纸寄示，上钤好些印文，都是新刻的，有肄龥，觚叟，龥庵居士，逸谷老人，忆菰翁等。这大都是疑古二字变化来，如逸谷只取其同音，但有些也兼含意义，如觚龥本同一字，此处用为小学家的表征，菰乃是吴兴地名，此则有敬乡之意存焉。玄同又自号鲍山疒叟，据说鲍山亦在吴兴，与金盖山相近，先代坟墓皆在其地云。曾托张樾丞刻印，八月六日有信见告云：

日前以三孔子赠张老丞，蒙他见赐疒叟二字，书体似颇不恶，盖颇像百衲本《廿四史》第一种宋黄善夫本《史记》也。唯看上一字，似应云，像人高踞床阑干之颠，岂不异欤！老兄评之以为何如？

此信原本无标点，印文用六朝字体，疒字左下部分稍右移居画下之中，故云然，此盖即鲍山疒叟之省文也。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至十六收来信，系十五日付邮者，其文曰：

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祖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它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将这书点交给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日前拜访，未尽欲言，即挟《文选》而走。此《文选》疑是唐人所写，如不然，则此君模唐可谓工夫甚深矣。……（案，此处略去五句三十五字）。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儿童……”（不记得那天你说的底下两个字了，故以虚线号表之）也太狭（此字不妥），我以为“似尚宜”用“社会风俗”等类的字面（但此四字更不妥，而可以意会，盖即数年来大作那类性质的文章，——愈说愈说不明白了），先生其有意乎？……（案，此处略去七句六十九字）。旬日之内尚拟拜访面罄，但窗外风声呼呼，明日似又将雪矣，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则或将延期矣。无公病状如何？有起色否？甚念！弟师黄再拜。廿八，一，十四，灯下。

这封信的封面上写鲍缄，署名师黄则是小时候的名字，黄即是黄山谷。所云《九通》，是李守常先生的遗书，其后人窘迫求售，我与玄同给他们设法卖去，四祖诸公都是帮忙搬运过付的人。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又有许多感慨，总之在这时候告一段落，是很好的事。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极有价值有意思，却亦就不能发表。只有关于《文选》，或者须稍有说明。这是一个长卷，系影印古写本的一卷《文选》，有友人以此见赠，十日玄同来时便又转送给他了。

我接到这信后即发了一封回信去，但是玄同就没有看到。十七日晚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德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去遇见稻孙少铿令扬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对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

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

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注云：

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有所论述，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亦还没有心情来做这种难工作，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

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　　　　（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野草的俗名

1939年7月16日刊《宇宙风》乙刊第10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三，光绪丁未四月下云：

> 初七日，往返田塍，见野花，指问村人。野木犀枝叶花朵皆如桂，但白色，墙上有藤下垂如金银花，亦白色，土人谓之石沿藤花。又有小红花，瓣如障扇形，土人名山荷花浪。此皆土俗语，若欲考其名义，须检《尔雅》《本草》[①]。

叶鞠裳好古，故尊信《尔雅》、《本草》，但土俗语亦自佳，即古书中名义多自俗名出，注疏家亦多征引，若郝兰皋的《尔雅义疏》最为显著，不佞亦正以此益喜之也。毛子晋著《毛诗陆疏广要》，疏解颇详，后刻入《青照堂丛书》中，有李时斋批语常引俗名，在"采采芣苡"条云：

---

① "本草"原作"本经"。

车前以多生道旁故名，吾乡人或名猪耳。叶断之有丝，小儿或呼为老婆绩线。

此于经说或博物学上不知价值若何，却是民俗志的好资料，可以见平民或儿童心理，不单是存方言而已。范啸风著《越谚》卷中记名物，花草项下有绍兴土俗名数条，稍为增补注释共得八则。

(一) 臭婆娘

臭婆娘，《越谚》注云：

其子细，其气臭，善惹人衣。《留青日札》名曰夫娘子，实即《尔雅》所谓薦蕼窃衣耳。越呼是名。

钱沃臣《蓬岛樵歌续编》注云：

《留青日札》，草子甚细，其气臭恶，善惹人衣者，名曰夫娘子。南方谓妇人无行者曰夫娘，盖言其臭恶善惹人者。案即《尔雅》薦蕼窃衣，俗曰臭花娘草。

钱君为象山人，可知宁绍方言相同也。郝兰皋《尔雅义疏》下一“窃衣”注云：

今按此草高一二尺，叶作椏缺，茎头攒蔟，状如瞿麦，黄蕊蓬茸，即其华敷，粘着人衣不能解也。

《本草》似未著录。日本中勘助著小说《银茶匙》前篇四十三叙岩桥至丛莽中采取狗虱，撒人衣发上，盖即此物，亦是土俗名，字书上无考，平常只如字解作狗身上虱，此殆以形似而借用也。

(二)官司草

官司草，《越谚》作“官私草”，注云：“有茎而韧，孩童争胜为戏。”案此即是车前，如苏颂所云，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中抽数茎作长穗如鼠尾，花甚细密，青色微赤。儿童拔其茎，对折相套，用力拉之，断者为输，盖是斗草之戏也。俗称诉讼为打官司，故有此名，“官私”疑误。尤西堂著《艮斋续说》卷七云：

> 《芣苡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传》曰，文王之时，万民和乐，儿童歌谣。申公亦谓童儿斗草嬉戏歌谣之词。今急口读之，其声甚似。

《诗传》《诗说》原系丰道生伪作，但斗草之说亦颇可喜，姚首源在《通论》中大加以嘲笑，未免以人废言矣。日本寺岛良安编《和汉三才图会》卷九十四有角抵草一项，注云：

> 案角牴草原野湿地有之，叶布地丛生，微扁，似石菖而色浅。秋起茎，顶作穗，青白色，可有细子而不见。其茎扁，强健，长六七寸，小儿取茎绾穗结如钱襁，而用二个，一插其结处，两人持茎相引而断者为输以戏，因此草俗名相扑草。

看图盖是莎草类，儿童游戏用法相同，故名亦相类，在中国不知何名也。《和汉三才图会》原用汉文，今仍其旧，唯一二费解处稍为修

改。

(三)黄狗尾巴

黄狗尾巴,《越谚》无注。《尔雅义疏》下一“稂童粱”下引郑志,“韦曜问云,《甫田》维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本草纲目》卷十六“狗尾草”下,时珍曰:“莠草秀而不实,故字从秀。穗形像狗尾,故俗名狗尾。”《和汉三才图会》注云:“案狗尾草原野多有之,小儿用之钩蛙为戏者。”在中国不闻有此游戏,但小儿亦喜采取玩弄耳。

(四)碰鼻头草

碰鼻头草,《越谚》湴浡头草,注云:“似莼。”《本草纲目》卷十九“荇菜”下,时珍曰:

> 荇与莼,一类二种也,并根连水底,叶浮水上。其叶似马蹄而圆者,莼也;叶似莼而微尖长者,荇也。夏日俱开黄花,亦有白花者。

这里所谓碰鼻头草盖是荇而非莼。越中多水,城内道路几乎水陆并行,乡下则河港尤阔大,交通必赖舟楫,人民对于水里的东西自然特别感有兴趣。如坐“踻桨船”——《越谚》卷中注云:“小而快,用脚踏桨,桨在后,踻从《荀子》礼论篇注。”案踻字无可注音,当读如绍兴音“弱”——中,进村间小溇,见两岸碧叶贴水,间开黄白小花,随桨波而上下,便知俗名之妙,老百姓非全无幽默者也。《诗经·周南》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仿佛亦有此意,此固非如范啸风所谓今之闭户攻八股者所能领会者也。

(五)老弗大

查旧日记有一节讲到老弗大,时为光绪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其文云:

> 午至乌石头墓所,拔老弗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凋,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之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

陈淏子著《秘传花镜》卷三花木类考中平地木一则云:

>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瓯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

越中此草很常见,盆栽易茂,北方似无有,唯在日本亦有之,俗名薮柑子,或写汉名紫金牛,为植物学的一科名。杉木唯三著《植物和汉异名辞林》在"薮柑子"下亦收录"平地木"一名,而知者盖鲜。日本译《呐喊》序文中有"结子平地木"一语,译注云:"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的围场称平地松林,平地木殆其地所出产耶。"此则舍近求远,未免徒劳而无功也。

(六)天荷叶

《本草纲目》卷二十"虎耳草"下,时珍曰:

> 虎耳草生阴湿处，人亦栽于石山上，茎高五六寸，有细毛，一茎一叶如荷盖状，人呼为石荷叶，叶大如钱，状似初生小葵叶及虎之耳形，夏开小花淡红色。

《花镜》卷四“藤蔓类考”云：

> 虎耳一名石荷叶，俗名金丝草。其叶类荷钱，而有红白丝缘其上，三四月间开小白花。春初栽于花砌石罅，背阴高处，常以河水浇之，则有红丝延蔓遍地，丝末生苗，最易繁茂，但见日失水，便无生理矣。

此节所说最得要领，盖叶上红白丝与红丝延蔓俱是天荷叶的特色，小时候对于此草觉得有兴趣即在此诸点，西湖花隐翁亦注意及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七）骨牌草[①]

《本草纲目》卷二十“石韦”下，时珍曰：“多生阴崖险罅处，其叶长者近尺，阔寸馀，柔韧如皮，背有黄毛，亦有金星者，名金星草。叶凌冬不凋。”又“金星草”下引掌禹锡云：

> 喜生背阴石上净处及竹箐中少日色处，或生大木下及背阴古瓦屋上，初出深绿色，叶长一二尺，至深冬背生黄星点子，两两相对，色如金，因得金星之名。

---

① “骨牌草”原作“牌草”。

越中所见叶只长一二寸，黄星亦两两相对，因形似骨牌，故得是名。俗传如能收集三十二张成一副，便是神药，可治虚损，服法已记不清，大抵是炖老鸭吃吧。陈伯雨著《金陵物产风土志》中云："钟山多药材，有骨牌草者，点肖其牌，云能治劳瘵，《本草》所未载也。"即是此草，《本草》中曾载着，但云主治疮毒为异耳。

梁茝林著《浪迹续谈》卷五有"骨牌草"一则云：

> 骨牌之戏自宋有之，宣和谱以三牌为率，凡六面，即骰子之变也。近时天九之戏见于明潘之恒《续叶子谱》，云近从睦好事家变此牌为三十二叶，可执而行，则即今骨牌碰湖之滥觞也。今张氏如园中有骨牌草，春深时丛生各地，草叶狭而长，其叶尾各有点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唯虎头略少。余在扬州时即闻有此草，佥言若得三十二叶，点子皆全者，可治血症[1]，而实未曾目见此草。今乃于如园中亲手摘视，未知先有此草而后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后生此草，不可得而详矣。

案金星草已见于《嘉祐本草》，又《益部方物略[2]》中亦载，可知宋时已入药，唯骨牌草之名则当起于近代耳。掌禹锡称其叶长一二尺，宋子京赞亦云长叶丛生，盖是生在阴崖深菁中者，昔在故园所见都在木犀枝间，故颇短小，或是变种也。

---

① "症"原作"证"。

② 此处原衍"记"字，已删。

（八）咸酸草

《本草纲目》卷二十"酢浆草"下，时珍曰：

> 苗高一二寸，丛生布地，极易繁衍，一枝三叶，一叶两片，至晚自合帖，整整如一。四月开小黄花，结小角，长一二分，内有细子。

苏颂曰："初生时小儿喜食之。"案此所说均合，小儿摘叶食之，味微酸，故名。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卷十六引《闽书》，亦云咸酸草，与越中同。

此外本来还有两三种植物要说，今姑从略。上面我所记的只是物名，引了古书稍加注释，表示对于土俗语的兴味之一斑①而已，这在方言与民俗学上的意义未曾有所说明。柳田国男在所著②《民间传承论》第八章"言语艺术"中有关于动植物俗名的几段话，都说得极好，今摘译其植物名一部分于下：

> 鸭头草的方言实在很多，有叫作染坊的老奶奶或染店客人者，这就把新造此语的时代也指示给我们了。染坊职业化了，普及于国内，在足利时代之末，江户前期顷，村人看了这花的蓝色，便去与新近印象很深的染坊连接起来，其定名的时代差不多就可推知了。曼珠沙华（案即石蒜，越中称蟑螂花）也

① "斑"原作"班"。
② "著"原作"述"。

有种种名字，因为在彼岸（案即春秋分前后各三日，共七日称彼岸）时分开花，故称为彼岸花；或远望其形状而定名的，曰狐花；又因触着感觉疼痛而曰烂手，曰保世花，也是好玩的名字。保世留者，四国之方言，意云使热辣辣的痛也。又有地方嫌恶此花，称之曰死人花；或则因其开在水边，故取水怪之名称之曰猿猴花，河童花。（案猿猴借音，即是河童之别名，似溺鬼而系生物云。）这种名字在远隔地方也会相同，或由传闻而沿用者当亦有之，但偶然命名一致者盖亦多有。如称此花为河童花，在各地方多用河童的方言下再着一花字为名。

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



致《人世间》编者

1939 年 8 月刊《人世间》第 2 期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生：

蔼理斯归道山，又翻译问题，此均有谈谈之价值，但因此亦不易谈，须经许多思索，而在此刻又难作此烦难之工作也。鄙意此时只无关重要之事可谈，但如无谈谈之兴趣，则亦不可能耳。《梦谈》稿已有几则，总未能决心抄奉，只有两年前旧稿一篇曰《谈关公》，当找出一看，如可勉强适用，当再录呈。《人世间》之名字甚佳，此只将语公旧名掉动一下，便化陈为新，惜吾辈楚囚不能得见耳。顺颂

近安。　　　　作人启。廿三日晨。



俞理初的诙谐

1939年9月1日刊《中国文艺》创刊号
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

《白虎通》云，女，如也，从如人也。《释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婚，婚，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时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广记·长恨歌传》云，天宝时人歌曰："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则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咏》傅玄《苦相篇》云："苦想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生女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私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有戾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一时见，一绝逾参辰。"此

谚所谓姑恶千辛，夫嫌万苦者也。《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亦贵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妇人苦》诗云："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其言尤蔼然。《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书·梓材》，成王谓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此圣人言也。《天方典礼》引谟罕墨特云，妻暨仆[①]，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读了上文，觉得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馀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②]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③]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④]》，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是也。讲到学问与诗文，清初的顾亭林与王渔洋总要算是一个人物了，可是读他们的笔记，便

① "妻暨仆"原作"暨妻仆"。

② "均"原作"匀"。

③ "愊"原作"幅"。

④ "稿"原作"类"。

觉得可取的地方没有如预料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1]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于乾嘉时，《存[2]稿》成于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蔡孑民[3]先生在年谱序中曾列举数例，加以赞扬，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读《存稿》，觉得另有一种特色，即是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有一则[4]云：

>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记录，从日常言行一小节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资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问题。《存稿》卷三《鲁二女》一篇中说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公羊穀梁二家释为淫通，据《左传》反驳之，评云：

---

① 原无“厚”字，今增。

② “存”原作“类”。

③ “蔡孑民”原作“蔡子民”。

④ “习苦斋笔记有一则”，原作“习苦齐笔记有一侧”。

季姬盖老矣，遭家不造，为古贵妇人之失势者，不料汉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

又云：

听女淫佚，则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帅师，非君命不书，非告庙不书，淫佚有何喜庆，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瞽儒秽言无一可通者。

又卷三《书难字后》有一节云：

《说文》亡从入从乚[①]，为有亡，亦为亡失。唐人《语林》云，“有亡之亡一点一画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观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观之。

又关于欸乃二字云：

《冷斋夜话》引洪驹父言欸乃音奥，可为怪叹，反讥世人分欸乃为两字。此洪识难字诚多矣，然不似读书人也。

又有云：

又《短书》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笔书，退检古名帖，忠恕

---

① 以下原衍“非乛乚之乚”五字，今删去。

草书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谬，乩神亦荒谬也。

又卷四《师道正义》中云：

《枫窗小牍》言，宋仁宗时开封民众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当抵死。此则非人所为。师本以利，诚不爱钱，即谢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损，乃苦守聚徒取钱本意而致出钱幼童于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于人世也。

又云：

《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预敛[1]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

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谓南方雪中实有芭蕉，王维山中亦当有之，对于诸家评摩诘画乃神悟不在形迹诸说深不以为然。评曰：

世间此种言语，誉西施[2]之颦耳，西施是日适不曾颦也。

卷十四《古本〈大学〉石刻记》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从《礼记》写出《大学》本文，其

---

① “敛”原作“歛”。
② “施”原作“旋”。

识甚高。时有张夏者辑《闽洛渊源录》，反极诋守仁倒置经文，盖张夏言道学，不暇料检五经，又所传陈澔《礼记》中无《大学》，疑是守仁伪造。然朱子章句见在，为朱学者多以朱墨涂其章句之语，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览朱子章句，致不知有旧本，可云奇怪。

后说及丰坊伪作石经本《大学》，周从龙作《遵古编》附和之，语多谬妄，评云：

此数人者慷慨下笔，殆有异人之禀。

又《愚儒莠书》中引宋人所记不近情理事，以为不当有，但因古有类似传说，因仿以为书，不自知其愚也。篇末总结云：

著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可谓穷形极相。古今来此类层出不尽，惜无人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难得之故。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思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幸而免耳。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辟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

矣。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苦雨斋）

《姑苏杂咏》[1]

1939年10月1日刊《中国文艺》1卷2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偶阅明清人所作地方名胜诗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苏杂咏》二卷，乃是黄晦闻先生的遗物。《杂咏》诗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编入《大全集》，此尚系原本，后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傅跋，盖是青丘被害后二十四年也。去年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印”[2]，“敬斋”，又曰“陈天爵印”，“天士”，两册首别有印曰“黄节读书之记”。晦闻卒于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撰一联挽之云：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

① 本文作于1937年2月25日，但1939年始发表，并写有“再记”。其首节曾单独收入《书房一角》，题云《黄晦闻》(39・007)。

② “印”原作“叩”。

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钤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今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晦闻卒后,藏书多散出,偶在书肆见此册,遂以六元买得之。青丘原书固不多见,无意得到故人手泽,亦可记念也。

查《瓯北诗话》卷八,讲高青丘的一部分中有几句关于他的著作的话云:

>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馀首,名之曰《大全集》。

所说似不甚确。寒斋所有此《姑苏杂咏》二册,即系洪武年中所刻者也。《静志居诗话》卷三“高启”条下云:“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南楼》、《槎轩》、《姑苏杂咏》等集,自选为《缶鸣集》。”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条下云:“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凡二千馀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馀首。”朱竹垞[1]纪晓岚二君说《缶[2]鸣集》似亦有待考处。涵芬楼本《大全集》卷首存《缶鸣集》原序三篇,其谢徽的一篇署年月为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序中有云:“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又金氏文瑞楼刻本所录原序,其第三篇为《姑苏杂咏》自序,署年月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案即辛亥年也。照这年代看去,《姑苏杂咏》当然未曾编入《缶

① “垞”原作“坨”。
② “缶”原作“凤”。

鸣集》内，因为《杂咏》之成在《缶鸣集》选定后一年，自当别行，洪武三十一年之单行本即其一证，至徐用理乃复杂糅增益编[1]为一集耳。《杂咏》周傅跋有云："锡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谋锲诸梓，虑其传写之讹，属傅编次而校正之，复需言识于简末。"此云全集即指《杂咏》全本，似以前只有传抄，此为初次上木也。书分上下两卷，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等十类，共一百十题，诗百三十一首，自序云一百二十三，跋又云一百三十六，不知何以计数各异。编全集固自有则例，唯鄙见则以为分体不如编年，原来各种小集亦以罗列为宜，胜于拆散分排，特别如《姑苏杂咏》有其个性者，尤不宜鲁莽割裂，如成串的星月菩提子，单个非不可赏玩，但无甚兴味耳。不佞最爱其《临顿里》十首，原本有小序云：

> 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所居也。皮陆有诗十首咏之，余悉次其韵，盖仿佛昔贤之高致云。

此诗今收在《大全集》卷十三，却无小序，亦是缺憾[2]。《杂咏》每篇有序，金檀注《青丘诗集》，始重复一一列入题下，称之曰原注，其实在《大全集》中乃原无有也。景泰刻本虽曰名贵，但在读者，还不如看金氏文瑞楼本，古本或粗而今本或精，往往有之。但如或得《缶[3]鸣集》等各原本，加以复印，则亦是佳事，因此可见本来面目，虽未必更佳，亦总是有异，此即值得传播耳。金檀注本例言之二云："《姑苏杂咏》间有旧刻单行，中多脱谬，国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锓版

① "编"原作"偏"。
② "憾"原作"恨"。
③ "缶"原作"无"。

亦潦草。"此言原非妄，唯《杂咏》虽有误，总比《大全集》为胜，如《杂咏》"走狗塘"一题在目录上乃误刻作"是狗塘"，可为一例，唯卷下"锦帆泾"一首，末二句[①]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大全集》则父刻作交字，渔乃是墨丁。《杂咏》全本皆刻作软体字，殊不潦草，只可惜无青丘自序，或者此当在康熙周氏本中，抑已破损佚去，皆不可知也。（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记于北平）

〔附记〕 凡编集，文可分体，诗不可以分体，最好是依年代合刻各原编小集，而别附一分体目录，略如索引，庶几得中。盖依体分编，不但破坏内容的统一，如《姑苏杂咏》是，且亦破坏作风的统一，例如袁中郎的《解脱集》，完全是代表公安派的最高潮，不特在各篇诗歌之间，即诗与文其间亦有息息相通处，合而读之，便极易了解，真是事半而功倍，如此则文诗且并不宜分编，须一切仍其旧也。各集有原序，亦多有用处，编合集时大抵弃去，甚为可惜，后世作序跋固多泛滥，但单只考查其编印的本末年代，已大有用矣。《大全集》录存序文三数篇，尚有可取，但如周傅跋便无有，即不能知《杂咏》在洪武中曾有刻本了。（六月十九日记）

〔再记〕 张君索稿，愧无以应，只得以旧作塞责，计前后距离已有三十月，此种陈言，岂复值得一读，思之唯有惶悚。

（廿八年九月六日）

① 此处原衍"下"字，已删。



古文谈

1939年10月28日刊《华光》1卷4期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同朋友谈天，听说近来有些大学招考，限定写古文，用白话文者不阅。朋友说此事大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两种文怎么能写。觉得这话有点古怪，请他说明，便说了这些话。

他说，第一白话文没法写。要照口头所说的那样写下来，只有戏剧及小说中记录对话才有此必要，目的是在于保存说话的口气。此外则无此必要，也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口语要用了去细密的叙事，或说理都还不大够，努力的去做则必须先练习一套本领，像市场说书或是教堂讲道理的才行，那是每个学生都来不及的。这里还是说北方一带国语区域的人，别处都习惯了说方言，学了一点蓝青官话还不够应用，哪里能够说得到写呢。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方言来写，至多只能成功《粤讴》或《海上花》里的对话罢了，而且这也不过是歌曲与对话，要去说理叙事，其困难和上边所说也还是一

样。因此,白话文这东西是写不来的。他又说,他听过许多[①]人的演说,几乎没一个说得好的,可见白话也还不大有人能说得好,何况要去写下来呢。

第二[②],古文也没法写。可是,这还有办法,虽然要一番大动干戈的预备,这件事多少有点困难。要写古文,这古以什么为范围呢?上古么,三代以上?那未必然吧。中古,周秦,西汉,或是近古,唐,宋,大约都可以,近代明清且不谈。所说预备工作,并非别事,只是要请国立研究院或是编译馆准备许多钱,许多人才,许多光阴,编出一部大"引得"来,把列朝文章例如周,秦,西汉,东汉等,一字一句,精细鉴别,详明排列,以完全严密便利为要,刊成书册或卡片,分发应用。这期间恐怕早则十年,迟当加倍,但也只好忍耐等待,一旦书成,则写古文不难矣,即看古文,虽以我(朋友自称)之不才,也觉得可以胜任了。如有人以古文呈阅,即问他做那一代那一派或那一人的,答说西汉,那么就取出西汉的一部引得,一一对勘,全合为及格,若是有字句查得为西汉所无,无论其出于东汉或是其后,悉以不合论,径打杠子可矣。翻过来说,在作者也就可以照样地办,如想做西汉古文,即在该当引得中去找材料,拼凑起来,便可合格。倘若不是这样用科学方法划分范围,只泛说古文,到底古到什么时代,十日相传为古,便以三百年前为古[③]呢,还是以本年以前为古?时光如流水,今年划定的三百年是明崇祯十二年,再过十年便到永历三年了,如此下去漫无限制,在民国三二八年时我们现在的文章也当算作古文,这还成什么话呢。所以在该引得编成之前,古文是没法写的。

---

① "许多"原作"好许多"。

② "二"原作"一"。

③ "古"原作"限"。

末了，他综合的说，天下有两样东西，是二是一，是一是二，此即语言与文字，一在口头说着，即是白话，一在纸上写出来，即是文章。语言变了文字，多少又有了点艺术性，便成了文言，凡文章都可以说是文言的，虽然它根本是语言，因为要把他写下来，要使他比白话说得更清楚更有力，自然与白话所用的字面或句法有点异同，故可称之曰文言，详言之即是文章的言语也。无论口说或是笔写，目的只是要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人而已，这里第一要有意思，第二要传达得出。假如没有意思而乱道，或说了一大套而人家不懂，则目的不能达，如此说话谓之胡说，如此作文便是不通，说到这里白话古文都是形式之末，那么也可以不必多谈了。

我听了朋友的一番话，觉得也颇有道理。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自己明明以为是写白话文，无如蓝青官话既然说得不很好，又为得要求意思明白起见，往往古今中外的乱用一阵子，结果弄成四不相，乡间则叫做三脚猫，不过我也很满足，总之是尽了我的能力去明了地表白所想说的意思了。在我一面自认是写了白话文，可是也有别的朋友怪我喜写文言，弄得我莫名其妙，现在归结起来，觉得倒[1]都不错，盖写的只是文章而已。日前看见友人在读一个日本学者所著的书，叫作《国语之将来》，他主张国语的目的是在要把自己的意思明白地传达给别人，如今将人教练得没有思想，又或不能满足地传达意思，这便是国语教育的失败。这个意见与我的朋友刚才所说的颇有相似之处，我便说给他听，恭维了两句，他只微笑拱手，说岂敢岂敢。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朋友在民国以前留学欧洲，专门弄化学，近来却只读线装旧书，外国书是久已不看了。我觉得有点失言，这场谈说也就此完结了。

---

① “倒”原作“到”。



关于“覆瓿”

1939年11月1日刊《覆瓿》第11号
署名知堂
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高先生写信叫我给《覆瓿》月刊写文章，我很抱歉，因为没有什么话可说，未能应命。但是，觉得这覆瓿的名字很有意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多少不免有点历史癖，想到那《汉书》上的典故，引出一番话来，这叫无话找话，在我算是聊以塞责，但是在古文作法上恐怕是有什么名号的，不过现在记不起来，反正没有关系，也只索罢了。

据说扬雄在写《太玄经》和《法言》时[①]，刘歆对他说，现今读书人懂得什么易和玄，你的著作只好给人拿去覆酱瓿吧。这件故事几乎妇孺皆知，不必再加说明，但是我觉得特别有兴趣，就因为其中有这几个问题。其一，这瓿是什么？我查字书，书上引了《宣和博古图》，画作敛口大腹的罐似的东西，我才了解，也算是放了心，原来这不是花盆样子的大口的瓦器，要不然，口那么大了，怎么覆

① 原无“时”字，今增。

法呢。字典说，瓿，唐韵蒲口切，我想这大约与俗语的篰和甏是同类的形状，篰[1]用竹制，甏则烧土而成，或者即是瓿的后身亦未可知。

其次，这覆瓿的书是怎么样的呢？古代的书据说是用竹木简的，至今尚称简策，书名有《竹书纪年》，在罗振玉所印的《流沙坠简》中，还有些汉代木简的照片，"春君长毋相忘"的一片恐怕还有许多人记得，琉璃厂南纸店里也有铜镇纸，刻着这两行隶书。可是，一串串的竹简，这简直没法拿去盖酱瓿，无论瓿的口怎么小。再说，书卷后来是用布或纸所写，卷成一卷，仿佛同画相似，有谓缥帙即是月白布的袋，所谓牙签是写书名挂着的象牙牌。那么这一卷卷的东西，似乎也不能比竹木片更适用，盖在瓿上反正都是通空气，而且还可以让小虫子自由出入的。假如不把这一卷子抖开了，从新叠作方块，无论如何不能合用。我却相信刘歆[2]他们不见得有闲工夫来这样做，所以我颇怀疑那时的书也有书本式的，看得不中意时这才可以顺手搁在酱瓿或酒瓮上权当盖子用，至于书本式的是什么样子，那我还不能知道。摺叠本至今俗称经摺，似乎起源于佛经，线装大约更要迟了，我不能说在西汉末就有这两种装法，但总之如不是书本，这酱瓿[3]便不大好覆，所以姑如此说，如有错误，伫候明教。

扬子云的三部著[4]作趁这机会拿出来一看。《太玄经》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法言》大部分可懂，二者虽都是模拟之作，《法言》较好，我看要胜过《文中子》，因为他还不很像《论语》，盖因尚有雕虫

① "篰"原作"簿"。

② 此处原衍"把"字，已删。

③ "这酱瓿"上原衍"或"字，已删。

④ 原无"著"字，今增。

篆刻之馀习在也。《方言》乃是他的杰作，他想到收集别国方言，其解释又不单以《尔雅》为依据，这两点至少都是他的特色。可怜后世人记方言者无一不紧抱[1]《尔雅》、《说文》，自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至陈训正的《甬句方言脞记》（几位释[2]《方言》的自更不必说了）全是如此，可见祖师究竟不同，非后世徒弟们所能及。《太玄》、《法言》可覆酱瓿，《方言》十三篇应当免议，今后如有实心记录方言者，还该以扬君为法，清儒小学虽好，于此一门全无是处也。

---

① 此处原衍“信”字，已删。

② “释”原作“读”。



国 文 谈

1939年12月28日刊《华光》1卷6期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前日我的那老朋友又来了，又谈到国文的问题。大抵人都喜欢讲外行话，总觉得比自己门槛里的事新奇有趣，所以那老朋友决不同我多谈他专门的事情，虽然这在我本来还不至于算对牛弹琴，因为我们的职业原是颇相近的。他却只高兴议论经学道学文学这些物事，自必有些很可笑的意见，可巧主客正是同样的外行，所以谁也听不出谁的破绽，有时也还谈得滋滋有味，两三个钟头还说不了。这一回也是如此，适值鄙人手闲，便把他记录一部分下来，不过不是速记，只是记个大意，而且又变成我自己的文章，不能保存多少本人的口气了。

我的朋友起头就大诉苦，说中学国文教本之误人。他有侄儿在高中一年读书，翻开书来就念《老子》，他吓了一跳，再看下去又是《易经》，吓得跳不起来了。这《周易》，除了文王孔子以外，恐怕还没有人懂得，说到用，则路旁摆摊的“赛康节”之流也都会弄。研

究院林立，国学家也数目不很少了，《易》之新研究终于还未出现，可见学者们对于此书也还有点谦逊，这其间，要抓出一卦来叫十六七岁的少年咽下去，这怎么行，又是什么用意呢？《老子》有些世故的话还不难懂，可是谈玄说道，那就属于哲学者的专门范围，在西洋据说叫作物理后学，须得先弄过物理，实在即是现今所谓自然科学之后，才可以着手，这又岂是少年们所弄得来的。他说他真不懂这国文教本的目的何在，为的是做文学史的例子呢，还是要使得学生能懂国文并且自己能写。据他的意思，教国文的目的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即是使人能懂国文书，能自己学了来写，但是《易经》的某一卦于此有什么用处？无论教员怎样的卖气力，反正讲不清楚，即使说是讲清楚了，也未必就能举一反三的去读懂其馀的六十三卦。再说，这些见龙在田等话，就使真是韵文的先祖，学生读了是否于写作有用？学了去拟作文词，好的是《太玄经》，坏的是《文章游戏》里的嫖卦赌卦，似乎现在都没有这必要。误人子弟，这种读本可以当得起这个评语了吧。

他对于周朝的文章大加批评之后，回过来又攻击清朝的文章。他有一个外甥在初中读书，有一天在读国文，他走过旁边，看见这是一课薛福成的《登泰山记》。他因此大发牢骚，说这种教本误人子弟，这篇文章很不通。他说他也知道这薛福成是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在现今无论新旧都崇拜曾文正公的时候，桐城派正是走着红运，这个他也知道，不过文章还是文章，通不通也总是事实，就是圣贤也不能全无错处，所以他的指摘不至于便犯了非圣无法的罪。据他说那篇记的起头是这几句，照教科书原来的句读抄录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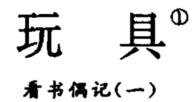
> 同治四年，福成参曾公幕府事于徐州，明年，移住济宁，以巡阅河防，纡道泰安观形势，遂登泰山，余与李榕申甫，黎庶昌

菀斋，方宗诚存之，王定安鼎丞皆从。

这节文章，他说，就大有毛病。同治四年这句的主格是福成，明年却不是了，论意思当是曾公，而论文法乃仍是福成，因此读下去觉得头绪杂乱。历来发表的中学国文教授的目的以至大学招生国文考试的标准，都说到要学生写出文章来无文法上的谬误。主格混杂不清，这是文法上大谬误之一，教科书里的文章如此，教学生如何能无谬误。本来薛福成也何至于就文理不通，实在是今昔论文的标准不同，从前主格混杂大约还不大妨事吧，而今却是不行了。假如学生熟读了这种文章，用功模写，结果将做出许多文法上多谬误即文理不通的文章，教员看了摇头大打杠子，不知道这实在还是学校教他们如此的。这今昔之不同，据他说明大旨是这样：从前的文章是唱的，现在却是读的，即一是听的，一是看的。桐城派祖师姚鼐念韩愈《送董邵南序》，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常数易其气而后成声，完全是唱曲的办法。因为重在声调，故意思不大重要。向来有人批评韩愈《送孟东野序》之不通，起首说"物不得其平则鸣"，末了又说"和声鸣盛"，正相反对，就是中间说"以鸟鸣春"，鸟亦何尝有什么不平，一篇之中有好些矛盾。这说《送孟东野序》不通，与说该序是好文章的，实在两者都是不错。为什么呢？如以读的标准来说，意思前后矛盾，文法谬误，当然是不好，称之曰不通不为冤枉，但若是以唱的标准来说，则只要声调好便好了，意思与文法有什么关系呢？皮黄戏高唱入云的时候，听众精神恍惚，大有入魔之意，假如拿了原来词句来看，不通的地方尽多得很，但此毫不害其为皮黄也。韩愈薛福成的文章好坏问题正是如此，盖唱佳，而读则未必佳耳。说到这里，话又得说回来了。皮黄则可，文章却不可。文章并不就是歌曲，现在学校里教学生国文目的也

不要他能唱而要他能读，能看懂别人的文章，还要再进一步自己也能够写。因此无论在唱的标准上怎样呱呱叫的好，现今国文教育上却都不适用，可惜大家积重难返，大抵还是以耳为目，只挑选听了好的文章来教青年，不去找看了好的文章，标点排印的国文教科书其实也还是新式的《古文释义》罢了。

他很反对青年念八大家及桐城派文，拉拉扯扯的说了许多的话，今只记其大意，馀悉从略。随后他再说对于所选白话文的不满意，这里只好更简单的记下两要点而已。其一，他说许多杂志报章上偶然登载的文章，随便选入，其实本质还不过是中学生作文的程度。其二，有些名人在政事等各方面上确有本领，但文章却非其所长，选入也不适宜。他总结的说，看初中国文一册里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国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学生在一学期中只读得这一点儿国文，无论他怎样用功，真心想学写作，怎么能行呢。世间说现今中学生国文程度差了，这有如虐待继子的三天给他吃一顿饭，却说他长得不肥，岂不是冤哉枉也么。以上所谈都是消极方面的话，我也想到想问他积极的办法，国文要怎样教才好，可是不知怎么一岔，我们又谈到求仙问题去了，于是这国文谈也就自然中断了。



玩　具[①]

看书偶记(一)

1939年1月1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读《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慧锡两山记》中有云:

买泥人,买纸鸡,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

此令人想起《扬州画舫录》的话来,卷十六云:

山堂无市鬻之舍,以布帐竹棚为市庐,日晨为市,日夕而归。所鬻皆小儿嬉戏之物,未开新河时皆集莲花埂上,故孙殿云诗有“莲花埂上桥畔寺,泥车瓦狗徒儿嬉”之句。自开新河后,此辈遂移于此,故梦香词云,“扬州好,画舫到山堂,屈膝窗

① “读书偶记”1939年1月1日起在《实报》刊出,4月18日起改名“看书偶记”,《书房一角》则统称《看书偶记》,但收录不限于《实报》所刊,次序亦多变动,现编号均按《实报》次序,未刊《实报》者于年度中列于其后。

儿粘翡翠，折腰盘子钉鸳鸯，花月总生香”。

樊文卿《津门小令》之七十八云：

津门好，儿戏笑声哗，碎剪羊皮糊老虎，细穿马尾叫虾蟆，竹马纸乌纱。

据说天津亦称小扬州，二词正堪相比。中国文人学者向来轻视儿童，故歌咏记叙玩具的文章甚少，得见一二节，虽甚简单，亦正可喜也。

印书纸

看书偶记(二)

1939 年 1 月 5 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闻怡谷老人言,桐城黄君的《论衡校释》已出,前日往琉璃厂,因买得一部。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论衡》中九虚三增至今犹有万丈光焰,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觉不易读耳。黄君此著有功于后学不少,鄙人亦大受惠赐,披读数章,豁然意解。但用纸稍差,质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实以那么的高价发售,似亦不妨用竹纸印矣。

此种纸微黄而光滑,便于印锌版,出于日本,在彼地则不用于印书,只供广告传单之用,不知来中国后何以如此被尊重,称之曰米色纸,用以印精装本[①],此盖始于开明书店,旋即泛滥全国矣。中国为印书最早之国,至今而尽忘其经验,连一张纸的好坏亦已不能知道,真真奇事也。

---

① 此处原衍"用"字,已删。



翁鞋

看书偶记（三）

1939年1月9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鲍鈖著《稗勺》中有《翁鞋》一则云：

北人冬月履纳棉絮，臃肿粗坌，谓之翁鞋，李空同[①]集中用之。当是老人所着，故名。

案北京今俗名老头儿乐，更有风趣。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云：

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吆卖，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密哈密酥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

---

① “空同”原作“崆峒”。

然则瓜中亦有此名，大约即是南边所谓冷饭头瓜又名呃杀瓜者乎。假风雅人轻视民间物名，不能领取其鲜活的谐味，往往喜改为古语，此正是作木乃伊的手段也。翁鞋今未闻此名，如非空同[1]所改作，则幸甚矣。



《毛诗多识》

看书偶记（四）

1939年1月1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阅《毛诗多识》，书面有旧日题记云：

> 此书系十年前刻本，惟印本似不多，书估遂尔居奇，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从邃雅斋买得，价尤奇昂。

《毛诗多识》凡上下两卷，今刻为“求恕斋丛书”之一，有乙丑刘承干序，时为民国十四年也。序云多隆阿姓舒穆录氏，字文希，称其为乾嘉间经学名家，事迹则未详。案王菉友《蛾术编》卷下有致多雯溪先生书，注云先生名隆阿，书中即言《毛诗多识》事，王君谓书刻板后须卖之，而多以为不可，故致书重申此意。今据刘序似书终未刻，卷上有王菉友识语十数则，稍留痕迹而已。王书不著年月，以书中语考之，当为去乡宁县后所作，计其时在咸丰壬子夏后，去乾隆末年已五十七载矣，可知多隆阿乃是嘉道间人，盖与王菉友是同行辈人也。



关于多隆阿

看书偶记(四)[1]

1939 年 1 月 22 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阅杨子勤所编《雪桥诗话》,见续集卷八中有云,同治三年四月,礼堂将军多隆阿卒于大营,予谥忠武。其后记程棫林处又云,意園得多礼堂先生《毛诗多识》,稿本丛杂,属少珊为之理董云云,似著《毛诗多识》者即此多隆阿。惟续集前条中已云,忠勇蒙古人,生平不识汉字,遇公牍使人诵以听,然则著书岂可能耶。刘氏刻《毛诗多识》,所据即意園本,且亦正是杨氏所携以相示者,不知何以一疑为乾隆时经师,一以为是同治时武将也。据王蒃友书,《多识》作者为号雯溪或文希之多隆阿,其号礼堂者别是一人,殆可无疑。杨氏曾与意園共编《八旗文经》,乃混二多为一,且使不识汉字人解《毛诗》名物,未免疏矣。

---

① 集中与《毛诗多识》并作一篇,故同列为(四)。



《紫幢轩诗》

看书偶记(五)

1939年1月23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鲍冠亭《稗勺》中有《真雅文俗》一条云:"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南阜山人诗集》昔年曾搜得一部,今在琉璃厂又得《紫幢轩诗》,但只三种四卷,仅有其全部七八分之一耳。卷首有题辞云:

> 子晋为渔洋弟子,学有所自,故得卓然成家。是本有梧门私印,是奉选《熙朝雅正》时搜得之也,惜仅三种,非全集也,存之求是斋中,时时展卷耳。

下钤朱文印曰文淇读过。初疑是刘孟瞻,后查延清编《遗逸清音集》卷三收有文淇诗十七首,注云文淇高氏,汉军正白旗人,著有《求是斋诗草》,盖清末人,入民国尚存也。《紫幢轩诗》第一页下方有法梧门印三,文曰堂堂堂印,存素堂珍藏,诗龛居士存素堂图书

印，皆朱文。诗题上时贴有红纸碎片书字作记，盖是入选之作，惟五七言律诗均标作五七言立，不写律字，岂是法梧门家讳耶。书刻印甚精，而时有误字，不知何故，如桥误槁，有两处均如此，其一且还是押韵处也。

紫幢轩诗美恶如何，非不佞所能说，但翻读此四卷书，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诗中时常说及街上叫卖东西的事。《槐次吟》中《暖屋》云，后巷黄昏人卖炭。《立冬夜作》云，听卖街前辣菜声。《艾集》卷上《闻卖豆声》云，独轮车上小灯悬，则并写其状态。卷下《冬街夜归》云，素纸周糊芦菔担，过街似点上元灯。亦是此一类。《里门望雨》云，马乳蒲桃马牙枣，一声听卖上街初。《年夜》云，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枕柝轩瞑坐》云，市声只隔寒烟外。以上所举，盖悉是市声也。有一诗题云："枕柝轩中自巳至酉，书卷开阖，悉以市声为准，戏成一首"，有句云，小柝重过晚市油。案敲梆卖油至今尚然，用入诗中，不知芗婴居士而外尚有何人。又《连夕不饮》诗中有一联云，柝喧街下夜，火响炕封煤。此是打更的梆声，但总之似乎都喜欢听，故以枕柝名轩，若封火细事，却亦是北方生活的一点滴，亏得他收拾来放到诗里去。昔日读闲园鞠农之《一岁货声》，铁狮道人之《燕京岁时记》，心正喜之，其爱景光识名物之意有相同者，今在紫幢轩亦得见一斑，此数人者可谓不俗者矣。



《西斋偶得》

看书偶记(六)

1939年2月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近日搜集蒙古博明著作,得西斋三种,计《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并嘉庆辛酉年刊,而书中宁字悉已剜改,盖是道光时所印也。博氏进士出身,而通晓蒙古满洲唐古忒诸国语,故所见自较广,与一般文人不同。《西斋偶得》卷一蒙古呼汉人一条曰:“蒙古呼汉人为契塔特,盖蒙古初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后五代时始通中夏,惟时燕云十六州皆属契丹,故以辽国名称之。”又西洋呼中国一条云:“西洋呼中国为吉代,盖亦契丹之讹。”案此西洋当是指俄国,俄语称中国正云吉泰,今哈尔滨尚有吉代思卡耶街,据此知其源当出于蒙古语,瓦剌一条下说此本是唐古忒语之美称,明史误为专名,结论之曰:“故中国人不可与谈边外之事,中国之书生更不可与谈边外事也。”语虽不敬,却亦是事实,书生辈百口莫辩,大抵因为只读中国文,或者即通外国语亦只取便口给,未能利用到文章学问上来耳。

《西斋偶得》卷下佛书文字一条中，引王阮亭《居易录》，抄录董斯张《吹景集》所举佛典里中国古语，云当是内典偶合耶，抑袭取耶？西斋解之曰："盖佛书本皆梵文，其中国语皆译者援据经史文以释之，不惟非偶合，亦非袭取。"说得何等简单明了。其实佛经原是印度文，由译人用汉文写出，此事明明白白何劳再说，而名士如董王诸公似均未知，岂非奇事。

西斋的识见胜于中国书生多多矣，此无他，亦只是有常识，能明辨而已。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之谲诞者假老庄之书为之，龚定庵俞理初蒋子潇闻之大笑，加以嘲弄，见子潇《读释藏日记》中。此三君者，盖是嘉道间之人杰，龚蒋亦喜杂治梵藏满蒙天方文字，其识见之能广大，殆亦非偶然也。



《疑　耀》

看书偶记（七）

1939年2月11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疑耀》七卷，明张萱撰，今刻入《岭南遗书》中，通行于世。明时坊本题李贽之名，后人屡有辨正，其实看本文即可了然，不烦旁证，即今刻本中张萱自序，竭力声明，亦可不必也。

《疑耀》中虽有数则为张和仲采入《千百年眼》，亦本平平，其识见乃实甚卑陋，不出书生窠臼，与卓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信此书为李氏所著者倒未免可笑耳。如卷二《佛字辨》，谓佛字义为拂，不能译为觉。卷四《佛经不真》，又《佛经恐非西来大意》，卷五《佛书可疑》，皆意主辟佛，而不知翻译为何事，与王渔洋等相似，正是好例。卓老即使不崇佛，亦何至于此乎？

又卷五《妇人遭乱》一条，实即是饿死事小之小注。至论淫乱之始，以为始于夏少康时之女岐，尤为匪夷所思，此事乃亦有原始可考耶？想起来可为绝倒。至其自序中丑诋闽秃，全不为自己的文章少留地步，此又可见其短少趣味的修养，惟世人多犯此病，或不能单怪张君也。



记杨妃脚

看书偶记(八)

1939年2月1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蒋子潇《春晖阁诗钞选》卷四有七言古诗一首,题曰:

> 江茂才星楼得美人出浴图,自题诗强名杨妃,属余和作,因戏咏之。其末两联云:旧藏亦画华清宫(原注云,余所藏"华清出浴图"为仇十洲笔),丰肌大脚香雾浓。今朝才看凌波小,遗事或堪补天宝。

此细事,却颇有意思,于此可以见秀才们之如何倾倒于女人之纤足矣。金古良撰《无双谱》,画与赞均佳,而花木兰之靴乃亦不自然地尖小,则贤者亦尚不免,射堂岂习见戏台上女将之有跻,以为木兰亦当尔耶。不佞对于人家之好色并不想反对,以为此亦人情之常,惟独此事不能理解,若遇此等秀才,即不显示嫌憎,也总往往觉得好笑也。



张皇亲胡同

看书偶记(九)

1939年2月24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日前欲至西城尚勤胡同访友，适送报至，便一翻阅，见记张皇亲胡同掌故，云即是天启张后父国纪宅所在，今名尚勤胡同。及出门命车夫往尚勤胡同，猝不能解，因急告以旧名，始恍然悟。懿安皇后据正史亦是千古贤媛，留一巷名以纪念其故里，未始不佳，不知何为改之，且令引车卖浆者茫然不省其处耶？近年来北京地名多随意改换，如狗尾巴胡同之为高义伯，羊尾巴胡同之为杨仪宾，皆是。后人不知高义伯之原语，或将以为有拾金不昧之义人曾住此地，且将编故事以实之矣。欲化俗为雅，而其结果乃反更俗，士大夫往往有之，自可不必再问吏胥耳。



《北风集》

看书偶记(十)

1939年3月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余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颇想读其诗文而不可得。久之始在厂甸买得《画虎集文钞》,虽只寥寥十数页,而文多质朴可取,又得见其《南行诗草》,小序与注甚多,又常采小说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处也。庆博如为《岁时记》书序,因亦留意其人,著作只得到一种,曰《铁梅花馆北风集》,内容比《画虎集》更少了,题序等倒有八页,本文则只五页而已,共计律诗绝句三十四首。此系庚子在郊外避乱时所作,有好些都觉得可喜,卷末《归家》二首尤令人读之怅惘。鄙人昔时曾恨不得遇身历乱离之人,听他讲讲过去的事,然而今日不敢请与相见也。闻庆君今健在,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或有缘能得他种著作读之,便已满愿矣。《北风集》版心下署"铁梅花馆丛书第二十四",不知此外尚有何书也。

上文系二十八年一月间所写,阅两月承张君次溪惠赐铁

梅花馆著作三种，即《怀古集》、《闷翠诗》各一卷，合订一册，《铁梅七十自述诗》一卷。自述诗序题壬寅，为民国二十七年，计其生年当为清同治八年己巳也。编订时记。



诗　话

看书偶记（十一）

1939年3月1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越缦堂日记》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条下评钟雨人所刻《养自然斋诗话》云："意在表征拾坠，以人存诗，其例甚善，惜所采稍杂，不免入于庸近，其称谓有太夫子及姻伯之类，亦囿于时俗。"阅诗话卷三，便遇见太夫子姻伯三数次，不觉失笑。惟此虽有俗味，比满纸中丞大令者似尚胜一筹。常怪后人笔记中称人何以必须用官衔，若诗文话，尤无关系矣，而亦复如是，岂官职高卑乃与文字佳否有影响耶。外国文人尽有做官者，但培根不闻以水部称，戈德亦不闻号相国也。最奇者无官位人则名之为布衣，此与佛教中之白衣相似，但白与缁对，用为分别，而布衣则为等级的，其例殆犹朝鲜称独身男子曰总角钦。此等似是琐屑，却值得细想，都是中国人精气之所在。花下喝道不为韵事，但偕某大令看花则是普通诗题矣，鄙人见之常觉不好过，有如看缠足女人也。



张芑堂逸事[①]

看书偶记(十二)

1939年3月18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张芑堂《金石契》,刘氏重刊五册本嫌其不精,原本又畏其贵,今所有者只是乾隆戊戌编上下两卷本耳。《金粟逸人逸事》一卷,录入邓氏"古学汇刊"第一编中,其提要云:"朱琰撰,记张芑堂徵君琐事,与《世说》相近。"近日重读一过,乃觉得并不近似,三十二则中才有一二略得仿佛,馀均是诗话之属,但尚可读,朱笠亭亦是解事人也。日前偶从书坊得原刻《逸事》一册,有乾隆戊子沈廷芳序,钱人龙跋,金粟逸人小像一页,沈芥舟画,蒋元龙赞,皆汇刊本所无。逸人像戴东坡笠,面瘦长,颇有神气,以意度之当必相肖,有如西泠五布衣中之金冬心像,都非市井之丹青师所能臆造者也。

① "张芑堂"原作"张芭堂"。



背　书

看书偶记（十三）

1939年3月2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雕丘杂录》十一《东斋掌录》记邓文洁公论读书法，略谓生平苦不能记，即三四行书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书都有个意思，所谓含其英咀其华，自然得他好处，非是记他的将别处用。梁葵石很赞成他的主意，与鄙见亦相合，盖鄙人最缺记性，即最所喜欢的陶诗亦一篇都背不完全也。但古今却都看重背诵，岂拟将别处用耶。《蓉槎蠡说》卷二云：

> 永乐朝教习庶士甚严，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捕蛇者说》，诏戍边，复贷之，令曳大木。启等书诉执政，执政极陈辛苦，得释归，见陆釴《漫记》。

至今父师闻尚责令学生背韩柳文及其他，此亦是朱棣之同志。鄙人幸非庶吉士，亦不去再当学生，否则当如程圣跂所云，危矣。

《天咫偶闻》[1]

看书偶记（十四）

1939年3月2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杨钟义《雪桥诗话馀集》卷八记震在廷事，云著述甚夥，以《天咫偶闻》最为精审。鄙人读震氏书，亦同此意。《偶闻》大体虽似《藤阴杂记》，惟《杂记》太近诗话，在不懂诗如鄙人者读之，常不免有骨多肉少之感，《偶闻》则无此恨矣。

二十六年秋间卧病，阅清人笔记以自遣，见有可喜者随笔录其题目，凡阅五十馀种，所选共六百则，《偶闻》十卷中计录出二十条，《杂记》乃一无所取，即脍炙人口之《阅微草堂五种》亦只取其八，大都不谈果报者耳。

《偶闻》中多记八旗文学艺术家事，亦是一种特色，读博西斋著作后颇感兴趣，故此一方面于我亦有用处。《涉江诗文钞》各一卷，《海上嘉月楼劬学遗牖》二卷，均得一读，不能有所臧否，晚年不得意故走而卫道，此固是无可奈何，若私意则所不喜也。又壬子后易

① 原作《天咫偶闻》。

姓名为唐晏，此事本应从主人，惟鄙人爱《天咫偶闻》，习见震钧之名，今仍愿以是相称。《妙峰山琐记》的作者易名鲍汴，鄙人仍称之曰奉宽先生，亦聊以示相敬之意耳。



《輶轩语》

看书偶记（十五）

1939年3月31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往时见张之洞著《輶轩语》，嫌其名太陈腐，不一披阅。丁丑旧上元日游厂甸，见湖北重刊本，以薄值买一册归读之，则平实而亦新创，不知其何不径称“发落语”，以免误人乎。《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张氏不喜言神灵果报，《阴骘文》、《感应篇》，文昌魁星诸事，即此一节，在读书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语学语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称赞《阅微草堂笔记》，即贤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为然。纪氏文笔固颇干净，惟其假狐鬼说教，不足为训，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犹为无害。我称张香涛，意识下即有纪晓岚在，兹故连及之。二人皆京南人，均颇有见识，而有此不同，现今学子不妨一看《輶轩语》，《阅微草堂》则非知识未足之少年所宜读者也。



变鬼人

看书偶记(十六)

1939年4月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谢在杭《五杂组》卷五“人部一”云：

> 黔筑有变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与数人宿，夜深闻羊声，顷便入室，就睡者连嗅之。僧觉以禅杖痛击之，踣地，乃一裸体妇人也，将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罗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见土官方执人生瘗之，问其从者，曰捉得变鬼人也。

此颇似西欧巫蛊故事，形似人狼，迹似僵尸，却并非一事。赵翼《檐曝杂记》卷三有《人变虎》一则，与人狼更近，云：“龙观察士模为余言，普尔边外人有能变虎者，新授孟艮土目叭先捧，即其人也。余以将军命檄之来永昌，令其变，竟不能。”游僧目睹活埋变鬼人，虽在三百年前，思之亦可怕，赵瓯北实验虎变而失败，则不禁令人绝倒矣。此种精神其实极可佩服，惜不可多得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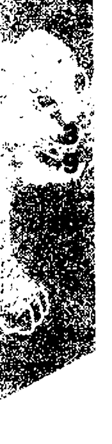
《文字蒙求》

看书偶记(十七)

1939年4月13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秋间患腹疾久不出门，日前因事不得不到南城去，便中从琉璃厂书店求得《正字略》一册归读之，对于王菉友大有敬意。此书亦是《字学举隅》之流，而由读《说文》人为之，便自不俗，陈雪堂字亦较之翰苑分书似有不同也。安丘王氏著作，寒斋旧有《说文》数种，未及细读，惟《文字蒙求》四卷，昔曾涉猎，今日又取阅，亦觉得多可喜处，所说根据《说文》，改变处却亦不少，且其著书目的全为儿童，与《鄂宰四种》中念念不忘后生初学相同，此意甚可感，亦实希有可贵。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作，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蒯氏“广义”作于光绪辛丑，已是六十馀年后矣，却殊不足观，可知此事甚难，愿力与识力如不相副，亦是徒尔。佛说因

缘，疑此中正亦有之，末法难挽，大士不出，吾辈乏力梵志坐树下慨叹弥日，复何补也。



《教童子法》

看书偶记(十八)

1939年4月1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王菉友著《教童子法》一卷,附《四书说略》后,虽只十三纸,却颇有精彩语,即使未能上比古人,亦足与张香涛《輶轩语》竞爽矣。如云:

>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

又云:

> 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

均清楚爽利可喜。又谓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则可通于文艺制作,尤有见识,非

平常为父师者之所能知矣。

《四书说略》虽多为作时文而设，亦多有隽语明通语。有一处云：

> 古人带经而锄，樊迟何故学之，即学之又何用请之？请之者，浮海之意也。

案李氏《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云：

> 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

上下三百馀年，意见暗合，此亦难得而可贵也。山东学者似特别多情味，不佞所喜者有三人，即桂未谷郝兰皋与王菉友是也。



读书偶记[①]

看书偶记（十九）

1939年4月18日刊《实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近两年无事可做，只看杂书遣日，外国书既买不起，也没有兴趣，所以看的只是些线装书。看了之后，偶然有点意思，便记了下来，先后已有几十条，再给他起了一个总名，叫做“读书偶记”。可是不凑巧，有一天翻看书目，看见上边有一种《读书偶记》，八卷，清赵绍祖著。这部书我没有找到，但是书名既然和他重复，我只得想法子来改。想了几天没有好办法，结果只将读字涂去了，换上一个看字，虽然不免改头换面的不能彻底，却总比雷同要好一点吧。我仔细想想，这字也还改得有道理。读书这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是高邮王君那样的人，才能去写《读书杂志》，我们也来看样，难免有点僭妄。我实在只是看点闲书罢了，平常总是说看闲书，没有说读

---

① 《实报》上的“读书偶记”专栏自此始改称“看书偶记”，《书房一角》将此篇移作《小引》。

的，如今改了倒[1]很着实。读书人是不容易做的，高的很是了不得，下的也很要不得，若是看书的那便是别一类，客气一点说书的尊一声看官，我们就来充当一下也正不妨吧？

① “倒”原作“例”。



《戊戌奏稿》

看书偶记（二十）

1939年4月2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阅麦仲华所编南海先生《戊戌奏稿》，颇有见识，六月“请禁妇女裹足摺”中尤多佳语，如云：

> 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贫家尤甚。亲操井臼，兼持馈浣，下抚弱息，上事病姑，跛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扪足叹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隳[①]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缢树而弃生，堕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

我尝怪古今有识者何以不憎恶缠足，今见康君，乃始得为中国男子解嘲，事虽不成，可以传矣。《癸巳类稿》中俞理初有《旧唐书舆服

① “隳”原作“堕”。

志书后》,《天苏阁丛刊》中徐仲可有《天足考略》,此二者当可与竞爽。其馀多是杨廉夫王贻上一流人物,可以坐灯棚下吹笙歌诗,醉饱而散,无从与谈人世辛苦也。



《扪烛脞存》

看书偶记（二一）

1939年5月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陈馀山《扪烛脞存》十二卷，前有蒋子潇序，至民国甲寅始以活字版印行。此系《诗诵》作者之笔记，目录亦颇有意思，殊多期望，但一阅爽然若失，与一般读书人的本领盖无所异也。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陈氏于此两关都透不过，莫怪不能给予及第分数耳。卷五《艺术脞》中引《鹤林玉露》云，陆象山观棋局，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弈而得大胜，评之曰，可知艺与道无所不通。焦里堂在《易馀籥录》卷二十亦述此事，而断之曰：

> 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

此数语极高超，亦极平常，只是有常识耳，而此在世间又甚少有，真真有百年旦暮之感，读之不禁感激。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适买得《初潭集》三十卷，遂联想及之，使人怅惘终日。



《千百年眼》

看书偶记(二二)

1939年5月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明末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评论史事颇有见识。卷三“吴亡不系西施”一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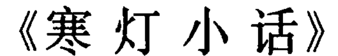
> 昔人谓声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

案此意盖本于李卓吾，《初潭集》卷三记汉武魏武嗣宗仲容诸人后曾有所发明，有云：

> 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

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此种特见实在只是有常识耳，正如花红柳绿，个个都应看见，而偏多病眼者，反而把看见的人当作怪物，大是奇事也。



《寒灯小话》

看书偶记（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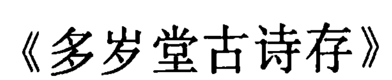
1939年5月10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曩读李氏《焚书》，喜其心直口快，思想明达，最所敬仰，而文章煞辣，亦有可畏之处，但见卷四《寒灯小话》四则所记，则其人又是蔼然富于人情者也。如第一段云：

>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言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

读此节大有悲凉之气，窃意是卓吾生活的极重要资料，只怕识者不易多得耳。我们看《日知录》中论李贽处，便可知顾宁人毫无感觉，

只是人云亦云,有如隔巷听人家呼捉贼,便尔跟着大嚷,发挥其优越感而已。一代学者如顾氏尚如此,他更何望哉。



《多岁堂古诗存》

看书偶记（二四）

1939年5月20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多岁堂古诗存》，成书选，本八卷，而卷二分上下，实是九卷也。前阅《天咫偶闻》，中录《古诗存》例言四十七则，颇可喜，因求得全书读之，评点不多费笔墨，却多有佳趣，思想尤明达，至不易得。卷七评陈后主云：

> 后主的系词人，倘止携暄范诸狎客为贵游子弟，则文采风流，未始非千秋佳话，乃位违其才，遂致倾败，亦其大不幸也。

又卷八评隋炀帝云：

> 帝之清词丽句与陈后主同工，而浑灏之气时或过之，足压时辈，何恨恨于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耶？然亦足见古人虚心刻覈无论已。

平心想来，只是有常识，故说来合于情理，但试看古今来有若干人能说，即此可知是大不容易，值得我们佩服也。《冷斋夜话》卷四记其弟超然论诗语曰：

> 陈叔宝绝无肺肠，诗语却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此虽深许其诗得于天趣，洪公亟叹为知言，但仍牵扯行事，未能免俗，与成误庵相比，犹差一级耳。

乌里雅苏台

看书偶记(二五)

1939年5月23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野棠轩摭言》八卷，吉林奭良著，卷三《言文》，卷七《言多》中语多可取。卷七记乌里雅苏台将军之苦，有云：

> 其地浮沙，不能筑高墙大屋，虽以将军之署，墙仅及肩，前院三楹，后院五楹，将军之所居也。捐闷散步院中，市人呼曰，将军出矣！群聚观之，将军乃入户。不可以病，购药在杂货铺，付药一撮，问其何方何药不知也，煎药即在煮羊肉大釜中。

昔读《儿女英雄传》，安公子简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举家沮丧，未免诧[①]怪，今得憩叟解说，意思乃更明了矣。《野棠轩文集》五卷，亦多有明达之见，并世不可多得。大抵评论古今文章学术，如能不为唐宋两位文公所罩住，即此便已佳，可以知其自有见识，惟大家

① “诧”原作“诧”。

往往不能如此，盖为患得患失故，转不如寻常文人之能自主，野棠轩之可取殆即在此也。



《儿女英雄传》[1]

看书偶记(二六)

1939年5月30日、6月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又喜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玩笑着说,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最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使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第三十五回鬼神示兆,说此人当中,这一

① 《实报》分两次刊出。

点我觉得是一个大毛病，全书中本来不谈神怪，此处乃落了《棘闱夺命录》的窠臼，很是可惜。写十三妹除了能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大约列公也曾[①]遇见一位过，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耦的谬说，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以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我小时候读《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庭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下[②]一极恶劣的印象，若《水浒传》之特别憎恶女性，为废名所指摘，小说中如能无此等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鄙人所言颇似多捧在旗的人，好在此刻别无用心，止是直抒胸臆，想知者亦自当知之耳。《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九作者考丙云："文康字铁仙，勒保孙，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所说较他处为详，所为文有《史梅叔诗选序》一篇，收在《文经》卷十九中，其文亦颇佳，末署道光乙未，逮马从善为评语作序，时为光绪庚寅，相距已有四十三年矣。

① "曾"原作"会"。

② 原无"下"字，今增。



《品花宝鉴》[①]

看书偶记（二七）

1939年6月12～13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从市场得赵景深君著《小说戏曲新考》，卷上有《品花宝鉴考证》，说及著作年代，根据杨掌生《梦华琐簿》的记录，云《品花宝鉴》的前三十回成于道光十七年，后三十回补足于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十二年后全书方才告成，刊印年时代是咸丰二年。案此处所举年岁稍有错误，寒斋藏有一部，书系原刻，题叶后有长方框，隶书三行云，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六月工竣。是即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梦华琐簿》原文在丁酉年记事下注云，《品花宝鉴》是年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此书盖实刊成于道光己酉，而杨掌生见到时乃在咸丰壬子，本是两件事，非见书时即刊印时也。又云丁酉年先成三十回，与陈少逸自序校对，亦略有不合。自序言某年秋后着手，是年有顺天乡试，可知是道光丁酉，两月间得十五卷，明年往粤西，稿

① 《实报》有两则，《书房一角》合为一则。

置敝簏中八年之久，及后北返，自粤至楚舟行七十日，又写得十五卷，是年应顺天乡试，当是丁未，故前三十回之成前后盖十年，不得云成于丁酉也。后三十回则在道光丁未年腊底续写，五阅月而成，已是戊申的夏天，到冬天付刊，次年毕工，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不记干支，但据所说两次在京应秋试的事实来考查，丁酉丁未均适合，可知上文所推算的大旨是不错的了。写到这里，想起孙子书君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来，查卷四中《品花宝鉴》项下注曰，存，清咸丰间刊本未见，光绪己酉刊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原来这里也为杨掌生所误，以为原刊是咸丰间的，无怪其见不到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料到这己酉年的八行本即是原刊，硬把他退下一甲子去，说他是光绪己酉年的翻本。其实光绪并无己酉，那时已是宣统元年了。还有一层，戊申己酉年本明明写着幻中了幻斋开雕，假如该斋初刊于壬子，到己酉重刊，这其间已经隔了五十七年，幻中了幻居士在初刊时如年正二十，至此也已是七十八岁了，恐怕难得再有刻书的雅兴吧。《小说新考》与《书目》二者都是专门著述，而于此点皆不免有小错误，可见人言之难以凭信也。



刘备曹操

看书偶记(二八)

1939年6月20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寿藻堂杂存》二卷，民国丙辰铅字印，上卷为《瞽说》，分经郛、史苑、字林、艺圃、谈丛五门，下卷则云《可园外稿》，即诗文与词也。陈伯雨著有《养和轩随笔》，在“金陵丛刻”中，语多明通，《瞽说》中亦多有可取者。“史苑”有一则云：

> 朱子作《纲目》，改《通鉴》之例，以蜀为正统，盖欲为南宋立竿取影。其实先主之在汉，未奉献帝之命，夺西蜀而有之，与孙权据江东正同，较诸曹丕托名禅让者犹降一等。前史命之曰三国，名实相称莫过于此。若南宋之亲承正统，当援周平王汉光武为例，彼蜀汉者不过如五季之北汉耳，安得以正统归之哉。

此言虽是平常，却大有见识，但非一般人心醉桃园结义者所能了

知。适阅刘南赤著《汉上丛谈》，卷一记荆门雷氏所藏铜雀台瓦砚，有云：

> 前代时吴匏庵蓄铜雀砚，其友某公恶曹瞒，拔剑碎之，沈石田作击砚图以纪其事。脱遇如某公者，斯砚即欲瓦全不可得矣。

读书人上了说书的与戏子的当，以为曹孟德真是大白脸，大动其义愤，持以读史固非，若随便打破人家的砚台，更未免神志太不清爽矣。

读字书

看书偶记(二九)

1939年6月2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雕丘杂录》六云:

家君尝侍赵忠毅公,公教以读字书最为有益。余见有名能文章而于字音读尚多讹者,甚矣识奇字为学者第一义也。

《輶轩语》二云,解经宜先识字,注有云:

《说文》初看无味,稍解一二便觉趣妙无穷。

今人钱氏《课馀闲笔补》云:

每有天下人趋之若狂,而余竟莫名其妙者。葱蒜何味,而世人群以为美。烟草鸦片何物,而世人群以为香。《说文》琐

屑，有何意义，而世人尊而敬之，几欲置之四子五经之上。余于此惟有谢不敏而已。

读字书，看《说文》，都很有意思，就只是入门为难耳。钱君谓《说文》琐屑，此正是初看无味，或者如人说磊落人不能注《尔雅》，却不知在草木虫鱼间亦自有趣妙无穷，但如不入便无可奈何也。鄙人常喜人家看字典文法，不但能识字，亦复可以通史。英国有人著书，曰《英语里的历史》，此意亦妙。但是《说文解字》未足以任此，须有人集合甲骨钟鼎大小篆文，自写一册《新文字蒙求》，庶乎其可，而新的大字典亦是必要。如能悠悠然待之数十年，或可有成，但亦或不然，此事正极难言也。



唐晏

看书偶记(三十)

1939年7月29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贩书偶记》卷十八别集类《涉江先生文钞》一卷,诗一卷,渤海唐晏撰,民国乙卯铅字排印本,又名《涉江遗稿》。又注云:唐晏原名震钧,因辛亥国变改名。案震在廷殁于民国庚申,在乙卯后六年,寒斋所有本乃是辛酉年印,文集有章梫劳乃宣乙卯年二跋,上文或者①是误记,不然在生前不能称遗稿也。唐晏改名在辛亥后,一般均如是传说,惟求恕斋刻《庚子西行纪事》一卷,本文末尾署光绪辛丑五月,唐晏录于白下,然则在民国十年前固已有此名矣。或云《西行纪事》刻于民国乙卯,故卷首题唐晏纂,刻书者遂并改去本文中署名以归一律,亦未可知,但揆诸事理则为不通,鄙人未敢遽信也。《野棠轩文集》卷四氏娄说中云,国变后儿辈乞食四方,冠其姓曰娄。结末云:

① "者"原作"以"。

康熙时伊尔根觉罗之顾，雍正时章佳之尹，两朝圣人未之问也。独是彼乃化歧视之见，此则苟为逃死之谋，岂可同日而语哉。

唐晏

古来避仇避乱避讳易姓，时时有之，诚如所论，惟私心不甚喜者，则以旗人有被歧视之感而出此故耳。如循旧例以第一字为姓，不必冠姓易名，亦可通行，且似亦更为大方也。

金冬心题记

看书偶记（三一）

1939年9月30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金冬心题记小文，别具风致，久为世间所重，原刻近已不可见，寒斋所有者只乾隆间花韵轩刊《巾箱小品》本，嘉庆间种榆仙馆本，同治壬申桐西书屋本，光绪戊寅当归草堂本，皆翻刻也。当归草堂本今收入《西泠五布衣集》中，最易得，魏稼孙编校，便于阅读，陈曼生本序甚佳，字体与所刻《佛尔雅》相同，古朴可喜，而《画竹题记》多缺，似不及矣。魏氏附记云：

>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本盖亦从《巾箱小品》出，而编校不佳，如自写真题记末一则中匾□者一语，各本均缺中一字，今乃将此三字全删去，即其一例。

惟卷末附刻王笈甫《画钟进士像记》二十四则，虽未足与昔耶居士抗衡，亦颇有意思，盖取其别致耳。



《大瓢偶笔》①

看书偶记（一一）

1939年10月4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从松筠阁取来《大瓢偶笔》八卷，抄本四册，索价甚昂，但却想得之，则以乡人著述故耳。卷首有印朱文曰，会稽章氏藏书，末有朱书题记四行云：

> 光绪乙巳九月，重游广陵，适老友凌子兴家书籍散出，旧抄本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及此册遂为余有。小阳九日粗读一过，校数十馀字，读毕漫记之。老硕。

此盖是章硕转售物，章氏藏书前只得到所刊《绝妙好词笺》一部，各卷首尾有章贞读书等印三方，今又得此本，上有题跋，更可喜矣。看抄本文字，琰宁均缺笔，当是道光年间所写，去今才百年，不能算

① 本篇曾刊《实报》，但未编入《书房一角》，故不列号。

很旧，又此书有[钅穷][1]石山房刻本，亦不甚难得，容再求之。《偶笔》所谈皆关于写字的事，于鄙人殊有隔教之感，唯文章尚佳，亦颇可读，仿佛如阅黄山谷的一部分题跋也。

① “[钅穷]”原作“竆”。

39.050

《分类诗话》

看书偶记（三二）

1939年10月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今人著《苌楚斋续笔》卷十云：

南昌喻端士编辑新城王文简公士禛《皇华纪闻》、《陇蜀馀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馀话》六种中论诗之语，分志趣、风雅、感慨、考证、评论、汇编六门，每门一卷，汇编分上下卷，乾隆己酉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刊本。一本名《谐声别部》，一本名《分类诗话》，一人所辑，同时所出，而序文例言两书一字不易，亦无一言言其更名，是真不可解矣。

此书寒斋有一部，即名《分类诗话》，每叶中缝鱼尾上悉空白，只存卷数，卷首及序文中书名则是剜补，形迹显然，可知此名乃是后改。其初当名《谐声别部》，例言末一则中云："和声鸣盛，贵谐人心，风雅鼓吹，此为别部"，可以知之。至于改名理由，或者书板归

于他氏，嫌其原名太晦涩，故易名以顺俗耳。观其剜补殊不雅观，新名亦笼统，可见非解人所为，《续笔》以为是喻端士自己有此二种刻本，非但观人不审，即察物亦有误也。《谐声别部》原书近来亦得一部，刻印均相同，惟不经残毁，自觉得更悦目耳。



《天津文抄》

看书偶记(三三)

1939年10月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中国向来有汇刻地方著述为丛书或总集者,此虽似未免乡曲之见,但保存文献功效甚大,于读书人亦极有便利。近来因搜集徐沅青著作,稍买得天津的总集类书,有《天津文抄》四册,亦是庚申岁金氏所刻,纸墨颇佳,与《屏庐丛书》相同。原书分二十四卷,华少梅编,其子听桥所增订,今裁并为七卷,多所删削,即使后人于义法体例有见到处,以此改变昔人著述面目,觉得亦是得失参半。闻近世有人重刊《戴南山集》,乃倩人篇篇加以斧正,使成为桐城派文,以此例彼,固尚少胜耳。书名原为《津门文抄》,盖拟与梅氏诗抄相对,今改称《天津文抄》,虽云纪实,揆之名从主人之义,亦不无缺憾。华少梅又著有《脞录》二卷,幸得有一册,首尾无序跋题叶。有墨笔点窜及书眉批语。看首叶碧琅玕馆一印,知是杨庸叟手笔,亦可珍也。

庸叟著有《碧琅玕诗钞》正续各四卷，文集惜不得见，只于《文钞》中录存四首而已。《文钞》刻颇精而校似有疏忽处，卷一胡捷余武贞公议中，主张以周定夫、王玄趾、潘子祥诸人从祀，玄误刻作立字，胡象三盖原籍会稽，故文中尚称吾越也。



《扬州画舫录》

看书偶记(三四)

1939年10月11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鄙人甚不喜皮簧戏以及二胡，推至戏考剧评，亦无不然，盖几于恶乌及屋矣。阅《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多记戏班事，却颇有可喜处，如一则云：

> 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

此外小丑滕苍洲，贴旦谢瑞卿、魏三儿各节，亦均有情致。乃知天下事无不可书，只要见识趣味文字三者足以胜之。我辈平日所见者多低级的书，但知考较嗓音，赏玩脂粉耳，谭复堂之《群芳小集》尚未能免，他更不必论矣。李艾塘记景物风俗及琐屑事亦多可取，卷十一虹桥爪一带的描写，凡声技饮食有十五六节，无不佳妙，有

《景物略》、《梦忆》之风而更少作[1]态，故亦遂更为自然，多情味也。

秋冷多闲，摘录数则，庄诵一过，且喜且愧，自己无论如何用心，总写不出这样好文字，若写时又须由会而至不会，则愈亦难矣。

① 此处原衍"客"字，已删。



蟋蟀之类

看书偶记（三五）

1939年10月1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多隆阿著《毛诗多识》卷下，“蟋蟀在堂”条云：

> 盖蟋蟀种二，有在[1]野在家之异。其在野者，圆头修股，形似阜螽而小，色黑如漆，翼短，不飞而善跃，多居黍禾田中。其在家者形略同，色微苍而有白花文，暑居室外石砌败垣之中，或居古墙颓壁之下，应秋则鸣，白露乍凉，声彻夜不息，天渐寒则移进堂屋，故此诗曰在堂。寒渐重，又移居灶畔，故蟋蟀名灶马。俗呼曰趋趋，即促织二字音声之转。

案所云在家者即普通蟋蟀，通称蛐蛐，在野者乃是油胡卢，吾乡俗名油唧呤，若灶马又是别一种，《本草纲目》云，俗名灶鸡，吾乡称为灶壁鸡，谚云，臧螂灶壁鸡，一对好夫妻，是也。俗又名灶马为驼背

① “有在”原作“在有”。

灶马拱背甚高，乃呼为驼背，此则与蟋蟀大不相同者也。以上三种小虫，乡里小儿无不知之甚审，而学者反不能辨，何欤？中国讲学论文太务严肃，孩童游戏，民间俗说，皆在所不顾，故非独不能眼学，亦并缺耳食，只于发箧呫[1]毕中求之，则所知自有限矣。多氏此书所征尚广博，不免此弊，他更可知。史香崖《止园笔谈》卷二论阿滥堆，末节有云：

> 披《尔雅》《禽经》，今不知其物有无，出见其物，又不知其在书中为何。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细已甚，犹难哉。

① “呫”原作“咕”。



宝竹坡

看书偶记（三六）

1939年10月2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清宗室遐龄号菊潭，著有《醉梦录》二卷，《岭云斋诗草》一卷，光绪乙酉白纸石印，抄写多误，而文可读，虽亦间谈因果怪异，却颇质朴，前读敦崇笔记亦如此，此盖是旗下人之特色欤。《醉梦录》卷上《宝太史春联》一则有云：

> 宝竹坡廷，余族弟也，风流倜傥，才轶绝伦，其未遇时自撰春联云：小室难容佳客坐，柴门未许俗人敲。又，无事且扪尸下穴，有心难对谷旁人。如此类甚多，今略举一二以概其馀。

又卷下记刘亨庆酒后诵罢官诗云：

> 闽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赋，只爱蛾眉不爱官。

此亦是竹坡之作，菊潭甚加责备，惟比对联乃已蕴藉多多矣。案宝廷以江山船案罢官，时为光绪八年壬午，遐龄自序为癸未夏，正是其次年，《越缦堂日记》三十九册中记此事，亦大有微词。其实此等事本不必深论，乃宝廷晚年忽讲道学，庚寅著《庭闻忆略》，夏震武为刊行之，曾在厂甸得一册，对照读之，不禁微笑。昔见吾乡某甲所著随笔，一小册子中起头大谈圣经贤传，末了则讲市井小儿的猥亵话，与此正相似，不过首尾颠倒而已。



李朴园

看书偶记(三七)

1939年10月29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见"馀录"卷十有一则云:

> 宝坻李比部光庭,长子藻以嘉庆戊午生,咸丰戊午又得一子,年已八十馀,伯兄季弟之生相去正一甲子。

李朴园著作寒斋共有三种,一为诗集十二卷,《感旧诗》一卷,道光庚子年止,二为《乡言解颐》五卷,道光庚戌年序,自称年七十八,三为《吉金志存》四卷,咸丰己未年跋,有印文曰吾年八十七。案己未为戊午之次年,然则其生子时当是八十六岁,殆可与《儿女英雄传》之邓九公竞爽矣。《吉金志存》每卷首皆题男慕茵摹拓,敬筱校录,据诗集则藻之后慕之前尚有名菜者,又卷十二己亥年诗题中有云:

> 今六旬有七矣,幼子三人,一十三,一十岁,一甫六岁,斗

室中为暖炕，环坐，授之读。

此盖即慕与敬与葰，惟卷十一诗注中云，戊戌冬生一子，此未列人，殆以未授读故耶。戊戌生戊午生皆不知何名，想亦是从草字头者，惟上举六人中乃有敬字，恐未免为颜黄门所讥耳。

朴园诗虽未佳，而题咏不避俗事，有好些均收入《乡言解颐》中，此则颇可取。统观朴园著书，自当以《乡言》五卷为其杰作，而全部著作中亦都有一种风趣，在向来读书人中间正亦是难得而可贵者也。



钱竹汀论轮回

看书偶记(三八)

1939年11月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有"释氏轮回之说"一条云:

> 《列子天瑞篇》,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释氏轮回之说盖出于此。《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

案《列子》如系晋人依托之书,岂能为释氏说所从出?若如所云,则非晋人读《列子》后而假造不可矣。钱竹汀本是乾嘉时难得的学者,奈何此等处与王渔洋辈同样见识,士大夫不读佛书以为正派,却亦即此吃亏不少了。今且不远引明末的例,嘉道时有些学者多读释道藏,或学习梵藏亚剌伯满蒙文字,如俞理初龚定庵蒋子潇等,均足以助成其思想之阔大,博西斋裕思元之流亦正如此。读经典亦何必一家归依顶礼,只是开一头门窗,多放进一方面风日来

耳，一样于养生有益，若必谓东向以迎紫气，西向以望净土，计议横生，自只好塞向墐户而已，昏昏沉沉，无足怪也。



《金陵游记》

看书偶记（三九）

1939年12月14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得《金陵游记》一卷，渔洋山人著，板心下端刻“阮亭古文”四字。考其时当是康熙三年甲辰也。卷中凡游记八篇，题名记七篇，大抵均见于《渔洋文略》卷四，而文字稍有异同。第六篇《六朝松石记》，《文略》不收，馀亦多所删削。《文略》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渔洋年已六十有二，故文益简劲，但游记得存其少作，又两本异同处有如原稿上改窜之迹，阅之亦极有意思。卷首有小序六，为杜茶村、陆丽京、施愚山、冒辟疆、尤西堂、陈其年之作，王西樵题诗一章，在合集中便不可得见矣。此数文在诸人集中不知收存否，即有之亦极不易见到，因此更感觉原刻单行本之可贵，盖与合集允宜并重者也。阮亭文雅洁，少嫌其欠腴，茶村序称欲撰《金陵景物略》非阮亭不可，恐是过誉。此事须得有见识魄力，阮亭于此殆未能胜。如多写此类游记数十篇，固亦可喜，但仍是文集中物，未必能自成一部著作耳。

旗人著述

看书偶记(四十)

1939年12月2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想一看金息侯的著作，承友人借给《瓜圃述异》等三四种，也就满足了。这些书铅印尚无妨，却都用洋粉连印，售高价，故不想收藏一份，其所说虽不免多夸饰，亦殊有可取处，值得读一过也。不知怎的我觉得读旗下人的文章常比汉族文人高明，而平常大官的说话也比卑陋的读书人大方，这恐怕是同一的道理。如博明之《西斋偶得》，震钧之《天咫偶闻》，锡缜之《退复轩随笔》，遐龄之《醉梦录》，敦崇之《芸窗琐记》，奭良之《野棠[1]轩摭言》，或见识明达，或态度大雅，文词之巧拙在其次，似反无甚关系矣。《瓜圃丛刊叙录》中有金氏的《满洲老档秘录叙》，又徐世昌序，都还说得过去，惟有一跋，中云"臣纾以犬马馀生"云云，末署"宣统庚申举人臣林纾谨跋"，比较起来便显得很是寒伧。故家纵出了纨袴子弟，仍有点大方气象，不至与跟班混同，此总是实情。鄙人对于旗人何必雪中送炭，亦只是说实话而已。

---

① "棠"原作"堂"。



钥匙牌[①]

看书偶记(四一)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张芑堂《金石契》卷上载南宋铜铸牌，云：

右铜铸牌，龙泓外史旧居候潮门外，掘地得数十枚，余曾见之，或准伍佰，或准壹佰，皆有临安府行用五字。

又引元孔行素《至正直记》曰：

宋季铜铸牌，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背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佰[②]文等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取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

① 以下各篇未刊《实报》，均据《书房一角》收录，具体写作时间尚待考定。
② “佰”原作“伯”。

钱竹汀《恒言录》卷五“钥匙牌”一条即引此文，而字句少异。戴醇士《古泉丛话》卷三云：

> 右铜牌，南宋物也，此叁[②]佰，所见有伍佰贰佰者。宋史不载，后人掘土得之，然绝少，近世有仿铸以射利者，所在皆是。夏松如尝得真铸牌以示客，客曰，此铸牌耳，余积百馀枚矣。松如大诧，翌日请观，累累成贯，皆射利者所为。松如不欲訾，唯唯而退，客什袭珍藏，面有得色。

鄙人曾于后门外得此牌二枚，一曰叁佰文，一曰壹佰文，皆是射利者所为也，惟鄙人知其为假，而贾人亦云非真，因以薄值得之，似亦尚无伤大雅。鄙意如能模制珍品，精密不苟，廉价出售，亦是好事，如戴君在皇祐条下所云：登此虎贲，留为马式，岂不慰情胜无哉。鄙人颇想以壹佰文者为钥匙牌，但无如许钥匙需要挂牌耳。

---

② “叁”原作“参”。



《列仙传》

看书偶记(四二)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三“诙谐”条下有云：

> 《列仙传》云，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合金液，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初学记》地部引)。此语真堪绝倒。

又云：

> 道家者言多荒怪不足辨，今《列仙传》亦无此言。

郝君正论自是不错，但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马明生为最有风趣，其只愿为地仙，不乐升天，也与鄙意颇相合，鄙人设想地仙之乐自儿时至今不少变，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内服耳。读王夫人校正本《列

仙传》，所言固多荒怪，而记叙殊可喜，其事亦质素，不令人读之生厌，盖是古人的一种长处。张鲁辈虽是妖法，却胜吕岩十倍，此事言之甚奇，惟唐宋以来的神仙日趋堕落，其记述亦不复足观，乃总是事实也。看《列仙传》中七十名仙人的履历，除自然神异之外，不出服食补导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惟鄙人窃有取者，以其颠来倒去只是服补脑汁的办法，以行迹近于隐逸，以视后来厕身天阙，星冠羽衣，趋跄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毕竟清浊迥殊，盖鄙意关门做神仙总较开门做节度为胜一筹也。五斗米道中想也有品级，今不详知，若夫近代道教的典制，岂不即是直抄人间的帝制者耶。



倒悬求长生

看书偶记(四三)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中"小便"条下引《后汉书》甘始传云:

>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

案此见《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其下文云"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采补之术见于《素女经》诸书,人尿列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李时珍曰,方家谓之曰轮回酒、还元汤,隐语也。此二事意趣可解,惟爱啬精气而至于倒悬,则殊匪[①]夷所思,读之不禁发笑。孙彦清著《寄龛乙志》卷二引《宋书》乐志,足以蹈天,头以行地,云今

① "匪"原作"非"。

越中亦有此戏，谓之竖蜻蜓[1]，余幼时闻有村童为此，翻藏府，呕粪秽而毙。审如是则此亦大危险，范蔚宗云三人寿各百馀岁，正是侥幸之至，且为此种种苦行，而所得只此，亦似利息甚微薄也。鄙人昔曾有言，中国修仙的人很像是极吝啬的守财奴，什么一点东西都不肯拿出去，至于可以拿进来的自然更是无所不要了。他只有一点可取，便是纯依自力，盖此外有拜北斗禳玉皇一派，则有如士大夫之以磕头求官，以视倒悬或饮小便者，当又下几级矣。

---

① 原无"蜓"字，今增。



秃头

看书偶记(四四)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九有《翟晴江先生传》,末云:

> 尝自言童子时读书塾中,有僧过其门,适塾师外出,率众童子持棓往击僧,僧踉跄走避。封公见而挞之,先生曰,吾恶其秃也。

梁君文固有风趣,而其事亦甚妙,可知翟晴江是解人也。佛本不必排,自来道学家只自心虚耳,其所稍可恶者就是那秃头,鄙人昔曾有此意,不图翟君已先我发之矣。鄙人最不喜一切残毁,落叶枯株固尚不妨,断瓦残垣则只在诗画中差可观,若是人物便不能如是,即病理与变态,但可哀矜,亦不乐见也。金冬心自写真题记云,欲于癞者颠者秃简者毁面者瘦者之中,求得寡谐者,无论真实如何,鄙人未敢赞同,若身中面白而视之仍索然无味,此乃别一事,当分论之。和尚之秃在今日已为普通,本可不忌,但用刀刮光,又有受戒香疤数行,如玉蜀黍痕迹,视之殊不舒服,又或将头发分开作俗装,则大可以棓击之,盖是破戒僧,击毕当勒令还俗也。



带皮羊肉

看书偶记(四五)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在家乡吃羊肉都带皮,与猪肉同,阅《癸巳存稿》,卷十中有云,“羊皮为裘,本不应入烹调。《钓矶立谈》云,韩熙载使中原,中原人问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熙载曰,地产罗纨故也,乃通达之言。”因此知江南在五代时便已吃带皮羊肉矣。大抵南方羊皮不适于为裘,不如剃毛作毡,以皮入馔,猪皮或有不喜啖者,羊皮则颇甘脆,凡吃得羊肉者当无不食也。北京食羊有种种制法,若前门内月盛斋之酱羊肉,又为名物,惟鄙人至今尚不忘故乡之羊肉粥,终以为蒸羊最有风味耳。

羊肉粥制法,用钱十二文买羊肉一包,去包裹的鲜荷叶,放大碗内,再就粥摊买粥三文倒入下盐,趁热食之,如用自家煨粥更佳。吾乡羊肉店只卖蒸羊,即此间所谓汤羊,如欲得生肉,须先期约定,乡俗必用萝卜红烧,并无别的吃法,云萝卜可以去膻,但店头的熟羊肉却亦并无膻味。北京有卖蒸羊者,乃是五香蒸羊肉,并非是白煮者也。



《香祖笔记》

看书偶记(四六)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王贻上虽见识平常，曾请解八股文与缠足之禁，但其论文诗亦有可取处。《香祖笔记》卷一云：

《类纂》载武林女子金丽卿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郎瑛谓其不能守礼，当[①]出则拥蔽其面。时方食，不觉喷饭满案。

又云：

高季迪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此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不知季迪何以堕落如此，而盲者反以为警策。

① 原无“当”字，今增。

此二节语皆极通达，鄙人最不喜史论及咏史诗，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详知，未便武断下褒贬语，且更怕成养文人习气，轻易裁判别人，以刻薄为能，非细故也。窃意此事当从学塾改起，不令生徒作史论，庶几正本清源之道，虽其效或当在百年后，苟能有效即是大幸矣，百年何足道哉。



古诗里的女人

看书偶记（四七）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阅《多岁堂古诗存》，卷二下“汉乐府古辞”中有《陇西行》，其中间云：

>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
> 问客平安否？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
> 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
> 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成书批云：

> 更极妩媚有态，古人此种细腻处最难学。

案此处说诗固不错，但如论诗中之人，亦正写得极可爱，颇疑中国

五代以前的女子确实有如此姿态，不尽关诗人的粉饰也。

清末夏穗卿氏有言，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则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虽似偏激而实含至理。尝泛观诗文，见写女人之美者亦不少，而难得有如此可爱的影象，岂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只由于咏物者多耳。若奴婢是人，未始不可爱也。《陇西行》作者故云：

> 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
> 亦胜一丈夫。

说得极有人情。吾于是乃不禁感叹，此时盖不独女人未曾沉沦，即男子亦正不堕落也。



《大谷山堂集》

看书偶记(四八)

1939 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得蒙古梦麟《大谷山堂集》六卷,卷头曾题记曰,此诗集本无甚足取,今从松风堂购得之,因其为震在廷故物耳。卷首有海上嘉月楼印,末叶一印曰涉江。此书题叶为吴兴刘承幹署,后书戊午仲冬刊于维扬,平常均称为嘉业堂刊本,即所谓《辽东三家诗钞》之一。近阅《瓜圃丛刊叙录》,总目后有金息侯①之子关东识语,中有云:

> 忆前岁家在廷先生震钧与我父约刻八旗名贤遗著,编目得数百种,仅合刊《大谷山堂②》数集,在廷先生既去世,板归刘翰怡京卿承幹印行。

① "侯"原作"候"。
② "堂"原作"房"。

由是可知此书本是震氏所刊，后归刘氏，我当初以为此本系刘所持赠，今乃知是震生前所印，自钤印记者也。据海上嘉月楼《勖学遗笺》所记，震氏晚年正住在扬州，卷下收有戊午己未数函，惜未曾说及，如不见关东识语，几无从得知此事真相矣。

今通行之《辽东三家诗钞》，所收为李锴《睫巢集》七卷，长海《雷溪草堂诗集》一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大谷山堂集》有庚申上巳日刘承幹序，有云："同社友唐元素司马始以表章遗献，将合《大谷山堂》并《睫巢》、《雷溪草堂》诸集汇为一编，成兹三种，未及印行而其事中辍，今以其板归余。"而《睫巢集》又有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袁金铠序云："三家诗抄原椠在吴兴刘君翰[①]怡承幹处，本年春介长白金君息侯梁让归吾奉，保存于京师奉天会馆。"乃知楚弓楚得，板又易主者，而三家之称亦是后起，盖震氏原意陆续重刊，今乃偶然存此三部耳。惟据《涉江遗稿》张志沂跋，震氏殁于庚申之秋，今刘序署庚申上巳日，是时震氏故尚健在，然则关东所云在廷去世后板归刘翰怡之说，似又非是事实矣。一部诗集刻印的事迹尚且如此难查明白，那么别的考证自然更不容易了。

① "翰"原作"汉"。



《野园诗稿》

看书偶记(四九)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从书肆沽[1]得《野园诗稿》抄本，四册三种，稿纸中缝上刻野园二字，存题签三，曰《西清载笔录》、《野园诗集》、《留都集》，各钤二印，一壶卢形，朱文曰“佟雅”，一方形白文曰“濠濮间想”。卷首无书名，惟《野园诗集》首行下有印，白文云“臣介福”，朱文云“珥笔承恩”，末尾二大印，朱文云“景庵”，白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壶”。全书末空白半叶有题识曰：

右稿三种为满洲介福所著，案《熙朝雅颂集》，介福字受兹，一字景庵，雍正癸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至侍郎，有《西清载笔录》、《退思斋诗》、《野园诗集》、《留都集》、《关中纪行集》、《采江小草》、《采茶歌》。今读其诗，颇多秀句，且有见道之言，在满洲人中可谓难能足贵者矣。张芝圃送阅属

① “沽”原作“估”。

题，因识数语归之。戊寅九月，退翁周肇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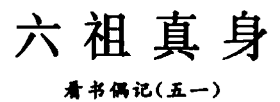
查《雅颂集》，介福诗在卷四十六，所注正同，惟其著作实只六种，盖《采茶歌》乃是集中所录第一首之诗题耳。《天咫偶闻》卷五列记八旗人著述目录，集部中有介福之《野园诗集》等五种，而《西清载笔录》则收入史部，在《槐厅载笔》之前，此亦有误，今据抄本乃是古今体诗九十六首，大都是应制和韵之作，并非散文记录也。《偶闻》卷三云，佟府有野园，介受兹先生福自号野园，即此，至今尚在。佟雅盖即是野园之姓，佟府后为贝满女学校，园不知如何，距震在廷著书时不及四十年，尔时仅存之旧邸第皆已易主矣。

《癯鸥戏墨》

看书偶记（五十）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天津徐沅青著述，余所得者有《医方丛话》八卷，《宋艳》十二卷，近又得其《敬乡笔述》八卷，则民国三十一年新刊，用蓝印者也。卷末徐世章跋有云，有《癯鸥戏墨》，文体骈俪，见公《蝶访居诗集》自注，而传本迄未之见。《戏墨》昔年曾得一册，当时同买得者尚有樊文卿之《津门小令》，因从书堆中检出重阅，则题叶后大书光绪乙酉年春二月津门蝶园雕板，与《宋艳》等相类，惟其时只见署名津门东海癯鸥撰，知为天津徐姓，不曾细考也。书凡二卷，有诗星阁主人骈体序文。卷一为集《桃花扇》及《燕子笺》句酒筹各百五十支，骈体序记书共六篇，卷二为书扇屏二则，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诗共四十九首，《蝶园词曲》十六首，《花间楹联丛话》十三则。徐跋云，又《酒筹谱》一种，张君君寿仅获一见，即已为南省士人购去。案此或亦即是《戏墨》，因为卷上全部差不多是酒筹也。诗星阁主人不知为谁，《笔述》卷八记张笨山著书中有星阁集，高彤皆注云，星阁当作诗星阁，然则此作序者其殆是张氏后人耶。



六祖真身

看书偶记（五一）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姚福均著《铸鼎馀闻》卷四有“六祖真身”一条云：

> 宋文信国《指南后录》有“南华山”诗，自注云：六祖禅师真身，盖数百年矣，为乱兵封其心肝，乃知患难佛不能免，况人乎。

又一题云：

> 己卯五月十八日予以楚囚过曹溪，宿寺门下，六祖禅师真身顷为乱兵穷其胸，探其心肝，盖意其有宝，故祸至此。

案六祖慧能殁于唐先天二年癸丑，至南宋末年祥兴二年己卯，历年五百六十六矣，不图槁骸复见剖割，岂非真是有什么夙缘乎。余前

论越王峥欧兜祖师，留下漆身，供人膜拜，以为是恼懊。今观六祖事，当更了知有身之足为大患矣。元人本不必论，如杨琏真伽所为，宁复有人理，但彼是番僧，当爱其同类，不至残毁和尚死体，然则所谓乱兵或非此辈亦未可知。漆身中间那里会有宝贝，而贸贸然探其心肝，此事真奇绝，如不是文文山亲至曹溪看来告诉我们，几乎不大有人能相信也。

《学海谈龙》[1]

看书偶记(五二)

1939年作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汤纪尚著《槃薖纪事初稿》四卷,光绪乙酉年刊,有俞曲园序文,后并缩成三卷,为《槃薖文》甲集,以丙戌迄壬辰文二卷为乙集,附癸巳迄乙未所作文为别录,重刻行世,曲园序则已无有,盖序中颇议其文多艰深也。乙集卷上有最录龚瑟人逸文一篇,云已授朱之榛传之,今检龚集补编朱序,果云系汤伯述所编,而序语亦即袭用槃薖文上半,但少改为流畅而已。原文末有云:

> 逸文竟刻,更得《学海谈龙》一书,说郡国山川彝鼎,说金石杂事,皆可喜,小学家伟之,亟写副贶苏州吴副都,人间遂有传本。

案张祖廉著《定盦年谱外纪》卷上云:

---

① 《看书偶记》(五三)至(六一)在1940年度内。

嘉庆戊寅纂平生师友言论及所见古物，为《学海谈龙》四卷。

《娟镜楼丛刻》中又有张氏所辑《定盦遗著》一卷，序文之末乃云："所望四方闳达之士，访羽陵饱蠹之简，获《学海谈龙》之编"，则在民国辛酉时此书固未传于世，所云录寄苏州之副本不知浮沉何所也。吴张二君皆吴中人，搜访定公著作又至勤苦，而《谈龙》竟不出，思之闷损。吴副都岂是憲斋耶，若如是则踪迹当亦易易，或《槃薖文》人少见者，乃致失之交臂，亦未可知耳。



飞　升[1]

桑下丛谈(一)[2]

1939年2月22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阅《剑南诗稿》，卷二十七寄方瞳胡先生诗有注云："古仙人飞升皆在五岳名山，故人少见者。"放翁盖是长者，故其言如是，与千一百年前同郡人王仲任语相比较，更觉得有意思。《论衡》卷七《道虚篇》中论淮南王飞升之虚，有云："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鸟有毛羽能飞，不能升天，人无毛羽，何用飞升？使有羽毛，不过与鸟同，况其无有，升天如何？"又记李少君称得道，终乃病死，推论之曰："如少君处山林之中，人绝迹之野，独病死于岩石之间，尸为虎狼狐狸之食，则世复以为真仙去矣。"其言甚深刻，大有师爷笔法。不佞系学儒而少兼佛者，故不愿败长厚者之意，若私心所喜者，乃是王君疾虚妄之精神，窃以为最可尊贵也。

---

① 自本文起五篇原刊《实报·看书偶记》，1943年《书房一角》结集时始移入"桑下丛谈"。

② 《书房一角·桑下丛谈(一)》为《小引》，今编为(43·007)，"丛谈"各篇的序号亦与《书房一角》不同。



越缦堂诗[1]

桑下丛谈(二)

1939年4月2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白华绛柎阁诗》十卷，光绪十六年刻，而印书似不多，市价乃踊贵。近年杭州抱经堂朱氏书肆觅得旧板，重印行世，字画完好无缺，且卷首多有平步青撰传一篇，尤为可喜，可见新印本有时亦较旧者为胜也。传后有自记八行，中有云：

> 君尝言文非予所长，最为知己。自闻恶耗，雪涕沾衿，即思为诔及哀辞，以舒四十五年同案之悲，苦不成一字，江郎老尚才尽，况不通如予乎。

语颇诙诡，李君如地下有知，亦当干笑，平步青这样写了，王继香亦遂刻在诗集里边，都不愧为达者，俗人便不能知道这些，以为不雅驯，乃抽去不印，如不是此次旧板新印，我们将不知有此一回事矣。

---

① 《书房一角》改题《李越缦诗》。

甚矣，俗人之误事，而旧书之后印本亦有时会有用，不可一笔抹杀也。



陶方琯

秉下丛谈(三)

1939年6月18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山阴胡寿颐著《洗斋病学草》,卷下有诗题云《间壁艳妇未起》。有序曰:

> 余友陶伯瑛孝廉方琯,年未三十,以攻苦得心疾,犹日课一文,数上公车,或惘惘出门,只身奔走数千里。今病益剧,忽喜吟诗,稿中有是题,同人无不大笑。孙彦清学博闻之醉骂曰,古人命题往往粗率类此,何足怪,设出老杜,诸君赞不绝口矣。余谓题虽俚,着笔甚难,效颦一咏,纾情而已,大雅见哂弗顾焉。

案《病学草》刻成于光绪甲申,寒斋有陶方琯著《梅花吟》一卷,自序题光绪丁酉,则已是十三年后,其时尚健在,疾亦似稍好。诗为五律六首,七律六十首,序语亦寻常,惟号已改为樗亭而非伯瑛矣。

据《复堂文续》中《亡友传》，陶方琦没于光绪甲申，年四十，计至丁酉当是五十三，方琯是时恐亦将近六十了罢，所谓心疾或是神经衰弱，三十年来想亦渐轻减，洗斋所记殆只是一时的情状也。



烧鹅

桑下丛谈(四)

1939年7月2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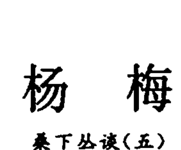
阅《清河书画舫》,在王羲之项下说他写经换鹅事,想起小时候常听人说王羲之爱鹅,此事妇孺皆知,殆因右军曾官会稽故耶。

绍兴人常食鹅,平常在食品中其品格似比鸡鸭为低,但用以为牲则尊,年末祀神于猪肉外必用鸡二三鹅一,春秋家祭时之三牲,则只是鸡与猪肉干鱼而已。春时扫墓例必用熏鹅,略与烧鸭相似,而别有风味。孙德祖著《寄龛丙志》卷四叙孙月湖款谭子敬:

> 为设烧鹅,越常羞也,子敬食而甘之,谓是便宜坊上品,南中何由得此。盖状适相似,味实县绝,鸮鸮者乃得此过情之誉,殊非意计所及。已而为质言之,子敬亦哑然失笑。

鹅鸭味虽迥殊,不佞有安越之意,则宁取鸮鸮者,鸭虽细滑,无乃过于肠肥脑满,不甚适于野人之食乎。但吃烧鹅亦自有其等第,在上

坟船中为最佳，草窗竹屋次之，若高堂华烛之下，殊少野趣，自不如吃扣鹅或糟鹅之适宜矣。



杨梅

桑下丛谈(五)

1939年7月2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嘉泰会稽志》卷十七“杨梅”一条云：

> 方杨梅盛出时，好事者多以小舫往游，因置酒舟中，高饤杨梅，与樽罍相间，足为奇观。妇女以簪髻上，丹实绿叶繁丽可爱。又以雀眼竹筥盛贮为遗，道路相望不绝，识者以为唐人所称荔枝[①]筐，不过如此。

小时候常闻人说杨梅山，终未能一到，但到者亦只是饱吃杨梅而已，未必置酒饤果，至于妇女簪杨梅者更无有矣。装篮馈遗，此风至今未泯，儿童最为欢喜，胜于送西瓜也。

不佞去乡久，对于乡味无甚留恋，惟独杨梅觉得无可替代，每见草莓即洋莓上市，辄忆及之。杨梅生食固佳，浸烧酒中一日，啖

① “枝”原作“支”。

之亦自有风味,浸久则味在酒中,即普通所谓杨梅烧,乃是酒而非果矣。吾乡烧酒其强烈自逊于北方之白干,但别有香气,尝得茅台酒饮之,其气味亦相似,想亦宜于浸杨梅,若白干则未必可用,此盖有类燕赵勇士,力气有馀而少韵致耳。洋酒不知何如,窃意如以好勃兰地酒浸杨梅,经一宿食之,味必不恶,惜无从试之也。

药 酒[1]

药草堂随笔(一)

1939年4月9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读汲古阁刻《姚少监诗集》，见其多用药字入诗，留心计算，凡十卷中得五十五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便有五处，可谓多矣。余最喜其《游春》之十云，药草长新苗，又《游昊天玄都观》云，风定药香细，可供药草堂作资料，但他似乎最好制为药酒，如云酒香和药熟，又药气酒中闻，此外尚有数例。药酒这物事拿来常喝，殊无此兴趣，至多是茵陈酒气色尚可爱耳，唯笼统的说药酒，亦颇有风味，似宜于疏野的生活。古人云，酒为百药长。《说文解字》十四篇云：

> 医，治病也，从殹从酉。殹，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王育说。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

① 周作人1940年在《庸报》开"药草堂随笔"专栏，后加入1939年发表在《实报》及别处的小文数篇，编成《药堂语录》。本篇原刊《实报·读书偶记》，却未收入《书房一角》。《药堂语录》编次未按发表次序，现则概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医酒。古者巫彭初作医。

照这样说来，酒总与药有关系，不是酒可医病，便是医者多爱酒，如段茂堂在注中所说。为什么医工之性多得酒而使的呢？我想，这岂不就因为巫彭初作医的缘故么。端公替人家治病，总是先要跳神，那么音乐与歌舞与香与酒都是必要的工具，此正是使用法器，说他是爱酒似还有点欠妥。药酒的制造，最初或者是医师自用，其次才给病人喝，那时大约也还是神药的性质，若当作平常的酒用，自当更在其后也。



洪幼怀[①]

药草堂随笔(二)

1939年7月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偶买得《篛廊琐记》四册，凡九卷，题固始王守毅著，咸丰甲寅刊，纸墨不甚精良，而字体颇特异，多说文体及别体字，所记不出狐鬼怪异，文章却颇佳。审视署名处，守毅二字系重贴者，乃窥视纸背，则本是王济宏也。尝读《七经楼文钞》，见有王君序文，因记其名字，今见文中言及马春圃洪幼怀，可知其即是人无疑矣。《琐记》本亦寻常小说家言，而读其文便觉不同，此中似亦有可凭者，正复不愧为蒋子潇之友也。卷六有《记洪幼怀》一则甚妙，惜有八百馀言，不能转录，但其叙在虞城初相见时一节，却总不可不节抄耳。文曰：

幼怀来作记室，住分东西屋。一见扣余属籍，余应以河

① 原刊《实报·看书偶记》，未收入《书房一角》。

南，洪吴音曰，中州河南耶？湖北湖南耶？再答以中州河南，幼[1]怀瞪目视天，忽作伧语曰，河南人知甚鸟。

但不久二人即成挚友，而洪为作诗集序之蒋子潇恰也是河南人，亦一奇也。世传王凤洲作《金瓶梅》，毒死荆川，蒋瑞藻孔另境均引《寒花斋随笔》为证，不出撰人姓名，今见卷六末记"书毒荆川"，即上说出处，且云，洪幼怀说此，不知果然否？据王君所前记，则幼怀盖是一奇人，窃意当是龚孝拱一流，良不愧为名父之子，唯其述荆川事虽奇诡可喜，亦只可作东坡说鬼听耳，恐未必可依据为典故，若更没其来源，则尤非所宜矣。洪幼怀天分绝人，以痴玩世，有洪呆子之目，而蒋子潇极重之，诗有云，论交兼生死，只一洪符孙。洪序中亦述蒋语曰，于诗吾服幼怀而已。王忏生于《琐记》又一再记述其言行，洪幼怀之著作虽不可多见，其人亦已足以传矣。

---

① "幼"原作"洪"。



《洞灵小志》[1]

药草堂随笔(三)

1939年11月1日刊《中国文艺》1卷3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戌，《续志》则在丙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抄》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洞灵二志若依据

---

① 原题《谈鬼怪(一)》。

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厅[1]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曰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檗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棚下周览挽章，均是。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因，读之殊觉单调，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① "厅"原作"听"。



张天翁[1]

药草堂随笔（四）

1939年11月1日刊《中国文艺》1卷3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香祖笔记》卷六云：

古今传记如[2]《拾遗记》、《东方朔外传》之类，悉诞谩不经，然未有如《诺皋记》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尝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刘天翁[3]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乘天翁车，骑白龙，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坚既到天官，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岁小儿，而公然笔之于

① 原题《谈鬼怪（二）》。
② “如”原作“记”。
③ “刘天翁”原作“天刘翁”。

书，岂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尔。

案，此事便只是荒唐得好玩，是传说与童话的特色，与经史正大相殊耳。震钧著《庚子西行记事》中云：

又闻某处有拳坛，其坛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鸿钧道人者，又未几则沿街多贴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

夫关公与鸿钧老祖在《三国演义》、《封神传》中岂非很好的脚色，但不堪坐坛上实司刑政，以贻害邦国，正如上古希腊用人于社煞是可怕，后来亚耳德米斯处女神止在神话中出现，原无妨其庄严之美，为诗人所歌咏叹美也。我最喜欢《聊斋志异》上面的一首渔洋山人题诗，至今还背诵得来，其词云：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①]

案此诗亦见渔洋《蚕尾集》中。懂得这个意思，自然便会爱读《诺皋记》与希腊神话的故事，王君奈何自己倒忘了，对段柯古大认其真耶。中国道教的天上朝廷原还是人间的那一套，不过镀了一点金而已，如李义山著《李贺小传》所说，上帝修白玉楼成，找长吉去作记，可为一例，——金銮殿还只是土木，这楼大约是以白玉代砖吧。至于这里所记鄷倍的事，刘张二位交代天翁职位，实在也无非把人世篡夺的把戏应用到天上去罢了，论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对。世人

---

① “诗”原作“时”。

既承认天廷的朝见和除授，却不信其也有史上见惯的纂夺，则正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癸巳存稿》卷十三《张天帝》一则中亦述此事，云此当是张道陵造作道书时议论，检《道藏》书未见也。此评甚确，可以从刘张二姓上看出来，五斗米贼之气焰亦尚存在，后世居然任为天师，可知黄巢之造庙非不应该。但是俞理初的话也只是确实到这里为止，前面已说过夺位系取诸史上，其馀设想及白雀白龙则是传说中现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不能归在张道陵名下，算是他的新意匠者也。同一荒唐，在神话中则可喜，在人世间便可怕，此一极简单事，本可不烦言说，但世上知之者似正亦不多耳。



《药草堂随笔》附记[①]

1939年10月15日刊《学文月刊》第1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这两年来不写文章，本来自己并没有话想说，也落得清静，就只苦于朋友们来索稿时无以应酬。好比肠胃病的人，穷饿也正合式，但客人到来还得拿碗白米饭出去，有时不免找出旧棉袄向长生库暂时存放。旧稿长一点的，到得《谈关公》寄出去时已经完了，现在只好抄点陈旧小文，差不多已经近于套裤之类，值不了几文，实在破烂太甚，这个要请大家原谅。　　（廿八年九月八日）

---

① 本附在《凌厚堂》(39·005)一文的后面，却是为"药草堂随笔"而写的。因《凌厚堂》已收入《书房一角·看书馀记》，故将其列于本年度"药草堂随笔"诸文之末。



《太上感应篇》[1]

药草堂随笔（五）

1940年1月1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

> 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

编者注曰：

> 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

---

① 本篇为《庸报·药草堂随笔》的第一篇，也是《药堂语录》文集的第一篇，今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故列为第五了。

案《輶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人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药草堂随笔(六)

1940年1月17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按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

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

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1]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

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① "诂"原作"话"。



科目之蔽

药草堂随笔（七）

1940年1月20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

> 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

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馀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衷[①]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

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

① “衷”原作“中”。

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亦甚可注意者也。



曲词秽亵

药草堂随笔(八)

1940年1月26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七有《读曲杂说》十八则,其第十三云:

> 笠翁《凰求凤》内,有小引《字字双》,极市井秽亵之语,不堪入目。若《西厢》之《酬简》一折,《牡丹亭》之《惊梦》一折内,何尝无狎语,《长生殿》之《窥浴》折内,尤极荡冶,然止觉其隽艳,不似笠翁之恶秽欲呕也。须知此事亦须读破万卷,始能下笔有神,雅郑之分关乎根柢如此。

案周君所说末数语甚有理,大抵艺与文都争这一点,或曰趣味,或曰书卷气,其实就只是多读多做,有经验,识好丑而已。但是上文所举实例却未见妥适,可知此事实不容易,或者因为反对笠翁有成见故耶。《西厢记》、《牡丹亭》三十年前读过,略略记得,《长生殿》有点荒疏,重新拿出来看,卷二第九折《窥浴》中《凤钗花络索》有四

语，系描写女人身体，本亦平平耳，而吴舒凫评注之云，“描摹冶丽，如有玉环呼之欲出，觉《杂事秘辛》犹形似非神似也。”称扬过分，或是友朋捧场，亦尚属人情之常，周自庵更谓其尤极荡冶，而止觉隽艳，则似故扬甲以抑乙，乃评家恶习，更无足取，若平心而言，尤极二字亦用得不当，岂耳食吴评，信其超越《秘辛》之故欤。笠翁传奇立意本多村俗，如《凰求凤》一曲即是说男子戒淫，乃得三妻，中状元，其曲词如何，亦不想为之辩解，因此非不佞所知，惟所云《字字双》小引，虽原本不佳，却亦并不那么恶秽，第六出《倒嫖》中《普贤歌》或反更为可议。案此小引系第三出《伙谋》之首三章，反复细读，诚是市井之语，但别无不堪入目之处，此出本叙娼家因生意萧条，招集会议，脚色三人，一副净扮村妓钱二娘，一丑扮肥妓孙三娘，一净扮老妓赵一娘，读者只看此情节及上场人，便可知其所说必无甚好话矣，倘于此而欲求见莺莺丽娘玉环出场时之空气，真是极大难题了。即如《长生殿·窥浴》之文虽可云隽艳，但起首时丑扮宫女上，所唱小引《字字双》“小监胡缠”云云，亦正是市井语，与《凤钗花络索》不同，可见此等处正有一种必要的谐和，假如一味高雅，亦便有出轨的时候，《读曲杂说》之七有云，元人院本多贪好句，不切本人口吻，李逵唱“风雨替花愁”，其词非不圆美，却是可笑，即此理也。



女人三护

药草堂随笔（九）

1940年2月2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

> 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

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乎疑心最彻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类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

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信如吾言，则我所佩服的尧的话大抵当出于道家，而黄老之学乃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①]，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

① “统”原作“说”。

《习苦斋画絮》

药草堂随笔（十）

1940年2月13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戴醇士著作，旧得有《习苦斋文》四卷诗八卷，同治五年刊，《笔记》一卷，十年刊，《画絮》十卷，光绪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后又得《画絮》别本四册，曾题其端云：

> 平常所见《画絮》皆惠年编刊十卷本，今此书只四卷，字画精好，胜于惠刻，而前后无题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于服官吴门时曾裒集付刻数卷者耶。此系吴仲怿旧藏，卷首有海丰吴氏石莲庵一印。

顷读《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七有《习苦斋画记类编》序，叙惠菱舫得《习苦斋画絮》读之而画学大进，又云："然《画絮》一书只刻四卷，尚有《习苦斋画记》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画记》排比，以类相从，付

之剞[1]劂，题曰《习苦斋画记类编》。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固在，且系曲园手书，唯上文所引数语已改为“然其书十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后《画记类编》之记亦改作絜字，唯题叶篆书仍作“戴文节画记”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确系戴氏初刻之《画絜》，盖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园谓画记别有一书，当为传闻之讹，而惠菱舫所刻改变体例，亦不宜袭《画絜》原名，如序中所称加类编二字，庶几名实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几已无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莲庵藏本，又于曲园集中见未删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颠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① “剞”原作“欹”。



《耳食录》[1]

药草堂随笔（十一）

1940年2月13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复堂日记补录》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窠臼，却亦有其佳处。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耳食录》亦谈报应，但其纯为志怪而作者多诙诡可喜，如卷一之《邓无影》，卷六之《廊下物》，颇有《诺皋记》之风。又卷五《白衣妇人》一则，迷离惝怳，莫明究竟，后世小说中少见此种写法，实乃是《诺皋记》下卷戴詧事的翻案，可知乐君受段柯古之影响为不浅矣。唯原文云詧为诸妇人牵入坑，及詧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詧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录》述少年语曰，彼甚乐，尚何哭为。

① 本篇未刊《庸报》，因其收入《药堂语录》，故编列于此。

此则殊有点金成铁之概。文字之事盖甚难言，乐君尚未能辨其中边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则记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虽是劝戒老调，而文情斐娓，无惹厌处，其工巧似出《阅微草堂》之上，盖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如橄榄或萝卜，虽是用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乐莲裳此文可为一例矣。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鼠数钱

药草堂随笔(十二)

1940年2月27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茶香室续钞》卷二十四有《鼠数钱》一则云：

> 方浚颐《梦园丛说》云，粤东有钱鼠，其吻尖，其尾长，其声若数钱然，故名。俗云见则主人家有吉庆事，亦犹京师人尊猬为财神也。按常鼠亦能作数钱声，俗云朝闻之为数出，主耗财，暮闻之为数入，主聚财。

案钱鼠在越中亦有之，俗名油炸老鼠，实臭鼠也，过时闻有臊气，如油焦味，又唧唧作声，但不及常鼠数钱时之急速耳。王衍梅作《鼠嫁词》中云："啾啾唧唧数聘钱"，即运用此典，颇工巧可喜，但鼠之数钱实乃震惊失常，欲叫不得，故急迫而咋咋作声犹人之口吃，其时大抵与蛇骤遇，竦立不能动，旋即被其缠束矣。儿时闻鼠数钱声，常为悚然，盖知近处必有异，所惧实在蛇而非鼠也。三十年前

家母在越，夏夜为帐顶上鼠所扰不能寐，以压帐竹竿拍席驱之，嗒然作声，鼠亦忽数钱，骤惊故尔。母谓或竹竿声似蛇拍尾故，此解更近理。北京未见臭鼠，常鼠大小有数种，亦未曾闻其数钱，殆因少蛇故耶。中国旧日通行铜钱，交付时必计数，除一五一十罗列几案地上外，大抵两手持数，亦以五文为一注，由右至左，钱相触有声，说及数钱声便各意会。今铜钱尽废，即铜元亦渐匿迹，恐更后将[1]无人能解此语矣。

① "恐更后将"原作"恐将更后"。



《琐事闲录》

药草堂随笔（十三）

1940年3月1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张林西著《琐事[1]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几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续编卷上之《面》，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续编卷上又有《不入诗话》一则云：

> 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

按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

---

① 原无"事"字，今增。

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

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惟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涕[1]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衰，却亦可贵。鄙人曾从故友烨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① "涕"原作"泪"。



《跨鹤吹笙谱》

药草堂随笔（十四）

1940年3月6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吹笙续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叶，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曰"已庵"，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

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

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

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九烟遗集》

药草堂随笔（十五）

1940年3月12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故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惟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奁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箧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按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凡十馀卷。又卷二寄陶嵺公

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如梦录》

药草堂随笔（十六）

1940年3月19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如梦录》一卷，不著撰[①]人姓名，记明季开封繁华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故以为名。今所见印本有两种，其一为写梦铅字印本，其二为河南图书馆木刻本，二者皆成于民国，铅字本似较早出。录中所记颇细致可喜，文亦质朴，惜刊本已经删削，如能觅得原本读之当更多佳处。前有咸丰二年常茂徕序，有云：

> 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埠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实堪捧腹。

---

① “撰”原作“选”。

即此可知所删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钱难买的民间传说的好资料，由明末遗老辛苦的录存，抄本流传二百馀年之后，却被假风雅的文人学士一笔勾去，想起来真是十分惋惜也。王阮亭评《梦粱录》，亦谓其文不雅驯，不知其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盖民间生活本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那么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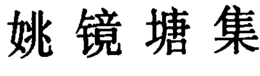
《存拙斋札疏》

药草堂随笔（十七）

1940年3月26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页，末有汪悔翁跋。第二本无题页，本文十八页，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页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页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页相同，唯末两页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为异耳。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意之

所在。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炫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疲，此则其一病也。



姚镜塘集

药草堂随笔(十八)

1940年4月2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集初得一部，系光绪间重刻者，殊不满意，近日买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旧有者转赠步庵，知其亦有潘集也。龚定庵《己亥杂诗》之六十说及姚镜塘，注云：

> 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塽，先生初奖借之，忽正色曰，我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乃自烧功令文。

余前读姚集，见其中时文三卷，无所用之，颇为轻视，殊不知其如此名贵。定庵诗云，此事千秋无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则余之不懂更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学濬所作姚君传，中引《己亥杂诗》注

记焚时文事，云时仁和龚自珍负才傲睨，独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称曰姚归安。此盖亦根据杂诗“毅然一炬为归安”一语，而似未免失之速断，诗注中原称其名曰姚先生学塽，其曰归安者只是诗语耳，如云镜塘固不协平仄，即称姚公姚先生[①]亦欠妥帖，自以地名为宜，未必是定称，到处都如此说法。或病琐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窃意此正是常有，亦复无妨，若必欲一筐樱桃先给予怀王，不但为古学家所笑，其实即作白话诗者亦未必以为是也。

① 原无“生”字，今增。



《汴宋竹枝词》

药草堂随笔(十九)

1940年4月4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寺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

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岂非即宋之相蓝寺[1]耶，想必仍有卖此种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渔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① “寺”印本作“类”。



《绕竹山房诗稿》

药草堂随笔(二十)

1940年4月8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绕竹山房诗稿》,馀姚朱文治著,正续共二十四卷。馀姚与会稽邻县,故买得之。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唯注中解说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词》中咏儿童玩具,注云:

> 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儿要嬉戏,先蒙面以存羞恶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约如此。

案《潜夫论》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以为宜禁,固已过于严肃,今则颠倒的加以道德的解释,其可笑殆更过之矣。

又卷十《夏日遣怀诗》之五有云:

枫树不如丰市好，六书原是有谐声。

注云：

近葺石婆桥庙，余为书额，因改丰市。

盖地名原为枫树，馀姚土音树市同读，因为改题，取利市云。其实据我看来，枫树之名亦大佳，正不必改，改为丰市，尤见得有俗气，近于所谓市井小儿之见矣。

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



五祖肉身

药草堂随笔(二一)

1940年4月9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蒋超伯著《麗溏荟录》卷二有“五祖”一条云：

> 《棘闱夺命录》云，黄梅东山五祖肉身，明季一兵斫其指，指为村媪所得。有蒋文学命漆工续上，完好如初，壬午秋梦五祖谓曰，念汝续指功，获隽当在八十名，果然。又按虞伯生《黄梅五祖碑》，宋之季年国境日蹙，以边障受兵，吏民奉师道体入求福，州果以灵贶安堵，不遭锋镝，五祖神异如此。

鄙意谈神异不妨，且亦正自有其佳趣，但须谈得好，且别无用意耳，若上文所举则鄙陋甚矣，不知蒋君何所取而记之。佛教固未尝不讲奇瑞，禅宗洒脱，应不重此，即留下肉身亦已大是多事，何更念念于一指，以中第乞人，甚有市井习气，识者方将笑之，岂宜如念佛老婆遽信为真实？此正如谭复堂言，科举之弊已深，士大夫役志于

此，故《棘闱夺命录》一类莠书出现于书房，至与经史争席也。余前据文文山《指南后录》，记六祖真身为元兵所剖割，今五祖又为清兵断其指，师徒皆厄于兵刃，真是无独有偶，但五祖能福苏州，免于元兵之残毁，则又与六祖正相反矣。元明迄今已历六七百年，不知两祖之真身尚存否乎，如能有善士为举而付之荼毗，连舍利一并埋却，干净了结，亦是大好事也。



《七修类稿》

药草堂随笔（二二）

1940年4月23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惟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

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1]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惟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

---

① “系”原作“紧”。

按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惟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惟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

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辛卯侍行记》

药草堂随笔(二三)

1940年4月26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陶拙存著[1]《辛卯侍行记》六卷，书不难得，而多用毛太纸，近日始得官堆纸印者一部，与原《求己录》仿佛，亦可喜也。此书记西北地理，间有记事言处，亦殊有理致。卷一记五月十三日出怀庆东门，注云：

> 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虑子分母食，何不托子于友，曲为斡旋，乃欲埋之，则大伤母心，不得为孝，岂可传之丹青乎。凡编训蒙之书，当取切近情理者。向见某书图画故事，首卷即绘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湩，乳其犹子一事，此为理所必无，近时童子多狡，以此等谰言示之无益有损。

案郭巨事大悖理，后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训蒙书一节尤为有识，操

[1] “著”原作“着”。

觗者不可不知。其实不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览》中记此事颇详，云引刘向《孝子传》，而冯梦龙的《笑府》与赵梦白的《笑赞》中均录有笑话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众仙女饯行，皆嘱付曰，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寄个信来。此不必待赵君之赞，已知其悠谬，但董永不过使人觉得可笑而已，尚无大害，若元德秀则竟是人痾矣。又卷六记腊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沟，有草地数里。注云：

> 皆旱芦及拳曲之短茨，俗呼[①]刺疙疸，间有席具草，或作息鸡，或作芨萁、集吉、芨芨。戈壁中得水气，只生此三卉，远望芃芃，近视则数步一丛，仍是粗沙细石及碱块，罕有土壤，非独不可耕植，即移他处之草于此亦不能活。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车中望见荒草，为之一释愁容也。

此记塞外风物，颇有情致，又得之亲历，与耳食者迥殊，书中曾讥评主蒙古屯田议者，龚定庵虽倔强，于此亦当无可争辩也。

① “呼”原作“乎”。



《舌华录》

药草堂随笔(二四)

1940年4月30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舌华录》九卷,明曹臣纂著,采录诸书,惟取语不取事,分"慧语"以至"凄语"凡十八类。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小时候读《砚云甲编》中《陶庵梦忆》,始知《舌华录》的名字,原文有云:

>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至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辄发赪。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弟兄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立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

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今查原书乃不见此条，细看卷三“冷语”第六中间两本均缺一页，乃从友人借上海有光纸石印本阅之，补抄七则，恰在其内。文云：

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①]恶只是不吃。

卷首列所采书目五十馀部，不知此条出于何书，纵或失实，曹氏可不负其责，惟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及处，又以张元汴为会稽人，亦有错误。

① “美”原作“善”。



《夷坚志》

药草堂随笔(二五)

1940年5月5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夷坚志》全书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中卷帙为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万卷楼依影宋钞本重刊,流行于世。洪景卢喜编著大部书,内容不免芜杂,《研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三称其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评甚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诵诗一则云:

>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案此所记盖是汉文对读之常态，但在昔时少所见，不免以为奇怪耳。契丹文字少见，不知中国有人通其读法否，此处尚可想见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边，契丹语译则说定为倒影水底之树，又鸟译作老鸦，均可广异闻，未必读鸟为乌，大抵在此景色中以乌鸦为更相适欤。周松霭辑《辽诗话》二卷，钜细毕搜，此一则亦殊有风趣，不知何以遗失也。

又案《辛卯侍行记》卷一注中论华英文难易，其十一难曰，华文多顺理成章，其倒讲者绝少，英文大都倒讲，如曰尔若干岁，译之为如何老是你也。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识者，于此尚未免有倒顺之见，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麻团胜会

药草堂随笔(二六)

1940年5月8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家中旧藏《皆大欢喜》四册,道光元年刊,内系《韵鹤轩杂著》及《随笔》各二卷,无撰人名字,后因移家失去,在北京复求得一部,则纸墨均不及矣。《杂著》中颇多佳作,盖嘉道时盛行谐文中之上乘,卷二有《书麻团胜会事》一篇,中云:

> 沙三少爷者逸其名,本豪家子,少以游荡破其产,遂弃家市麻团以自给,问其言不答,辄歌于市。壬戌岁值竞渡日,沙因买舟往观,携麻团一筐,额大匾于船,曰"麻团胜会",傍缀一联曰:"借径看龙船,不衫不履,三少爷现身说法;回头望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触目伤心。"敞衣跣足,歌也而以泣继之。

近阅彭昌祚著《恐自逸轩琐录》,见卷一亦有《沙三标子》一则记其事,可知实有其人,但传闻异辞,谓沙以观龙舟费四千金,析馀

资予家人，自留五百金，至中秋复招群僧施食，糁米为团，杂以胡麻，筐承车载，填塞道衢，远近居人小儿乞丐，闻风奔赴，以数万计，于是高结香龛，颜曰“麻团胜会”，旁有一联云：

三标子现身说法；

大老官及早回头。

事毕金已罄，以衣质钱一串为资本，日持歌板市麻团于里巷，有向其购者，歌一曲以侑食焉，已过而追呼之，则直前不应。家人以计诱之归，终不肯留一饭，竟以饥寒成病死云。

案韵鹤轩盖是吴人，成书在嘉庆年间，彭君则是江西人，道光甲午路过苏州，闻同舟人述沙三事，距嘉庆壬戌已三十二年矣。疑二说当以前为近真，若后者本亦流传于当地，自是沙三传说之一说，唯观其联语缺损不工，又以年代在后，难免有展转传讹之处耳。麻团不知是何种食物，以芝麻着团子外，抑或以为馅乎，《琐录》云糁米为团杂以胡麻，疑亦是想象之词，如何杂法大是疑问，吾乡捣糯米饭裹芝麻白糖或豆沙成团，名曰麻瓷，又作汤圆外着芝麻，用香油煤之曰金团，恐二者均未必是也。



划水仙

药草堂随笔（二七）

1940年5月10日刊《庸报》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语录》

王凝斋著《秋灯丛话》卷十四云：

航海者遇飓风骤起，樯舵倾折，智力皆穷，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详姓氏，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闾大夫，灵异昭昭，有求斯应。康熙中王君云森遭折舵，舟复中裂，舟师告曰，唯划水仙可免，乃披发与舟人共蹲舷间，以空手作拨棹势，众口假为钲鼓，如午日竞渡状，遂顷刻达岸。又顾君敷公中流舟败，已半沉，共划水仙，舟复浮出，久之有小舟来救，此舟乃沉，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陈某遭风，舟底已裂，鹢首欲俯，转旋巨浪中，危亡之势不可顷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试效之，沉者忽浮，穿浪如飞，俄抵一屿，乃得无恙。神之灵应如此。

案此节所言，盖即根据郁永河著《稗海纪游》附录《海上纪闻》，王顾皆郁氏之友，陈系同时之事，即郁在台湾之康熙丁丑，其时为八月初六日云。《秋灯丛话》有乾隆戊寅年序文，相去正六十年，可知其时郁氏著述当有传本，故凝斋得采用之，其文亦强半相同，唯稍改为简洁而已。读划水仙之纪事，常不禁愀然不怡，人力所不能及，唯有委诸超自然，而祈祷之外出以咒禁，迫切之情，益可哀矣。《丛话》亦循俗记因果鬼狐，而文字质实可喜，有时亦颇有见识，如卷十三言蝉并非餐风饮露，卷十五言山东无豺狗能制虎，野鸟可压油者，与一般文人专以耳食为事者又稍有不同也。



落花生

药草堂随笔(二八)

1940年7月7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东培山民著《一征砚斋笔记》卷七云：

> 花生亦曰长生果，又名落花生，殆无名也，以其花落于地，一丝牵蒂落实土中，故曰落花生。曰花生，减字呼之；曰长生，以形名之。此果初出日本，康熙间有僧应元携种归国，乃散植至今，以取油为大宗之用。以资果饵，亦应用之一。

案此所说盖即根据《本草纲目拾遗》卷七引《福清县志》语，其实不尽可凭，下文又引万历《仙居县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可知始入中国非在康熙矣。方密之著《物理小识》有崇祯癸未序，卷六“番豆”下云：

> 一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种之，一畦不过数子，行枝如

瓮菜虎耳藤，横枝取土压之，藤上开花，花丝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豆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

此殆即今所谓小花生，其时盖已普遍，不仅限于闽浙一带。

中国传说落花生来自扶桑，而日本则俗名南京豆，寺岛良安著《和汉三才图会》卷九十六“落花生”下引明周文华《致富全书》语，又云，按落花生近年来于长崎，书前有正德二年自序，即清康熙五十一年也。此事正有类例，同是一瓜，在中国称倭瓜，而日本则称唐茄子，但看中国又通称为南瓜，日本亦有柬浦寨之别名，可以想见其原产地当在安南方面，先来中国，再转至日本。花生行程恐亦是如此，唯其来路在何处，乃不能如南瓜之易于推测耳。



《入都日记》

药草堂随笔(二九)

1940年7月14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戊戌居杭时曾住在此街，距塔儿头不远，殊有怀旧之思。书皆小品，其一为医俗道人著《俗语指谬》三卷，《杭州白话报》抽订本，木板竹纸，辛丑年刊。其二为钱大昭著《迩言》六卷，光绪四年“啸园”重刊巾箱本，唯与茹氏《越言释》均未收入丛书中，不知何也。其三为《南菁丛书》本《戴氏论语注》二十卷。其四则《入都日记》一册不分卷，不著撰人姓氏，唯读第一页即可知为李圭所著书，记光绪丁亥进京验看引见事，自六月十九至十月十二逐日有记，极琐屑切实可观。记中常及与黄思永相见事，有数处更与《思痛记》有连，如八月十七日条下云，令仆分送子畴慎之诸同乡土仪，火腿各一肘，茶叶各四瓶，《环游地球新录》、《思痛记》各一部。又九月二十三日条下云，慎之读余《思痛记》，悲往日被难之惨不减于余，为加序焉。案《思痛记》一本有黄思永序，署光绪十三年九月下浣，时日正相

合。卷末又附到省记事，十月二十九日条下云：

> 申刻登城隍山，访伍公祠，当日在难中题壁诗已不见。前诗云："罡风吹我下杭州，江水滔滔去不休。今日伍公祠畔立，何期吾尚戴吾头。"追忆昔日所遭，犹不禁酸鼻也。

此一绝句亦可补入《思痛记》中，前后相去盖有二十七年矣。李君著作余着意收罗，虽重复亦必收，今于无意中又得此日记，亦大是可喜事也。



许敬宗语

药草堂随笔(三十)

1940年7月21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舌华录》九卷十八类，集录古今人妙语，刊于万历乙卯，去今已三百二十五年矣。雨中无事，全部读一过，觉得可喜的还多是晋人语，后人不免有学步之嫌，但有几则亦颇佳。卷三“冷语”第六云：

唐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无畏[①]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闻而欲罪之。

卷九“浇语”第十七云：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

① “畏”原作“为”。

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

袁小修眉批云，今世无此轻薄人，若有之，吾乐受。案敬宗为人如何，今可不论，唯此二条所记，确甚不错，而前条尤为有见地，无怪唐太宗听了大不高兴也。贤哲设教唯恐人之不解思量，英雄则恐人解思量，盖如此便不易得健者供驱使，俗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读《世说新语》，觉得魏晋时最杰出的便只有孔文举与嵇[1]叔夜，却即以是都不得其死。许延族生在唐初，其性格虽难以相比，总之也是会思想的人，何以遇见李世民这种英雄而得免于祸，我们翻开《唐书》，看见他列在“奸臣传”的第一名，可以知其故矣。魏晋以后士多死于思想，初唐剩了许君，他用一部分思想去保身家，遂得成功。此一小事，却是很有意义的一点思想史料也。

---

① “嵇”原作“稽”。



销夏之书

药草堂随笔(三一)

1940年7月28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大暑中从名古屋买到一包旧书,书有三部,都是关于图画的,颇可销夏,但因此也就容易看完。其一是《集雅斋画谱》四册,原板本有六种,这是"图本丛刊"重刻本,只有"五言唐诗画谱"、"木本花鸟谱"、"草本花诗谱"、"梅竹兰菊谱"等四卷,缺少六言七言唐诗,可是刻印均佳,四大册只要三元钱,亦大廉矣。其二是《彩画职人部类》二册,橘珉江画,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重刻。共二十八图,写百工情状,木板着色,甚为精致,阅之唯恐其尽,虽然看完不厌重看,但可惜还是只有这几页耳。其三稍为特别一点,是《和译桐阴论画》一帙四册,本田成之译,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出版。《桐阴论画》原本原来也很容易得到,不过那多是初编罢了,若要三编全部,便多与《画学心印》在一起,于我别无用处。我不懂画,看《桐阴论画》实在只看文章而已,此外则取其注中多举出画家生卒年月或年岁,这在普通书上是极少见的。和译共有三编,价又不过一元馀,

得了来也可备参考。但是我立即想起的是原本错字之多，如画字往往作昼，龚芝麓还写作袭方伯呢。我翻开译本来看，果然说顾眉生袭方伯芝麓之妾，而这袭字是译作一个动词了。随后是李因的一节，译文末云："在海宁之光禄葛，没有奇妾。"觉得文句太奇，查原文则云，"海宁葛光禄无奇妾"也，此外类例尚多。翻译可见不是易事，像我这样想利用译本不去找原书，也证明是弄巧成拙了。



《宋琐语》

药草堂随笔（三二）

1940年8月11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郝兰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者。他在乾嘉时代主要的地位是经师，但是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调，理想的学者我想就该是那么样的吧？近日拿出《宋琐语》来读，这是一册辑录书，早一点的有周两塍的《南北史捃华》，再早是张石宗的《廿一史识馀》，虽然都还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罢了，但郝君的便有点儿不同。小序云：

> 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

他赏识《宋书》的文章，很有道理，所录凡二十八类，标目立名，亦甚有风致，与《世说新语》所题差可比拟，馀人殆莫及也。本文后偶着

评注，多可启发人意，读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祖将去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陈诉事，注有云：

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棱，内图禅代，匆匆东归，而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

“藻鉴第二”记何长瑜在会稽郡教读，不见尊礼事，注云：

按蔡谟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乃贻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

又“谈谐第二十四”引“武二王传”云，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注云：

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

凡此皆有意致，与本文相发明，涉笔成趣，又自别有意思，如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



《南园记》[1]

药草堂随笔（三三）

1940年8月18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爽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

> 陆放翁为《南园记》、《阅古泉记》，皆寓策励之意，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不能尔也。韩败，台评及于放翁，不过以媚弥远耳，亦何足道。而后人往往讥之，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见《茶香室四钞》）。先生至为和平，持论向为通允，此盖涉笔及之。袁子才独不尔，信通人也。

前见陈作霖著《养和轩随笔》，有云："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而于文人为尤甚，如斥陆放翁作《南园记》，亦其类也。"当时甚服其有见识，今爽氏所言则又有进。讲学家好为苛论，尚只是天资

---

① 本篇后又曾收入《书房一角》，但最后一段删改成了一句话："曲园先生持论通允，而论放翁未能免俗，盖因和平故乃不克为直言以忤世俗耳。"

刻薄而已，若媚权臣，岂不更下数等耶。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已反复得出奇矣，在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益不知是何意思，憩叟揭而出之，诚不愧为通人，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

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为读史的正途。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的缘故么？外国人做文章便不听说如此牵引史事，譬如英国克林威尔，法国那颇伦，总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坏都有可说的了，却并不那么常见，未必是西洋人的记忆力差，殆因未曾学做策论之故吧。无论看哪一部史书，不要视为文料或课题，却当作自家的事看去，这其中便可以见到好些处令人悚然，是即所谓殷鉴，尔时虽不能惧思，也总无暇写厚于责人的史论矣。

郢　人

药草堂随笔(三四)

1940年8月25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庄子》卷八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则云:

>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垩尽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鄙人向来甚喜此文,不独若蝇翼与运斤成风,形容尽致,此处亦是二难并,好汉遇好汉,正如金圣叹喜欢说的话,所谓好看煞人,末了则是庄子[1]的牢骚,冰冷的一句话,使后世讲《南华经》的人们与宋

[1] "子"原作"公"。

元君同样的感了一场没趣[1]。郭子玄注云，非夫不动之质，忘言之对，则虽至言妙斲而无所用之。然而后人很喜欢引用这个典故，却又都弄的有点缠夹。《订讹杂录》卷八“郢削”条下引《庄子》文至立不失容，论曰，征此则垩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属之郢人，大非。胡氏语固不错，但可笑处不仅在此，即使以斧削属之匠石，而车载斗量的作者悉以郢人自居，恐匠石亦不敢轻易动手，盖人人都会得以石灰涂鼻子尖上，而难于能够立不失容也。我辈凡夫岂敢随便削人，亦并不好妄求人去削，还是自己用点心，诚实勤恳的写文章，庶几可以无大过失，亦已足矣。

---

① “趣”原作“趋”。



《燕窗闲话》

药草堂随笔(三五)

1940年9月2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燕窗闲话》二卷,光绪辛卯年刊,题江阴郑守庭先生著,盖其门人辈所编刻者也。卷末附墓志铭,亦其门人所撰,而生卒年月不可考,但记其七十五岁时事,云"明年卒",如抓云雾。惟查卷上记中举人时自云己未生,乃知其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国为传记于此多不注意,"疑年录"之叠出殆亦不得已耶。《闲话》所记悉其半生阅历,不说果报妖异,自有特色,虽大事不出教读、赈饥、讲乡约诸端,但写小时候琐事,亦复朴实可取。有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

《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然所解时有谬误者，读“子罕言利”，误认子罕为宋之乐喜。读《易经》“象曰”，不知为大象小象，误认为舜弟，窃疑所言俱佳，想为舜所化，克谐之后学问大进也。思之俱堪发粲。

余前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曾说以前所读之经书于我毫无益处，后来之能够写文字，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这即是看闲书小说。平常我劝青年多学外国文，主张硬读，对于一种文字约略入门之后，便来查字典看书，头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还是看下去，随后覆阅就可懂三四分，逐渐进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郑君所说差不多即可为我作证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欤。



丁巳旧诗[1]

药草堂随笔(一则)

1940年9月9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偶然整理二十年前故纸,于堆中得一纸片,写七言绝句二首云:

> 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
> 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槐茧未成秋叶老,闲翻土偶坐黄昏。

末署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诗意与时日考之,可知是为张勋复辟战后之作。查旧日记,七月二十一日项下只记云:阴,上午雨,终日未霁。但十八日云:得丸善书店五日所寄劳苇尔著《支那土偶考》第一分一册。诗中所翻即系是书,斋中虽有若干六朝土偶,但

① 本篇刊于《庸报》而未收入《药堂语录》,故不列序号。

块然一物，不能缁也。张勋率辫子兵驻于天坛，战败乃只身逃入东交民巷。前门为商会所在地，本事惜不能详，大抵当时多有奇论怪话。第二首云南天何事，今亦已不复记忆矣。其时寓居南半截胡同旧邑馆，院中有大槐树，相传昔有乡人携眷居此，其妾缢死此树下，后遂定例，馆内不得住女眷云。每至夏日，槐蚕满地，穴土作茧，故诗语及之。菖蒲溇人谢甲携妾来避难，馆中人共哄，在院外争执，力竭声嘶，甘乙出而调停，许留一宿，其事始解。乙为内务部司官，为鲁迅之三味书屋同学，常督其幼子读《古文观止》，朝夕出入，遥闻其哀吟声，为之恻然。自己虽曾在书房读过书，殊不知古文之声，其悲切乃如斯也。因槐茧而想起当年的邑馆，牵连书之，事虽琐碎，亦殊可记；廿馀年前往事多如轻尘过目，无复留影，偶得一二事，亦正是劫灰之馀，致可珍重者也。



中秋的月亮

药草堂随笔（三六）

1940年9月16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云：

> 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此记作于四十年前，至今风俗似无甚变更，虽民生凋敝，百物较二年前超过五倍，但中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弃，至于赏月则未必有此兴趣了罢。本来举杯邀月这只是文人的雅兴，秋高气爽，月色分外光明，更觉得有意思，特别定这日为佳节，若在民间不见得有多大兴味，大抵就是算账要紧，月饼尚在其次。我回想乡间一般

对于月亮的意见，觉得这与文人学者的颇不相同。普通称月曰月亮婆婆，中秋供素月饼水果及老南瓜，又凉水一碗，妇孺拜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清凉。相信月中有娑婆树，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间，此亦似即所谓月华，但不幸如落在人身上，必成奇疾，或头大如斗，必须斲开，乃能取出宝物也。月亮在天文中本是一种怪物，忽圆忽缺，诸多变异，潮水受他的呼唤，古人又相信其与女人生活有关。更奇的是与精神病者也有微妙的关系，拉丁文便称此病曰月光病，仿佛与日射病可以对比似的。这说法现代医家当然是不承认了，但是我还有点相信，不是说其间隔发作的类似，实在觉得月亮有其可怕的一面，患怔忡的人见了会生影响，正是可能的事罢。好多年前夜间从东城回家来，路上望见在昏黑的天上挂着一钩深黄的残月，看去很是凄惨，我想我们现代都市人尚且如此感觉，古时原始生活的人当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见这种情景，听着豺狼嗥叫，夜鸟飞鸣，大约没有什么好的心情，——不，即使并无这些禽兽骚扰，单是那月亮的威吓也就够了，他简直是一个妖怪，别的种种异物喜欢在月夜出现，这也只是风云之会，不过跑龙套罢了。等到月亮渐渐的圆了起来，他的形相也渐和善了，望前后的三天光景几乎是一位富翁的脸，难怪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喜悦，可是总是有一股冷气，无论如何还是去不掉的。“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这句词很能写出明月的精神来，向来传说的忠爱之意究竟是否寄托在内，现在不关重要，可以姑且不谈。总之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中秋的意义，在我个人看来，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看月亮，而还账又过于吃月饼，然则我诚犹未免为乡人也。



七夕

药草堂随笔(三七)

1940年9月23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五"天文讹"中,有"七夕牛女相会不足信"一条,引《学林新编》所论,历举《淮南子》、《荆楚岁时记》、周处《风土记》各说,皆怪诞不足信,子美诗曰,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亦不取世俗说也。杭氏加案云:

> 案《齐谐记》亦载渡河事,《艺苑雌黄》辨其无此事,亦引杜诗正之。杜公瞻注晋傅玄《拟天问》,亦谓此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又《岁时记》引纬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此说更属无稽。

查陈元靓《岁时广记》,七夕一项至占三卷,《学林》、《艺苑雌黄》、《拟天问》注各条均在,略阅所征引杂书,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时为最盛,以后则行事渐微而以传说为主矣。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

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

> 七夕油炠粉果，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

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诳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论，则亦自有其佳趣。谭仲修《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二年七月下云：

> 初七日晚内子陈瓜果以祀天孙，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

此意甚好，其实不信牛女相会实有其事，原与董浦诸公一样，但他不过于认真，即是能把诗与真分别得清，故知七夕传说之趣味，若或牵涉现实而又能祸世，即同一类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妇，谭君亦必不能忍耐矣。



朱詹

药草堂随笔(三八)

1940年10月1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阅焦广期《此木轩杂著》,卷三中有"近科大小题时文题辞"一则云:

> 吾家一切什物不能备,其最多而无用者,独近人所为制举文字耳。以与人,人无欲者,则类而存之,盈几可二百馀卷,卷三四百纸,盖积渐致然,然其势犹未已也。噫,此诚何所用哉。北齐时有义阳朱詹者,累日不爨,常吞纸以实腹。不幸遭值荒岁,此几上累累者,庶可备数月之粮乎。

案傅青主有《书成弘文后》一篇,对于八股痛詈恶詈,焦君生于康熙时,亦发此论,流风遗韵犹未断绝,而以诙谐出之,觉得更别有风趣。所引吞纸事见《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中,原文云:

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

据此则朱詹盖在南朝，是梁时人，上文云北齐，殆以颜氏而致误。古时纸用楮皮，或者因此聊可代食，若后来竹纸，虽与笋亦是一类，似难适用，焦君备荒之意恐亦徒然耳。闻近代文明国家节省用纸，改造丝缕以代布帛，古人轻视文章，谓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今似已足证明其不确，但此等用处亦当以不着一字的白纸为宜，则文章仍然是不必要者也。抱犬而卧，足为勤学之佳话，比囊萤映雪尤有情味，却亦亏得颜君娓娓叙说，有文情相生之妙。曾闻笑话云，有乞丐数人[①]寒夜露宿，身披蒲包而苦足冷，乃觅犬子用以温脚，夜半一人大叫，或询其故，答曰，足指为毡毯所咬伤。今昔庄谐虽有不同，亦正是无独有偶也。钱木庵《出塞纪略》记在归化城左近见华严塔元人题名，有句云，今人同古人，残月如新月，岂不信哉。

① "数人"原作"人数"。



《澹庵文存》

药草堂随笔（三九）

1940年10月8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数年前得《芸香阁尺一书》二卷，无锡朱荫培撰，读之知其与秋水轩有关，盖尺牍颇受许葭村影响，卷中又有致许又村书也。去年老友罼公以吾乡《平蝶园酒话》抄本见贻，前有朱氏序，云平筠士见属，筠士即蝶园子，为朱氏门人，《尺一书》有跋语，即其所编刻。后得《咒笋园剩稿》，作者傅霖亦吾乡人，又有朱氏序跋在焉。因为这些因缘，我对于芸香阁著作颇想搜集一看，却是不易得，近日始从杭州寄到一册《澹庵文存》，据尹继美跋语，似同治丁卯已经评刻，今内有己巳年遗文，当系殁后重订，只有抄本欤。书凡二卷，存文十七篇，诸人题词称其壮年好为骈俪诙谐之文，后从梅伯言闻义法，乃识宗派。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是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咒笋园剩[1]稿》序今见《文存》卷一中，原本序跋各一，合并为一篇，大加修改，益朗朗可诵矣。尹

① “剩”原作“遗”。

评云吞吐有神，可谓适当，但如想要在其中采集事实，则远不及原刻二文。如序言卒时年仅三十七，跋言时为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未时，改本均无。又序云遗橐千金，散之立尽，改本乃作万金。跋云，将死，邻左右厌苦之，雨莼曰，朱某必殓而葬我，不汝累也，改本添两句曰，我前世僧[1]也，行将去矣。实的事情削去，虚的增上，皆为行文计耳。一唱三叹，附以教训，文成矣而情益减，良不如《尺一书》中致傅雨莼一札，多大皮囊装得如许愁恨云云，虽是秋水轩调，尚得见多少情意也。其馀各文别无甚意见，读去原自成为一篇古文，后人不必多下雌黄，因无比较材料，好坏说来也不明显，今悉从略。

① “前世僧”原作“前僧世”。



《松崖诗钞》

药草堂随笔（四十）

1940年10月16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松崖诗钞》一卷，武康李钟撰，抄本，皆近体诗，共一百一首。首叶有印，白文云阮亨梅叔，末有墨笔题字一行云："甲子冬日扬州阮亨梅叔敬读于武林抚院之诚本堂"，名字上盖二印，朱文曰仲嘉，白文曰阮亨印，皆颠倒，二之上重盖朱文印梅叔，故重叠猝难辨识。卷首夹红纸一幅，似系第二纸，首二字曰钧诲，当系承上文，下云：

> 武康僻在群山中，轻材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广文髦而好学，其诗又天机清妙，实为此乡所仅有。若蒙夫子题辞奖借，则闻者必踵而起，固陋之俗可以小变。伏求赐以弁言，慰其慕韩之意，则广文幸甚。熊飞幸甚。

此盖是徐雪庐手笔，其上又有草字涂改，其文云：

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今广文之诗，颇似陆放翁，而胸次更无芥蒂焉。王右丞云，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真趣矣。吾于广文之诗亦云。嘉庆甲子，扬州阮元序。

有白文印云伯元。案阮君编集《两浙辅轩录》，成于辛酉癸亥，此书呈进稍迟，又录例不收生存人，故未能入选。惟潘峄琴编《续录》及《补遗》共六十卷，在九十年后，乃亦不收入，未知何故，岂传抄本不多，采访者未之见耶。徐雪庐著《春雪亭诗话》颇可喜，据小引盖作于嘉庆乙丑，卷中常引故人诗句，而亦不及松崖，然则松崖诗岂真在此一册中欤。余不知诗，惟喜其多真率处，又常言酒，似是真爱饮酒者，与寻常诗料不同。《避地》五律中云，市近亲赊酒，村荒寄卖鱼，句云，酒债急须偿，又云酒债嫌多积，赊盖属实。其自咏广文先生生活之七律有云，喜酒不嫌妻对酌，以诗论不知如何，然此语总之极佳，殆可谓自有其真趣者也。



《武藏无山》

药草堂随笔(四一)

1940年10月22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郝杰同著,万历年刊,北京大学图书馆曾有一部,只存一至五卷,北京图书馆有全本,影印收入《善本丛书》第一集中,据谢刚主跋,明末讲日本的书颇不少,惟记日本名[①]物风俗语言文字,则无逾是书之详矣。案卷三中有歌谣三十九首,卷五中有山歌十二首,中国介绍日本诗歌恐当以此为最早。原书刊行年未详,若以万历中年计算,正当丰臣秀吉时代,较隆达百首或尚在前也。歌谣首列原文,再注读法即对音,释音即译语,末为切意即是意译,惜多谬误,今录其三十七于后,题曰《武藏无山》:

木索失那外,
紫气那一面别纪,
阳脉木乃失,

① "名"原作"民"。

骨萨摇里一迭铁，
骨萨尼个所一而。
（武藏山，
无山岛，
月出出野草，
月入入野草。）

案原意云，武藏野无有月亮可入的山，出从草里出，入便向草里入。卷四分天文等五十四项，列记语言，对音之外并注平假名，亦多不确，颇有《英语入门》之概，阅之亦可发笑，可见古今人情相去不远。卷二记风俗亦未免多耳食，或是根据华商所谈，故非是直接见闻也。

村濑栲亭著《艺苑日涉》卷六“民间岁节上”，凡引用《全浙兵制》日本风俗记三处，今悉见此书“时令”项下，《全浙兵制》不知何书，或其中风俗记即以此第三卷充之耶。所引第一节云：

新正名曰少完之，以正字呼为少音，完之即月也。朔日贺岁，从尊至卑，礼节如口云红面的倒，乃阳光普照之言，千首万世乃千春万岁，华盖华盖盖长此少年，乃通国俗语也。

栲亭注曰：

熙按，寄译通言，不过影响，明人虽颇通晓[1]我邦事，犹尚讹谬如此，译北狄西竺之言，亦可以类推耳。聊录以备搜览。

[1] “晓”原作“尧”。

此处批评甚是，记述异地风俗者不可不注意，大抵须有科学之真，文学之美，始能有济，必不得已而去，文章或可不讲，惟趣味仍不可少，盖如此则记录乃有品格，说到底亦还是属于美的领分者也。

指　画

药草堂随笔（四二）

1940年10月29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松村操著《近世先哲丛谈》续编卷上记村濑栲亭事，有一则云：

> 指头画谓之手画，又谓之擘画。有池无名者工此技，尝为人作之，伊藤介亭在坐，赏叹久之曰，穷乡僻邑乏笔之居处，亦复可宝。无名闻之大惭，终身不为此技。栲亭尝闻此话，深感其言之有味，常以告人云。

按中国作画常有不用笔者，以手以舌，以发以尻，以破布甘蔗渣，不失为一奇技，然似并不足尚，介亭此言可谓谲谏矣。

据小杉未醒著《池大雅传》，亦记此事，系引田能村竹田语，惟中述栲亭语云，介亭先生是至笃实人，不会嘲弄人，盖实是如此想耳。大雅为日本南画之先觉，正不必以指画争奇，所作《十便图》，乃就李笠翁原作十绝句，各作一图，为其杰作之一，曾见复印本，与

芜村作《十宜图》合册，总名《十便十宜》，只能领略其十一之趣而已。小杉未醒撰有《十便图赏叹》，今录其二“浣濯便”于下云：

浣尘不用绕溪行，门里潺湲分外清，不是幽人偏爱洁，
沧浪引我濯冠缨。

大雅堂把笔对纸试诵此诗，画出何物来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昔有此语，如写一人正在洗帽缨，亦殊无味。烁地心机一转，画作丛竹，洗过丛竹的根，水在流着，水从泥墙下流来，水动，竹叶也动，正是一味清风。于是噗地盖下图章，文云“前身相马方九皋”，喊，这本该是九方皋，却忘记了，刻成了方九皋，就是这么的使用着，或者结果是使用一世也未可知吧。

此赞亦殊有致，与大雅之风趣正相合也。



《如梦记》

药草堂随笔(四三)

1940年11月5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馀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1917)卒,年四十五岁。我于丙午年(1906)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小说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七号,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将》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形势。哥将在中国普通译作“哥儿”,但方言中似别有较适合的名词,如越中之“阿官”是也。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很懂《保登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以至长冢

节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像别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书，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记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钱名世序文

药草堂随笔(四四)

1940年11月12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近年搜集古今试帖诗,留其板刻稍佳者,已得一百馀种,关于唐人试帖者十七,其中《全唐试律类笺》乃独有三种刻本。此书十卷,恽鹤生、钱人龙编,有康熙乙未自序,余所得者其一为乾隆乙卯万福校刻本,有杭世骏序,其二为乾隆辛巳恽宗和改订刊本,宗和即鹤生子也。其三则康熙乙未原本,近日始得到,前有钱名世序,盖人龙为名世之子,序三叶惜只存其半,但因此得略知钱同庵之文章与书法,亦大可喜耳。昔曾得王锡侯之《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十卷,甚自珍惜,今此序文当可居次位乎。

提起钱名世,便令人自然想起《名教罪人》这一案来。《名教罪人》原册存故宫中,今有活字印本,为《文献丛书》之一,很容易见到了。此是天地间一奇书,有缘者大可一看。钱序作于康熙五十四年,《名教罪人》的上谕则是雍正四年,其间只隔了十年的光阴,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变。钱序之谄奉皇帝与七言诗八首之谄奉年羹

尧，赋诗诸臣之谄奉雍正，其实一也。再看雍正初年给年羹尧的甜蜜的朱谕，亦何怪别人献诗乎，但是只许[①]州官放火，原是自古如斯耳。奭召南《史亭识小录》云，名世投诗当在年羹尧入觐之时，是时朝廷褒功颂德惟有日不足，词臣一诗颂扬，可谓泰山之微尘，亦似仰希朝指，说的很合情理。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此正是制科的真用处，深通养瘦马的极意，禛公诚不惜以金针明度与人也。

① "但是只许"原作"但只是许"。



《日本国志》

药草堂随笔（四五）

1940年11月19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

>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的[①]书的。

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

① 原无“的”字，今增。

元赞先生事略》尚可读，馀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1]以形势沿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著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梼亭之《艺苑日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① 原无“继”字，今增。

《读〈诗〉管见》

药草堂随笔（四六）

1940年12月3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江叔海《石翁山房札记》卷三有牟陌人《诗切》一则云：

栖霞牟廷相陌人，孜孜三十馀年成《诗切》一书，手稿凡六易，大旨谓当芟郑笺，黜卫序，寻博征，申浮丘申培之坠义，顾所改诗序类多影响依附，或凿空臆撰，无所谓寻博征申坠义也。其最可嗤鄙者，如《桑中》刺丑夫欲得美室而不谐也，《有蓷》咏丑妇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学，其友作诗戒之，以卫多女间也，《葛生》刺寡妇不谨也，《东门池》观美女戏舟也，《东门杨》咏夜游张灯也，《泽陂》嘲人怕妇也，《鱼丽》刺众客无廉耻而嗜饮食也。说《诗》至此，风雅扫地矣。近人罗慎斋《诗说》尤多创论，至谓“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为指男女阴。此真诗之一厄。

案江君此说颇有传讹，亡友饼斋尝以问馀杭先生曰，莜何物也？先生曰，大头菜耳。此语至今流传。后饼斋从老铁借得凝斋《读〈诗〉管见》阅之，始知所说不实。罗氏原书卷五云，“视尔如莜，谓其色与莜之华同耳。莜华白而浅红，布地繁密，亦秾丽而可爱者。椒性辛温大热，食之走气分而助火。”并未曾指男女阴，江君殆出误记。又罗氏生乾隆时而称之曰近人，亦误。唯凝斋以椒为春药，谓猝投之而强使吞之。又释子仲之子云，子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谓诗咏强暴者于白昼稠人间掠美少年以去，则解亦大奇，惟不如札记之所云耳。牟氏《诗切》不可得见，但其序尚有传本，又罗氏《诗问》中间或引其数语，“视尔如莜”二语下引牟陌人云，妇人相语也。想必别有说法，惜不能得其详矣。《诗切》所说序虽多似诙诡，然亦颇有适切者。如《泽陂》之第三章云：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牟氏解之为陈人怕妇诗，岂不极似？徐读一过，直令人忍俊不禁。此虽未能谓为确解，总不得不说殊有巧思也。



曾衍东诗

药草堂随笔（四七）

1940年12月10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春间偶得《哑然绝句》诗一册，内题"哑然诗句"，"七如道士曾衍东著"，手写木刻，半叶六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皆七言绝句，每首连题共四行，一叶得三首，凡七十七叶，计诗二百四十首有半，末尾残缺。首有序云：

> 七如诗句多不成话，却又好笑。以其不成话，便当覆瓿。因其多好笑，搁在巾箱，舍不得糟蹋他了。久之成堆，公然一集。古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哑然绝句自序，嘉庆戊辰，七如道士曾衍东。

我读其诗其序文，看其字其款式，如"嘉庆戊辰"四字夹行并写，其图章，如云"曾大诗书画"，"曾先生妙笔"，可知是郑板桥一派，又一印文云，宗圣裔六十七世孙衍东，则是曾子之后也。曾见

王西庄郝兰皋所写信，有模仿板桥体者，可以想见其时风气之一斑，只可惜现在找材料不大容易，若此诗集在这一点上颇有价值，若其多好笑读了有趣，又其次也。关于曾君的事，只见方士淦《蔗馀偶笔》中有一则云：

> 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曾大令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楼。阮太傅[1]总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脍炙人口矣。

今集中有《黄鹤楼》一首云：

> 楼高多少步楼梯，直上高楼远水低，画鹤鹤飞都不见，大江东去夕阳西。

又有下乡诗云：

> 丝繐榔竿轿大乘，四围雪亮玉壶冰，村姑不识玻璃面，纤手摸来隔一层。

此盖是居官时作，但不知是何处令君，或者当在两湖乎。曾君圣裔，而喜作打油诗，岂不怕世人之攒诃聚詈耶？此一事亦令我感到兴趣。前见孔传铎所作《申椒集》及《红萼词》各二卷，多隽艳可喜，此人乃衍圣公也，虽是性质略略不同，但亦可谓无独而有偶矣。

---

① “傅”原作“传”。

《右台仙馆笔记》

药草堂随笔(四八)

1940年12月17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俞曲园先生行状[①]》，末有云：

> 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

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殊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惟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

① “先生行状”原作“先行形状”。

不至令人哕弃耳。《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馀子所可企及也。试以卷一为例，第一则记冯孝子，虽曰以表纯孝，庶几左氏之义，写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传之风。又何明达、王鬃堂二则，写市井细民之高义，可以愧士大夫，而了无因果的结局，近世说部中均极少见。若其记范婉如及扬州某甲女，痴儿怨女之情死，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乃多有恕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潮州制柿饼人砍断虎尾，因而获虎，末曰："孔子曰，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应敏斋在钱唐江沙洲上见绿色巨人，末曰：

> 《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馀，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鳀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

此等处骤视似只是文人旧习，所谓考据癖耳，实则极有意思，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卷首附刻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其一末联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夫听说鬼之态度有如东坡，岂复有间然，而先生年老又似乐天与放翁，更无些子火气，则自愈见醇净矣。

方晓卿《蠹存》

药草堂随笔(四九)

1940年12月24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地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买到姚福均的《铸鼎馀闻》四卷,很是别致,于是设法去找了《补篱遗稿》八卷,《海虞艺文志》六卷来。其次是方旭的《虫荟》五卷,续找来的有方晓卿《蠹存》二卷,光绪戊戌[1]刊本。《虫荟》收罗材料颇不少,可以算是关于动物的一部类书,特别是蛇的一部分,读去仿佛是听讲希奇故事,也颇有意思。《蠹存》却是一部怪书,目录共分天文、时令、神鬼、形体、妇婴、食物、植物等十八目,据序言凡因应之大,事物之细,罔不毕具,以广见闻,裨日用,似乎是《万宝全书》之类,而又实是笔记,所以是特别。如时

① "戌"原作"戍"。

令中多列禁忌，宫室方位，方药亦杂神异，其所主似近于方技，用现代语当称之为非科学的，但因此亦多保存好些旧传承或是民俗的好资料也。神鬼一目颇足比拟《酉阳杂俎》，其说鬼尤多妙语，但不著出处，稍为可惜，所说不必一致，故疑其非出于一源。“水鬼”一则云：“鬼作纸灰气，惟水鬼作羊臊气，如人在船中闻羊臊气，急向空写嚣字，则不为害。”按溺鬼作羊膻气，亦见《子不语》，岂已视为水怪故耶，写“嚣”字可以避害亦奇，符咒的心理亦大值得研究，但恐不易得此闲人耳。



夜光珠

药草堂随笔（五十）

1940年12月31日刊《庸报》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焦南浦著《此木轩杂著》卷一有“南唐宠姬”一则，前半云：

宋大将获南唐后主宠姬，夜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云烟气愈甚。曰，宫中不点烛耶？答曰本阁每至夜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李氏一国之主，豪侈如是，其后身羁帝京，日夕以眼泪洗面，运去事往，宜百感之交集也。

按此种传说盖古已有之，梁僧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三十六，“杂行长者部”树提伽身生人中受天果报二，引《树提伽经》云：

进到其户，白银为壁，水精为地。王见水流，疑不得进，树提伽即导王前。户中以黄金为床，白玉为几。树提伽妇有百二十重金银帏帐，端正无双，为王作礼，眼中泪出。王问卿妇

见我何不惬，眼中泪出？答言王衣烟气，是故泪出。王言庶民燃脂，诸侯燃蜡，天子燃漆，亦无烟也，何得泪出？提伽答言，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挂着堂上，昼夜无异，不须火光。

《千字文》云，“珠称夜光”，可知久有是说，而故事实例则或当以此经为最早，六朝译文亦足以称之，自有古艳之色，后世传闻恐从此出，如烟气云云，形迹更甚相似。惟佛经言长者前生布施，身受天堂之供，其事本是神怪，仙人楼居中有此照夜之珠，非但不觉鹘突，且亦自然，今移在南唐宫中，便觉得欠妥帖，至少也须放在汉武故事里才行，盖后世帝王已难该得起此宗珍宝，固不必引清故宫为例证始可知道也。尝闻湖州友人说笑话云，有村妇早起劳作，叹息曰，那比得[①]皇后娘娘快活，此刻想尚躺在蓝夏布帐子里，叫声太监，给我拿个柿陀来吃。大家莫笑村妇以主观描写王家的幸福，读书人想象宫中必有宝贝，亦何尝出三家村见识以外，可知此等处要取舍得中亦殊不易易也。

① “那比得”原作“那得比”。



《四史疑年录》

看书偶记（五三）

1940年1月24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买得《四史疑年录》两册，凡七卷，阮刘文如著。前有阮云台嘉庆二十三年序，著者自序，谭复堂光绪二十一年序，题叶后面乃署宣统元年春王月刻。案此盖是榆园许氏旧刻，当成于光绪丙申，十馀年后不知为谁氏所得，乃改刻年月，村俗可笑。卷五中是仪之名凡两见，均未避讳，又每卷撰人题曰仪征女士某，可知其非刻于宣统时也。

录中第一人是项羽，得年三十一，此人的确不愧为英雄。但是看下去，最可叹异的还是董贤，年止二十三，这除了有些王子后妃以外，名人中顶年青的总要算是他了。吾乡金古良撰《无双谱》，“垓下叹”与“恐惊寐”均俨然居卷首。此二人真不可及，而张子房更出其上，此则由于金君黍离之感，与其以文山结末同一意思耳。



《三千威仪》

看书偶记（五四）

1940年1月26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佛教戒律本是传而非经，颇似中国的《礼记》，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尤为鄙人所喜读，盖其所说又甚类《曲礼》也。如卷上云：

> 夜起读经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经戒利，馀人不如我。二者，设不利，不得言我经戒不利正为某比丘事故乱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恶。四者，设明日欲问所疑，不得说馀，直当说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当持是经中语以行问人使穷。但有是念，非贤者法。

此即可以移示中国的读书人。卷下又云：

> 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

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

此则朴实细致，虽朱柏庐亦未能说到，令人读之感叹，觉得希有可贵也。大抵古人好处就只是切实，懂得人情物理，说出话来自然体会得宜，后来和尚忙于做法事，读书人应科举，叩头上宰相书，更无工夫来想这些事情，唐宋以来家训毫无《曲礼》气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规》持与《威仪》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



《扶桑两月记》

看书偶记（五五）

1940年2月4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阅罗叔言《扶桑两月记》，所记盖是光绪辛丑冬东游视察教育事，罗君本是读书人，故文多可读，与王韬、王之春等均不同也。有云：

> 于书肆中购得宋闻人耆年《备急灸法》，内载妇人难生，宜灸右脚小指尖三炷，如妇人扎脚，则先以盐汤洗脚令温，气脉通疏，然后灸之云云，据此则宋代妇人尚非人人缠足可知。

此一则故是《存拙斋札疏》中材料。又云：

> 毛子晋刻《津逮秘书》，实是用活字。儿时读《毛诗陆疏广要》，见其中有横植之字，始悟毛氏刻字原是活板，特排印精工，与刻板骤不能别耳。

不佞乃取《陆疏广要》考之，在卷上之下第四十六叶，“颜如舜华”条下，子晋引《尔雅》“椋木槿”，槿字倒植，稍偏近左下，但非是横植，此外亦并无有，疑罗君所说即指此。但仔细考察，只此一例实不足证明系是活板，盖寻常木板剜改处亦偶或脱落，匠人不谨慎辄颠倒错乱嵌之，正是可有的事，非活字始会有倒植也。曾见《明斋小识》后印本，有多处文字凌乱，意不可通，盖均是此例，不过是绝端的例，亦不可多见者耳。



卷地皮

看书偶记（五六）

1940年4月7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沈丙莹著《春星草堂集》中有《星匏馆随笔》十二卷，卷六有一则云：

> 《山堂肆考》，王知训帅宣州，性贪婪，因入觐赐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如鬼。或问何为者，答曰，我宣州土地也，知训入觐，连地皮卷来，故至此。案《江南遗事》载此乃徐知训事，今俚语卷地皮本此。

案今通称刮地皮，此系俗语，不能知其所本，大抵只能根据文献，如五代纪录中见此语，可知其时已有之而已。伶人用语率取当时最通行者，以博一笑，有如今之相声等，未必自我作古，创造新语，待有人著录，传至后世，为俚言之所本也。古来学者喜就载籍所记，推定为某语本源，往往本末倒置，揆诸事理亦复难通，此则甚惑也。记有人著书，言男女淫乱始于何时，读之不禁失笑，而言者凿凿有据，仿佛记得说是妹喜时，正是很好的例子。

《林和靖集》

看书偶记（五七）

1940年4月8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前日书贾携《林和靖集》来，喜而留之，余非能知妻梅子鹤之诗者，因少时曾有此刻本，故不能无恋恋。查旧日记第七册，光绪壬寅正月十六日，以钱二百文托孙朝升从江南官书局买长洲朱氏重刻《林和靖诗集》二册来，屈指计之已是三十七年前事，思之惘然。本家举人椒生公时为管轮堂监督，讲道学，诵《感应篇》，放生，收字纸。孙朝升即专司收字纸之人，江北人，已年老矣，尝面谀公，老爷行善多，已可成地仙，胡尚未仙去耶，大为公所不喜。余与伯升叔则常请其往城南行脚时代买物事。公厉禁食牛，而孙朝升字纸担中每为我辈藏白切熟牛肉来，在号舍中喝白酒，以盐蘸牛肉食之，殆因系禁物之故，觉得似特别有味也。

《冷红轩集》

看书偶记（五八）

1940年4月15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前从杭州买得江宁人著作三部，悉有渔村印记，后又得二书，一为忏花庵刊《柳亭诗话》，一为《冷红轩诗集》，种类不同，而亦均有此印或题记，亦一奇矣。《冷红轩诗集》二卷，词一卷，长白女史友兰氏著，其子麟趾手书付刻，故颇精工，咸丰七年刊，但似不多见，《天咫偶闻》卷五八旗人著述书目中亦未列入。友人有搜集闺秀著作者，余则欲得旗人文集，因连类及之耳。

据序跋言，作者为燕山相国寡媳，斌良题词云燕山是其兄，盖即是桂良。斌良、法良均有诗集，桂良则似无之。友兰姓萨克达氏，适得奕赓所著《清语人名译汉》，检之，萨克达下注曰母野猪，此尚有春秋时古风，唯以氏女诗人得无唐突，犹之诗人姓牛，亦终嫌不相称也。

《贩书偶记》卷十八别集类，《冷红轩诗集》二卷，长白女史百保友兰撰，光绪壬午葆真斋刊。《芸香馆遗诗》卷下有和友兰三姊诗

数首，附录原唱二首，署名百保，下注友兰，今亦见《冷红轩诗》中。可知友兰本名百保，而原集上不书，未审何故，殆至光绪重刊时始加上耶。



《稗海纪游》

看书偶记(五九)

1940年4月18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从旧书估得《稗海纪游》一编，纸敝墨劣，而文可读，价亦不廉，但终收得之，因其记游历台湾事，盖亦不多见也。书共八十四页，纪游居其大半，后附《伪郑逸事》、《番境拾遗》、《海上纪略》三种，题武林郁永河沧浪稿，襄平达纶经圃校刊，首页则题道光乙未新镌，枣花轩主人订。据达纶序云，幼时于琉璃厂得写本，后官秦中，为之付梓，盖在郁氏游台百三十八年后矣。案《野棠轩文集》卷三有赵公行状，达纶为赵尔巽之祖，道光癸未进士，著有《台湾风土记》《枣花轩稿》《经圃日记》等，所云风土记疑即纪游之误。郁永河游台湾在康熙丁丑(西历一六九七)，因采硫黄，深入鸡笼番地，所记多险怪可喜，文亦颇佳。其记郑成功遗事虽只寥寥八则，陈永华父女传各一，而语殊翔实。其同行友人顾敷公于永历十三年被掠至台，留居三十馀年，故所据必多可信，且亦颇有推重语，达氏序中称其论郑氏事尤有古良史遗意，可谓有识矣。清末《申报》馆收入

《屑玉丛谈》三集中，今亦已罕见，如或杭人有好事者收入小丛刻中，亦是胜事也。



《左庵词话》

看书偶记（六十）

1940年4月20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左庵词话》二册，不记卷数，各册页数自为起讫，惟一册末有跋语六行，姑以此定为上下册耳。下册有一则云：

> 《草堂诗馀》所录皆鄙俚，万不可读。舒白香《词谱》虽仅百首，调多未备，然皆选佳作，足资规模，不枉竹垞当年向钱遵王家巧偷得来。

偶然兴到涉笔，将《词谱》与《绝妙好词》混而为一，张冠李戴，虽是疏忽，但亦事所常有，不足深怪也。龙顾山人撰《清词玉屑》卷五云：

> 许迈孙娱园亦曰榆园，池亭树石，胜擅江左，其佳处曰疏香林屋，曰潭水山房，曰藕船，曰还读书堂，曰莲花诗龛，曰微

云楼，山阴王眉叔各谱《望江南》写之。

其错误亦正相同。许迈孙固亦有其娱园，惟有疏香林屋等之娱园乃在会稽小皋步，盖是秦秋伊之园，戊戌前后屡游其地，微云楼已不能登，潭水山房尚完好，乃只是一楹屋，阶前有一方池，别无甚佳趣也。秦氏于光绪丙戌刻有《娱园诗存》四卷，卷三为《萝赏集》，集录同人题咏诗词，王眉叔《望江南》词共十首均收在卷内，龙顾山人所录盖是王氏《笙月词》，此词适为许迈孙所刻，遂以此误会耳。



《思 痛 记》

看书偶记(六一)

1940年4月29日刊《实报》
署名药堂
收入《书房一角》

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馀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李氏别种著作，亦曾着意收罗，见《思痛记》尤欲得之，至今已有三册，新旧稍不同，内容则一，前又得其一，墨暗纸敝，末叶墨题一行云，丙申九月筱园读于沪滨，印文曰小园，各本均只有光绪六年高鼎序金遗跋各一，此本乃多有光绪十三年黄思永序一篇，盖后刻加入者，故为早印本所无也。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黄氏自称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序云，今读是编，语语酸楚人心坎，不觉旧痛触发，涕泣交流，良可悲矣。

往日尝读鲁叔容《虎口日记》，杨德荣《夏虫自语》，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觉得都不甚奇，惟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余收集《思痛记》已有四册，本意亦拟分给他人，惟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损一册。前曾借给胡适

之君一读，不知其印象如何，当时不愿追问，适之亦是识者，想亦以此不曾给什么回答也。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记）



禹迹寺

1940年1月1日刊《中和月刊》1卷1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孟子》曾述禹治水之法，又《论语》云：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这简单的几句话很能写出一个大政治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庄子》说得很好：

昔者禹堙洪水，……亲自操橐耜而九杂[①]天下之川，腓无胈[②]，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

① “九杂”原作“涤”。
② “腓无胈”原作“股无胈”。

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屩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1]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道也，不足为墨。

盖儒而消极则入于杨，即道家者流，积极便成为法家，实乃墨之徒，只是宗教气较少，遂不见什么佛菩萨行耳。《尸子》云：

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焦里堂著《易馀籥录》卷十一云：

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而巫者效之为禹步。孔子有姊之丧，尚右，二三子亦共而尚右。郭林宗巾偶折角，时人效之为垫角巾。不善述者如此。

说到这里，大禹乃与方士发生了关系。本来方士非出于道家，只是长生一念专是为己，与杨子不无一脉相通，但是这里学步法于隔教，似乎有点可笑，实在亦不尽然，盖禹所为之佛菩萨行，显然有些宗教气味，而方士又是酷爱神通，其来强颜附和正复不足怪耳。案屠纬真著《鸿苞》卷三十三《钩玄》篇中有“禹步法”，颇疑其别有所本。寒斋无他道书，偶检葛稚川《抱朴子》，果于卷十七《登陟》篇中得之。其文曰：

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以左足

① 原无“苦”字，今增。

> 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

此处本是说往山林中，折草禹步持咒，使人鬼不能见。述禹步法讫，又申明之曰：

> 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不独此事也。

准此，可知禹步威力之大。不佞幼时见乡间道士作炼度法事，鹤氅金冠，手执牙笏，足着厚底皂靴，踯躅坛上，如不能行，心甚异之。后读小说记道士禹步作法，始悟其即是禹步，既而又知其步法，与其所以如此步之理由，乃大喜悦。自己试走，亦颇有把握，但此不足为喜，以不佞本无求仙之志，即使学习纯熟，亦别无用处也。

《尸子》云禹生偏枯之病，案偏枯当是半身不遂，或是痿痹，但看走法则似不然，大抵还是足疾吧。吾乡农民因常在水田里工作，多有足疾，最普通的叫做流火，发时小腿肿痛，有时出血流脓始愈。又一种名大脚风，脚背以至小腿均肿，但似不化脓，虽时或轻减，终不能全愈，患这种病的人，行走蹒跚，颇有禹步之意，或者禹之胫无毛亦正是此类乎。会稽与禹本是很有关系的地方。会稽山以禹得名，至今有大禹陵，守陵者仍姒姓，聚族而居，村即名为庙下。禹之苗裔尚存在越中，那么其步法之存留更无可疑了。凡在春天往登会稽山高峰即香炉峰，往祭会稽山神即南镇的人，无不在庙下登岸，顺便一游禹庙，其特地前去者更不必说。大抵就庙前村店里小酌，好酒，好便菜，烧土步鱼更好，虽然价钱自然不免颇贵。做酒饭供客，这是姒姓的权利与义务，别人所不能染指的。但是我们怎能

说贵呢。且不谈游春时节，应时食物例不应廉，只试问这设食者是谁呀？大禹的子孙，现在固然只是村农，我们岂能不敬。别的圣贤的子孙或者可以不必一定敬，禹是例外，有些圣子贤孙也做些坏事，历史上姓姒的坏人不曾有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这一说好像是有乡曲之见，说天下英雄都出我们村里。其实这全是偶然。史称禹生于石纽，范蠡又是楚人，所以在志书里他们原只是两位寓贤而已。

小时候到过一处，觉得很有意思，地名叫作平水。据说大禹治水，至此而水平，故名，这也是与禹极有关系的。元微之撰《长庆集序》云：

> 尝出游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问之，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也。

这又是平水的一个典故，不过我所知道的平水只是山水好，出产竹木笋干茶叶，一个有趣的山乡，元白诗恐怕连村校的先生们也不大会念了。另外有一处地方，我觉得更亲近不能忘记的，乃是与禹若有关系若无关系的禹迹寺。据《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门云：

> 大中禹迹寺，在府东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晋义熙十二年骠骑郭将军舍宅置寺，名觉嗣。唐会昌五年例废，大中五年复兴此寺，诏赐名大中禹迹。

这寺有何禹迹，书上未曾说明，但又似并非全无因缘，事隔九百馀年，至清乾隆乙酉，清凉道人到寺里去，留有记录，《听雨轩馀纪》中《陆放翁诗迹》一条下云：

予昔客绍兴，曾至禹迹寺访之。寺在东郭门内半里许，内祀大禹神像，仅尺馀耳。寺之东有桥，俗名罗汉桥，桥额横勒春波二字。

吾家老屋在覆盆桥，距寺才一箭之遥，有时天旱河浅，常须至桥头下船，船户汤小毛即住在罗汉桥北岸，所以那一带都是熟习的地方，只可惜寺已废，但馀古禹迹寺一额，尺馀的大禹像竟不得见，至今想到还觉怅怅。禹陵大庙中有神像，高可二三丈，可谓伟观，殿中闻吱吱之声，皆是蝙蝠，有许多还巢于像之两耳中，但是方面大耳，戴冕端拱，亦是城隍菩萨一派，初无一点禹气也。数年前又闻大兴土木，仍用布商修兰亭法，以洋灰及红桐油涂抹之，恐更不足观矣，鄙意禹如应有像，终当以尺馀者为法，此像虽不曾见，即从尺馀一事想象之，意必大有特色在耳。后世文人画家似乎已将禹忘却了，范大夫有时入画，也还是靠他有一段艳闻，其实仍以西子为主，大家对于少伯盖亦始终无甚兴趣也。

禹迹寺前的桥俗名罗汉桥，其理由不能知道。据宝庆《会稽续志》卷四“桥梁门”下云：

春波桥在城东南五里，千秋鸿禧观前。贺知章诗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故取名此桥。

放翁再过沈园题二绝句，其一云，落日城头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相传桥名即用放翁诗语，今案《续志》可知其不实，志成于宝庆元年，距放翁之殁才十六年，

所说自应可信。现在园址早不存，寺已废，桥亦屡改，今所有的圆洞石桥是光绪中新造的，但桥名尚如故，因此放翁诗迹亦遂得以附丽流传下去。我离乡久，有二十年以上不到那里了，去年十二月底偶作小诗数首，其二说及寺与园与桥，其词曰：

>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今年一月中寄示南中友人匏瓜庵主人，承赐和诗，其二末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匏瓜庵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两年不写文章，手生荆棘矣，写到这里，觉得文意未尽，但再写下去又将成蛇足，所以就此停住，文章好坏也不管了。（廿八年十月十七日）



读《初潭集》

1940年1月1日刊《中国文艺》1卷5号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少敝旧而价不出廿元，颇想留之。会玄同来谈，又有生客倏至，乃属玄同且坐苦雨斋北室，即前此听虾蟆跳处，今已铺席矣，可随意偃卧，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书大佳，如不要勿即退还。——盖自欲得之也。未几全书送来，议打一折扣而购得之，尚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殁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系之，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夜，知堂记于北平。

此是不佞题所藏《初潭集》的话，于今转眼将一年矣。今日取出书来看，不胜感慨。玄同遇虾蟆事在民国十三年，查旧日记七月廿五日条下云："阴，上午十一时玄同来谈，至晚十时去。"又八月二日条下云："下午雨。玄同来访，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见面时玄

同云，夜间室内似有人步声，何耶？我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当是幻觉，及客去收拾房间，乃见有大虾蟆一只在床下，盖前此大雨时混入者也。尹默闻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虾蟆来与晤对耳，遂翻敬亭山诗咏之曰，相看两不厌，虾蟆与玄同。昔日友朋戏笑之言，流传人间，衍为世说，或有传讹，实则只是如此耳。因题记语加以说明，念古人车过腹痛之感，盖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虽然他所专攻的音韵学我不能懂，敬而远之，称之曰未来派。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但是我说中国思想界有三贤，即是汉王充，明李贽，清俞正燮，这个意见玄同甚是赞同。我们生于衰世，犹[1]喜尚友古人，往往乱谈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们的友朋，想起来未免可笑，其实以思想倾向论，不无多少因缘，自然不妨托熟一点。三贤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祸，其人似乎很激烈，实在却不尽然，据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的，只是世间历来的意见太歪曲了，所以反而显得奇异，这就成为毁与祸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么凭据呢？这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一句有常识的名言，多么诚实，平常，却又是多么大胆呀。假如这是某甲说的，说不定也会得祸，幸而出于《礼记》，读书人没有办法，故得幸免，不为顾亭林辈所痛骂耳。

我曾说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须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

---

① “犹”原作“欲”。

可明了。《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记阅俞理初的《癸巳类稿》事，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李君是旧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点，亦可谓颇有眼力矣。李卓吾[①]的思想好处颇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这里看出来。《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初潭集》卷三列记李夫人、阮嗣宗邻家女、阮仲容姑家鲜卑婢诸事后，加案语云：

李温陵曰，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馀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

---

① "吾"原作"君"。

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1]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2]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此所言大有见识，非寻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诸媪”项下记蔡文姬、王昭君事，评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妇人，身[3]世不幸，皆可悲也。

又记桓元子为其侄女宥庾玉台一门，曹孟德为文姬宥董祀，评云：

婿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亲亲，曹公贤贤，呜呼，曹公于是为不可及矣。

书眉上有无名氏墨书曰：

上数条卓吾皆以[4]为贤，乃欲裂四维而灭天常耶。

其后别有一人书曰：

---

① “西”原作“要”。

② “恃”原作“持”。

③ “身”原作“生”。

④ 原无“以”字，今增。

卓吾毕竟不凡。

李卓吾此种见解盖纯是常识，与《藏书》中之称赞卓文君正是一样，但世俗狂惑，闻之不免骇然，无名氏之批，犹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之疏耳，其词虽严，唯实在只是一声吆喝，却无意义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险事乃是不肯说诳话，许多思想文字之狱皆从此出。本来附和俗论一声亦非大难事，而狷介者每不屑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题《扪烛脞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

但只有常识，虽然白眼看天下读书人，如不多说话，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洁癖，则如饭中有蝇子，必哇出之为快，斯为祸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万历十六年卓吾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时年六十二岁。书分五部，曰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又各分细目，抄集故事，有如《世说》，间附以评论。中国读书人喜评史，往往深文周纳，不近人情，又或论文，则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艺然[①]。卓吾评乃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即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漫然也。卷十一"儒教下"云：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阶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

---

① "然"原作"所"。

评曰：

太管闲事，非子言也。

又云：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有蒙袂戢屦，贸贸而来。曰，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评曰：

道学可厌，非夫子语。

据《檀弓》所说，这里说话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写作仲尼，但这两节所批总之都是不错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达人情物理，所言说必定平易近人，不涉于琐碎迂曲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说得很妙，他以为经书中有些都只是圣人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此语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如上文所举，虽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例也。近来介绍李卓吾者有四川吴虞、日本铃木虎雄、福建朱维之、广东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约略可知矣，《焚书》亦已有两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错误不便读，安得有好事者取原书并续书影印，又抄录遗文为一集，公之于世，以便学者乎。（廿九年一月廿七日）



《春在堂杂文》

1940年1月15日刊《学文月刊》第2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春在堂全书》十年前购得一部，共一百六十本，堆放书架上，有望洋之叹。不佞不懂经学，全书中精粹部分以是不能了解，以前陆续抽读的只是尺牍随笔杂抄笔记这一类，大都是曲园先生业馀遣兴之作罢了。我向来很佩服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师而留心轻文学，对于小说故事做过好些研究，读《右台仙馆笔记》中《黄土老爷》诸篇，觉得是好文字，非一般说部中所有。近来闲居无事，拿出《杂文》来看，有许多文章看得甚喜欢，特别是序文一类，觉得在近代文章中极少有的。平常讲词章的人批评曲园先生的诗文总说是平庸，本来曲园诗自说出于乐天放翁，文也自认文体卑弱，似乎一般的批评也还不错。但是，诗我不大懂今且慢谈，文的好坏说起来颇有问题，因为论文的标准便有好些差异。有喜谈义理者，不但主张言中有物，其物还必须是某一派的正统思想，所以如不是面红耳赤的卫道，或力竭声嘶的辟邪，便不能算是好文字。又有好讲音律

者，凡是文章须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韩愈《送董邵南序》，数易其气而后成声，然后铿锵镗鞳，各有腔调，听之陶然。然而在此二派之外还可以有一种看法，即是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这是普通说话的条件，也正可以拿来论文章。我就是这一派看法的，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这两种成分，我理想中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春在堂杂文》现在便可以给我做一个很好的例。

序文极是常见的东西，人们即使不从文集里去找了来读，无论看什么书大抵前面总可见到一两篇序文的。但是平常有谁看了觉得喜欢呢？我近二十年来才学会看书先看序，可是结果多是不满意，难道真如郑板桥所说敷衍的太多么。其实倒还因为照程式做的多了的缘故，这些大都选得进《古文范》里去，在我们想找平庸的说话看的人却也就不免失望了。曲园先生的序文在书上常可见到，这不仅如章太炎先生所微讽，先生好以笔札泛爱人，《杂文》自序中也自己承认性好徇人之求，那么这些序文一定多有敷衍的了。然而我们的经验是，一部书上有几篇序，其中如有曲园先生的在内，则其中最可读的必定就是曲园先生的那一篇。在《天津徵献诗》、《槃薖纪事初稿》、《习古斋画絮》、《眉绿楼词》等诸书中，都是这样。为什么缘故呢？作序即使同是敷衍，因为这多少总是赋得，但敷衍也有不同，有如寒暄，一种是照例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种也是说今天天气好或是冷，不过关于冷稍有发挥，说是早上见了霜，或是阴寒得很萧寂，有些物理人情上的根据，这就觉得有点意味了。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

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极不易及者也。

现在试举几个实例。《杂文》卷一《逊学斋诗集序》说风与雅的区别,说明后世的诗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荔园词序》论诗词曲三者变迁之迹,即阐明其特色所在。三编卷三《王子安集注序》论骈散文甚有精义,最可佩服,以骈俪为文之正轨,真通文章体例者之言。又云宋人以八代为衰,奉昌黎为鼻祖,自此以往遂有语言而无文字。此与鄙意甚相合。《秦肤雨诗序》引扬子云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论诗中有偏丽偏则两派,《击壤》遗音,《香奁》流弊,均所不取。《玉可庵词序》论词之正宗贵清空不贵饾饤,贵微婉不贵豪放,与《荔园词序》可互相发明。四编卷六《眉绿楼词序》论诗词分类编年之是非,谓诗宜编年,可以考定其生平,词则以分类为宜,盖词之体率婉媚深窈,或言及出处,亦以微言托意,不如诗之显明,依年编录未必足供考证,故不如分类读之,窥见其性情之微,转足以想见其为人。又《槃薖纪事初稿序》对于艰深之文微致讽词,五编卷七《可园诗钞序》自述诗宗香山剑南,亦即是此意。有云:

> 诗固所以写性情也,雕斵性情而为诗,其犹戕贼杞柳以为杯棬[①]乎。

此语亦甚佳,与上文文崇骈俪之说似两歧,而实俱有至理。曲园先生著作未有专篇论文学者,仅散见于杂文中,序类中为最多,虽只是散金片羽,而言简意赅,往往与现代意见相合,实盖为之先导,此则甚可贵也。

---

① "棬"原作"卷"。

《杂文续编》卷二有文数篇，皆关于金石文字者，如《慕陶轩古砖图录序》、《问礼庵彝器图序》、《两罍轩彝器图释序》、《画馀庵古钱拓本序》、《百砖砚斋砚谱序》，文章议论均可喜。《古砖图录序》有云：

余经生也，欲通经训必先明小学，而欲明小学则岂独商周之钟鼎，秦汉之碑碣，足资考证而已，虽砖文亦皆有取焉。

此数语可以包括诸文大意，简单的文句里实具有博大的精神。中国学者向来多病在拘泥，治文字者以《说文解字》为圣经，钟鼎碑碣悉不足取，砖瓦自更不必论矣。太炎先生曾谓古代日用食器且少见，独多钟鼎，大是可疑，龟甲兽骨则是今人伪作，更不可信。曲园先生乃独能有此创见，如在金石学家本亦无奇，以经师而为此言，可谓首开风气者矣。此外文章随便举例如六编卷八《唐栖志序》、《徐淡仙百兰稿序》，卷九《东城记馀序》，并无特殊意见可说，而就题写去，涉笔成趣，不费气力，不落蹊径，自成一篇可读之小文。《杂文补遗》即七编卷二有《外弟姚少泉所著书序》，则又亦庄亦谐，姚君喜谈道与兵与医，曲园先生称其谈道之书明白晓畅，又谓惜余钝根仍茫乎未得其门径，与之论兵则只取其兵贵藏锋一语，"其论医亦多心得，余固执废医之论者，姑勿论也。"微词托讽，而文气仍颇庄重，读之却不觉绝倒。此种文字大不易作，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是好文章之特色，正如盾之两面，缺一不可者也。寿序与记各类中尚有佳文，兹不具论，只以序文为限，亦不及详举也。

读曲园先生的序文，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有些正论学术文艺，有如导言，但少简短耳。有些抒情说

理，笔致如随笔小品，虽是七八十年前著作，而气味新鲜，一似墨色未干者，此可异也。我们平日写文章，本来没有一定写法，未必定规要反古，也不见得非学外国不可，总之只是有话要说，话又要说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结果或近欧化，或似古文，故不足异，亦自无妨。《春在堂杂文》中有些与新文学相通即以此故，若我辈写序虽力或未逮，用意则固不谬，今见曲园先生序文有相近者，此又我们之大幸也。朋友相语，常苦没有适宜的文章可以给学生读，《左传》《史记》非无名篇，不过那只可当文学赏鉴，不能作自己写作的参考，若要勉强去学，势必画虎类狗，做成烂调古文而后已。如今看见曲园先生的许多序文，很是喜欢，觉得这颇足供启蒙之用，虽然一时不能指定那几篇最合用，但总之在这中间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很好的资料来，使青年学子读了得到益处。近来长久不写文章，觉得荒疏了，夏天读《春在堂杂文》很想写一篇小文，但是不敢下笔，一半也因为怕说得不对，唐突先贤，到现在才决心来写，盖我深信此类杂文甚于学子有益，故仍来饶舌一番，不管文章的好坏，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到底，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　　　　（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谈食鳖

1940年2月1日刊《中国文艺》1卷6期
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方濬师著《蕉轩杂录》卷八有《使鳖长而后食》一则云：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谓之饕餮，甚矣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也。鲁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羞鳖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鳖，辞曰，将使鳖长而后食之，遂出。酒食所以合欢，文伯与敬叔两贤相合，不知何以添此恶客，真令人败兴。

案此事见《国语》五《鲁语》下。《左传》宣公四年也有一件好玩的事：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

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

这因后来多用食指动的典故的关系吧，知道的人很多，仿佛颇有点幽默味，但是实在其结果却很严重，《左传》下文云：

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

《国语》也有下文，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颇严肃。文云：

文伯之母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鳖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逐之，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

《列女传》卷一母仪传"鲁季敬姜"条下录此文，加以断语云：

君子谓敬姜为慎微。诗曰，我有旨酒，嘉宾式宴以乐，言尊宾也。

关于子公子家的事《左传》中也有君子的批评，《东莱博议》卷廿五又有文章大加议论，这些大概都很好的，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的倒还在上半的故事，睹父与子公的言行可以收到《世说新语》的忿狷门里去，似乎比王大王恭之流还有风趣，王蓝田或者可以相比吧。方子严大不满意于睹父，称之为恶客，我的意思却不如此，将使鳖长而后食之，不但语妙，照道理讲也并不错。查《随园食单》水族无鳞单中列甲鱼做法六种，其"带骨甲鱼"下有云：

> 甲鱼宜小不宜大，俗号童子脚鱼才嫩。

侯石公的话想必是极有经验的，或可比湖上笠翁，但如此精法岂不反近于饕餮欤。凡是吃童子什么，我都不大喜欢，如童子鸡或曰笋鸡者即是其一，无论吃的理由是在其嫩抑在其为童也，由前说固未免于饕餮之讥，后者则又仿佛有采补[①]之遗意矣。不佞在三年前曾说过这几句话：

> 我又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可怜人这东西本来说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吃肥了好吃或卖钱。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械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使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地来，先让这班小朋友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学业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帮去也总还不迟。

我这些话说得有点罗里罗嗦，所讲又是救救孩子的问题，但引用到这里来也很可相通，因为我的意思实在也原是露睹父的将使鳖长而后食之这一句话而已。再说请客食鳖而很小，也自难免有

① “补”原作“捕”。

点儿吝啬相。据随园说山东杨参将家制全[1]壳甲鱼法云：

> 甲鱼去首尾，取肉及裙加作料煨好，仍以原壳覆之，每宴客，一客之前以小盘献一甲鱼，见者悚然，犹虑其动。

这种甲鱼虽小，味道当然很好，又是一人一个，可以够吃了，公父文伯的未必有如此考究，大约只是在周鼎内盛了一只小鳖，拿出来主客三位公用，那么这也难怪尊客的不高兴了。请客本是好事，但如菜不佳，骨多肉少，酒淡等等，则必为客所恨，观笑话中此类颇多，可以知之，《随园食单》即记有一则，《笑倒》中则有四五篇。吝啬盖是笑林的好[2]资料，只关于饮食的如不请客，白吃，肴少等皆是，奢侈却不是，殆因其有雄大的气概，与笑话的条件不合耳。文伯的鳖小，鳖还是有的，郑灵公的鼋则煮好阁在一旁，偏不给吃，乃是大开玩笑了，子公的染指于鼎尝之而出有点稚气好笑，不能成为笑话，实在只是凡戏无益的一件本事而已。《左传》《国语》的关系至今说不清楚，总之文章都写得那么好，实在是难得的，不佞喜抄古今人文章，见上面两节不能不心折，其简洁实不可及也。

---

① "全"原作"金"。

② "好"原作"如"。

《书房一角》原序

1940年2月26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橱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

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敬[1]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前[2]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出[3]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

① “敬”原作“败”。
② “前”原作“或”。
③ “出”原作“去”。

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　　　　（廿九年二月廿六日）

关于阿Q

1940年3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1期
署名知堂
收入《秉烛后谈》

阿Q近来也阔气起来了，居然得到画家给他画像，不但画而且还有两幅。其一是丰子恺所画，见于《漫画阿Q正传》。其二是蒋兆和所画，本来在他的画册中，在报上见到。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大抵赶得着王冶梅算是最好了，这回所见虽然不能说比《护生画集》更坏，也总不见得好。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不过蒋君的阿Q似乎太瘦一点了，在有些场面，特别是无赖胡扯的时候[1]，阿Q如是那么瘦便有点不相称的，实际上阿Q本人也还比较的胖。文学家所写，艺术家所画的人物，自然不必全要照原样，但是实物的比较有时也不是无用。我在三十年前曾认识真阿Q，说起来有点面善，就所记忆略记数则，以供参考。

---

① “候”原作“位”。

阿Q本来是阿桂拼音的缩写，照例拼音应该写作Kuei，那么当作阿K，但是作者因为字样子好玩，好像有一条小辫，所以定为阿Q，虽然声音稍有不对也不管了。其实阿桂也原是对音的字，或者是阿贵也说不定，只因通常写作阿桂，这里也就沿用，不问他的生日是否在阴历八月里，阿桂姓谢，这是我查了民国四年的日记才记起来的。说到民国四年，那么阿Q在辛亥年未被枪毙可想而知了，作者硬把他枪毙了事，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枪毙这《正传》便无从结束，其二更重要的则由于作者对于死罪犯人沿路唱戏大家喝[1]彩的事很感兴味，借此可以写进去。阿桂平日只是小小的偷点东西罢了。他有一个胞兄，名叫阿有，专门给人家舂米，勤[2]苦度日，大家因为他为人诚实，多喜欢用他，主妇们也不叫他阿有，却呼为有老官，以表示客气之意。阿桂在名义上也是打杂的短工，但总是穷得很，虽然并不见他酗酒或是抽大烟。到了穷极的时候，他便跑去找他老兄，有一回老兄不肯给钱，他央求着说，这几天实在运气不好，偷不着东西，务必请借给一点，得手时即可奉还。他哥哥喝道，这叫作什么话，你如不快走，我就要大声告诉大家了。他这才急忙逃去。其时阿有寄住在我们一族的大门的西边门房里，所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阿桂虽然以偷为副业，打杂总算是正业罢。可是似乎不曾被破获过，吊了来打，或是送官戴大枷，假如有过，一定会得街口传遍，我们也就立刻知道了。所以他在这一点上，未始不是运气很好。但是话虽如此，枪毙可能他也并不是没有。辛亥革命那一年，杭州已经反正，绍兴的知县和绿营管带都逃走了，城防空虚，人心皇皇，那时阿桂在街上走着嚷道，我们的时候

---

① “喝”原作“喝”。

② “勤”原作“劝”。

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对答得好：你们总比我有。有者，俗语谓有钱也。这样下去，阿桂说不定真会动起手来，可是不凑巧，嵊县的王金发[①]已由省城率队到来，自己立起军政分府，于是这机会就永远失掉了。

阿桂虽穷而并不憔悴，身体颇壮健，面微圆，颇有乐天气象。我所记得的阿桂的印象是这一副形相，赤背，赤脚，系短布裤，头上盘辫。吾乡农工平常无不盘辫，盖为便于操作故也，见士绅时始站立将辫发推下，这就是说把盘在头上的辫子向后一推，使下垂背后，以表敬意。赤脚也是乡民的常习，赤背在夏天原是很普通的事，——但是阿桂难道通年如此的么？这未必然。那么为什么我总记得他是赤背的呢？理由其实很是简单。有一年的夏天，大约总是民国初年，我看见他在我门[②]口走过，赤着背，如上文所记的那种形相，两手捧着一只母鸡，说道，谁要不要买？有人笑问，阿桂你这鸡哪里抓来的？他微笑不答。恐怕这鸡倒不是偷来的，有些破落的大人家临时要用钱，随手拿起东西叫人去卖，得了几角小洋，便从中拿一角给做酬劳，这是常有的事。我还有一回看见阿桂拿了一个铜火锅叫卖，那时他的服装已记不得了，不知怎的那回卖鸡的印象留得很深，所以想起来时总觉得他是赤着背。此外大约还卖别的各色东西，虽然我未曾亲见，但是听人说这什么是向阿桂买来的，也是常有的事。我同阿桂做过几次交易，却是古砖之类，他听说我要买有字的砖头，找了几块来卖，后来大概因为没有多大油水的缘故罢，不再拿来了。查旧日记，在民国四年乙卯那一册里找

---

① "发"原作"法"。
② "门"原作"们"。

到这几项记录。

十一月十六日，雨。上午谢阿桂携一砖来，三面有文，云永和十年太岁在甲寅，□月□章孟高作，孟南成，共十九字，字多讹泐，顶有双鱼，两面各平列八鱼形。下午又以其一来，顶文曰十二月葬，正书，云皆是胡氏物，共以一元易得之。

十九日，阴。下午阿桂以二断砖来，留拓二纸。

廿一日，阴雨，上午阿桂来，断砖因索值高议不谐，即还之。

十二月廿五日，晴。上午谢阿桂又持天监普通二断砖来，以五角收之。

右四砖均于民国八年移家时搬至北京。永和十年砖后来托平伯持赠阶青先生，曾见其手拓一纸，有题记曰："永和砖见著录者二十有四，十年甲寅作者有汝氏及泉文砖，而长及一尺一寸，且遍刻鱼文者，惟此一砖，弥可珍矣。阶青记。"梁砖全文，一曰天鉴二年癸未，一曰普通四年作，亦胡氏物，皆未上蜡，而坚黑如铁沙，天监又写作鉴，特别可喜。十二月葬乃是常砖，我看至多是赵宋时代而已，或曰葬字写得怪，恐非唐人不能，我也不能表示是否。总之阿桂卖给我过这些砖头，我对于他是不无好意的。他的行状，据我们知道可以说的就是这一点。《正传》中有许多乃是他的弟兄们的事，如对了主人家的仆妇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罢，这事是另有主名的，移转来归入他的账下。先贤说过，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是之谓欤。　　　　（廿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记）



释子与儒生

1940年3月7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读贺子翼的《水田居集》，有《诗筏》二卷，所说通达事理多可喜，有一则云：

> 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镠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镠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于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

严九能著《蕙檙杂记》中亦云：

大慧禅师曰，予虽学佛者，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读《宋史》李芾传大恸，怒侍者不哭，欲推堕岩下。被缁削发，究无生法忍，须具如此胸襟而后可。

这两节都说得极好，不但是关于佛教有所说明，也可以移到别处的事情上来。平常士大夫辟佛只骂倒世俗和尚而已，于佛教精神全不曾理会得。如阮葵生著《茶馀客话》卷十二云：

昔人谓佛老都是忍心汉。人之所以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者，其心皆有所不忍也，佛老则无所不忍。呜呼，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

此即是一例。声闻缘觉二乘可以说是独善其身的办法，若是大乘菩萨的行愿，单就众生无边誓愿度来说，尧舜其犹病诸，惟有大禹可以够得上吧。盖士大夫都是臣子的身份，故以忠孝为其义务，菩萨乃以君父自居，欲尽其慈仁之责，所以更是难能而可贵了。中国儒生亦称引禹稷，而行禹之道者却只有墨者，孟子又复斥之为禽兽，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卷三曾论之曰：

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安肯如杨子之不[②]拔一毛，世方后公事急身图，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惟乡愿乎，彼[③]其通宦机适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

---

① "君父何人，忠孝何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倒错作"君父何人，忠是可忍，孝何事也，孰不可忍也。"

② "不"原作"下"。

③ "彼"原作"待"。

> 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杨墨真而乡愿伪，试思泣歧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为古今奇绩，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

由是可知，释子学佛，与墨者学禹相同，都不是容易事，非是有血性人不能到。若杨子为我，有如修小乘者，但了得四谛，至多多可获阿罗汉果，终是自了汉，不可同日而语也。《孟子》“离娄下”云：

>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这里说的本很圆通，明明说出有两条路，即平世与乱世不同，其实这不同的还只是两种人，禹稷与颜回有如伯夷与柳下惠，情性能力不是一样，孟子同样看待，虽或与事情不甚相合，这宽大的看法总是可取的。后来的儒生却更是不逊，大约自从韩愈以来一心只想道统，以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口实，便以为天下最高的只有一种人，便是讲学家，这在佛教还够不上小乘，大抵等于唱经的和尚罢。《癸巳存稿》十三《黄石斋年谱当毁论》中引石斋讲书问答，有云：

> 禹稷做一代宗祖，细如路人；仲尼做树下先生，尊于天地。此处看破，才有克复源头。

俞理初甚以为非，谓以禹稷细于路人，不似克复人语。其实克己复

礼与救民饥溺原是两样事，如何比较得来，如必谓讲克复胜于救民，则害理甚矣。

据我们平凡人想，儒家本是讲实际的，并不是不重功利，那么其理想当然是禹稷，孔子栖栖皇皇的奔走，其理由也无非是忧民，所以如是其急，等到设法下手去干，这才来坐在树下找几个学生讲讲，所讲的恐怕还是入世的问题要紧，性命之理也总在罕言之列罢。韩愈辟佛成名之后，后人忽又见禅理而大悦，于是儒家的主要事情变成专讲[1]玄学，案此在西儒称为物理后学，中国儒家着重世事，此正是物理所有事，乃跳过了来讲后半橛，反而专弄玄虚，难怪反为释子所轻，盖彼如不专务拜忏唱戏，其大慈悲种子犹未断绝也。笼统的说一句，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这一篇账如不算结，儒家永无复生之望，所馀留而或将益以繁荣者，也只是儒教式的咒语与符箓而已。

（二十九年三月七日，改写前年所撰小文）

① “讲”原作“愈”。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1940年4月1日刊《中国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光绪辛丑至丙午我在江南水师学堂，这其间大约是癸卯罢，蔡先生回绍兴去办劝学所，有同学前辈封君传命，叫我回乡帮忙，因为不想休学，正在踌躇，这时候蔡先生也已辞职，盖其时劝学所（或者叫作学务公所亦未可知）的所长月薪三十元，在乡间是最肥缺，早已有人设法来抢了去了。以后十二年倏忽过去，民国五年冬天蔡先生由欧洲回国，到故乡来，大家欢迎他，在花巷布业会馆讲演，我也去听，那时我在第五中学教书兼管教育会事，蔡先生来会一次，我往笔飞坊拜访，都不曾会见。不久蔡先生往北京，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六年春天写信见招，我于四月抵京，蔡先生来绍兴会馆见访，这才是初次的见面。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

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民国六年八月我改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仍暂兼了编纂员一年，自此以后至二十六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任职。民六至民八，北京大学文理科都在景山东街，我们上课馀暇常顺便至校长室，与蔡先生谈天，民八以后文科移在汉花园，虽然相距亦只一箭之遥，非是特别有事情就不多去了。还有一层，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谩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都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去云。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也就站开一点，不常去谈闲天，可是我觉得对于蔡先生的了解也还相当的可靠。民六的夏天，北京闹过公民团，接着是督军团，张勋作他们的首领，率领辫子兵入京，我去访蔡先生，这时已是六月末，我问他行止如何，蔡先生答说，只要不复辟，我是不走的。查旧日记，这是六月廿六日事，阅四日而复辟事起。这虽似一件小事，但是我很记得清楚，至今不忘，觉得他这种态度甚可佩服。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尽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

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毋庸细说，若撮举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该之，亦可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

想，倒是真正之儒家也。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国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以上诸事，论者所见不同，本亦无妨，以我所见则悉合于事理，若在现今社会有所扞格，未克尽实行，此乃是别一问题，与是非盖无关者也。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解释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成于民国八九年顷，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诸公肯细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在这以前有《中国伦理学史》一卷，还是民国前用蔡振名义所著，近年商务印书馆又收入"中国文化丛书"中，虽是三十馀年前的小册子，至今却还没有比他更好的书，这最足以表现他的态度，我想正是他最重要的功绩。说到最近则是民国二十三年，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俞理初年谱》中有他的一篇跋文，也值得注意，其时蔡先生盖是六十八岁矣。起头便云：

余自十馀岁时，得俞先生之《癸卯类稿》及《存稿》而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

文中分认识人权与认识时代两项，列举俞氏思想公平通达处，而于主张男女平等尤为注重，此与《伦理学史》所说正是一致，可知非是偶然。我最爱重汉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这三位，尝称为中国

思想界不灭之三灯，曾以语亡友玄同，颇表赞可，蔡先生在其书中盖亦有同意也。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虚妄，李卓吾与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色是有常识，唯理而复有情，其实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般多已枯竭，遂以偶有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为正人君子所齿，李君乃至以笔舌之祸杀身，俞君幸而隐没不彰，至今始为人表而出之，若蔡先生自己因人多知其名者，遂不免有时被骂，世俗声影之谈盖亦是当然，唯不佞对于知不知略有自信，亦自当称心而言，原不期待听者之必以我为是也。

我与蔡先生平常不大通问，故手头别无什么遗迹可以借用，只有民国廿三年春间承其寄示和我茶字韵打油诗三首，其二是和自寿诗，均从略，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别有风趣，今录于下方：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蔡先生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处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报载蔡先生于三月五日以脑溢血卒于九龙，因写此小文以为纪念。（廿九年三月六日）



汉文学的传统

1940年5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3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

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性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想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离娄下”有一节云：

>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末了的譬喻有点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样消极的。再说就是消极，只是觉得不能利人罢了，也不会如后世"酷儒莠书"那么至于损人吧。焦理堂著《易馀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1]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

① "遏"原作"遇"。

案《淮南子》"泰族训"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古人亦已言之，刘君却是说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章太炎先生著《蓟汉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鸮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1]，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

用现在的话来说，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己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此种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

① "悟"原作"梧"。

的基本分子，中国人分得一点，不能就独占了，以为了不得，但总之是差强人意的事，应该知道珍重的罢。我常自称是儒家，为朋友们所笑，实在我是佩服这种思想，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正好比空气与水，我觉得这比较昔人所说布帛菽粟还要近似。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什么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国是不会得绝的，因为孔子生于中国，中国人都与他同系统，容易发生同样的倾向，程度自然有深浅之不同，总之无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辈的忧虑实是杞忧。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说过的师爷化的酷儒与禅和子化的玄儒都起来，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运动，就是助长之一，结果是无益有损，至少苗则槁矣了。对于别国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样，只要是自发的，无论怎么慢慢的，总是在前进，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种流行，实际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复到原来状态，估计最少须得五十年工夫。

说到这里，我觉得上边好些不得要领的话现在可以结束起来了。汉文学里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在民间也未必没有，不过现在只就汉文的直接范围内说而已。这自然是很好的东西，希望他在现代也仍强健，成为文艺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时却并无一毫提倡的意思，因为我深知凡有助长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为人生的文学如被误解了，便会变为流氓的口气或是慈善老太太的态度，二者同样不成东西，可以为鉴。俞

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文题曰《女》，中引《庄子》天道篇数语，读了很觉得喜欢，因查原书具抄于此云：

>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此与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样。文人虽然比不得古圣先王，空言也是无补，但能如此用心，庶几无愧多少年读书作文耳。

还有第二点应当说，这便是文章。但是上边讲了些废话，弄得头重脚轻，这里只好不管，简单地说几句了事。汉文学是用汉字所写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不可不予以注意。中国话虽然说是单音，假如一直从头用了别的字母写了，自然也不成问题，现在既是写了汉字，我想恐怕没法更换，还是要利用下去。《尚书》实在太是古奥了，不知怎的觉得与后世文体很有距离，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再看《诗》与《易》，《左传》与《孟子》，便可见有两路写法，就是现在所谓选学与桐城这两派的先祖，我们各人尽可以有赞成不赞成，总之这都不是偶然的，用时式话说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从前我在论八股文的一篇小文里曾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这里除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建立在汉字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做或不会做诗钟之类，可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势力，这会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改了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

旧变不到哪里去，而且变的一点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起来的，讲到结果则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盖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比从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要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题[①]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不知道敏感的新诗人关于此点有否注意过，可惜一时无从查问。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我又恐怕这种意思近于阿芙蓉，虽然有治病的效力，乱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上边所说思想一层也并不是没有同样的危险。我近来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实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时也容易有危险气味，芥川氏有言，危险思想者，欲将常识施诸实行之思想是也，岂不信哉。　　　　（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① “难题”原作“难问题”。

致周黎庵

1940年5月27日作，曾刊《华发集》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黎庵先生：

久未通讯，得手书极忻幸，承垂念尤感。鄙人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馀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可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鄙人个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仅此，《大阪每日》所载不知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以前津报曾说鄙人将做大学校长，或者亦此类乎？此事真伪自有事实可征，但世上有捕风捉影者及幸灾乐祸者，只可供他们去当材料，受其祸者无可奈何，造谣与报怨各各满足之后，或自消沉耳。草草奉复，不尽。陶君想尚在港，近来刊物久不能见，寄去一二小文亦不知刊出否。顺颂

近安。

作人启，五月廿七日。



炒栗子

1940年6月1日刊《中和月刊》1卷6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日前偶读陆祁孙的《合肥学舍札记》，卷一有《都门旧句》一则云：

> 住在都门得句云，栗香前市火，菊影故园霜。卖炒栗时人家方莳菊，往来花担不绝，自谓写景物如画。后见蔡浣霞銮扬诗，亦有栗香前市火，杉影后门钟之句，未知孰胜。

将北京的炒栗子做进诗里去，倒是颇有趣味的事。我想芗婴居士文昭诗中常咏市井景物，当必有好些材料，可惜《紫幢轩集》没有买到，所有的虽然是有“堂堂堂”藏印的书，可是只得《画屏斋稿》等三种，在《艾集》下卷找到《时果》三章，其二是“栗”云：

> 风戾可充冬，食新先用炒。手剥下夜茶，饤盘妃红枣。北

路虽上番，不如东路好。

居士毕竟是不凡，这首诗写得很有风趣，非寻常咏物诗之比，我很觉得喜欢，虽然自己知道诗是我所不大懂的。说到炒栗，自然第一联想到的是放翁的笔记，但是我又记起清朝还有些人说过，便就近先从赵云松的《陔馀丛考》查起，在卷三十三里找到《京师炒栗》一条，其文云：

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挥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

这里所说似乎有点不大可靠，如炒栗十枚便太少，不像是实有的事。其次在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卷四有《炒栗》一则云：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黏，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凳子上，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借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饤间称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

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

所谓宋人小说，盖即是《老学庵笔记》，十枚亦可知是十裹之误。郝君的是有情趣的人，学者而兼有诗人的意味，故所记特别有意思，如写炒栗之特色，炒时的情状，均简明可喜，晒书堂集中可取处甚多，此其一例耳。糖炒栗子法在中国殆已普遍，李和家想必特别佳妙，赵君以为京师市肆传其遗法恐未必然。绍兴亦有此种炒栗，平常系水果店兼营，与北京之多由干果铺制售者不同。案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八，《立秋》项下说及李和云：

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士庶买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卖者虽多，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

李李村著《汴宋竹枝词》百首，曾咏其事云：

明珠的的价难酬，昨夜南风黄嘴浮，似向胸前解罗被，碧荷叶裹嫩鸡头。

这样看来，那么李和家原来岂不也就是一爿鲜果铺么？

放翁的笔记原文已见前引《晒书堂笔记》中，兹不再抄。三年前的冬天偶食炒栗，记起放翁来，陆续写二绝句，致其怀念，时已近岁除矣，其词云：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
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
怕出偏门过鲁墟。

先祖母孙太君家在偏门外，与快阁比邻，蒋太君家鲁墟，即放翁诗所云轻帆过鲁墟者是也。案《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草部，"荷"下有云：

> 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而游者多以昼，故不尽知。

出偏门至三山，不佞儿时往鲁墟去，正是走这条道，但未曾见过莲花，盖田中只是稻，水中亦唯有大菱茭白，即鸡头子也少有人种植。近来更有二十年以上不曾看见，不知是什么形状矣。

（廿九年三月二十日）



1940年6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4期

什么是现今所必需，自己所最缺乏，所以应当借用的；什么是异同可资比较，短长可供采择的；什么是自己尽可适用，不必多事改作的。这样分头做去，多借用不算什么羞耻，借用得少也不必是光荣，总之是要诚实，要切实，以民族生存为目标，一般市井之见都暂且搁下。单就学外国语来说，这也是必要之一，如学英文，谈话通信，学习理工各科，固是有裨实用，或借以窥知希腊罗马古文化，通达科学文明之本源，即读小品散文，得挹取亚迪生、阑姆一流的精华，加在中国文学潮流中，亦是大好事也。这样说来，我对于买外国书读这一件事，本是极其赞成的，近来之所以不买，自然并不因为忽然厌倦，却有别的几种理由。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说出来平淡无奇，但是极正当，便是因为书价太贵。我们过去买洋书的经验，大抵先令马克值五角，美金值两元，普通六先令的新刊小说只要花三块钱也可买到了。有一个时候北京的中交票不值钱，但最低只有几天，那时一元才抵得十便士而已。可是近时金价大涨，一两至值五百六七十元，在从前的十倍以上，外币的价格随之上升，那么六先令的书恐怕也非三十元不可了吧。这个年头儿，买洋书谈何容易，于是以不买了之，倒似乎是最简便之一法了。

话虽如此，不买也并不是绝对的，不过买得非常之少总是实情，即如去年里一本都没有买，然而在前年却也曾买过几本。其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汤姆普生（D'Arcy W. Thompson）的《希腊鸟名汇》（Glossary of Greek Birds），一九三六年重订本，价十二先令半。此书系一八九五年初版，一直没有重印，而平常讲到古典文学中的鸟兽总是非参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后，又是远隔重洋，想要搜求这本偏僻的书，深怕有点近于妄念吧。姑且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去一调查，居然在四十年后初次出了增订版，这真是想不到的运气，这本书现在站在我的书橱里，虽然与别的书排在一起，实在要

算我洋书中珍本之一了。今年在最近一个月里却又得到了两本好书。第一点是价钱不贵,原价共计美金七元馀,放在北京饭店怕不要一百五十元之谱么,我从丸善买来,连邮费只化了三十元,可谓廉矣。第二,这两部书都是蔼理斯(Havelock Ellis)所做的。蔼理斯在去年以八十高龄去世,听说有自叙传,由波士顿的好顿密弗林书店出版,这回弄到手,即是六百五十页的大册《我的生涯》(My Life),看了很是高兴,却还没有工夫细读。此外一册是他讲法国的论文集,名曰《从卢梭到普鲁斯忒》(From Rousseau to Proust),还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书。往常听说普鲁斯忒难懂,一时不想找评论来读,但是后来觉得缺这一册也不好,终于把他买了来。书中共收论文十七篇,有六篇是涉及卢梭的,此外关于果尔蒙、魏尔伦等四五文人,多据自己直接见闻有所论述,也自别有见地。但是我所最佩服的乃是另外几篇,是谈论人类学家邵可侣,自传作者特帖黎伯爵,《尼可拉先生》的著者勒帖夫(Restif de La Bretonne)诸人的。这末了的一位,所谓"阴沟里的卢梭"。虽然文学史家不大愿意多说他,那《尼可拉先生》总是十八世纪的一部大作,尤为性学者所珍重,我在这里能够见到详细的评论(云即是英译六册本的导言),焉得而不惊喜。这如在《断言》(Affirmations)中的《论加沙诺伐》,《论圣芳济及其他》,都不是在别人的书中所能见到的文章,每翻阅时不禁感谢作者,亦并自庆幸英文之未为白学也。我虽少买洋书,唯如在三年中得到三册满意的书,则亦足以自豪矣。

（廿九年四月十三日）



《药堂语录》序

1940年6月5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语录》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扬子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

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

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老老恒言》

1940年7月1日刊《中和月刊》1卷7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慈山居士曹庭栋所著书，寒斋只有《逸语》十卷，《永宇溪庄识略》六卷，皆乾隆时原刻。《老老恒言》五卷有两种，其一为光绪己卯孙氏刻本，收在《槜李遗书》内，其二题光绪癸卯偶园刊本。案《槜李遗书》本孙稼亭跋云旧本罕存，金眉生得之私为枕秘，既而刻之乡塾，曾以一册见贻，因重校付梓。今偶园本有同治九年金氏序，文中恬字未避讳，板式行款及中缝上下鱼尾等悉与《永宇溪庄识略》相同，当系所云乡塾原版，后为偶园所得，改刻年代，此类事盖数见不鲜者也。《识略》卷六为《识阅历》，即自撰年谱，记文甚简，而事多有趣味。乾隆十一年丙寅下云：

是岁著《逸语》，勿少懈。注及盗泉二字，未考所出，检《水经注》已终卷不得，忽风过几案间，揭开盗泉出处，乃注明之。

与孙渊如的《孔子集语》相比，《逸语》自觉谨严少逊，唯因此亦别有其风趣。注语多通达，如盗泉一节即是好例。《逸语》卷十"州里"第十九引《尸子》云：

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注云：

盗泉，《水经注》曰：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盖盗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来常过之，既不宿其地，亦不饮其水，故记者志之曰，恶其名也。愚谓不宿不饮，必有心恶其名而然，圣人不若是之迂也。盖暮矣可宿而犹可无宿，即不宿，渴矣可饮而犹可无饮，即不饮，行所无事而自出于正，特在记者窥测之，则以为恶其名耳。然学者苟即是说而推焉，亦足为慎微谨小之方也。

曹氏自称慈山居士，《老老恒言》孙跋中云，园有土阜数仞，因家居奉母，命曰慈山，晚岁即以自号，《年谱》乾隆九年甲子下云：

邑中有浚河之役，园艮隅馀隙地，令堆积淤泥，人便之，更拆去北廊五架，尽为堆积地，数日间岿然成山，以恰值母寿，名曰慈山。尝赋诗，有"时维二月九，春和气融漾，慈帏敞寿筵，适对兹山爽，兹山讵云高，我乡却无两"之句。

此说慈山原始，更为详尽。跋又云，乾隆丙辰词科再启，君与兄古谦明经庭枢均以鸿博特征。朱序云，己未丙辰两次鸿博，祖子顾少

宰尔堪、兄古谦明经庭枢皆就征，此盖为跋语所本，其实却未确。检《年谱》，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岁，十一月古谦弟生。丙辰词科与试未用者二百二人，中有曹庭枢，即慈山之弟，名当作廷而非庭。《识略》卷三《识杂文》中有《慈山居士自叙传》，末云："名庭栋……初名廷，后改为庭，以示终老牖下之意云。"《年谱》乾隆元年丙辰条下云，是岁以孝廉方正荐，敦促验看，自问不敢当此，以病辞。查丙辰不就试者二十五人，其中亦无慈山名，可知所谓以鸿博征亦是传文之误。又《年谱》卷首载祖蓼怀公讳鉴伦，康熙己未进士。曹子顾举顺治壬辰进士，在康熙己未二十七年前，为慈山曾祖子闲之弟，见于《西堂杂组》。朱孙二君与慈山同里闬，而所记均不免有谬误，于此盖可见考证之难矣。

《老老恒言》有序跋，自述著作大意，《年谱》中所记亦更为实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十四岁下云：

> 自秋入冬薄病缠绵，终日独坐卧室，著《老老恒言》四卷。

三十八年癸巳下云：

> 元旦口占：爆竹声喧日上初，醒犹恋枕起徐徐，衰年自笑曾何补，四卷新编老老书。

又云：

> 夏初发刻《老老恒言》，补著《粥谱》一卷，共五卷，岁暮刻工始竣。

《年谱》记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慈山年七十八岁，据金序称其寿至九十馀，然则尚有十馀年未记，亦可惜也。

我读《老老恒言》，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所说多通达事理。著者在卷四之末说明道，总之养生之道惟贵自然，不可纤毫着意，知此思过半矣。卷二《燕居》中云：

> 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关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

又同卷《见客》中云：

> 喜谈旧事，爱听新闻，老人之常态，但不可太烦，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即在座，勿用周旋，如张潮诗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气，对客时亦须检束。

此等文字一看似亦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孔子有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不必一定是钱财，官爵威权以及姬侍等都是，即如不安于老死，希求延年长生，也无不是贪得之表示。《恒言》的著者却没有这种欲望，自序称亦只就起居寝食琐屑求之，《素问》所谓适嗜欲于世俗之常，绝非谈神仙讲丹药之异术也。大抵此派养生宗旨止是啬耳，至多说是吝，却总扯不到贪上去，仿佛是杨朱的安乐派，出于道家而与方士相反，若极其自然之致，到得陶公《神释》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

第二的理由，因为这是一部很好的老年的书。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很慨叹中国缺少给中年以及老年人看的好书，所谓好书，并不要关于宗教道德虽然给予安心与信仰而令人益硬化的东西，却是通达人情物理，能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类著作。此事谈何容易，慨叹一时无从取消，但是想起《老老恒言》来，觉得他总可以算得好书之一，如有好事人雕板精印，当作六十寿礼，倒是极合适的。说到小毛病当然亦不是没有，最明显的是在卫生上喜谈阴阳五行，不过他引的本来多是古书，就是现在许多名医岂不也是讲的这一套，智识阶级的病人能有几个不再相信的，那么对于慈山居士也觉得不好怎么责备了。孟子说老吾老，又说幼吾幼，今《老老恒言》有书可读，闻有《幼幼集成》，却无意去看，恐怕只是普通的小儿科罢。老人虽衰病，尚能执笔，故可自做书自看，小孩子则话还说不好，难怪无所表见，若父兄忙于功名，亦无暇管闲事也。

此外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养老乃是孝之精义。从前见书中恭维皇上，或是他自夸，常说以孝治天下，心里总怀疑，这是怎么治法呢？近日翻阅《孟子》，看到这样一节，这才恍然大悟。《离娄上》云：

>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又《梁惠王上》云：

>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同样的话，孟子对了梁惠王齐宣王都说了一遍，意思极是郑重，很可见养老之政治的意义。《说文解字》八云：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又云：

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由是可知，善事父母亦着重在老年，我想中国言孝之可取即在于此。从前我写过《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曾说道：

父母少壮时能够自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年，这不但衣食等事，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

只可惜后世言孝者不注重此点，以致愈说愈远，不但渐违物理，亦并近于非人情矣。《老老恒言》在此点上却大有可取，盖足为儒门事亲之一助，岂止可送寿礼而已哉。（三月）

辩　解

1940年7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5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成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我们回想起从前读过的古文，只有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文章实在写得很好，都因此招到非命的死，乃是笔祸史的资料，却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在西洋古典文学里倒有一两篇名文，最有名的是柏拉图所著的《苏格拉底之辩解》，可是他虽然说的明澈，结果还是失败，以七十之高龄服毒人参（Koneion）了事。由是可知说理充足，下语高妙，后世爱赏是别一回事，其在当时不见得如此。如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以不知为不知，而其他智士悉以不知为知，故神示说他是大智，这话虽是千真万真，但陪审的雅典人士听了哪能不生气，这样便多投几个贝壳到有罪的瓶里去，正是很可能的事吧。

辩解在希腊罗马称为亚坡罗吉亚，大抵是把事情"说开"了之意。中国民间，多叫作冤单，表明受着冤屈。但是"兔在罪下不得

走，益屈折也”的景象，平常人见了不会得同情，或者反觉可笑亦未可知，所以这种声明也多归无用。从前有名人说过，如在报纸上看见有声冤启事，无论这里说得自己如何仁义，对手如何荒谬，都可以不必理他，就只确实的知道这人是败了，已经无可挽救，嚷这一阵之后就会平静下去了。这个观察已是无情，总还是旁观者的立场，至多不过是别转头去；若是在当局者，问案的官对于被告本来是“总之是你的错”的态度，听了呼冤恐怕更要发恼，然则非徒无益而又有害矣。乡下人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殆是难免的事，高呼青天大老爷冤枉，即使侥幸老爷不更加生气，总还是丢下签来喝打，结果是于打一场屁股之外，加添了一段叩头乞恩，成为双料的小丑戏，正是何苦来呢。古来懂得这个意思的人，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倪云林。余澹心编《东山谈苑》卷七有一则云：

>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两年前我尝记之曰：

> 余君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①]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① “所”原作“之事”。

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举例来说，恰好记起《水浒传》来，这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那一段里，说林冲在野猪林被两个公人绑在树上，薛霸拿起水火棍待要结果他的性命，林冲哀求时，董超道：“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金圣叹在闲话句下批曰：

> 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

本来也亏得做书的写出，评书的批出，闲话这一句真是绝世妙文，试想被害的向凶手乞命，在对面看来岂不是最可笑的废话？施耐庵确是格物君子，故设想得到写得出也。林武师并不是俗人，如何做的不很漂亮，此无他，武师于此时尚有世情，遂致未能脱俗。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恋爱何独不然，因为恋爱死生都是大事，同时也便是闲话，所以对于“上下”我们亦无所用其不满。大抵此等处想要说话而又不俗，只有看苏格拉底的样一个办法，原来是为免死的辩解，而实在则唯有不逃死才能辩解得好，类推开去亦殊无异于大辟之唱《龙虎斗》，细思之正复可不必矣。若倪云林之所为，宁可吊打，不肯说闲话多出丑，斯乃青皮流氓“受路足”的派路，其强悍处不易及，但其意思甚有风致，亦颇可供人师法者也。

此外也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大，还不至于打小板子，解说一下似乎可以明白，这种辩解或者是可能的吧。然而，不然。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他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是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

伦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了狼么。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致被损害侮辱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固然其难能可贵比不上云林居士，但是此种心情我们也总可以体谅的。人说误解不能免除，这话或者未免太近于消极，若说辩解不必，我想这不好算是没有道理吧。

（五月二十九日）



宣 传

1940年7月3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我向来有点不喜欢宣传，这本不过是个人的习性，有如对于烟酒的一种好恶，没有什么大道理在内，但是说起来时却亦自有其理由。宣传一语是外来的新名词，自从美国的“文学即宣传”这句口号流入中国文艺市场以后，流行遂益广远，几于已经无人不知了。据说原语系从拉丁文变化出来，原意只是种花木的扦插或接换罢了，后来用作传道讲，普罗巴甘大这字始于一六二二年，就是这样用的，再由宗教而转成政治的意味，大约就不是什么难事。中国从前恐怕译作传教传道之类吧，宣传的新译盖来自日本，从汉文上说似是混合宣讲传道而成，也可以讲得过去，在近时的新名词中不得不说是较好的一部类了。

其实对于传道这名称我倒不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我读汉文《旧约全书》，第一觉得喜欢的是那篇《传道书》，《雅歌》实在还在其次。蔼理斯《感想录》第一卷中曾论及这两篇文章，却推重《传道

书》，说含有更深的智慧，又云：

> 这真是愁思之书，并非厌世的，乃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均衡，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古希伯来人的先世的凶悍已经消灭，部落的一神教的狂热正已圆熟而成为宽广的慈悲，他的对于经济的热心那时尚未发生，在缺少这些希伯来特有的兴味的时代，这世界在哲人看来似乎有点空了，是虚空之住所了。

这样的传道很有意思，我们看了还要佩服，岂有厌弃之理，可是真正可佩服的传道者也只此一人，别的便自然都是别一路，说教集可以汗牛充栋，大抵没有什么可读，我们以理学书作比，可知此不全出于教外的诽谤矣。至于宣讲《圣谕[1]广训》，向来不能出色，听说吴稚晖四十年前曾在苏州玩过这种把戏，想或是例外，但是吴公虽然口若悬河，也只宜于公园茶桌，随意乱谈，若戴上大帽，领了题目，去遵命发挥，难免蹶竭，别人更可不必说了。假若我的设想没有错，宣传由宗教而转入政治，其使用方法[2]也正如名目所示，乃合传教与宣讲圣谕二者而成，鄙人虽爱读《传道书》，也觉得其间如有一条大埂，不容易逾越得过，自然也接受为难了。

我不喜欢宣传的理由大约可以说有两种，一是靠不住，一是说不好。不知怎的我总把宣传与广告拉在一起，觉得性质差不多相同，而商店的广告我是平常不很信任的。商业的目的固然第一是获利，却亦不少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的店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3]，

---

① "谕"原均作"喻"。

② "方法"原作"法方"。

③ "论"原作"议"。

可是很奇怪的是日用必需最为切要的有如米面油盐鱼肉等店大都没有广告，在无报纸时代也还不贴招纸，因为有反正你少不得我这种自信，无须不必要的去嚷嚷，便是现今许多土[①]膏店也是那么悃愊无华地做，一面拿得出货色来，一面又非吃不可，这样的互相依存，生意已有了十分光，语云，事实胜于雄辩，是也。翻过来看，从前招纸贴到官厕所的矮墙上，现在广告登满报纸的，顶多是药店，也并非生药而乃是现成的丸散膏丹，我们也不好一定说医屁股的药比医头的不高尚，总之觉得这些药都很可疑，至少难免有十分之九以上是江湖诀。不管是治什么东西，宣传的方法大抵差不多，积极方面如不说斋戒沐浴，也总是选择吉日，虔诚配合，吃了立见奇效，自无庸说，消极则是近有无耻之徒，鱼目混珠，结果是男盗女娼，破口大骂。这种说法我想殊欠高明，恐难得人家的信用，然而广告与宣传却老是那一副手段，或者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也未可知，或者信用的老实人着实不少，所以不惜工本的做下去，也是可能的事，虽然这在我看去多少有点近于奇迹。至于说不好，即跟上文而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件事，盖事情如有虚假，话也就难说得圆满，我们虽未学过包探术，唯读书见事稍多，亦可一见便晓，犹朝奉之看珠贝，大抵不大会得失眼也。

本来自然界亦自有宣传，即色香是已。动物且不谈，只就植物来说。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何也？桃花有桃花的色，李花有李花的香，莫说万物之灵，便是文盲的蜂蝶也成群而至，此正是直接传达，其效力远胜于报上的求婚广告，却又并不需要分厘的费用。或曰，童二树画梅花，有冻蜂飞集纸上。因为同乡关系，我不想反驳这故事，但是那蜂我想当即飞去了吧，在他立刻觉得这

---

① “土”原作“士”。

是上了当的时候。大约此蜂专凭眼学，所以有此失，殊不知在这些事情上鼻子更为可恃，说部中记瞎子能以鼻辨别人高下休咎，嗅一卷文有酸气，知其为秀才，此术今惜已不传，不然如用以相人与文，必大可凭信，较我们有眼人从文字上去辨香臭，更当事半而功倍矣。

（七月三日）



缘　日

1940年8月1日刊《中国文艺》2卷6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到了夏天，时常想起东京的夜店。己酉庚戌之际，家住本乡的西片町，晚间多往大学前一带散步，那里每天都有夜店，但是在缘日特别热闹，想起来那正是每月初八本乡四丁目的药师如来吧。缘日意云有缘之日，是诸神佛的诞日或成道示现之日，每月在这一天寺院里举行仪式，有许多人来参拜，同时便有各种商人都来摆摊营业，自饮食用具，花草玩物，以至戏法杂耍，无不具备，颇似北京的庙会，不过庙会虽在寺院内，似乎已经全是市集的性质，又只以白天为限，缘日则晚间更为繁盛，又还算是宗教的行事，根本上就有点不同了。若月紫兰著《东京年中行事》卷上有"缘日"一则，前半云：

> 东京市中每日必在什么地方有毗沙门，或药师，或稻荷样等等的祭祀，这便是缘日。晚间只要天气好，就有各色的什么

饮食店，粗点心店，旧家具店，玩物店，以及种种家庭用具店，在那寺院境内及其附近，不知有多少家，接连的排着，开起所谓露店来。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要算是草花店吧，将各样应节的花木拿来摆着，讨着无法无天的价目，等候寿头来上钩。他们所讨的既是无法无天的价目，所以买客也总是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乱七八糟的还价。其中也有说岂有此理的，拒绝不理的，但是假如看去这并不是闹了玩的，卖花的也等到差不多适当的价钱就卖给客人了。

寺门静轩著《江户繁昌记》初编中有《赛日》一篇，也是写缘日情形的，原用汉文，今抄录一部分如下：

古俚曲词云，月之八日茅场町，大师赛诣不动样，是可以证都中好赛为风之古。赛最盛于夏晚，各场门前街贾人争张露肆，卖器物者皆铺蒲席，并烧萨摩蜡烛，贾食物者必安床阁，吊鱼油灯火，陈果与蓏，烧团粉与明鲞，（案此应作鱿鱼。）轧轧为鱼鲊，沸沸煎油糍。或列百物，价皆十九钱，随人择取，或拈阄合印，赌一货卖之于数人。卖茶娘必美艳，鬻水声自清凉。炫西瓜者照红笺灯，沽饧者张大油伞。灯笼儿（案据旁训即酸浆）十头一串，大通豆一囊四钱。以硝子坛盛金鱼，以黑纱囊贮丹萤。近年麦汤之行，茶店大抵供汤，缘麦汤出葛汤，自葛汤出卵汤，并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苏，色色异味。其际橐驼师（案即花匠）罗列盆卉种类，皆陈之于架上，闹花闲草，斗奇竞异，枝为屈蟠者，为气条者，叶有间色者，有间道者。钱蒲细叶者栽之以石，石长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若作托叶衣花，若树芦干挟枝。霸王树（案即仙人掌）拥虞美人草，凤尾蕉杂麒

麟角(原注云,汉名龙牙木)。百两金,万年青,珊瑚翠兰,种种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杂木骈植,萧森成林。林下一面,野花点缀。杜荣招客,如求自鬻,女郎花(原注云,汉名败酱)媚伴老少年。露滴泪断肠花,风飘芳燕尾香。鸡冠草皆拱立,凤仙花自不凡。领幽光牵牛花,妆闹色洛阳花。卷丹偏其,黄芹萋兮。桔梗簇紫色,欲夺他家之红,米囊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钱往往可拾。新罗菊接扶桑花边,见佛头菊于曼陀罗花天竺花间。向此红碧绵绮丛间,夹以虫商。宫商缴如,徵羽绎如,狗蝇黄(案和名草云雀,金铃子类)唱,纺绩娘和,金钟儿声应金琵琶,可恶为聒聒儿所夺。两担笼内,几种虫声,唧唧送韵,绣出武藏野当年荒凉之色,见之于热闹市中之今日,真奇观矣。

《江户繁昌记》共有六编,悉用汉文所写,而别有风趣,间亦有与中国用字造句绝异之处,略改一二,馀仍其旧。初编[①]作于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今已一百十年,若月氏著上卷刊于明治辛亥(一九一一),亦在今三十年前,而二书相隔盖亦已有八十年之久矣。比较起来,似乎八十年的前后还没有什么大变化,本乡药师的花木大抵也是那些东西,只是多了些洋种,如鹤子花等罢了。近三十年的变化或者更大也未可料,虽然这并没有直接见闻,推想当是如此,总之西洋草花该大占了势力了吧。

北京庙会也多花店,只可惜不大有人注意,予以记录。《北平风俗类征》十三卷征引非不繁富,可是略一翻阅,查不到什么写花厂的文章,结果还只有敦礼臣所著的《燕京岁时记》,记《东西庙》一

---

① “编”原作“篇”。

则下云：

> 西庙曰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东庙曰隆福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会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两庙花厂尤为雅观，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

这里虽然语焉不详，但是慰情胜无，可以珍重。这种事情在有些人看来觉得没有意思，或者还是玩物丧志，要为道学家所呵叱。这者我也知道，向来没有人肯下笔记录，岂不就是为此么，但是我仍是相信，这都值得用心，而且还很有用处。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的[1]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的文化大略，结局是徒劳而无功，后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无及，如要卷土重来，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古今文学美术之菁华，总是一时的少数的表现，持与现实对照，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或者反有抵牾亦未可知，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不佞不凑巧乃是少信的人，宗教方面无法入门，此外关于

① 原无“的”字，今增。

民俗却还想知道，虽是炳烛读书，不但是老学而且是困学，也不失为遣生之法，对于缘日的兴趣亦即由此发生，写此小文，目的与文艺不大有关系，恐难得人赐顾，亦正是当然也。

（廿九年六月，夏至节）



蚊虫药

1940年8月1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味集》

丁修甫著《武林市肆吟》百首，其九十一云：纸筒樟屑火微熏，药气烟浓夜辟蚊，胜卧清凉白罗帐，青铜钱止费三文。注云："蚊虫药亦列屋货卖。"案丁君卒于辛亥，所咏盖是清末事，蚊虫药值三文，越中亦有之，其时大约每股才二钱耳。制法以白纸糊细管，长二尺许，以锯木屑微杂硫黄等药灌入，或云有黄鳝骨屑尤佳，再压扁蟠曲作圈，纸捻缚其端即成矣。其烟辟蚊颇有效，唯薰帷帐使黄黑，洗濯不退，又蟠放地上，烧灼砖石木板悉成焦痕，是其缺点也。光宣时匠人用洋铁制盘，上加铁丝网为盖，颇便于用，唯贫家仍只以木板作垫而已。俗传有人失蚊帐，往测字，写一四字，卜者视之曰，得无失蚊帐乎，其形宛在，家中人如有名阿四者可问之。阿四不服，欲往难卜者，亦写一四字而作草书，曰蚊帐被窃，卜者熟视曰，勿妄语，汝哪得蚊帐，此字明明说只是一股蚊虫药过夏耳。看见草书四字

而即联想到蚊虫药痕，此在江浙人极是寻常，若黄河以北恐难赏识此笑话之趣味矣。

上面这段小文[①]写了之后将近一年，偶阅《武林旧事》，见卷六“作坊”项下有“蚊烟”一条，又“小经纪”，注云他处所无者，亦列有蚊烟，此盖南宋时事也。又《夷坚乙志》卷七，“杜三不孝”条中云，洪州民杜三夏日货蚊药以自给，一日大醉殴其母，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药内砒霜硫黄掬服之，俄顷而死。案据此可知在北宋时江西地方亦已遍行蚊烟，其中杂有砒霜硫黄，且亦称为蚊药，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查汪谢城著《湖雅》卷八，“造酿之属”下有“蚊烟”一项，注云：

> 按以浮萍及鳝鳖等骨研末，纸裹为长条，焚之以驱蚊，名曰蚊烟，夏夜露宿无帷帐者莫不用之。每焚一条，可彻夜无蚊，唯气息甚恶，闻之不惯令人头胀，故或呼臭蚊烟。

湖州蚊烟盖亦加入鱼骨，唯以浮萍代木屑，不知从何处得如许材料耳。《政和类证本草》卷八“水萍”下云：“《孙真人食忌》，五月浮萍阴干，烧烟去蚊子。”然则用浮萍盖唐时已然，想未必装入纸条，殆只是干而焚之，本来蚊子怕烟薰，不关是什么样的烟也。吾乡称纸卷者为蚊虫药，此外另有蚊烟，民间最通行的是这一种。大抵在黄昏蚊成市时，以大铜火炉生火，上加蒿艾茅草或枫[②]树子，罨之不使燃烧，但发浓烟，置室中少顷蚊悉逃去。做蚊烟以枫树子为最佳，

---

① 上面这段小文，曾以“蚊虫药”为题，作为单篇刊1939年12月27日《实报》，署名药堂。

② “枫”原作“杉”。

形圆略如杨梅，遍体皆孔，外有刺如栗壳，孔中微有香质，故烟味微香，越中通称曰路路通。《越谚》卷中名物部木类有路路通，注云："杉[1]子，落山检藏，以备烟薰。"女儿或择其形大而端正者，用水浸软，拔去其刺，用各式绒线穿孔缠扎[2]，状如绣球，可作端午之彩饰，但近年已几不复见矣。又一种用烟驱蚊法则缚艾如火把，点火生烟，名曰艾把，或取艾叶搓为绳，粗略如帐竿竹，名曰艾绳，其用法已与蚊虫药相近，唯费较多而不持久，故在民间通行势力乃远不能及也。

谭埽庵著《小虫赋》，第二十一段咏蚊蚋蠛蠓，有句云："畏烽烟而远窜，狎灯火而猝焚。"自注云：

> 性恶烟，旧云以艾薰之则溃，然艾不易得，俗乃以鳗鳝鳖等骨为药，纸裹长三尺，竟夕薰之，贫人无帐，每夕必市一裹，耐其臭犹得安寝也。闾巷间呼帐曰蚊厨，因戏呼蚊药之臭曰蚊厨香。其有帐者，夜或盗入，扇驱不肯出，则以灯草火取之，曰焠蚊子。

又句云："古日中而为市，改抢攘于朝昏。"注云：

> 夕则呼聚于檐外，乃入室，曰夜市，晓则呼聚于室中，乃散匿暗处，曰朝市，殊有准度。俗指日暮则云蚊子做市矣，指晓起则云蚊子尚未出市，以为程。所谓聚蚊成雷者，正其市声也。

---

① "杉"当作"枫"，《越谚》误。

② "扎"原作"札"。

这两章都说得颇好，前者可以与《湖雅》所言相印证，论时间却已早了二百五十年了，后者则可作蚊市的说明，也正是有用的文字。我们小时候在书房里对课，大抵总遇见过蚊雷这一类的题目，至于蚊虫做市尤[1]其是一句口头话，无人不知的。但是到了北京来一看，便觉得情形有点儿不同，除什刹海左近一带以外，大抵没有什么蚊子，平常可以不用蚊帐，点香辟虫也以白蛉为对象，称为白蛉子香，蚊市这类事自然更少人知道，在书上看见就须得注解了。洪北江著《外家纪闻》中有一则云：

> 外家课子弟极严，自五经四子书及制举业外不令旁及。自成童入塾后晓夕有程，寒暑不辍。夏月别置大瓮五六，令读书者足贯其中，以避蚊蚋。

这虽不及囊萤映雪之奇，也是读书的一个好典故，在昔时恐怕还是常有的，也觉得颇有意思。北京则蚊子既不多，即瓮亦少见，盖此非常瓮，乃是小口大腹，俗语所谓甏者是也。

（廿九年八月一日）

---

① "尤"原作"犹"。



关于杨大瓢

1940年9月1日刊《中和月刊》1卷9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我想搜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馀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最初得到江氏文学山房活字本《铁函斋书跋》四卷，系民国初翻印杨氏筠石山房重编本者，只可备检阅而已。继得抄本《大瓢偶笔》八卷，似是道光时所写，卷首有印朱文曰会稽章氏藏书，末有朱笔题记云：

> 光绪乙巳九月重游广陵，适老友凌子与家书籍散出，旧抄本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及此册遂为余有。小阳九日粗读一过，校改十馀字，读毕漫记之。老硕。

此抄本字拙劣多谬误，读之不快，唯未经改编，又系章硕卿旧物，差为可取。未几乃求得杨氏所刻"偶笔"及"书跋"共十册，道光丁未年刊，距今尚不及百年，但似已不易得，总之书贾大有奇货之意矣。

嗣知有《晞发堂文集》四卷，亦系杨慰农所编而未刊之本，在书肆寄售，问之云是东莞伦氏之物，今南行未返，因不能得，稍觉可惜。但诗集却于无意中得了一部，《力耕堂诗稿》三卷，康熙中叶刊本，每卷首有朱文印曰摩西，又一印左旋读之曰黄人过目。盖是黄摩西氏故物，亦正可珍重也。大瓢著作我所有止此，虽慰情胜无，但若欲写文章，则材料岂够用哉。

沈确士《国朝诗别裁集》刊于乾隆二十四年，卷二十录大瓢诗五首，注云：

> 杨宾，字可师，浙江山阴人。考安城为友人累戍宁古塔，可师赴阙讼冤，得旨之柳条边迎亲归，作《柳边记略》，塞外人称杨夫子。书法不染宋元习气，诗体专主沉着，身后散如云烟矣，惟于其门人处得塞外诗一册，故所录皆辛苦愁惨之音。

以后见陶凫村《全浙诗话》卷四十六引《国朝诗录》，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八引沈德潜语，商宝意《越风》卷八记大瓢事，均即根据沈氏语，此外则惟《輶轩录》更引《苏州府志》流寓传耳。叶调生《鸥陂渔话》卷三有"杨大瓢之父遣戍事"一则，据所得大瓢杂文残稿中《祁奕喜李汝兼合传》，乃知所谓为友人累之详情，原传有云：

> 慈溪魏耕为兵部侍郎张煌言结客浙东西，班孙留之寓山，或经年不去，先府君亦时时过寓山与耕语。当是时，浙东名士竞以气节相尚，萧山李甲、归安钱缵曾与班孙，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阴无赖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从煌言所来，有所需，耕许之，既而觉其妄，批其颊，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于是伪为耕书抵缵曾，缵曾又殴之。元章遂之镇浙将军告变，捕缵曾等。

……缵曾遗其妻书，以幼子属府君及甲，书为逻者所得。狱成，耕、缵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孙徙宁古塔。

杂文残稿后为大兴傅氏所得，拟编刻为“杨氏遗书五种”而未果，今又不知尚在天壤间否，但得叶氏引用，不独安城遣戍颠末大明，且全谢山《鲒埼亭集》文中谓李杨以葬魏雪窦事遣戍，其误亦可订正，则亦不无小补矣。又《吹网录》卷四有“柳边纪略”一则，甚致称美，傅节子《华延年室题跋》卷下有“题柳边纪略”二则，“铁函斋书跋”二则，“大瓢杂文残稿”一则，皆可参考。《柳边记略》跋一云原书五卷，卷五为省亲诗，盖即所谓塞外诗一册也，唯傅氏据张石洲旧抄本校雠，谓《换车行》暨《至宁古塔》二首已选入《别裁集》，而字句颇有异同，疑出选者润色，不得据校。又跋二据《苏州府志》流寓传叙其省亲及请归葬事，云《别裁集》称其赴阙讼冤，得旨之柳条边迎亲归，殊为失考。大瓢之诗与行事为世人所知，盖实由于沈确士之绍介，唯传讹亦从此出，传文既少见，“纪略”、“书跋”刊入《昭代丛书》壬集，“偶笔”、“书跋”合刻，都是道光年间事，若叶调生著书则至同治季年始出版也。

《别裁集》谓大瓢诗身后散如云烟，惟于其门人处得“塞外诗”一册，此固是当时实情，“塞外诗”盖即《柳边纪略》末卷之“省亲诗”，后来谈大瓢诗者大抵亦只以此为依据，如《越风》选五首，《两浙𬨎轩录》选三首皆是。《力耕堂诗稿》似均未曾见，杨刊本《大瓢偶笔》卷头有《杨大瓢传》，不著撰人姓名，云所著有《塞外诗》三卷，三卷或指此稿，惟称塞外诗，则内容各别，又可知其不然矣。诗稿前有乙丑唐大陶，丁卯朱谨，丁巳张永铨各序，后有费密跋，看里边的诗大概作于康熙戊午至甲子之初，刊集至早在丁卯，大瓢其时年三十八岁，两年后为己巳，始出关省亲，故作《塞外诗》当在己巳庚

午，此年代可考而知者也。卷一有七律题曰“姜定庵京兆归接宁古塔家谕”，末云：“可怜巢覆徒完卵，空负恩纶筑露台。”注云：“新例认工皆许还乡，寒家力薄，两吁未准。”考其时当是康熙十八年己未。卷二《书怀》一首，庚申年作，诗云：

> 宁古孤城沈阳北，沙黄草白乾坤黑，父母投荒二十年，万里迢迢归未得。近来当事亟筹边[1]诏书屡促输金钱，明许赎罪还乡井，共道白金须二千。眼见松陵吴季子，朝入度支暮归里，又闻燕山吕朝荫，脱却赭衣称柱史。可怜漂泊覆巢儿，空囊赤手将安之，富者掉头不肯顾，贫者叹息空踟蹰。

末二联从略，案由此可知在康熙二十年顷流人本可议赎，惟苦无资不能办，及庚午辛未，如大瓢传所记，邵嗣尧再疏请许赎，已在十年后，其时大瓢或已有资可筹，而邵疏为议者所阻，安城亦旋卒戍所矣。辛酉吴汉槎赎归，诗稿卷二中有诗二首，一题曰“吴汉槎先生自宁古塔归述两大人起居书感”，诗云：

> 吴王宫北日欲斜，车马纷纷人喧哗，争道京师明相国，万里赎还吴汉槎。汉槎先生姓氏熟，老父穷荒如骨肉，今朝有力独能归，匍匐问讯吞声哭。先生拭泪唤我名，执手为我数生平，汝父初居土城外，论心夜夜入三更。有酒呼我醉，　　有茶呼我烹，　　家人妇子日相见，米盐琐琐同经营。杏山吕氏教其子，汝父移家从此始，

[1] “当事”原作“当宁”。

一在城东一在西，白草黄沙二三里。患难知交能几人，
一日不见泪沾巾，自此卜筑土城内，三年比屋情更真。
汝母毵毵头尽白，汝父须髯尚如戟，常吟诗句慰亲朋，
每拆家书动魂魄，昨送江边无一言，相对相看双眼赤。
我闻此语心骨摧，奔走廿年终何益。白日惨惨江水寒，
风烟冥冥云汉碧，侯门谁复脱骖人，屈辱终身我不惜。

此诗述安城状况，深切处可与《至宁古塔》二首相比，在别一方面又是吴汉槎入关之好资料。此后第三首诗亦关于汉槎者，题曰“送吴汉槎先生入都”，诗系七律，不具录。案前诗云吴王宫北，是汉槎曾归吴，大瓢乃往问讯，后又入都，故后诗首联云，故国才看万回里，征帆又带夕阳开。《吹网录》卷四“宁古塔纪略”一则中有云：

旧传汉槎归后即殁，或云在京，或云在途溺水，其说不一。今观《纪略》只云文人薄命，溘焉捐馆，未著何年何地，而张（尚瑗）序则已明言归后疾卒。又大瓢书中记汉槎还病且死，犹思食宁古塔所居篱下蘑菇，则非在途溺水可信。

今又证以大瓢赠诗，可知溺水说确是无稽，大抵或以在京病殁为较近似乎。

大瓢的诗做得如何，因为自己不懂诗故不说，但是一件事觉得有点特别的，便是诗里的黍离麦秀之感。最显明的是卷一的《西湖杂咏六首》，今录其四五于下：

世事成今日，乾坤岂旧时。有山皆白骨，
何处听黄鹂。塔院调新马，游船载健儿。

可怜湖上月，夜夜照燕支。

宝石春风到，燕支少妇来。翠环垂耳戴，

蟒幅称身裁。钗脚镂新竹，靴尖碎落梅。

南屏山色暝，千骑柳营开。

此诗大概作于康熙己未，与张宗子写《西湖梦寻》序之辛亥相距不过八年，西湖的情形与诗人的感触当然亦无甚殊异，如宗子所云，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大瓢云歌舞人何在，莺花地已非，正是一样。唯大瓢不知怎的多拉上燕支，这与宗子不很相同了。《杂咏》里既加刻画，卷二又有“题满妆美人图次友人韵六首”，其二云：

燕支山下贵家儿，十五盈盈未嫁时，拾得春宫深夜看，

销魂未许侍儿知。

又其四云：

玉腕还思当枕眠，攲斜抱膝倩谁怜，猩猩毡上跏趺惯[①]

端坐翻嫌欠自然。

本来的图不知画的怎么样，诗则确是题的不大敬。日前偶看《蓑猗室京俗词》，忽然得到很好的对照。这本是陈师曾所画的《北京风俗图》，共有三十四幅，每幅由姚茫父题词，据跋说是民国乙丑丙寅间所作，石印两册，第一幅即旗下仕女，随一小吧儿狗，茫父题《瑞

① “跏趺”原作“跏趺”。

鹧鸪》一阕云：

> 犹堪背影认前朝，山上焉支色暗销，弄狗何曾知地厌，生儿不复号天骄//连镶半臂红衣狭，一字平头翠髻高，最是歌台争学步，程郎华贵尚郎娇。

又画左题二诗七绝款曰青羊，五绝无款，游戏固大佳，但不可少蕴藉之趣，兹故未录。相隔二百四十年，画家诗人都以此为题材，正是偶然之至的事情，觉得亦值得一提，将来如能搜到更多的资料，想再来一番考索，现在暂且不多说了。（二十九年六月十日）

〔附记〕 今年夏承杨氏后人见示“杨子日记”，系大瓢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

（三十年十月廿八日记）

〔附　录〕

题《杨大瓢日记》

昔日偶然得到杨大瓢《力耕堂诗稿》、《函斋题跋》及《大瓢偶笔》抄本，因写《关于杨大瓢》一文，于民国二十九年发表于杂志上，至三十年夏，乃承杨氏后人以杨子日记一册见示，系大瓢手笔，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即此是也。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知堂。



关于朱舜水

1940年9月1日刊《中国文艺》3卷1号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馀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我虽然想搜集乡贤著作，但是愿大而力薄，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此外如萧山之毛西河王南陔，馀姚之黄太冲邵念鲁，目的是在于买书，不尽由于乡曲之见了。《舜水遗书》也以同样原因买有一部，可是不曾怎么细看，因为第一这是铅字印本，虽说是吾乡马一浮所编校，错字却非常的多，读下去很不愉快，第二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近来偶阅新井白石的《东雅》，见其中常引舜水说，以关于果蓏树竹，禽鸟鳞介各门为多，有些注明出于《朱氏谈绮》，我这才知道他对于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的儒者，于是重复找书来读，十年

耽误虽是可惜，惟炳烛之明，总胜于终身面墙[①]，则亦正复可喜耳。

舜水《朱氏谈绮》四册，早见于名古屋一旧书店目录中，十年前亡友马隅卿君常常谈及，这是什么样的书呢，却终未决心去买来一看。近日寄信去居然买到了，宝永五年刻本，即西历一七〇八年，纸墨如新，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书凡三卷，据舜水门人安积觉序文云，卷中二册本是舜水为水户侯所著之《学宫图说》；卷上系懋斋野传问简牍笺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记其所闻；卷下则今井弘济概举所闻事物名称，分类罗列，汉和并记，间有说明，《东雅》所引大抵出此，文集中有答问三卷，亦被征引数条。安积氏《澹泊斋文集》中有与村篁溪泉竹轩书，以为舜水自有其大学问大文章，此书琐屑殊不足观，以重违水户侯遗教，故为编刊，所撰序文亦是此意，而以委曲出之，如末尾所云：

> 昔鱼朝恩观郝廷玉之布阵，叹其训练有法，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自临淮殁无后校旗事，此安足赏哉。览者有味乎斯言，庶为得矣。

此是正统的看法，亦自有道理，但是离开了政事与理学，要知道一个人的情性，从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反能明了真相，也正是常有的事。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二记朱舜水事十三条，其十一云：

>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

---

① “面墙”原作“墙面”。

又同卷中记陈元赟有一条云：

> 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淡[①]，客惯方言谈每谐”，又“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句。

此二则所记，皆关于言语小事，但读了却有所得，有如小像脸上点的一个黑子，胜过空洞的长篇碑传文集中的疏揭论议正经文字。又《阳九述略》、《安南供役纪事》等，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但是集里的书牍九卷，答问三卷，《谈绮》三种，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是很有意思的资料。《谈绮》卷上关于信函笺疏的式样，神主棺木的制法，都详细图解，卷中说孔庙的构造，大有《营造法式》的派头，令人不得不佩服。安积氏著《朱文恭遗事》中云：

> 藏书甚少，其自崎港带来者不过两簏，而多阙失，好看《陆宣公奏议》、《资治通鉴》。及来武江，方购得京师所镌《通鉴纲目》。至作文字，出入经史，上下古今，娓娓数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

在别一方面，他的常识亦甚丰富，卷下辨别名物，通彻雅俗，多非耳食者所能知。答小宅生顺书之一有云：

> 来问急性子，仆寡陋无所知，于药材草木鸟兽更无所知，然闻急性子乃凤仙花子，不辨是非，触手即肆暴躁，未知是否。

---

① “淡”原作“谈”。

此岂无所知者所能写。至答小宅问中历说沉速诸香，尤为不易，无怪今关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滞安南系在经商，故熟悉香料也。答野节书中云：

> 敝邑青鱼有二种，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蛳青，浑身赤黑色，鳞大味佳，大者长四五尺。其一寻常青鱼，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见其大者，以其食小鱼故不使长久。

案范啸风著《越谚》卷中水族部下云：

> 鲭鱼又名螺蛳青，专食螺蛳，其身浑圆，其色青，其胆大凉。

此螺蛳青正是越中俗语，不意范氏之前已见于舜水文集，很有意思。《谈绮》卷下天时部首列“零糖”，下注和语，盖是冰柱。《越谚》云，“呼若零荡”。此俗名通行于吴越，若见诸著录，恐亦当以此为最早矣。记圣庙建筑那么细致严密，说名物时又多引用俗语，看似抵忤，其实乃出于诚笃切实，二者反可互证也。《遗事》中云：

> 文恭自持严毅，接人和愉，与客谈论，间及俚谚嘲笑之事。不能饮酒，而喜客饮，时或对棋，棋不甚高。

此所写皆有意味，有颊上添毫之妙。《遗事》中记舜水所述“只好州

苏作判通"一诗，又一则云：

> 有媒人极言女子之姣，娶之而丑，夫家大怒，欲殴媒人，其人骂曰，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对𡈼苕帚。𡈼音芝，俗字，犹言敝苕帚也。

案于此可想见舜水之风趣，欲使异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𡈼字音芝训敝，今无可考。《易馀龠录》卷十引顾黄公《白茅堂文集》书徐文长遗事云：

> 文长之椎杀继室也，雪天有童蹋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欋取冰，怒掷妇，误中妇死。县尉入验，恶声色问欋字作何书，文长笑曰，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盖俗书欋作𡈼也。尉怒，报云用𡈼杀，文长遂下狱。

注云，欋音瞿，《释名》云，四齿杷也。案今越中不知有铁器名瞿者，四齿钯农夫掘地多用之，则名曰铁勺，别有一种似锄而尖，更短更坚厚，石工所用，通称山支，或可写作芝音之𡈼字，唯平常人家不备此器，取冰不必需此，灶屋中亦无冰可取也。二百馀年间言语或不无变迁，可惜查不着这𡈼字的现身了，但在朱顾[①]二公遗文中得见此俗语奇字，亦很有意思的事耳。

谈舜水的著作，不可不说到那篇《阳九述略》。这是辛丑六月写给门人安东守约的文章，说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夫之作孽，人民之困苦叛离，自具深识；又谓清兵陷北京，布散流言，倡为

① "顾"原作"黄"。

均田均役之说，百姓多为所惑，亦是异闻，与记虏害诸条皆可备考，文繁今不能多引。上文提及安东守约，这也非说几句不可。舜水居东久，知人甚多，书牍九卷中与东邦人士者居其八卷，可以知之，及门亦不少，唯自谓只安东一人可称知己，其交谊之深密盖虽安积亦不及也。书牍第一卷中有与孙男毓仁书，详记其事，今录于下：

>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仅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则鱼鰯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义，亦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决不能也。

文集铅字本多误，今据《先哲丛谈》卷三所载录入。此书盖作于延宝六年，其时毓仁至长崎，于今二百六十二年，遂觉古人之高谊清风不可复见矣。



《正仓院考古记》序[①]

1940年9月30日作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不佞读大村西崖所著《正仓院志》，始知正仓院及其古物，心向往之，此已是三十年前事矣。嗣于平子铎岭书中得见二三麈尾图，又在别处见开元年款制墨影片，皆是正仓院藏物，令人惊且喜，此固是千馀年前古器物，第其用不仅限于考古，实在可以说是读书常识之一部分，现今学子亦多应知道者也。我辈谈墨上溯南唐，却亦无人见过，今明皇时墨实物尚存，且在沉香亭赋诗之前，岂非奇珍，可开眼界。自读《世说新语》，莫不知有麈尾其物，平常总以为形似拂子，然则王谢家风乃与禅和子无殊耶，正如古德执持现时如意，争能搔背，都非考查旧物，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读书作画亦便处处障碍也。夫正仓院御物在日本为国宝，其重要意义所当别论，在异国之人立场自未免稍异，不佞所最感兴味者，乃在于因诸遗物得以窥见中国过去文化之一斑，而此种种名物在中国又多已无考，日本

① 1944年11月作为《十堂序跋选》之二，刊《文史》第1期，署名十堂。

独尚有保存，千百年后足供后人瞻仰赞叹，其为惠实大矣。若日本特殊文化，研究非易，泰西法勒耳翁辈虽有论列，今未及问津，宁从盖阙。唯古称同种同文，则语本无根，泥古而不通今，论学大忌，如或以与中国有关之资料为唯一证据，以为日本古文化即是如此，斯则陷于大谬，无一是处，有如瞽人扪烛以为是日，不但按灭烛光，抑且将灼其指矣。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有年，特蒙便宜，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写成考古记一卷，将以问世，命写序文。傅先生倾倒其该博之学识与经验，以成是书，记录考证，备极详明，辅以多数图象，有益于吾国学子者极大，更奚俟不佞赘言，唯见著书主旨大段与鄙意相合，私心窃喜，因[1]不辞固陋，略述所见，用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廿九年九月三十日）

---

① "因"原作"固"。



《元元唱和集》

1940年10月1日刊《中国文艺》3卷2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前回在一篇关于朱舜水的文章里，引用《先哲丛谈》，牵连的说到陈元赟。据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今关天彭的《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小畑利三郎的《淮王常清与陈元赟之诸研究》，查出陈氏的生平约略如下：陈元赟，字义都，别号既白山人，又称菊秀轩，浙江杭州人，生于万历十五年，天启元年与沈茂人共随单翔风至日本京都，持福建总兵公文，来议倭寇事，留三月馀，不得要领而回，曾与林罗山唱和，见罗山集中。归国后应会试不第，崇祯十一年再至日本，遂留住不去，其后为尾张藩主毛利义直客，居于名古屋，与诗僧元政相识，作诗唱酬，著有《元元唱和集》，二人诗各一卷。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卒，年八十五岁。元赟多才技，能拳术，知建筑及制陶，均传于日本，又名古屋有茶食曰板元赟，亦其所创制也。他在日本的影响，与朱舜水的不同，大抵不在学术方面，我觉得一块点心的流传，实在要比一卷书还有意味，不过这里也还

只是且谈谈他的诗文耳。

元赟著有《老子通考》四册，只在图书馆看到，我所有的只是一部两册的《元元唱和集》。集内元政、元赟诗各一卷，二人互为序，题宽文二年，次年刊行，即西历一六六三年。我这一部新从名古屋买来，旧敝多虫蛀，末页有墨笔题记二行云：此书上下二册，以清酒一升，从僧贞中易得。贞中不知是何时人，盖亦是风雅和尚，配得读元政诗者，唯清酒时价一升值至十元，亦已大不廉矣。《先哲丛谈》卷二纪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引元政诗。今案原诗悉见《唱和集》中，其一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原题云《谢元赟翁来访》，其二为《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十首之三，全诗凡五韵，今录于下：

> 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相忘如痴骏。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

元赟和诗，其一云公是道安能说法，我非曼倩好诙谐，尚有意趣。其二末四句云：

> 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
> 眉语神自解。

有如角觝，工力便不能相敌。盖元政受五山文学的流派，自有洒脱之趣，元赟则乙榜出身，犹多絷缚，二人虽同是景仰袁中郎者，其造就自不免有异也。《唱和集》中元政《送元赟之尾阳》十诗，有小序云系用袁石公《别陶石篑》韵，文中说明其缘起云：

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等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兹九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至别石篑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

《先哲丛谈》卷二云：

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袁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元政本因元赟知有中郎也。元政书曰：数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绝高，《瓶史》风流，可想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书，今得之读之，实足下之赐也。

元政所著《草山集》前后三十卷，仓卒不得见，《唱和集》中有《和李梁谿戒酒诗》，小序云：

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而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亦可知也。何者，言即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之好文章者，不本道德，徒拾古人之唾馀，以为得巧，可耻之甚也。

此意亦原本公安，而说得颇妙，以道德与性灵合为一，尤有意义，其

时钱受之辈正在力斥袁钟，而深草上人乃能知爱好，大可佩服矣。日本汉文学中一时亦盛行七子派拟古典诗文，山本北山著《作诗志彀》等书，尊中郎而反于鳞，排斥模拟，提倡性灵，开辟一新途径，《志彀》序题天明壬寅，距元政时盖正是甲子一周。元政本名石井吉兵卫，二十六岁出家为日莲宗僧，居深草之瑞光寺，供养父母竭尽孝敬，后两亲同年以八十七岁殁，阅二七日元政亦卒，年四十六。作辞世和歌，意云：深草的元政和尚死了，虽是自家事，也觉得可哀。又遗命不建石塔，但于墓上种竹二三株。元政有《竹叶庵诗》十首为世所称，见《唱和集》中，其一云：

屋前竹叶垂，屋后竹叶隔，屋上竹叶覆，
中有爱竹客。

此盖足以为其墓志铭矣。　　　　（廿九年八月廿四日）



撒 豆

1940年12月1日刊《中和月刊》1卷12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1]小话选本消遣。日本的小话译成中国语当云笑话，笑话当然是消闲的最好材料，实际也不尽然，特别是外国的，因为风俗人情的差异，想要领解往往须用相当的气力。可是笑话的好处就在这里，这点劳力我们岂能可惜。我想笑话的作用固然在于使人笑，但一笑之后还该有什么馀留，那么这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约就是吧。笑话，寓言与俗谚，是同样的好资料，不问本国或外国，其意味原无不同也。

小话集之一是宫崎三昧编的《落语选》，庚戌年出版，于今正是三十年了。卷中引《座笑土产》有《过年》一则云：

近地全是各家撒豆的声音。主人还未回来，便吩咐叫徒

① 此处原衍“的”字，已删。

弟去撒也罢。这徒弟乃是吃吧，抓了豆老是说，鬼鬼鬼。门口的鬼打着呵欠说，喊，是出去呢，还是进来呢？

案，这里所说是立春前夜撒豆打鬼的事情。村濑栲亭著《艺苑日涉》卷七“民间岁节”下云：

立春前一日谓之节分。至夕家家燃灯如除夜，炒黄豆供神佛祖先，向岁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岁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谓之傩豆。老幼男女啖豆如岁数，加以一，谓之年豆。街上有驱疫者，儿女以纸包裹年豆及钱一文与之，则唱祝寿驱邪之词去，谓之疫除。

黄公度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五《礼俗志》二中“岁时”一篇，即转录栲亭原书全文，此处亦同。查《日本杂事诗》各本，未曾说及，盖黄君于此似无甚兴味也。蜀山人《半日闲话》中云：

节分之夜，将白豆炒成黑，以对角方升盛之，再安放簸箕内，唱福里边两声，鬼外边一声，撒豆，如是凡三度。

这里未免说的太仪式化，但他本来是仪式，所以也是无可如何。森鸥外有一篇小说叫做《追傩》，收在小说集《涓滴》中，可以说是我所见的唯一艺术的描写，从前屡次想翻译，终于未曾着手。这篇写得极奇，《追傩》的事至多只占了全文十分之一，其馀全是发的别的议论，与普通小说体裁绝不相似，我却觉得很喜欢。现在只将与题目有关的部分抄译于左：

> 这时候，与我所坐之处正为对角的西北隅的纸屏轻轻的开了，有人走进到屋里来。这是小小的干瘪的老太太，白头发一根根地排着，梳了一个双钱髻。而且她还穿着红的长背心，左手挟着升，一直走到房间中央，也不跪坐，只将右手的指尖略略按一下席子，和我行个礼。我呆呆地只是看着。
>
> "福里边，鬼外边！"
>
> 老婆子撒起豆来了。北边的纸屏拉开，两三个使女跑出来，捡拾撒在席上的豆子。
>
> 老婆子的态度非常有生气，看得很是愉快。我不问而知这是新喜乐的女主人了。

隔了十几行便是结尾，又回过来讲到"追傩"，其文云：

> 追傩在昔时已有，但是撒豆大概是镰仓时代以后的事吧。很有意思的是，罗马也曾有相似的这种风俗。罗马人称鬼魂曰勒木耳，在五月间的半夜里举行赶散他们的祭礼。在这仪式里，有拿黑豆向背后抛去一节。据说我国的撒豆最初也是向背后抛去，到后来才撒向前面的。

鸥外是博识的文人，他所说当可信用，镰仓时代大约是西历十三世纪，那么这撒豆的风俗至少也可以算是有了六百年的历史了吧。

好些年前我译过一册《狂言十番》，其中有一篇也说及撒豆的事，原名《节分》，为通俗起见却改译为《立春》了。这里说有蓬莱岛的鬼于立春前夜来到日本，走进人家去，与女主人调戏，被女人乘隙用豆打了出来，只落得将隐身笠隐身蓑和招宝的小槌都留下在屋里了。有云：

女 噢，正好时候了，撒起豆来吧。

福里边，福里边！

鬼外边，鬼外边！（用豆打鬼）

鬼 这可不行。

女 鬼外边，鬼外边！

案狂言盛行于室町时代，则是十四世纪也。嵩山禅师居中(1277—1345)曾两度入唐求法，为当时五山名僧，著有《少林一曲》一卷，今不传，卜幽轩著《东见记》卷上载其所作诗一首，题曰《节分夜吃炒豆》：

> 粒粒冷灰爆一声，年年今夜发威灵。暗中信手轻抛撒[①]打着诸方鬼眼睛。

江户时代初期儒者林罗山著《庖丁书录》中亦引此诗，解说稍不同，盖传闻异词也：

> 古人诗中，咏除夜之豆云，暗中信手频抛掷，打着诸方鬼眼睛。盖撒大豆以打瞎鬼眼也。

《类聚名物考》卷五引《万物故事要诀》，谓依古记所云，春夜撒豆起于宇多天皇时，正是九世纪之末，又云：

---

① “撒”原作“散”。

炒三石三斗大豆，以打鬼目，则十六只眼睛悉被打瞎，可捉之归。

此虽是毗沙门天王所示教，恐未足为典据，故宁信嵩山诗为撒豆作证，至于福内鬼外的祝语已见于狂言，而年代亦难确说，据若月紫兰著《东京年中行事》卷上云，此语见于《卧云日件录》，案此录为五山僧瑞溪周凤所作，生于十五世纪上半，比嵩山要迟了一百年，但去今亦有五百年之久矣。

傩在中国古已有之，《论语》里的乡人傩是我们最记得的一例，时日不一定，大抵是季节的交关吧。《后汉书》礼仪志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吕氏春秋》季冬纪高氏注云，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据《南部新书》及《东京梦华录》，唐宋大傩都在除夕。日本则在立春前夜，与中国殊异，唯其用意则并无不同。民间甚重节分，俗以立春为岁始，春夜的意义等于除夕，笑话题云《过年》，即是此意，二者均是年岁之交界，不过一依太阳，一依太阴历耳。中国推算八字亦以立春为准，如生于正月而在立春节前，则仍以旧年干支论，此通例也。

避凶趋吉，人情之常，平时忍受无可如何，到得岁时告一段落，想趁这机会用点法术，变换个新场面，这便是那些仪式的缘起。最初或者期待有什么效用，后来也渐渐地淡下去，成为一种行事罢了。谭复堂在日记上记七夕祀天孙事，结论曰，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对于追傩，如应用同样的看法，我想也很适当吧。

（廿九年九月七日）

《四 鸣 蝉》

1940年12月1日刊《中国文艺》3卷4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板者，在江户时代中期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三种。其一是《艳歌选》，十四年春间所写的《茶话》中第六则即是介绍这书的，略云：

> 《艳歌选》初编一卷，乌有子著，日本安永五年（一七七六）刻板，现藏东京上野图书馆中，原书未得见，仅有抄录一部分，收在汤朝竹山人所编《小呗选》内，计二十六首，首列俗歌原本，后加汉译。卷首凭虚氏汉文序有云：
>
> "乌有先生尝游酒肆，每闻妓歌，便援笔诗之，断章别句，纵横变化，翻得而妙矣。"

又例言之二云：

里巷歌谣，率出于流俗儿女之口，而翻之以成诗，自不得浑雅矣，间亦有翻难翻者，殆不免牵强焉，总是杯酒馀兴，聊自玩耳。而或人刊行于世，盖欲使幼学之徒悦而诵之，习熟通晓，乃至于诗道也。固非近时狡儿辈侏离之言，自以为诗为文，锲诸梨枣，但供和俗顾笑，假使华人见之则不知何言之比也，世人幸详焉。

他的译诗可以知道是不很信的，但是有几首却是实在译得不坏，不过他是学绝句和《子夜歌》的，所以其好处也只是汉诗的好处，至于日本俗歌的趣味则几乎不大有了。当时曾转录九首以为例，今引用其一云：

郎意欲迎妾，妾身那得行？行程五百里，风浪转相惊。

其二是《海外奇谈》。此书一名《日本忠臣库》，为《假名手本忠臣藏》之译本，题清鸿濛陈人重译，有序云：

鸿蒙子尝阅市获奇书，题曰《忠臣库》，彼之则稗史之笔迹，而录海外报仇之事，谓好事家译异域之俳优戏书也，惜哉其文鄙俚错误有不可读者，是以追卓老《水浒》之迹，润色订补，以备游宴之谈柄焉耳。

后署乾隆五十九年，即一七九四年，后来尚有翻本，故不难得，寒斋所有即明治时印本也。《假名手本忠臣藏》为竹田出云等所撰，记元禄十五年赤穗四十七义士报仇事，假设盐冶判官冤死，家臣大星由良之助等共杀怨家高师直，为同类义士剧中之代表作，上台演

唱，至今垂二百年不绝。此为净琉璃体，且说且唱，凡十一段，今译本改为十回，又作演义体裁，虽文气不能十分通畅，而模仿颇近似，所用明清小说中语亦有甚妙者，大抵所最难是安放得停当耳。《忠臣藏》本来是音曲，改为说部则但存本事，失去原文的藻饰，犹之莎翁喜剧，一变而为《吟边燕语》，其得失亦自易见也。

其三是《四鸣蝉》。这才是要谈的本题，其实也谈不了许多，只是说说梗概而已。此书一册，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刊，题亭亭亭逸人译，堂堂堂主人训，其时为乾隆三十六年，法梧门正是十九岁，以第二名入学云。堂堂堂有序文，自称白虎居士，印文二，曰姓不唐，曰似园芙蓉。亭亭亭有解说曰《填词引》，则说明日本词曲之种类者也。书中凡收译文四篇，依原目分记于下：

一、雅乐　惜花记

二、同　　扇芝记

三、俗剧　移松记

四、傀儡　曦铠记

首叶栏外横题曰才子刊书，卷中各篇起首栏外题曰才子刊书一百十七，以至一百二十。案序文末云："标才子者，聊取其奇也。刊书不刊，多言无益，鸣蜩何异。数其篇，四焉，题曰《四鸣蝉》也，是之取尔。"说明书名，颇有意思，唯所谓刊书不知究竟如何，岂百二十中止刊此四耶，惜无可考究矣。

这里所谓雅乐即是能乐，其词谓之谣曲，所收两篇皆世阿弥元清所作，时在日本南北朝，西历十四世纪也。《惜花记》原名《熊野》，亦作《汤屋》，译文中对音云瑜耶，乃剧中女主人公之名。熊野本为远江池田宿游女之长，为平宗盛所宠，召至京都，欲归省母病，不蒙许可，强令侍从看花，以观音力，使宗盛读诗感悟，因得东归。当时熊野咏诗，如译本云：何弃锦城如绣春，又惜乡里园花散，《惜

花记》改题即从此出。《扇芝记》原名《赖政》，亦是主人公之名，是分两场，第一场有僧云游至宇治，源赖政之灵化为老翁，引之游览，至平等院，见青草生作扇形，为僧说过去因缘，赖政战败，于此敷扇草上，坐而自刃，至今留草形如扇，以为纪念，日本读芝云西巴，即青草也。第二场则赖政于僧梦中现形，陈说当年战死之情状。能乐多是两场，中间主角进去更衣，由狂言师扮一二人，略作说白，多近于打诨，使舞台不空虚，此脚色称曰"间"，即中间之意。平常书本止列谣词，而此本则并存间之狂言。《熊野》虽只是一场，而在破之前后场中间，亦有一段，此亦颇有意思。引言中云："小收分前后，词曲也，有男优，有女优，动有淫态亵[①]语，大不似申乐严正且雅驯。"此即是说间曲，所云申乐即猿乐，谓谣曲之能乐也。《熊野》之"间"乃是使女夕颜与仆人剑持太郎，《赖政》则是土民朽松，所演与本文多少相关，但其风趣则与狂言殊相似也。

以上两篇所译系全文，馀则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移松记》原名《山崎与次兵卫寿之门松》，为近松巢林子所作净琉璃傀儡剧本之一，后由宫古路半中改为歌舞[②]伎用，称《山崎与次兵卫半中节》，汉译即以此本为依据，故标题曰俗剧。剧中叙与次兵卫恋慕名妓吾妻，中经患难，吾妻与之偕逃，而与次兵卫发狂，各地浪游，后为侠友所助，得以团圆，狂疾亦愈。今本所收为"物狂道行"一段，即叙二人游行事也。《曦铠记》原名《大塔宫曦铠》，竹田出云所作之净琉璃剧本，用于傀儡戏者，本有五卷，今所收为卷三中之"身代音头"一段，为最有名的部分。剧中叙北条氏欲废立，示意斋藤太郎左卫门袭杀王子，永井宣明建言俟王子与群儿歌舞时斩之，而

① "亵"原作"艺"。

② "歌舞"原作"舞歌"。

夫妇密谋以其子鹤千代为替代,及视斋藤所斩乃是别一小儿,宣明讶问,始知此是土岐赖员之子,即斋藤外孙也。“身代音头”即指此,译本谓替身踊场,殊难得恰好。斋藤虽尽忠王室,唯以身为北条氏部属,及兵败亦自杀以殉云。戏曲本事,略述难得要领,详说又易烦杂,今止从略,但亦已觉得辞繁而意仍不能达,苦矣。

统观这四篇的内容,不得不说译本的选择很有道理,也很确当。《熊野》是谣曲中之鬘物(女剧),艳丽中有悲哀的气味,《赖政》则是修罗物(战斗剧),行脚僧遇鬼雄化身,后又现身自述,与佛法结缘得度,为照例的结构,而赖政乃是忠勇儒雅的武将,与一般鬼雄不同,剧中所表示者有志士之遗恨而无修罗的烦恼,正自有其特色。《寿之门松》本为净琉璃之世话物(社会剧),大抵以恋爱为葛藤,以死为归结,此剧之团圆正是极少的例,“道行”一段在剧中是精彩处,即行道中之歌也。《曦铠》则为时代物(历史剧),斋藤忠义之士,而铁石心肠,人情已锻烧殆尽,为刚毅武士之代表,替身一场又是剧中之代表,其简要有力或可抵得过一部《忠臣藏》也。但是选择好了,翻译就更不容易。容我旁观者来说句风凉话,《曦铠记》绝对不能翻,古人已云画虎不成反类狗也,《移松》与《扇芝》次之,《惜花》则较易设法,因情趣较可传达耳。末尾熊野临行所唱数语译文云:“明日回头京山远,北雁背花向越返,俺便指东去,长袖翻东无馀言。”此可为一例。但此中译得最好的,还是两篇谣曲里的“间”这一部分,殆因散文自较易译,且诙谐之词亦易动人耶。尝闻人言,莎士比亚戏曲极佳,而读一二汉文译本,亦不见佳,可知此事大难,自己不来动手,岂可妄下雌黄,何况此又本用外国文所写者乎。不佞此文,原以介绍此书为目的,偶有评泊,止是笔锋带及,非是本意也,读者谅之。　　　　　(廿九年十一月七日)



读书的经验[①]

新光抄（一）

1940年2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

---

① 自本篇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皆1940年所作，陆续刊于《新光》杂志，多谈妇女问题，收入《药堂杂文》集时单独作为“第二分”。《新光》未得见，现据《药堂杂文》，由编者推定写作月份，并援《明珠抄》之例称为《新光抄》。

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地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茀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哪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

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读《列女传》

新光抄（二）

1940年3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有友人来叫我给杂志写文章。近年来文章不大写，因为没有什么话想说，但也不是全不执笔。假如有朋友的关系，为刊物拉稿，那么有时也写一点聊以应酬，至于文章之写得没意思，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既然是友人来说，似乎不好不写，问是哪一种刊物，答说大约是妇女杂志。杂志有特殊的性质，写文章便须得守住范围，选取题材大不容易，这又使我为难起来了，虽然我未始不曾做过些赋得的文章，在学堂里得到汉文老师的好些佳批，写倒也不难，只是这何苦来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后，终于答应了，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发表一点意见。经过很久的思量，仍旧不能决定来说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个《列女传》的古老题目。

这题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像是所谓赋得体，是其一。其次

是，当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曾写过这样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现在假如拉长了五倍，岂不够用了么。话虽如此，实际并不容易做，旧稿中可以抄来的细看只是一小半罢了，而且这题目到底是枯窘，要想舒展也大费力，题是赋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么做，不喜欢说新奇的或是陈腐的两样假话，此其所以为难也。

寒斋所有《列女传》，计有下列几种：一，“四部丛刊”本影明板《古列女传》，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刘向所编撰的原本八卷。二，刘开所纂《广列女传》二十卷。我们平常所说的《列女传》大抵是指的第一种。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后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时候常连正文翻看一过，所以想起来看了也已有好几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说，奥雅可喜。前年秋天题记中有别的看法，大意云：

> 《列女传》自昔日为女教经典，至今读之也无甚可厌处，不独“贤明”“仁智”诸人通晓事理，可为良妻贤母之规矩，即贞顺传中人亦确然有其个性，异于易损之货物。后世书中为人父者诏子女以孝，为人夫者教妻妾以节，无论措语如何工巧，他人见其肺肝，闻之但可发微笑耳。《列女传》尚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质实，且亦态度不同也。

这个意见，在现今重录的时候，还是一样。《列女传》卷四“贞顺传”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贞姜不肯下台，死于水与火，如颂所云，其一守礼一意，其一处约持信，之死不二，此古侠士之风，及于闺闱，与匹妇被迫之寻短见者，区以别矣。我们不必发思古之幽

情，以为上古定是乐土，但前人质朴，即或粗野较多，而卑劣分子故当较少，丈夫与女子虽气风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汉以后人之比也。后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视女人亦自更低，如钱塘夏先生所言，盖已非复奴隶而是货物矣，上者才及金丝雀，下者如犬马而已，太平之时多畜置以为玩饰，及至乱世则唯歼绝之，可以轻身自保，并可易得令名，为家门之光，亦有利于前程者也。鄙人读史志文诗，见记妇女死兵死难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数，侈陈以为光荣，未尝不为作恶终日，邦国多乱，妇人不幸罹害为最，而男子或反因而得[①]利，思之黯然。《广列[②]女传》本以刘子政书为范，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为"烈妇类"，乃有四卷，分量为全书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读之更应知此正是生者之耻耳。《列女传》一类书，此时如能虚心读之，颇有好处，但须当作史料，不可奉为教训，古传中的守礼持信固佳，广传中的急迫死难，亦均可供男女两方的参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谈蒡书"六则，其二曰"愚儒蒡书"，后半云：

>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

---

① 原无"而得"二字，今增。

② "列"原作"烈"。

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案《广列女传》卷七“母仪类下”即载此[1]事，赞以颂曰：

> 辅国有训，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关政教。
> 怒而惩之，进以大道。

对照读之，大可发笑。曰愚与莠，或未免太言重一点罢，但驳斥得不能说是不对。窃意如有此种见识，则去看古今一切书，无不如扬糠筛米，精粗立辨，随处得益，至可歆羡。俞君为嘉道间杰出的学者之一人，《书目答问》附录“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三项下，说明中有云，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此评语本亦不错，但我以为俞君之难及处，还在其见识之平实，如上文可见，其关于妇女问题者尤为独绝。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记阅《癸巳类稿》，有云：

>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

① 原无“此”字，今增。

越缦俗儒，满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语为偏谲本不足异，唯比拟为出于周姥则极有意思，本是排调却转成赏誉矣。以周公制礼，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贯岂能至此，可不谓之大贤乎。有如此平正通达的见识，可以谈妇女问题，无有偏执，亦可以写新列女传，读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笔，至今无能代者，可为嗟叹也。



新《文字蒙求》

新光抄(三)

1940年4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晚清时代的学者里面有好些是我所佩服的人,现在只说某一方面的共有两个,这便是王菉友与张香涛。或者要有人觉得奇怪,此二人有点列举得不伦不类,这批评也颇有理,假如我们认为那是《说文释例》的与《劝学篇》的作者。不过我这里的看法稍有不同,我把他们的《书目答问》《輶轩语》与《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相提并论,其间自然可以有一种连系,共通的特色是肯为后生初学指点说法,我所佩服的便是这一点。两三年前写《看书偶记》曾约略说及,《读輶轩语》中有云:

《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

又《读〈文字蒙求〉》中云：

> 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上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书，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

我常这样想，现代的学者太是小乘的了，平常在研究所埋头用功，苦心著书，本是很好的事，但其目的差不多就是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只要有惊人的新发明，即使转入牛角弯去也无妨碍，这正是声闻乘的行为，至多是得到阿罗汉果，还仍是个自了汉罢了。大乘菩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固然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样态度却是学者所应有的，自己辛苦的得闻半偈，便当想念有些人无缘闻法，要怎样帮助他们才好。学者为青年人设想，宁可耽误了自己的修行，分出点功夫来写入门的书，此正是法施功德，可以与济贫相比，即使只是戋戋小书，而中含大慈悲心则无有殊异。可惜的是这种人太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后边就接不上，我们小时候见到《书目答问》，这是如何的重宝呢，指引我们审择买书，赛过有良师益友，可是眼看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还只是那一部书，近来范希曾始有《补正》，未能算是新作，这与《文字蒙求》之后只有蒯礼卿的《广义》一样，王菉友原书本来也是根据《说文》，但其中改变旧说，自出新意的地方亦所在多有，《广义》于此等处却重引前说，或涉及阴阳五行，悉与本文乖违，未免可笑。如月、巾下原文云：

> 以上二字各有象形，不必谓之从冂也。

《广义》乃一一引《说文》,云"从冂,二其饰也",又云,"从冂,丨象系也"。卷首第一字为日字,原文云:

> 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①]者也。

是完全以象形解释,《广义》则加以玄学的说明云:

> 太阳之精不亏,故从□,一以象形。中央之一,古文乙字之变。阳中有阴,故日中有黑影,如离卦然。

此种说法以谈文字,既未必高明,持予童蒙,更难领受矣。

上文所说张王二君的四种书,现在都很需要,因为是启蒙的或是初学工具书,缺少这些,则学问不易发达,虽有专门家亦只是为学界做装饰而已。不过我们所要的乃是新作,并非单是增订或注疏之类,例如"新书目答问"的内容,应当于《书目答问》之上加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贩书偶记》的分子,使读者一检即得,能知是书之刻本异同优劣,可以不合于大师之家法,总须适于学子之实用。至于"新文字蒙求",也用同样的方针,参加古今中外的材料,不必定想把文字学的精义传授给人,至少能引起青年人对于汉字的一点兴趣,就很好了。王氏自述中云:

> 雪堂谓筠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

① "乌"原作"鸟"。

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

这个意思本来很对，在西欧言语学上也就是语源的解说，不算什么新鲜，从前学英文时从马孙氏文法上见到一点，觉得很有意思，使我对于文法书颇感兴趣。这是在讲名词之阴阳属的变化，注中说及主人(Lord)这字乃是古英文 hlafweard 之省，意云面包管理者，而主妇(Lady)原语为 hlaefdige，意云制面包者。后来我又知道古英文中有 hlafaeta 一语，意云吃面包者，乃是仆人，更有诙谐之趣矣。此外就偶然记忆的说，如甘草(Liquorice)字一见似是拉丁来源，而实出希腊语 glykorhiza，意云甘根。又蒲公英(Dandlion)雏菊(Daisy)，都是常见的草花，其原文一为法文 dent pe lion，意云狮子牙齿，一为古英文 daegeseage，意云日之眼。在拼音文字里就只是这些意义的变迁觉得有趣味，英国都已有威克来与斯密士等人写了好许多书，引人入胜，若汉文又有象形指事的花样，更为有趣，自然更容易写成可读的书。本来《文字蒙求》也编得很好，只是一个个字的罗列，兴趣容易分散，尚不宜于初步的读者，此外则因时代关系，甲骨钟鼎文字的材料未能利用，亦是可惜。现在似乎可以像斯密士著那小册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的样子，分几章来讲，或依六书，或照语类，深入显出，触类旁通，迤逦[①]说来便自有佳趣，不要怕损了学者的“纱帽翼子”，但求得童蒙的一顾，此事便不白做矣。《蒙求》中收止字，此本是足趾，只有小篆，已[②]不甚似，此处即应不客气的照甲骨文写一个脚八桠子，以此为本而讲到步，

① “逦”原作“遁”。

② “已”原作“巴”。

由此而陟而涉，与陟相对的降，辶从彳从止，便牵连到行，及出亦从止，各从倒止，意即是格，而客字也跟了出来，这样的安排，在内行人的手里，运用丰富的资料，大抵可以写成一章通俗而充实的文吧。不过话说到这里，要紧的还是须得人来写，这却又须得不但是专家而且还要肯做这利他[1]的工作的。从前曾经对故友烨斋提过几次，他总是说原则上赞成，因病不能写，现在难道可去电灯柱上贴广告么，也只好这样说说空话，表示一种漠然的希望罢了。或曰，何不自己来动手？庄生说得好，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① “他”原作“地”。



女人轶事

新光抄(四)

1940年5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偶然从估客的书包中得到《磨盾馀谈》一册,木板小本,内分两编,共计六十七页,是普通的书,没有什么特点可取。首页有印朱文曰"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稍上又一印较大,文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由此可以知其前后踪迹,今来燕市,当是兵燹馀生,亦可珍惜,因收存之。书有咸丰甲寅小引,署曰"钱塘张炳",内不分卷而两编各有题目,一曰"记潞河白大司空轶事",二[1]曰"记潞河白母刘太夫人轶事",盖张日熙当时为白小山第七子季生作记室,故为东家撰文颂扬其先德,事本寻常,虽自称笔无诬词,备野获也,是否都无甚关系,不佞亦不顾问也。唯披阅一过,觉得好些地方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关于刘太夫人轶事这一部分,本文除小引及家传外共三十五则,有记其教子如何严正者,此本亦甚佳,而往往动手就打,不免可笑,但或是实录。如云:

---

① "二"原作"仁"。

季生与又迁两君岁底下学，偶失叩辞于师，闻之大怒，力挞不解。

又云：

熙亭观察已生子女，偶一时向人前评论妇女之妍媸，随即掌责之。

所生唯一女，适同州李室，在家时偶于饭桌上挑拣菜蔬，便取箸[1]连挞云，幼小如此，若长大到婆家，岂尚成妇道。

这种家教似乎太偏于严，不过在那时候本来不算怎么奇怪，就只是我们现在看了不能佩服罢了。文中又说刘太夫人生活怎样的刻苦，仿佛也是平常行状中所有事，唯所记幼而遭闵，造成这样性格的本事，却是很足动心，也可以注意。据本编引言中云：

生四岁而父有渭南伯沈园之戚。

家传云：

太夫人生四岁，西斋先生顺亲意，有蒸藜之出。太夫人长，至不能忆母容，幽忧伊郁，自顾无人生乐趣，盖终其身不一日忍涉乐境者，即基诸此。

① “箸”原作“著”。

轶事第一则云：

衣粗食素，孜孜苦行，劬瘁不恤。凡南之新笋，北之蘑[1]菇，谓佳味也，皆屏不食。其心不忍一日涉乐境，有劝之者，辄以奉佛为辞，盖其苦心孤诣，不愿为外人道尔。

此种心境乃大可谅察，读之令人不乐，即其可以感人也。尝读汪龙庄著《双节堂庸训》，卷一中有记显生妣徐太夫人轶事六则，其第二三两则云：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2]如此，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馀恨。

每读辄不禁黯然。案此二人境况不甚相同，徐氏本是妾，早寡食贫抚孤，及其子登进士，则已死不及见矣。刘父为知县，夫由翰林历官至户尚，子孙繁盛，乃以生母被出，只此冤苦一念，致毒其生涯，虽处富贵之中，终无乐趣，其所自处坚苦之道与嫠穷殊无二致。二者原因虽异，皆足以见昔日女人之一种苦境，此固不独孝子顺孙言

① “蘑”原作“磨”。
② “犹”原作“就”。

之有馀恫，即后世旁观外人亦不禁掩卷太息者也。中国妇女问题尚未开始，亦不知何时才有希望，但此等都不失为很好的资料，可供有心者之思考。现今男女教育纵或相当发达，此又是另一回事，与妇女问题固无什么关系也。

轶事所记别有两则很有意思，可以想见刘夫人之非凡处。其一云：

> 性最慈，尝谓无论器皿什物，置不得所，辄被破坏，我见之掉头不顾，此即胸中一杀机也。位置安全，必使妥贴无患，此即胸中一生机也。于禽鸟草木悉不忍戕，即蚊蚋蚤虱之细，亦不辄杀，每出户庭，举步必看蝼蚁。最异者，北方夏苦多蝎，一夜入袖中簌簌作声，从暗中徐以手拈出之，竟不螫。

好生戒杀，本亦常见事，唯所云生机一节乃甚有致，此不单是慈悲，实有智慧混和其中，乃能作此雅言，极为难得。又一云：

> 出言多名论，发前人所未发。尝谓倡伎天下皆以为贱，然彼所以致此者，多鬻自父母耳，为人子者至自鬻以养父母，其境可悲，其心更可悲，吾特以为皆孝女之一端也。故平素于嫡庶间待妾必以礼，谓凡为妾为婢者皆能尽孝于亲而更得其正者，我时对之有愧，敢不爱而敬之乎。每见人之凌侮妾婢者，曰，是皆不能设身处地以思也。

此一节极有意义，但宜分别论之。倡伎是一种孝女的话我以前曾经说过，在论“鬼怒川事件”的小文里，正与福建的宰白鸭是孝子一样，自己觉得这颇说的深刻确切，不意百馀年前的老太太也已

有相像的话，不得不深表佩服。不过我的说法是梵志的翻着袜式的，而刘夫人乃老实的做正面文章[①]下去，云对之有愧。似不足为训，虽或由感于自己之不能尽孝于出母，故发为偏激之词，亦未可知。至于世间凌侮妾婢，此俞理初所谓虐无告者，凡有常识者当无不以为非，别无需什么理论，与上文所言亦可不相涉也。

① "章"原作"童"。



女学一席话

新光抄（五）

1940年6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溽暑避客，有老友携啤酒见过，不得不接见。酒味苦如药，甫罄一杯，客即发问，曰对于女子教育意见云何。闻之酒悉化汗，自额上出，而客意甚诚，盖有千金在中学毕业，来询求学方向，不能不作答。敛神养气久久乃对曰，如世间所云，贤妻良母，当是平稳的主张，但是鄙人不能赞一辞。为什么呢？这有两种理由。其一如何是贤妻良母，我不能知道。论一件事情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标准，因时地而异，周公周婆的问题还在其外。德国学者希耳息菲耳特博士著游记曰《男与女》，分远东南洋印度近东四部，记所见闻性的风俗，因为出于专家之手，足资参考。他在印度大忌林地方遇见西藏女人的纪事很有意思，原文云：

> 西藏女人在性学者看来有特别的兴趣。身体魁伟，骨骼坚实，挂满了各种珍饰，嘴里咬着短烟管，她从西藏高原大踏

> 步走向市场去，后面跟着她的三个以至五个丈夫，大抵是兄弟，背了货物在她后边跑，像奴隶一样。

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是中国，那里是行着合法的多妻制，游记有一节云：

>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子，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馀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

以上所说固然是两民族的事，尽足证明标准之怎样的可以不一致。照前者来说，贤妻的标本当是武后山阴公主，这自然是不可为法，但如后者则关雎[①]螽斯不妒之德乃是最高的女性道德，虽然是古来的传说如此，不过我想现在也未便即以此为教育之标准吧。再说，将来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应当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现今却是没法谈，所以归根是不能知道。其二，如何是贤夫良父，这又是不明白的事。许多事情都是对应[②]的，要想叫女人作贤妻良母，对于男子方面也不得不问一声，怎样是贤夫良父，以便对照设计。可是这个不但我不知道，恐怕别人也都不能比我知道得多。中国绅士大抵不喜欢说自己不好，现在就不必来多说致犯众怒，只须简单

① “雎”原作“瞧”。
② “应”原作“待”。

的说一句，照现在多数男子的生活，要说谁是够得上模范的好的丈夫与父亲，大约谁都有点不好意思承认吧。总结一句话，贤妻良母，虽是四平八稳的主义，讲得圆到一点可以新旧咸宜，可是我觉得有这些难处，所以无法着手，只好敬谢不敏了。

那么从职业问题上来谈女子教育么，这也不好办。现在男子的职业还成问题，大学毕业的出路只有做官、办报、教书这几种，生产事业方面几乎没有，更不必说战后的民不聊生，农工失业，不知政治家将何以善其后，此刻来为妇女计划职业，我们外行实在觉得无从下手。或者就去在做官办报教书的三途中分得位置，也可以说是一种办法，但是现今中国的家庭与市场都还是旧式组织的，主妇如出外就薄给的职业，同时家中即须添雇用人，结果在利益上还是差不多，这即使不是如古人所说的易子而食，也总近于易子而教吧。老实说，现在女子求教育，不可从职业着想，如作为装饰看，倒还不错。列位不要以为这里含有什么讽刺，实在是如字说的老实话，至于因为老实而稍似唐突，或亦难免。所谓装饰，不必将学位证书装框高悬，或如世间所说，大学文凭可作嫁妆的一部分，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在个人是值得用了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国民中间有教养的人多，岂不也是国家的名誉？所以这种装饰正是未可非薄的，就只怕的民穷财尽，将不可多得耳。现在话休烦絮，女人如要求学问，我觉得第一须与家庭社会的问题分离，这些问题即使有改革之必要，一时无从说起。石川啄木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说道：

>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变，可以如意的改变的，不过是这

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

女子的高等教育，如说的迂阔一点，当以为学问而学问为理想，这与家庭社会的现状虽似无关系，但如上文已曾说及，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前途却不是无补的。其缺点是只能为少数说法，必须其父母能供给求学，出阁后要家门清吉，于家务之馀，可以读书用功替代打牌看戏，这才合格，事实上当然不能太多，但或者也还不至[1]于很少乎。其实这种资格在男子想还不甚难得，今专对女子而言者，盖以男子志在四方，多有出仕的野心，学问流为敲门之砖，比比皆是，反不如女子无此特权，多有纯粹为学的可能，鄙人上条陈于女子而不往烦绅士诸君之清听者，实为此故耳。

引言拉得颇长，讲到本文，只有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女子做学问，我想最好是文化史一类的工作，这不但现在中国最缺乏，实在也于女子相宜。本来男女求学机会应当平等，女子如喜欢去弄理工方面，别无不可，不过那些东西男子着手的很多，还不如这边学问也极重要而较为冷寂，女子求学可以不谋功利，正适于担负这个责任。中国史学不可说不发达，从我们外行人看来，总觉得向来偏于政治史，其次是军事，经济已绝无仅有，至于人民生活便几乎找不到纪录，后来也不大有人注意。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我现在便是想劝女士们来做这方面的学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

① “至”原作“致”。

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由此可知学问无孤立亦无无用者也。尝见英国有哈理孙女士，研究古希腊宗教神话，茂来女士著《西欧之巫术》等，皆有新意见有重要地位，传说中“亚耳戈号[1]的航海者”，“灰娘”等专题研究，亦由[2]诸女士担任，著有专书行于世。美国儿童学书，自体质知能的生长之测量，以至教养方策，儿歌童话之研究，发刊至多，任之者亦多是女士，儿童学祖师斯丹来诃尔生于美国，其学特盛，又教育发达，幼稚园女师众多，故具此现象，中国自不能相比，唯其意实可师也。相传谓自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预备工夫大抵最要是常识，国文外国语也极重要，研究以本国事物为对象，故资料大半须求之于古文献。若比较研究之方法则不得不借助于异邦先辈的著作，外国文需要两种以上才行，否则不单是怕不够用，亦虑眼界未能广也。覼缕至此，仍未着边际，自己觉得有点近于醉话，其实是未必然，大约只是说的不好之故，若然则此一席之话殆可以就此结束矣。

---

① “亚耳戈号”原作“亚尔戈处”。

② “由”原作“有”。



观世音与周姥

新光抄（六）

1940年7月30日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近日翻阅《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五”具说观世音弘愿神力，古今传诵，如偈中有云：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文情俱佳，甚觉喜欢。但是长行中云：

应以长者居士长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读了却更有所感触。本来如经所说，观世音是无刹不现身的，所以这在神通与方便上说，都别无问题，我所有感的乃是为妇女说法而特别现妇女身。这因为是印度男女有别的缘故么？如说是的，问

题便可简单了结，岂不甚好？然而实在不是。佛在世时为善男子善女人说法，初无差别，因阿难之请而听大爱道出家为尼僧之始，其后有愿为比丘尼优婆夷声闻弟子者，佛均许可，可以为证。观世音特别这样做，那么为的是什么呢？粗说其理由，因为菩萨的慈悲，誓度无边众生，利用种种机缘，至示现八部人非人身，则妇女者本只其方便之一耳。本来变了龙与龙说话，变了金翅鸟与金翅鸟说话，情意容易相通，并无足奇，变了女人与女人说话，事同一律，也就可以照样的看过去。可是，女人也是人，她们说的话同男子一样，为她们说法何必现妇女身？这句话问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想，极是不容易的事，何况分属异性，虽是同历人世苦甘，毕竟感受有殊，经文于妇女中又分举四种身，随宜说法，则又以境遇而生区别，理想的说话我想应当是这样办法才好。此刻现在来谈《法华经》中的文句，这种迂阔的人大约也不大会有，我因经文而感到的，实在还是在别的方面，妇女问题实是重大，有许多还得妇女自身来提出，求得解决之路，这我相信是在时间上已经很旧，但在意义上也还颇新的一句话。

上边所引的经文，虽然源出印度，可以算是旧的一例吧。沈濂著《怀小编》卷五“海沂子”一则云：

> 明王文禄海沂，其《敦原篇》谓古人父重母轻，以制礼者乃男子，故为己谋，不免于偏私。案此论与《关雎》为周公作，非周姥作，何异。唐武后改古礼父在母服期年为三年，可以此意揣测古圣乎。

李慈铭著《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有一条云：

阅黟县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类稿》，皆经史之学，间及近事记载，皆足资掌故。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以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

这两个人意见很有点相同，都说到周姥。案《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一引《妒记》曰：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令节，遂颇欲立伎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①]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撰[②]，应无此语也。

谢公生于东晋之季，距今有千五百馀年，然则周姥的典故亦已可谓旧矣。后人说及，多意含非笑，如沈李二君可为代表，此固是当然，盖男子相为，自亦俗情之常耳。唯说者太偏信古圣以为必不至于偏私，也未免是惑，如武后改丧制，出于反动的有意的，故显而

① “谏”原作“练”。

② “撰”原作“传”。

易见，周公倘撰诗，非意识的为己谋，正是难免的事，吾辈亦可不必为讳也。讲到这里，我深感觉妇女问题之不易谈，周姥与周公都有困难，理想的办法只有是神，如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的菩萨，能超越性的界限而现妇女身者，其次如[1]先知帖勒西亚斯，前世曾为女身，有国王与后争论男女间的问题曾取决于他，这样的人说话总是不会再错的了。可惜而今剩馀的只有故事，虽然我很喜欢"普门品"的文章和意思，事实上还是没法办，所以这一路只得暂且搁下了。

现在话又说了回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妇女问题仍须善女人善男子自己来解决，这里第一重要适合的，承上文说来自然是妇女自身。正面的理由似无须多说，自己来讨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岂不是一百分的合理，故人云明于观火，其是之谓欤。我们觉得应说几句的乃是这反面的事，即是妇女可以这样做么？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白居易《妇人苦》诗云，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这种情形，女人自己当然知道的最清楚，然而有些事情也更比别人难说，我们只看至此刻为止，至少关于道德上两性平等的问题，未见有何正大深刻的要求与论争，可以知之。盖此颇与革命的言论相似，往往不但无效，且易得祸患也。中国妇女尽有这见识学问，而社会上还少接受她们的直言之馀裕，则奈何。所以向来关于妇女问题要说几句逆耳之言的，也还只有男子，虽然如李卓吾因此而被迫害，可以算是例外，大概都可安全的说过去，不过大众报以白眼或冷笑，指点说出于周姥云云而已。男子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但如得到评语说好为妇人出脱，或以周姥比拟，那么这便是确证，原论

[1] "如"原作"而"。

即使不深厚，也总有可取，盖男子立言而能近于周姥，是即能理解女子的立场，凡夫无此神通，为特现妇女身，亦差有所谓做起讲之意，王文禄俞正燮诸君之可尊重正以此故也。近二三十年中国思想稍有变动，将来讨论此等问题当有进步，女子自宜代表其同性，男子参加者亦会增多，周姥撰诗一语将由[①]讥评而转为赞语，世事便大有希望，时间纵或稍远亦无妨耳。由观世音说到周姥，跑了一趟野马，稿纸已完，议论未有结束，想来亦是难怪，此问题极大，我们写百十纸，固难能动其分毫也。　　（廿九年七月廿六日）

① “由”原作“有”。



蔡文姬《悲愤诗》

新光抄(七)

1940年8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近来想买一点清朝人笔记来看,收得焦南浦的《此木轩杂著》八卷,光绪初年席氏刊本,其中已有烂板,而文实可读,可谓同类书中之白眉。书中偶有眉批,又一印文曰王小松,第二册卷首有题词五行云:

> 拥书三十年,多半手未触。翻从病榻上,
> 泛观或细读。有味不能多,什九语陈腐。
> 艰深与敖牙,亦不爽心目。此编无鸿文,
> 杂论遂所取。识解颇超卓,笔墨颇简古。
> 晚书不值钱,幸未付书贾。
> 庚午九月黄冠村人王小松。

案庚午为民国十九年,王小松不知为何许人,但据批语可推知

是生于北方耳。题诗似偈，虽去入通押，读之未免拗口，但颇有风致，意思亦佳，评隲的尚[1]有见识。焦氏立论多极严正，唯因有识见有理解，故判断得中，宽严合理，真读书人不当如是耶。卷二有"范史列女传"一条云：

> 范晔作《列女传》凡十七人，而蔡琰文姬在焉，论者非之，谓琰失节于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录之，非所以厉妇节。余谓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离困辱，备历人世艰厄之境，其事诚伟，其情诚可悲也。范固云，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丧乱，出死入生，万端千状如琰，秉史笔者固不得而没之也。且但备纪其本末，则所以劝诫之意亦寓其中矣，岂必刊削无遗馀，甚者痛訾极詈，然后为良史哉。后之妇人有志节者，决不以文姬得列于传而相慕效，然则晔[2]之为此，其于名教盖可以无罪也。

后半为范蔚宗辩解，语甚平凡，前半所说则极有意义，人世苦痛是可悲故而伟大的事，史家首应注意，若执笔点定个人言行之好坏，则是歪曲恶化的末流耳。杭堇浦著《订讹类编》卷二"蔡琰入胡在邕未诛前"一则云：

> 《蔡宽夫诗话》云，《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词，（案东坡有是说，）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立，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

---

① "尚"原作"当"。
② "晔"原作"哗"。

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1]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无疑也。

此条考证文姬入胡在蔡伯喈未狱死之前，乃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这里有关系的只是说明虏掠的是山东的义兵，其人则是胡羌，盖由山东出河南，大掠而西，入于匈奴，这时候如是初平元年，则文姬归汉当在建安七年顷矣。《悲愤诗》第一章记乱中惨状，最有价值，上文所引太略，今从“欲共讨不祥”下，据《后汉书》抄录于后：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
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
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
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2]要当以亭刃，
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

① “猎野”原作“纵猎”。

② “毙降虏”原作“毙降虏”。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
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
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末述十二年后归乡的情形云：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
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景，怛咤縻肝肺。登高远眺望，
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

董卓之乱至今已历千七百五十年，但读此诗似无甚远隔之感，仿佛才如百年前事而已。太平天国之役去今不过八十年，其时情形恐未必有异，记录留存，今尚不少，亲历惨痛，而记述最详者，或当推李小池的《思痛记》，其所言悬男头载妇女之状，何其与《悲愤诗》相似，所不同者唯易韵言为散文耳。我们读此等诗文，固然第一为作者个人悲哀，但此是民族的悲剧，受其害者不知凡几，有一二人独能发为音词留在纸上，则虽是个人的说话，实乃代表无数人的苦痛，对于此第二点又不能不表示尊敬，此盖近于献给为公众幸福而横死者之一种尊敬矣。自汉末以至清末，此等事不知反复若干次，思之惘然，留下一点纪录，读之徒增叹诧，亦复何益。唯有能惧思者，即是关心国家民族的事的，觉得不能放过，此正如摸背上痛疮，因知苦楚，乃可望治疗耳。焦君云，秉史笔者固不得而没之也，可谓知言，再一转即入流矣。文姬诗云，“旁人相宽大”。人类同情，聊寄于此一语，焦南浦盖有之，此则非一般论者所能了知者已。



道德漫谈

新光抄（八）

1940年9月4日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从杭州搜得《帷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

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馀皆借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人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

又云：

>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馀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

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

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

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帏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1]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2]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复的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

① “彘”原作“子”。
② “戴”原作“载”。

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①]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无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

① "饿"原作"饥"。

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　　　　　　　（廿九年九月四日）



启蒙思想

新光抄(九)

1940年10月31日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偶阅梁僧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十一菩萨部十之二,现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第四,引《布施度无极经》,叙菩萨誓愿云:

>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①],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

此誓词诚佳,不独十方诸佛,皆赞善哉,即吾辈凡夫,亦闻之欢喜佩服,是固即是禹稷之用心,亦为孔孟之所努力宣扬者也。大乘菩萨舍身利众之行为,岂易企及,平常读书人当如此存心,事实上执笔写文章所能做的,也只是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这个愿心,一字一行虽是细微,亦费心血,所冀有半麻半麦之益,功不唐捐耳。古人作

① "浆"原作"桨"。

文希望有功于人心世道，其实亦本是此意，问题乃在于所依据的标准，往往把这个弄颠倒了，药剂吃错，病反增进，认冥为明，妄加指示，则导人入于暗路，致诸祸害，正是极常见事也。据我想这问题也还简单，大小只须讲一个理，关于思想的但凭情理，但于人无损有益，非专为一等级设想者，皆善也。关于事物者但凭事理，凡与已知的事实不相违背，或可以常识推知其然者，皆可谓真，由是进行，庶几近光而远冥矣。惟习俗相沿，方向未能悉正，后世虽有识者，欲为变易，其事甚难，其人遂亦不易得，二千年中曾找得三人，即后汉之王仲任，明之[1]李卓吾，清之俞理初，而世人不知重，或且迫害抹杀之，间尝写小文表扬，恐信受者极少，惟亡友烨斋表示同意而已。今且另举三数人，所谈不关伦理之钜或男女之微，此刻现在似在可言之列。其一是孙仲容，在他的文集《籀庼[2]述林》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今节录其一部分如下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惟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逸[3]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又中土古有蜮，《诗》《春秋》皆详言之，《说文》虫部及《左传》孔疏引《洪范》五行传说其形，并云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今水虫绝不闻有以

---

① “之”原作“知”。

② 原无“庼”字，今增。

③ 原无“逸”字，今增。

气害人者，而印度有电鱼形如木勺，能发电伤人物，窃疑古蜮即电鱼，射人之气即电耳，而谓为含沙射影，则不经之论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说者不审，遂谓似鳖三足，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

末又谓四灵中麟凤龙三者后世几绝迹，今澳洲有雾鸟，其羽毛华美，或即凤类，龙则化石中有之，与鼍略相近，麟似即麋鹿之别种，天壤间亦容有其物，结论乃云：

而中土所传云龙凤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1]不必曲徇古人耳。

孙君为经学大师，如今尚存行年九十三矣，而对于生物有如此通达的知识，现今许多少壮人尚当见之生愧，诚可谓难得。其二是刘青园，在所著《常谈》中有好些好意思，都是关于鬼者，今录其卷一的一则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2]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3]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故宜如此。

---

① “固”原作“因”。

② “唯余”原作“余唯”。

③ “无”原作“然”。

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

其三是李登斋，也是关于鬼的意见，见所著《常谈丛录》卷六中，题曰《性不见鬼》，其文云：

予生平未尝见鬼形，亦未尝闻鬼声，殆气禀不近于阴耶。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甥家祠堂内，两室相对，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呜呜不已，声长而亮，甚可畏。予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某曰，略不似人声，乌有寒夜深更，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必鬼也。予终不信，越数日予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殁，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耶？然予与同堂隔室宿，殊不闻也。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李玉鱼庶子传熊故居也，相传其中多鬼，予尝馆寓于此，绝无所闻见。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声在壁后，呀呷不已，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听之果有声，拥被起坐，静察之非虫非鸟，确是鬼鸣。然予亦与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闻，询诸生徒六七人，悉无闻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或如人行步声，器物门壁震响声，无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然予居此两载，迄无闻见，且连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乃复归室，其时旁无一人，亦竟毫无影响。诸小说家所

称鬼物虽同时同地而闻见各异者甚多，岂不有所以异者耶。若予之强顽，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的然也。

不佞是相信神灭论的，至少也是以不知为不知的，故对于刘李二君的见识与态度甚为佩服，即使还不够说为冥作光，那种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截表示，可以说是求真的态度，最值得我们的取法。本来鬼也是可以谈得的东西，只是有条件，这便是要为说鬼而说鬼。《癸辛杂志》说东坡的事云：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

这样的谈鬼才有意思，若是自己信鬼，瞪目结舌，说与众人听，则村中翁媪都会，只值得有笃志学徒珥笔抄录，不必自灾纸墨也。若或假借鬼物以示劝戒，以便私图，标号曰神道设教，是则实与巫工无异，妄说祸福，罚取灯油钱入己，如依章实斋笔法，当云并干三尺严条者也。所以说到底时，最善谈鬼的须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关于鬼的信仰与记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罢了。讲到这里，我便要再举出一个人来，即其四是俞曲园是也。俞先生行年六十，正是前一个庚辰年，起手著作其唯一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这如缪艺风在行状上所说，可以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五种》，孙彦清的《寄龛四志》相并，是清代小说中的佳作。但是《右台仙馆》另有一种特色，为别家所无者，便是说鬼而未必信鬼，卷首小诗二首之一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可以见之。笔记卷十二中有一则，记见鬼事数项，末云：

余神识早衰，近益昏眊，虽视人之须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见鬼矣。

寥寥数语，殊有排调之趣，先辈风致真不易及，我们拍桌打凳而讲无鬼，相形之下，良自惭已。

上文拉扯得很广，终于未能得要领，现在来总结一下，以便住笔。这里所说都是前代先贤的话，实在的意思却是在于现今，欲向少壮诸君进一言耳。老辈既多明达者，后来者当更精进，希望有人发挥而光大之，即以中学所得来的科学知识，少[1]加整理，便足为常识之基本，持以判别旧来的传承，使有条理，当非难事也。志怪说鬼，亦非不可，要知此事甚非易，且留俟有能力者为之，有如诗文小说，非人人皆可染指者也。不过我今所云乃是常理，在乱离之世，感情思想一时凌乱莫可收拾，启蒙运动无从实现，今亦如渔洋山人言，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　　　　（廿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① “少”原作“必”。

流寇与女祸

新光抄(十)

1940年11月作,曾刊《新光》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茶香室丛[1]抄》卷三有"明季流寇起衅于妇人"一则云:

> 《秋灯录》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驿递一裁,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宗邦,覆灭宗社,而实酿于一妇人,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慎哉。案《秋灯录》不知何人所撰,列入吴江沈氏《昭代丛书》,署云钓雪滩主人沈元钦钞。

王季重在《谑庵文饭小品》卷一中有"简周玉绳"三柬,其二均说及裁驿递事,其文云:

---

[1] "丛"原作"业"。

不佞得南缮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纤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

又云：

刘掌科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其言罢驿递犹可。若毛御史在京置妾，因其妻忽到，以公祖轻与勘合，而怒室色朝，突发此议，则因戏起乱矣。驿递乃穷人大养济院，穷人无归，乱矣。再语之相公。

当时谑庵在北京，其所说当可信。《海虞说苑》乙编中收有赵某著之《□[1]亭杂记》一卷，其中有一则云：

丙子春有岁贡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阙上书，上命取览，以所言无当而罢之。然其言亦有所见，如云，裁减驿递，而杠轿等夫去而为贼，则复驿递为平贼急着。一时或笑其迂，不知此实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安所得食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间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谬。

所记有康熙初年事，著者盖是明末清初人，记中自言癸未冬人

---

① 此字原缺，暂难查补。

都，见搢绅皆易小袖，则崇祯末亦在北京，其所见闻亦当有据。罢驿递一事，其结果可以想见一定是为丛驱雀，流寇因此加多了，却并不是流寇兴起的原因，所以复驿递也不能有益于平贼，既作贼的未必再肯回来做杠轿夫，但至少亦总可消极的减少一点乱源耳。此是三百年前事，仿佛是已经过去很远了，但是我们现在再拿起来看看，觉得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数年前读《老学庵笔记》，写过一篇小文，篇末抄引放翁的一节原文云：

>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1]，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2]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

我在这后边又加上几句蛇足的评语云：

> 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在是件奇事。

---

① "麨"原作"麪"。

② "家"原作"象"。

罢驿递也是明末助乱的一点滴，而成之者则是刘掌科毛御史，其个人虽可轻鄙，其阶级则甚重要，盖言官者实士大夫之代表，犹今知识阶级之居言论界者也。屠长卿著《鸿苞》卷四十五中有一条云："今时士大夫率攘臂以言语为勋业，终南捷径止在袖中一纸弹文，遂成风俗。嗟乎，天下何事不可为。"此固是明季之风气如此，实在亦并不限于一时，如《朱子语类》中所云，宋朝也是这样，清末则尚在人耳目间也。陶拙存在《求己录》卷下有一节说得很好：

> 纸上所传经济，推行动多窒碍，世事愈出愈奇，人情愈变愈幻，伏处草庐，断不能通知时务，即阅历仕途，亦未必洞悉庶政。好事者侈陈议论，多未平心静气，兼权理势之当然，第见其易，不见其难。凡视事太易者非妄即迂，纵心术端正，亦难与共济。

这里所说，还只是普通言事的弊病，即以言语为勋业也，若心术不端正者便妄作威福，对人则骂人，尚止祸及一人，对事则败事而害及大众，如刘毛二公是也。我尝想中国文人学会两种文章，即八股与策论，八股代圣贤立言，可应用于恭维附和，策论批评史事时务，适于毁谤攻击，数百年来一以贯之，过去一时查不清他的起头，将来也不能知其何时结尾。刘毛之事，实止其一鳞，其为人所注意指斥，恐亦是偶然的不幸也。《秋灯录》归结到女祸，乃是节外生枝的岔出题外去，其实重要问题在于王季重的安顿穷人，亦即上官道人所谓谨耳。

〔附记〕 以上自《读书的经验》至《流寇与女祸》凡十篇，均为《新光》杂志而作，在志上登载过。此系妇女杂志，故题材

多与妇女有关，今虽已事隔数年，重阅一过，觉得尚有一部分在现今亦有可供参考者，故重为排比存之。

（三十二年九月十日校记）



《旧书回想记》引言[①]

旧书回想记(一)

1940年11月25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近几年在家多闲,只翻看旧书,不说消遣,实在乃是过瘾而已,有如抽纸烟的人,手嘴闲空,便似无聊,但在不佞则是只图遮眼也。旧书固然以线装书为大宗,外国书也并不是没有,不过以金圆论价,如何买得起,假如我有买一册《现代丛书》的钱,也就可以买一部《藕香零拾》来,一堆三十二本,足够好些日子的翻阅了。从前买的洋书原来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过早已忘了,有些还未细看,但总有点爱恋,不肯卖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年的过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变成了旧书,正如人也变成老人一样。这种在书架上放旧了的书,往往比买来的更会有意思,因为和他有一段历史,所以成为多少回想的资料。但是这也与书的内

① 周作人从1940年11月起在《晨报》文艺版开《旧书回想记》专栏,后又加入1943年刊于《古今》杂志的同类文字,在《书房一角》集中仍称《旧书回想记》。

容有关系，如或有一部书看了特别佩服或欢喜，那么历史虽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时想到，也想执笔记述几行，以为纪念，新旧中外都无一定，今统称之曰旧书，止表示与新刊介绍不同云耳。回想是个人的事，这里免不了有些主观与偏见，不过有一句话可以说明，无论如何总不想越过常识，盖假如没有这个做灯标，读新旧书都要上当，何况作文说话，更将大错而特错，则吾岂敢。日前曾写小文曰《书房一角》，已有做起讲之意，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炉灶，实则还是此意思，故重复话今亦不再说也。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平）



《玛伽耳人的诗》

旧书回想记(二)

1940年12月2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提到洋文旧书，我第一想起来的总是那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一本小说，名曰《髑髅所说》。这是我于一九〇六年到东京后在本乡真砂町所买的第一本旧书，因此不但认识了相模屋旧书店，也就与匈加利文学发生了关系。只可惜英国不大喜欢翻译小国的东西，除了贾洛耳特书局所出若干小说外不易搜求，不比德文译本那样的多，可是赖希博士的《匈加利文学论》也于一八九八年在那书局出版，非常可喜，在我看来实在比一九〇六年的利特耳教授著《匈加利文学史》还要觉得有意思。其第二十七章是讲裴彖飞的，当时曾译为艰深的古文，题曰《裴彖飞诗论》，登在杂志《河南》上，后来登出上半，中途停刊，下半的译稿也就不可考了。但是现在我要想说的不是这些，乃是今年春间所买一本鲍林的《玛伽耳人的诗》。此书出版于一八三〇年，已是一百十年前了，为英国介绍匈加利文学最早的一册书，在参考书目中早闻其名，今于无意中忽然得到，

真是偶然之至。集中收诗人二十六，诗九十六，民谣六十四，而不见裴象飞，这也正是当然的，这位爱国诗人那时他才只有七岁呢，及一八六六年鲍林又刊裴象飞译诗集约八十首，则已在诗人战死十七年之后矣。余译育珂小说，于戊申成《匈奴奇士录》，庚戌成《黄蔷薇》，惟以未成密克萨德小说为恨，中隔三十年，忽又得鲍林之书读之，则与匈加利文学之缘分似又非偶然也。取育珂密克萨德旧小说，拂尘土，摩挱披阅，仍觉可喜，或者再动笔来译《圣彼得的雨伞》乎？此正不可必也。



匈加利小说

旧书回想记(三)

1940年12月9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民国前在东京所读外国小说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译本，以斯拉夫及巴耳干各民族为主，这种情形大约直到民十还是如此。这里边最不能忘记的是匈加利的小说。贾洛耳特书店出版的小说不知道为什么印的那么讲究，瓦忒曼似的纸，金顶，布装，朴素优美而且结实，民初在浙东水乡放了几年，有些都长过霉，书面仿佛是白云风[①]的样子了，但是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册，还有波阑洛什微支女士的小说《笨人》，总算幸而免，真是可喜的事。我对于匈加利小说有好感，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

① “白云风”疑当作“白癜风”。

趣，而其影响便多少留遗一点下来，到现今还未消灭。现在想起来这匈加利的黄白问题颇是暧昧，也不值得怎么注意，不过从前总有过这么一回事，有如因腹泻而抽了几口鸦片，腹疾早愈而烟枪也已放下，但记忆上这口烟味也还会少少存留的。至于小说有写得好的，那也不会忘记，可是这并不限于那一民族，密克萨德著《圣彼得的雨伞》的确还想翻译，别国的却也还有，如波阑显克微支著《得胜的巴耳德克》，俄国库普林著《阿勒萨》，日本坂本文泉子著《如梦记》皆是，就只可惜无此工夫，其实或是无此决心耳。

（十一月二十五日）



童　话

旧书回想记（四）

1940年12月16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以前曾有一个时候，我颇留意找外国的童话，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实童话我到现在还是有兴味，不过后来渐偏于民俗学的方面，而当初大抵是文学的，所以在从《司各得丛书》中得到哈忒兰以及叶支所编《英伦爱耳兰童话集》的时候，不免有点失望，虽然岩谷小波那样复述的《世界童话集》也觉得不满意。大约那时的意见只承认童话有两大类，一是文艺的，如丹麦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国格林兄弟所集录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样的天才，世间少有，而德国又不大新奇，因为当时注意的也是西欧以外的文学，所以童话用了同样的看法，最看重的是东北欧方面的出品。这些在英译本中当然不会多，凑巧在十九世纪末期出了一个怪人，名为尼斯贝忒培因，他专翻译许多奇怪国语的书，我买到他所译匈加利芬兰丹麦俄国的小说，童话集中最可喜的三种也正都是他的译本。一是俄国，二是哥萨克，三是土耳其，根据匈加利文

译出，后附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他懂的方言真不少，也肯不辞劳苦的多译，想起来还觉得可以佩服感激。这三册书各值六先令，本不算贵，当时省节学费买来，也着实不容易，虽然陀耳译的俄国童话有复制的比利平插画，价美金二圆，要高出四分之一，也终于勉力买到，至今并为我书架的镇守。民国以后格林一类的书也要搜集了，觉得哈忒兰的分类编法很有意义，他的《童话之科学》与麦克洛支的《小说之童年》二书成为童话的最好参考书，别方面的安徒生也另行搜集，虽然童话全集英译以克莱格夫妇本为佳，培因却亦有译本，又据说英文《安徒生传》也以培因所著为最，可惜我未曾得到，虽有别的二三本，大率平平，或不及勃兰特斯之长论更能得要领也。

（十一月廿一日）



歌谣

旧书回想记（五）

1940年12月23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民国初年我搜集外国歌谣的书，最初只注意于儿歌，又觉得这东西禁不起重译，所以也只收原文著录的，这就限于英文日文两种了。英文本的儿歌搜了没有多少种，后来也不曾引伸到民歌里去，可是这里有一册书我还是很欢喜，这是安特路朗所编的《儿歌之书》。此书出版于一八九七年，有勃路克的好些插画，分类编排，共十四类，有序言及后记，很有意思。因为朗氏是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家，又是有苏格阑特色的文人，我的佩服他这里或者有点偏向也未可知。日本方面最记得的是前田林外编的《日本民谣全集》，正续二册，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刊，正集附有《日本儿童的歌》一篇译文，小泉八云原著，见一九零一年出版的《日本杂记》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盖以前不曾有过这种文章也。以后汤朝竹山人著书《俚谣》等有十馀册，藤井乙男藤田德太郎编各歌谣集，高野辰之的《日本歌谣集成》十二大册，陆续出版，寒斋亦大抵收置，近

几年来却没有翻过一页，现在想到，只找出故上田敏博士校注的一册《小呗》来，把序文重读了一遍，不禁感慨系之。此书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由阿兰陀书房刊行，不久绝版，六年后再由阿耳斯重刊，这两种本子我都搜到，再版本的书品不知怎的总有点不如了。书中所收是两种民谣小集，即《山家鸟虫歌》与《小歌总览》各一卷，世间已有复刻，本非珍书，惟上田博士以西洋文学专家而校刊此书，序文中引古今西诗为证，歌中有语不雅驯处去其字，而于小注中加拉丁译语，凡此皆足以见其人平日之风格，每一展观，常不禁微笑者也。此等学人，今已不可再得，若竹山人用力虽勤，但并不是文艺或学问中人也。（十一月二十三日）



医学史

旧书回想记(六)

1940年12月30日刊《晨报·文艺》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汉文的医药书我所有的只是一部大板的《本草纲目》,有四十本之多,不过他的用处也只等于《群芳谱》或《花镜》,说得高一点也就是《毛诗虫鱼疏》与《尔雅翼》之流罢了。外国文的比较稍多,但那是《六法全书》之类实用备查的书,说不上翻读,若平常放在案边,有时拿出来看看的只有一样医学史。英文的医学史有康斯敦、胜家、陀生的三种,又胜家著《从法术到科学》《希腊医学》诸书,德国玛格奴斯著《医学上的迷信》,日本文的有山崎祐久著《少年医学史》,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日本医学史纲》。这中间我所最喜欢的是胜家的《医学小史》与富士川的《日本医学史纲》,虽然《从法术到科学》中有《古代英国的法术与医学》《古代本草》诸文,也很可喜。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猫犬之自舐其创是也,但是发展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

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阅二家小史，对于法国巴斯德与日本杉田玄白的事迹，常不禁感叹，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罢。此外特别有意义的便是中西医学的对照，欧洲中古医学上的水火地风四行说以及灵气流通等说，都与中国讲五行等相同，不过欧洲自十七世纪哈耳威的血液循环说出以后全已改革，中国则至今通行罢了。我们夸称一种技术或学问以为世界无双，及查文化史往往在别处也已有之，而且只是路程的一站，早已走过去了，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一服清凉剂，读医学史常容易感到。我还有一册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医学史》，混在外书房的乱书堆里，一时不易找到，现在也就不谈了。

（廿九年十二月三日）



画　谱

旧书回想记(七)

1941年1月6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儿童大抵都喜欢花书,这里有两种,一是绣像,一是画谱。最先看见的自然是小说中的绣像,如《三国演义》上的,但是这些多画的不好,木刻又差,一页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我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金射堂的《无双谱》四十图要算画得顶好的了,却也没有什么好看。《百美图咏》小时候也常见,更觉得是单调,大概这方面还要推任渭长所作为最,如《於越先贤像》,剑侠高士、列仙酒牌皆是。画谱中最有名的是芥子园与十竹斋,从前都曾翻过,却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不大记得清楚。总之木板的山水画很不容易刻得好,所以看了觉得可喜的还只是花鸟与草虫而已。说也奇怪,这里我所记得的提起来乃是两部外国书。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出版于天明四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比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要好的多,但他实是说经的书,不过我们拿来当作画看也并不错。喜多川

歌麻吕的《画本虫撰》乃是近来新得的，原本刊于天明八年，极为难得，我所有的只是复制限定板，虽然用珂罗版印，也颇精美，可惜原来的彩色不能再见了。全书凡十五图，每图二虫，配以花草，上记狂歌以虫为题，凡三十首，作者宿屋饭盛等皆为当时有名狂歌师也。歌麻吕亦有名浮世绘师，以美女画著名，而或者乃独称赏此册，其技工与趣味盖均不可及。永井荷风在《日和下驮》第八篇《空地》中云，我对于喜多川所作《画本虫撰》喜爱不已之理由，盖即因此浮世绘师择取南宗与四条派之画家所决不画的极卑俗的草花与昆虫而为之写生也。《虫撰》序言系追踪木下长啸子的《虫之歌合》，其实狂歌竞咏虽是一辙，若论图画则相去甚远，《虫撰》中第八秋蝉蜘蛛与玉蜀黍，第十三络纬蝉与锦荔枝，第十五青蛙金虫与荷叶，皆极可喜，《歌合》所画乃似出儿童手，如或古拙堪取，却是别一路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



妖术史

旧书回想记(八)

1941年1月13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我对于妖术感到兴趣,其原因未可详考,大概一半由于民俗学,大半却由于宗教审判的历史罢。从文化史上看来,符咒法术即是原始的科学,他所根据者一样的是自然律,不过科学的出于事实,每试皆验,而法术的则根于推想,不一定验罢了,这其间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事。别一方面,从法术发生了宗教,而宗教一边敌视科学,同时也敌视法术,结果是于许多妖巫之外也烧死了勃鲁诺等人,总称之曰非圣无法,这也很有意思,虽然是很可怕的事。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字思想的冤狱,罪名大抵是大逆不道,即是对于主权者的不敬,若非圣无法的例案倒不大多,如孔融嵇康李贽等是,在西欧宗教审判里则全是此一类,此正大足供识者之考察者也。我耽读这一类书已是十年以前的事,除一般说及法术者外,我所喜欢的有吉忒勒其教授的《新旧英伦的妖术》,茂来女士的《西欧的巫教》,二者皆是学术的著作,案汤姆生的《魔鬼史》与斯本思的

《不列颠之密教》均谓所云妖术乃是古代土著宗教之残留,论旨与茂来女士相同,当可信用。但是最特别的总要算是散茂士的著书了。我所有的只是四种,照出版年代排列,即是《妖术史》、《妖术地理》、《僵尸》、《人狼》,在一九二六至三三年中所刊行,共计六十三先令半,若论时价当在二百五十元之上了。我在这里计较价钱多少,便因为觉得买了有点冤枉,虽然那时的兑换率还没有这样的高。散茂士相信妖术确是撒但的宗派,目的在于破坏耶和华的天国,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非彻底肃清不可,无论用些什么手段与多大牺牲。花钱买书,却听了这些议论,岂不大冤,但在别一方面也不是全无用处,除许多怪意见外也有许多难得的资料,关于妖巫审判的,所以我至今还宝重他,至于《僵尸》与《人狼》二册尤可珍重,其中奇事怪画颇多,如不怕会做噩梦,大可供枕上读书之用也。

(三十年一月七日)

小　说

旧书回想记（九）

1941年1月20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提到小说，可以回想的事情一定应当不少罢。其实却不尽然。我读小说的历史开始得很迟，大约在十一二岁时，最初所读的记得是《镜花缘》，以后大概是《西游记》，《封神传》，《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所举都是代表的，其类似模拟者不再列记。这些小说当时读了很有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得到好些益处，有如小时候乱吃的糖与水果以及杂拌儿，虽然曾经吃坏了胃或牙齿，但其营养分子也总是不可完全抹杀的。我对于上记各项小说觉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来时却也不能说出那一部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什么地方可以怀念。说也奇怪，我现今提起小说来，自己寻问记得的部分是什么，这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古人云，买椟还珠，这颇有点儿相像，岂不是《笑林》里的材料么。我是想说实话，所以这也是无法。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可是《三国演

义》与《红楼梦》也不坏，大约还可以考在一等之内。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斲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足为初学指导，养成了解赏鉴之力，与明师指点不异。不过话须得说过来，这里条件第一要批注有趣味有见识，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于章回体旧作，他本来是说书人口吻，旁边有人再插嘴说几句，并不扰乱原来的空气，若是新小说，则上文所云自不能适用也。此外我还读过不少违碍小说，回想比较的容易找，但此等书既系犯禁，也就不便再谈了。

（一月九日）



七巧图

旧书回想记(十)

1941年2月3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小时候玩过的书本里头，最不能忘记的要算七巧图了。回想起来，当时所见者只是一册极普通的《七巧八分图》，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就是一种坊本而已，但是有些图如莲叶百合游鱼，简洁浑厚，有古典之趣，此所以不可忘也。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有云，曾得一斋主人真本，乃吕青先生所序，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此书惜未得见，意必有佳趣，求之书肆亦久不能获。

《七巧八分图》十六卷，补遗一卷，此为繁本，仁和女士钱芸吉撰辑，同治甲戌年刊，去今才六十八年，似亦已不易得，商务印书馆有石印本。寒斋有原刻一部，乃从东京得来，朱墨二色套印，颇为精致，而图样平凡，惟全部有千七百馀图，数量甚可观耳。

近日得《信手拈来》一卷，光绪辛丑年刊，自序署桐乡冯汝琪，云侗斋遭庚子之乱，自恨所学非所用，为世诟病，每思覆酱瓿物一无可传，惟《信手拈来》一册乃广《七巧图》之作，推陈出新，自谓有

突过前人处。书才六十页，共计百二十图，颇多佳作，每幅题一二成语，隽雅可喜，序中自诩之语盖非过夸也。图中如“郑家诗婢”、“北地胭脂[1]”、“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一心咒笋莫成竹”等，均有诗味画趣，大旨其构图妙处近于夏紫笙之《曲成图谱》，题句则似童松君之《益智图》。此二书亦自佳胜，但所用图板太多，易于见巧，不如《七巧》之简单而大方。一斋主人真本不知何如，得见侗斋本，中多可喜，亦已足矣，惟此系成人之书，若为儿童计，则或仍以小时候所见纯朴之《七巧图》为合宜耳。

（一月十八日）

---

① “胭脂”原作“脂胭”。



《淞隐漫录》

旧书回想记(十一)

1941年2月17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颇有关系,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虽或价值高下未能尽同,总之也是新学前驱之一支,我曾略为搜集,以备检考,这回买《淞隐漫录》的原因即是为此,但是感到兴趣则又是别的缘故。我初次看见此书时在戊戌春日,那时我寄住杭州,日记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下午工人章庆自家来,收到书四部,内有《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其时我才十四岁,这些小说却也看得懂了,这两部书差不多都反复的读过,所以至今遇见仍觉得很有点儿情分。当时所见的乃是小册四本,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每卷一册各二十页。据《弢园著述总目》云:

是书亦说部之流,聊作一时之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

> 郁结者也，其笔墨则将无同，其事实则莫须有，如目为刘四骂人，未免深文周纳矣。初散编于画报中，颇脍炙于人口，后点石斋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板，易名曰《后聊斋志异图说》，图画较原刻为工。

此十二册本篇末常有红绿纸痕迹，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可以说是初印，比小册便览多矣，唯披阅一二卷，华璘姑何蕙仙等虽极是面善，而已无复当年丰姿，此正与重读盛氏本《阅微草堂》相似，今昔之感固亦寂寞，但眼经磨练，犹之阅历有得，不可谓非是进益也。弢园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谰言》与《淞滨闲话》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

（一月三十日）

记酒令[1]

旧书回想记（十二）

1941年2月24日刊《晨报》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巾箱小品》四册，我看见他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面目亦已屡有变易了。最初所见是日本翻刻本，刻工颇佳，不过字的左边有和训句读，可以知道，其次是一部中国刊本，大约就是所谓华韵轩本吧，可是现在都已不存，前者不知何时遗失，后者则于十年前送给别人了。第三次所得，现今还在手边的又是日本翻本，首叶有印文云知足斋书画记，不知原系何人之物。此书所收共十三种，第一册为《冬心先生画记》五种，最为世所知，历来重刻冬心题记者差不多都于此取材，此外则《冬心斋研铭》与《板桥题画》也是可喜的小品文章，至今翻看还觉得很有趣味。但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却是别一种东西，即《西厢记酒令》是也。本来《唐诗酒筹》亦自不恶，如第一条云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每见辄令人绝倒。惟唐诗范围太

① 《旧书回想记》（一三）至（二八）在1943年。本篇《书房一角》改题《〈西厢记〉酒令》。

广，稍嫌凌杂，不及《西厢》之同出一书，较为匀称。此令凡百二十条，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编《酒令丛钞》，收入卷四《筹令》中，后又有自著《艺云轩西厢新令》计一百条。《集闲情小录》初集中有《西厢酒筹》一卷，一百六条，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则为东山居士之《西厢酒令》计三百条，嘉庆丙子年刊，远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见，故《丛钞》中未说及。酒令本是一种劝酒的方便，最简单的如猜拳拍七之类，迨至用成语作筹，便与灯谜相近，很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了。《丛钞》中有四书贯西厢令，其一云，“行乎富贵，金莲蹴损牡丹芽”，这原是一个谜语，不过现在底面颠倒罢了。文字上的雕虫小技，非壮夫所当为，惟汉字性质上有此游戏之可能，学者亦不可忽视，则此类酒令与灯谜诗钟对联等同是很好的资料也。（二月八日）

《鲊　话》

1941年1月1日刊《中国文艺》3卷5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近来收得佟世思著《与梅堂遗集》十二卷，附《耳书》、《鲊话》各一卷，系其六弟世畿所编集，有康熙辛巳序，但刻板似在雍正时，王渔洋序文署名已避讳矣。案《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云：佟世思，先世居于佟佳地方，姓佟佳氏，省言以佟为氏，隶汉军镶蓝旗，又言法海介福均其族人，唯集卷十二《先高曾祖三世行略》云，自北燕时远祖讳万讳寿者，俱以文字显，然则其世系远出六朝，与籍隶满洲之佟佳氏如介野园等固自不同也。《熙朝雅颂集》卷十三引《八旗通志》云：

> 《与梅堂遗集》十二卷，佟世思撰。是集凡诗十卷，词一卷，杂文一卷。其弟世集裒而刻之，末附《耳书》一卷，皆记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鲊话》一卷，则以公事至恩平而记其风土也。

《四库书目提要》亦如此说，盖为《通志》所本。《雅颂集》选其诗为十三四两卷，计百另二首，《雪桥诗话》卷三谈俨若诗有四则，最称赏其《横林雨夜访邵之莱夫子宅》四首，如其一云：

舟行常苦热，雷雨晚凉生。杨柳一时碧，
桔槔忽不鸣。沟田增细响，村鼓应初更。
我欲扶筇去，稻花香里行。

不佞虽不懂诗，读此亦觉得可喜。文十八篇多可读者，如《游红螺山记》、《思恩县开征记》、《与范彦公表叔书》均是，但是我觉得最有兴味的却是那两种附录。《耳书》文字颇简洁，所记事亦普通，可目为笔记中上品，末一则“唵嘛呢叭弥吽”，云是六字真言，传自西域，有谓“唵嘛呢叭弥吽”盖“俺那里把你哄”也。昔曾闻此传说，今知见于著录，亦颇有意思。《鲊话》据自序盖作于康熙乙丑，时至广东访其三弟世男于恩平县，记所见闻得三十九则，其序云，时在安徽同友人饮白酒啖鲟鲊，“昔陶母却[①]鲊，而恩平无鲊可以奉亲，伟夫一官冰冷，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鲊话耳。”书名即取此意。记文短者才十馀字，最长者只二三篇，亦不及二百字，读之无不可人意，盖如序中所云，恩平以弹丸黑子，奇凋异敝，不可名状，世传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将近之，其事本奇，而文足以副之，故遂耐读，所谓诚可悲可笑矣也。《鲊话》一序，计二百三十一言，亦诚实，亦波俏，而《八旗文经》则收录一篇俗调的《耳书序》，可知文章鉴别自有不可假借之处，观于《文经》选者之取舍，乃更相信自己见识渐益可靠，凡所取舍常与世俗相违，此即其征也。

---

① “却”原作“卻”。

《鲊话》中可抄者甚多，今只录其二三于下：

县署无头门二门，勉强向败墙下设门一合，以蔽道路往来者。无大堂，有墙三面，横以竹，覆以草，无栋梁门柱。前令设木屏高五尺，阔二尺有五，以别内外。伟夫孟浪，撤[①]而易以门，再八步计步弓四步，即令君妻下榻处也。

士子无城居者，来则跣足骑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着屐而后入。每来谒，伟夫必与饮食，无一人知进退周旋之节者。伟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亲见伟夫以白面微髭之知县教白头诸生，拜揖酬酢，始终不能而罢焉。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乱棕缚云板于下，此伟夫升堂号召胥役之具也。夜间，一老人身不满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鼓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从来无伦序，但随其兴会耳。闻伟夫曩者怒，命易之，询通邑无可代者，因仍之。

通城无三尺平净地，处处皆瓦砾，生野慈姑于上。予与檠十步城上，小立，谓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许，窜胯下过。

案恩平属肇庆府，距新会不远，不知何以荒秽如此。近人奭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七《言多》中有一则，言广西思恩府之苦，其文云：

其地谚曰：虎上房，蛇上床，皂隶上墙。侵晨将启户先四望，房上有踞虎则不开门。地卑湿连山，山蛇如蚁，宵中恒为蛇所扰如蚊虻。居民极少，皂隶无应募者，但于大堂两翼墙画

① “撤”原作“撒”。

衙役，以壮观瞻耳。

案佟世男为恩平县知县，世思记其地风土既极奇怪，而自己又适知思恩县事，真可谓偶然又偶然矣，只可惜不再写一卷《续鲊话》，不然必当有好文章可读也。遗集卷十二杂文中有《重修思恩县堂记》，述由贺县至思恩事云：

再调思恩，水土恶厉更倍于贺，亢则三冬热眩，哑不能言，雨则六月生寒，重裘莫御。

又《思恩县开征记》叙四乡头人来输纳情状，但云：

届期果来，老而皤者，少健者，棕帽者，布裹头者，徒行者，乘马者，聚数百十人，率皆衣青短衣，裸膝跣足，佩环刀七尺于胁下。

此盖如下文所云，思恩古属交趾日南，为环州生蛮之恒状，亦并不大奇。文中又有吏白开征有日之语，则固有胥吏，岂画壁者止是皂隶，而吏不在其内耶。《野棠轩摭言》引夏闰庵所见为证，似是近数十年中事，在康熙三十年顷反不若是之甚，亦不可解。唯《重修县堂记》言至广西后，宾客仆从不习于水土死者二年之内[①]一十八人，而佟君自己亦遂是年卒于官，时为康熙辛未，年四十有二，此则与夏闰庵所遇之思恩守志白石运命相同，似前后无甚变化，亦大奇也。

---

① “内”原作“外”。

怎样研究中国文学[①]

1941年2月1日刊《中国文艺》3卷6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今天我以国文教员的资格来向诸位谈几句话。我自己不是弄文学的，而仅是一个学海军者，奇怪得很，我却做了教国文的教员，一直有二十几年的历史，而今天却又和同学们谈起关于[②]国文的问题。谈起文学，它不像雕刻，不像绘画，绝不能在三年二年之内，就有像样儿的作品出现。往往下上三四十年的功夫，还不能有所成就，文学之不易学，其难可知。

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不外三点：(一)文学史的。探讨过去民族的文学，以及地理上、生活上、历史上诸问题，是为纵的方面。(二)文学语言的。是研究古代文学语言和现代的文学[③]语言中间的过程和变化。(三)内容的。也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历代的文学

① 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讲演，笔记者李啸仓。
② "于"原作"乎"。
③ "学"原作"字"。

家各有各的色彩，由这许多不同的色彩的分子上，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作家的心理。

研究国文的同学们，应该认识清楚，所谓文学不过是“文化”里的一部分，故而研究国文的范围一定要放大了，像哲学，史学，外国文学，经济……之类，算一块儿，才是整个儿的文化集团，也就是每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所需要的。此外还有一个要紧的部分，就是“生活”。方才我所说的哲学，史学……之类丰富了还不够，书本以外的东西，才更是有价值的常识。所谓书本以外的东西，就是课外的生活。所以我以前一度曾想写一篇文章，叫做“文学以外”，意思就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愈多愈好。平常的衣食起居一点琐碎的事情，平常人所不注意的，我们都注意到，那才是真正的学问。拿北京来说，我们打算研究天坛或是故宫，于是我们搬到天坛或故宫里去住，经过相当的时日，一草一木我们都清楚了，甚至于它的建筑，我们都可以详详细细的画出来，那样便算是了解天坛或故宫么？不，绝不！假若有人问你天坛或故宫的所在地，和它的历代的变迁，你便茫然不知了。所以要明了天坛故宫以外的事情，才算是真正的清楚故宫、天坛；正像想认识北京只知道有什么名胜，还不够，必须注意到乞丐杠房之类才算是对[1]北京有真正的了解。研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天天扎在文学书籍[2]的堆积里是不够的，更要注意到其他的书籍，进一步更要充实你自己的常识[3]——书本以外的生活。

这样说起来，我们脑子里所要装的东西岂不是太多么？不！

---

① “对”原作“到”。

② “籍”原均作“藉”。

③ “的常识”原作“常的识”。

你我要知道人类脑子并不像钉[①]只木箱，有一定体积，再多就装不下；看一本书起初[②]是看不懂的，只要是总看，自然而然的就会懂了；起初觉得没有功夫的，后来有了兴趣，自然而然的就有功夫了。故而，对于"生活"了解得愈多愈好，随之你可拿它做为你的基础，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设若没有这些常识做后盾，必将走入歧途而不能自拔。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把着他一定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做为自己的指南针，自己走自己的路。

同时我觉得，文学院的名词不太妥当，因为文学院的文学一字在英文是 art，art 本原出于希腊文的 art，art 的本意又为技术[③]的意思。你们要知道研究文学并不是一种技术，所以我常觉得不如改为 History 好，可是相沿已久，再改恐怕不太容易了。

当你们在中学的时候，一切的功课都是重要的，可是你们往往认为文学与科学没有关系，甚至于认为文学与科学根本上就没有联系，那是不对的。科学对于文学太重要了。文学时时需要科学的帮忙。现在研究文学的人有一个通病，是不考察是非，像同仁堂药铺子里的小抽屉一样，这个抽屉装着发汗用的药，那个抽屉装着败火用的药，各各抽屉都不发生连系。所以我常看到一种人，你若对他说，设若[④]安心平气静静的坐在那里，练到相当的时候，就有一股子白气从头顶上飞出来。他必答道"是的，对极了。"或者他还会发一篇更玄妙的议论，设若另一个人对他说，人的头盖骨很厚，他也必答道，"是的是的[⑤]，人的头盖骨确是很厚。"或者他还会指[⑥]出

① "钉"原作"定"。
② "初"原作"出"。
③ "术"原均作"士"。
④ 原无"若"字，今增。
⑤ "是的是的"原作"是的是"。
⑥ "指"原作"肯"。

头盖骨的一切名称。这就是通病了。他绝不会想到，头盖骨既然很厚，怎的会从头盖骨上冒出一股子白气来呢？研究文学的人也是，往往不会对证着考察是非，以致闹得一塌糊涂。

研究国文学的人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赏鉴”，用一种不客气的态度分别文学的好坏，思想是否正确。打算做这样的工作，当必有相当的修养。不二法门，就是古人说，“多读多作”。从前我买墨的时候，几乎分不出墨的好坏，后来一点一点的，一块墨只消拿到[1]手里一看颜色如何，就可以断定墨的品质的优劣。所以“赏鉴”也是如此，消磨[2]过长的时间，由经验上就可以鉴别文章的好坏。有一个朋[3]友周济，他作过一篇著作名叫《词辨》，内中分列优词与劣词，甚有见地，鉴赏能力很大，不幸[4]得很，在他坐船的时候，竟[5]把这篇还没问世的作品掉在黄河里了。

关于思想方面，可以分两点来说：（一）关于史的思想，研究文学的人应该依着时代而判断其思想是否正确，而用一种客观的[6]态度；（二）关于鉴赏的思想，如方才所云，要抱着一种主观的不客气的态度。

承继古人所遗留下来的遗产，是应该怎样的？要抱有主观的合于自己的兴趣的，那才对于自己有莫大的利益。举个例子[7]来说：杠房里抬杠的人们，每人都要有一件衣服，假若由一个人随便分派给某一个人一件，多少不如他自己在那里挂着的红绿衣服里

---

① “到”原作“对”。

② “磨”原作“摩”。

③ “朋”原作“为”。

④ “幸”原作“辛”。

⑤ “竟”原作“尽”。

⑥ “的”原作“本”。

⑦ “子”原作“字”。

挑一件穿上适意，虽然是实际本不合体。承继古人的遗产便是用自己的心思来[1]挑自己所高兴穿的衣服。

我虽不尊崇孔夫子的思想，可是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绝不是从外国搬来的。异民族给与你的思想，是不高兴接受的，像杠夫不喜欢别人分派给他一件衣服一样。常常觉得，一个乡下种田的农人，他也没受过多少知识，也不懂的什么叫做思想，假若使他的生活优裕一点，衣服穿得好一点，自然而然的他必走入儒家的思想，这绝不是怪事。

从前有一个同事，他是研究《诗经》的，每当有人要学《诗经》的时候，他必先使学诗的人们，倾向于一方，毛注，或者是尊崇三家注。凡是与三家注的意思不合的，尽皆反对，那才是研究文学的本色，这就是方才所云的，要用主观的思想。

我的国语，始终说不太好，恐怕有人要听不懂，请大家多原谅。完了。

---

① “来”原作“未”。



日本之雏祭

1941年3月1日刊《中国公论》4卷6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自昔有上巳修禊之事，最有名的是兰亭之会，后来日期改为三月三日，不必一定是巳日，但是这种行事在民间渐渐不大流行，只有少数风雅的人，模仿永和前例，偶或一举诗酒之会而已。日本古时风俗亦有禊祓，用纸制为偶人，以抚摩自己身体，祝诵而送诸水中，当作替身，以祓除不祥，据说后世玩具中人形一语即从此出云。这仪式在日本现时亦已不复见，却另外盛行一种雏祭，时期正是三月三日，仿佛是修禊的变相，但意味则很不相同了。雏字和训"比奈"，原是小鸟的意思，引伸为细小可爱的事物，即是雏人形之意，《古孝子传》云老莱子弄雏于亲侧，可见中国古时也以雏鸟为玩具，只是不曾见有引伸的意义耳。儿童持偶人为戏，日本平安朝文学中已有纪录，时为西历十世纪，至江户时代初期雏祭渐已成立，初只行于贵家，迨普及民间，成为儿童节日，则在十七世纪之末矣。雏祭大抵起于儿童游戏，唯后者儿童自为主，随地随时可行，

前者则家庭主之，又有一定期日，比附于旧有的三月三日，此与修禊或未必有关，但其为祝儿童成长之仪式当无疑也。现代雏祭仪式即沿江户时代之旧，设坛自三至七段，首列屏风，前陈雏人形男女各一，次为侍从乐舞，箱笥几案，文房游艺，妆饰道具，白酒菱饼之属，或更有英雄神仙故事，其人数无一定。雏祭之历史与其意义今语焉不详，但就现行形式介绍于中国，于此略可窥见日本爱儿童之情意与家庭风俗之一斑，□□□□□□□□□□□□，或不无小补，贤达士女，幸赐观览焉。



《药堂语录》后记

1941年3月24日作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余不能吸纸烟，十几岁时曾买刀牌孔雀品海诸烟，努力学吸，历久终未学会，以至于今，殆为天分所限耶。常见人家耽吸，若甚有滋味，心甚羡之而无可如何，则姑以闲书代之，无可看时亦往往无聊赖，有似失瘾，故买书之费竟不能省，而其费实或超过烟价，有时将与雪茄相比矣。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庸报》社索去者有四五十则，日前来信云拟搜集为一册，亦便答应。此种文字新陈两非，不入时眼，印成书本亦少有人读，恐终辜负报社的好意。但是有一件事，可以

代作广告者，不佞虽未受五戒，生平不打诳语，称之曰语录，自信可无惭愧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知堂题记。



上坟船

1941年4月1日刊《中和月刊》2卷4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陶庵梦忆》在乾隆中有两种木刻本，一为“砚云”本，四十年乙未刻，一卷四十三则，一为王见大本，五十九年甲寅刻，百二十三则，分为八卷。“砚云”本虽篇幅不多，才及王见大本三分之一，但文句异同亦多可取处。第八则记越中扫墓事，今据录于下：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座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座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鬯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国，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画江而守，虽鱼艣菱舠收拾略

尽，坟茔数十里而遥，子孙数人挑鱼肉楮钱，徒步往返之，妇女不得出城者三岁矣。萧索凄凉，亦物极必返之一。

小序中有云：

> 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

数语批评甚得要领，上文可以为证，但是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在于如睹风俗这一点上，因为所说上坟情形有大半和我小时候所见者相同。据说乙酉以后妇女已有三年不得出城，似写文时当在丁亥之顷，那么所谓二十年前应该是天启丁卯以往，后渐华靡可见是崇祯间事也。平水屋帻船不知是何物，平水自然是地名，屋帻船则后来不闻此语，若是田庄船，容积不大，未必能男女分两截坐，疑不能明。座船大抵是三道船亦名三明瓦，一船至多也只能容七八人，因饭时用方桌坐八人便已很挤了，故不能再分两截而须分船，亦正是事势必然，华靡恐尚在其次。鼓吹后世仍用，普通称吹手或鼓手，有两种，一是乐户，世袭的堕民为之，品最低，二是官吹，原是平民，服务于协台衙门者，唯大家得雇用之，窃意此当本名鼓手，乐户是吹手，后来乃混为一称耳。上坟用官吹者，归途必令奏将军令，似为其特技，或乐户所不能者也，海东青等名目则未曾闻。大家丁口众多，遗有祭田者，上坟船之数，大率一房中男女各一只，鼓手船厨司船酒饭船各一只，酒饭船并备祭品，如干三牲，香蜡纸钱爆仗，锡五事，桌帏棕荐等，此其大较也。

顾铁卿《清嘉录》卷三“上坟”条下关于墓祭的事略有考证，兹

不赘。绍兴墓祭在一年中共有三次，一在正月曰拜坟，实即是拜岁，一在十月曰送寒衣，别无所谓衣，亦只是平常拜奠而已。这两回都很简单，只有男子参与，亦无鼓吹，至三月则曰上坟，差不多全家出发。旧时女人外出时颇少，如今既是祭礼，并作春游，当然十分踊跃，儿歌有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即指此。姣姣盖是昔时俗语，绍兴戏说白中多有之，弹词中常云美多姣，今尚存夜姣姣之俗名，谓夜开的一种紫茉莉也。上坟仪式各家多不相同，有时差得极远，吾家旧住东门内东陶坊，西邻甲姓仪注繁重，自进面盆手巾，进茶碗，以至罗拜毕焚帛，在坟头扮演故人生活须小半日之久，坊东端乙姓则只一二男子坐小船，至坟前祭奠，便即下船回城，怀中出数个火烧食之，亦不分享馂馀，据划小船者说如此。二者盖是极端的例，普通的办法大抵如下：最先祀后土，墓左例设后土尊神之位，石碑石案，点香烛，陈小三牲果品酒饭，主祭者一人跪拜，有二人赞礼，读祝文，焚帛放爆竹双响者五枚。次为墓祭，祭品中多有肴馔十品，馀与后土相似，列石祭桌上，主祭者一人，成年男子均可与祭，但与祭大概只能备棕荐三列，分行辈排班，如人数过多则亦有馀剩。祭献读祭文，悉由礼生引赞，献毕行礼，俟与祭者起，礼生乃与馀剩的人补拜，其后妇女继之，拜后焚纸钱而礼毕，爆竹本以祀神。但墓祭亦有用者，盖以逐山魈也。回船后分别午餐，各船一桌，照例用“十碗头”，大抵六荤四素。在清末六百文已可用，若八百文则为上等，三鲜改用细十锦，亦称蝴蝶参，扣肉乃用反扣矣。范啸风著《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荤四素五荤五素名目，注云：“此荤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荤，忏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溜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

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据《越谚》注云系斗门镇名物，惜未得尝，但平常制品亦殊不恶，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唯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孙彦清《寄龛丙志》卷四记孙月湖款待谭子敬：

> 为设烧鹅，越常羞也，子敬食而甘之，谓是便宜坊上品，南中何由得此。盖状适相似，味实悬绝，鹅鹅者乃得此过情之誉，殊非意计所及。已而为质言之，子敬亦哑然失笑。

其实不佞倒是赞成鹅鹅者的，熏鹅固佳，别样的也好，反正不能统年都吃，虽然医书上说有发气不宜多食，也别无关系。大凡路远时下山即开船，且行且吃，若是路近，多就近地景色稍好处停船，如古冢大庙旁，慢慢的进食，别不以游览为目的，与《梦忆》所云殊异。平常妇女进庙烧香，归途必游庵堂寺院，不知是何意义，民国以前常经历之，近来久不还乡里，未知如何，唯此类风俗大抵根底甚深，即使一时中绝，令人有萧索凄凉之感，不久亦能复兴，正如清末上坟与崇祯时风俗多近似处，盖非偶然也。

（廿九年六月二日）

〔附记〕《癸巳类稿》卷十“书镇洋县志后”，《茶香室续钞》二十三“明人以食鹅为重”条，引王世贞《家乘》及《觚不觚》录，言其父以御史里居，宴客进子鹅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例也。盖明清旧例非上等馔不用鹅云。



钱译《万叶集》跋

1941年4月3日刊《新中国报》第112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平常自称是不懂得诗的，这原是实话，但可以加上一点解说，我所说不懂的，乃是诗的技巧，或是技巧的诗，若是诗言志那一种东西，平常人大抵多能了解，我当然可以说不是例外。我读《诗经》，最喜《国风》以及《小雅》的一部分，随便举出来，如“黍离”、“兔爰”、“氓之蚩蚩”、“谷风”、“燕燕于飞”，至今都还了了记得。其忧生悯乱之情更是与年俱增的深切的感到，此正如闻神之托宣，语语打入心坎，此种真诗，人岂有不懂得者哉。亦或有人性好到处寻求国民性，可以援引《诗经》，作种种随意的说法以至宣传，唯鄙意并不如此，以为我们从文艺里只能于异中求同，在异时代或异种族的文化中寻出共通的人性来，这才觉得有意义，也即是有意思。《书经》云“诗言志”，《诗序》又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则志也就是动于中的情也。世间或曰神或曰国家，分出许多间隔来。但此只以理论，若是情则不但无隔而且无不可通，此不佞所以对于作诗与

读诗的人特致敬意，以其同有通情达意之功也。

日本有《万叶集》，犹中国之《诗经》也。虽然从我们看去，其艰深难解或比《诗经》更甚，又其短歌言不尽意，索解尤不易。但如邮而通之，使我们得如读中国的古诗一样，则其所得亦将无同，所可惜者无人肯任此胜业耳。翻译之事本不易言，妙手如什师，尚言有如嚼饭哺人，长行如是，倡颂尤可知矣。往见《万叶集》英译，散文者全不像诗，韵文者又不像诗，成为英诗而非复是和歌，此中盖各有得失，皆非译诗良法。小泉八云文中多先引罗马字对音之原诗，再附散文译其词意，此法似较佳。华顿等人编希腊女诗人萨坡逸稿，于原诗及散文译之后，依附列古今各家韵文译本，庶几稍近于理想欤。

稻孙先生对于日本的文学艺术积三十年之研究，所得甚深，而向来谦退不肯执笔，近年出其绪馀，译述日本诗歌，少少发表于杂志上。今将裒集付刊，以目录见示，则自《万叶集》选取长短歌四十四首外，尚有古今和歌俳句民谣共百五十篇。选择既广，译又复极雅正，与原诗对照，可谓尽善矣。日本与中国，本非同种亦非同文，唯以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因文化交流之结果，具有高度的东亚共通性，特别在文艺方面为多，使中国人容易能够了解与接收，其阻隔只在言语一层上，若有妙手为之沟通，此事即可成就。稻孙先生此选，以谨严的汉文之笔，达日本文的情意，能使读之如诵中国古诗，无论文情哀乐如何。总之因此引起其感兴，多得知人情之味，此正是所谓胜业，亦复功不唐捐者也。西儒有言，文学的最高贵的是在于拭去种种的界限与距离，岂不信哉。我不知诗，岂能谈译诗，今但于诗之上下四旁言之，写得数十行，聊作跋语，以表示对于译诗者之敬意云尔。

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

1941年5月4日作，刊《斯文》23编6号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东京的本乡汤岛，和我是颇有情分的地方，光绪丙午为明治三十九年，余初至东京，即住在汤岛一下宿内，将及两年，故汤岛实为旧游之地中最可记念者也。汤岛圣堂见于载籍，素所知悉，唯向未得到，盖平常由汤岛东行往本乡三丁目，往神田则南行过御茶之水或水道桥，又或往日本桥，亦乘电车经过须田町，则绕[1]出圣堂之西矣。七八年前曾趁暑假往游东京，择居于本乡之菊坂，至汤岛二丁目一看，震灾后下宿固久已不存，圣堂正在复建，亦尚未毕功也。今年四月，□□□□□□□□□□东行，在东京停留四日，乃得有机会参拜圣堂，可谓幸事，唯时间匆促，惜未能细观耳。大成殿门墙梁柱皆黑色，宇野先生云，此系依照朱舜水之说，不知何所取义。案中国孔庙并不如此，查舜水《朱氏谈绮》卷中，大成殿项下确说明用黑漆，想别有根据，今不可得而知矣。斯文会出版有《日本现存

---

① “绕”原作“侥”。

文庙》一书，共列三十一图，其中自以汤岛规模最为宏大，其他地方有全同神社，或只一楹者，余见之重有感，更觉得孔子意义之重大也。亚洲古来曾出二圣人，是为孔子与释迦，佛法本是宗教，教化所及，寺院遍于东亚，盖无足异，若儒家所说但是道德，而影响亦及于国外，不为种族地域所限，则孔子视释迦为尤难矣。窃思孔子之教大抵只是一仁字，此与释氏之慈悲近似，但后者推至究极，而前者则止于中庸，此固可云不彻底，唯其可贵处亦即在此。盖孔子之道，常道也，看似平凡，却至真实，以理想论，其空灵微妙或不及出世法，若论实践，则唯此可常亦可久耳。《孟子·离娄下》云：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又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用世以禹稷为理想，亦自坚苦卓绝，但以视菩萨投身饲饿虎之精神，则又可见其同而异矣。孔孟心在为民，唯不曾全把自己没杀，乃是推己以及人，如《大学》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焦理堂《易馀籥录》中有一则云：

>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简单的几句话，贯彻物理人情，能将圣人之常道说得明白无遗蕴。墨子主兼爱，而说明云己亦在人中，由是可知人己并重盖是东方道德上之一健全性，根基本甚深广，而儒家则所存独多者也。晚近思想界多受西洋影响，盛行各派极端的主张，其言或甚美，而多近于

宗教，不合于人情物理，无论其为左为右，均为过激，大抵害多于利，如凡极端为社会国家而轻个人者，其危险倾向皆可惧也。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民间多文庙，今又得至汤岛瞻礼圣堂，知孔子影响之远大，深希望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已。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记于北京。

五月人形之说明

1941年5月29日刊《实报》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中国各地，以艾与菖蒲插门窗上，或书红签[①]粘壁云，“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日本古来亦有此种风俗，但是近已转变为庆祝男儿之节日，正如三月三日是女儿节一样。端午的蒲艾装饰本为辟邪之用，拟作旗剑等武器，意思甚为明了，在日本有所谓菖蒲刀菖蒲胄者，起源本是相同，及幕府时代，因尚武之故，乃更发达为武具之陈列。具原益轩《日本岁时记》云，在昔儿童束蒲为马，剪纸为人，揉木片为胄，削竹木为刀枪尖眉刀，以陈户外，近来风俗绮靡尚巧，人马多以木雕，或以纸脱胎施五彩，悉具甲胄弓刀种种，作入阵之状，纸旗画以丹青，或有用帛者。具原所说是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形，其时陈设大抵在门外，所云旗亦是长方者，竿上有横档，设小绊以止旗。后来甲胄弓刀均列室内，称为内饰，人形亦益增多，都是史传小说上的英

① 原无“签”字，今增。

雄，如武内宿祢、赖光、金時、牛若、辨庆、樊哙、关羽、钟馗等，只有旗还是立在户外，是为外饰，但此亦渐变形为旒，其位置也由地上而升到空中去了。旒在日本称为吹流，或吹贯，吹流上作半圆，缀长条数幅，因风摇荡，故名，吹贯则是全圆，长条倍多，如或连长条为一幅，画作鱼形，便成为现时所用之鲤帜，端午节前后在日本处处可以看见，相传鲤鱼登龙门，故以祝男儿将来之发达也。内饰之人形多系武人及武具，俗称武者人形，又因时节称曰五月人形。此种陈设原为端午节行事之一，唯其用意在于为男儿祝福，又有尚武之意，此则颇可注意之点也。

中国的国民思想[①]

1941年9月1日刊《教育时报》第2期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今天是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开始的一天，暑期讲习班照例每年举行一次，本届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关于暑期讲习班的意义，不必再加说明了。照预定的程序里面，我有两小时的讲话，实在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虽然我从民初以来都是作教员生活，可是讲演非我所长，不过既然规定了有这种讲话，所以我就把平常所想到的极平常的几句话提出来同大家谈谈。至于许多新的问题，说的人很多，我就不必说了。我所说的，是极平常的，没有新的东西，不过是我个人多少年以来想出来的一点问题，就是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究竟是什么？它的优点与劣点在哪里？

这个问题与我们很有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好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重要，可是平常不注意它，等到身体有病的时候，才想起来，我的身体怎样，要请医生检查检查，究竟哪一部分不

---

① 1941年7月17日在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的讲演，系速记记录。

好，应当赶紧医治；也有许多人讳疾忌医，有了病不肯请医生看，惟恐经过医生检查之后，会发现某部分发生毛病，心里反更不安适，所以不如不去检查；但这是没有用的，毛病在那里，不去医治，随他去，结果自然越来越厉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如此，国民对于国民的思想也是如此。中国的国民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病得很重的时期了，非请医生检查不可，必须明了哪部分健全，哪部分不健全有毛病，这是很重要的。不过看法各人不一样，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是很平凡很旧的，不过我相信没有假话，应该怎样说就怎样说，决没有怎样说得好就怎样说的地方，完全根据我一二十年来所想过的几点意见同大家谈谈。

中国国民的思想，说来说去，无论人喜欢不喜欢，根本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孔孟的思想。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孔子是中国人，他的学问特别高，思想特别好，可以做我们的代表，无论什么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的根本思想完全根据于孔子的思想，即是所谓儒家的思想。这是二千年以来，由种种方面可以看出来的。

儒家的思想哪一点最重要呢？简单的说，就是利人——这是我假定的名称，对于他人，对于民众，要给他幸福，为民众求福利，这是古今的中国国民思想，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我从前念过《四书》，记得《孟子》里有一段，讲禹稷。禹是治水的，“三过其门而不入”。治水是禹的责任，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被水淹死，就是禹自己的不好，如同禹淹死这个人一样。稷是种田的，天下只要有一个人挨饿就是稷自己的不好，如同稷叫这个人挨饿一样。所以禹稷都是圣人的心理。再如孟子与梁惠王讲仁政——所谓王道，孟子说得很简单，只要人民不饥不寒，年老的人有绸衣可穿，有肉可吃，等到人民的生活安定了，然后办学校，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样就是王

道。简单的说，我以为中国思想的优点，完全在为人谋福利，并不是为自己。我是圣人圣王，责任就很重大，所有的人民，有一个没饭吃，没有衣穿，都是我的责任，决没有“我是皇帝，我应该享福”的思想。这种享福的思想，是后来才有的。孔孟的利人思想，拿这两个例子就可以代表了。

还有一位清朝的学者焦理堂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他的父亲告诉他：

> 天下的事情很简单，第一就是自己要生存，第二就是子孙要不断的绵延下去。自己生存，子孙绵延，天下事就完了。不过，自己生存，同时也要使他人生存；自己的子孙绵延下去，同时也要使他人的子孙绵延下去。

焦理堂听了他父亲的话，研究多少年，也没有明白，后来研究《周易》，才知道他父亲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简言之，就是很平常的人生观。人是要生存的，不但要自己能生存，而且要他人也能生存，这样才能大家平平安安的生存下去。讲得玄妙一点，我们不大懂，平常说，就是所谓仁。孔子无论怎样玄妙，讲到底就是个仁字。曾子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就是推己及人，我能生存，他人也能生存。不过，恕是主观的，我喜欢吃甜的，他人也有不喜欢吃甜的，于是就要讲忠了。忠就是科学上所谓客观的态度，我喜欢吃甜的，他人有不喜欢吃甜的，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与我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忠。所以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就是仁，分说就是忠恕。

关于这一点，我以为从孔孟起，到老百姓为止，没有什么不懂的，这是最简单的人生观。自己要生存，他人也要生存；自己的子

孙要绵延下去，他人的子孙也要绵延下去。凡事都不要损人利己。这个观念不见得只有中国人有，是人人都有的，不过中国人对于这点特别明了而已。这是从书籍上看来，就可以完全知道的。有了这点理论，第二点实际，也就是由这一点研究出来的。

第二点是讲实际，不是理论，完全是就事论事。由讲实际看来，孔子的学说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有很大的理论，譬如佛教，他认为这世界的种种人生都是无聊的，所以要与这个世界断绝，求自己的解脱。基督教也是如此，认为人生在这污浊的恶世里非常痛苦，必须在这时候祷告上帝，领入天堂，才可以有永生。而孔子就没有这种思想。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至于死后如何，就不去考虑了。孔子曾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后问题毫无研究兴趣，而对于现在则非常重视，只要现在的几十年之中好好的过，对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好好的处，一生的目的就完了。照佛教说起来，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种种关系，使人不得自由，于是要出家，去求个人的解脱。儒家却是相反，这是孔子学说与宗教不同之点。至于中国人的崇信宗教，也是完全为帮助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为死后的永生。试看到妙峰山拜菩萨的人很多，可是他们朝山拜佛，大多数是求现在的幸福的。再举一个显明的例，财神庙是很有名的，到了财神菩萨生日的那一天，大家去求发财，可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就把财神菩萨忘记了，其实并不是永久忘记，其所以崇拜财神菩萨的原因，无非只是祈求现在发财而已，不像基督教徒一样每饭不忘，吃饭也祈祷，睡觉也祈祷，同时他们的祈祷只是求神的保佑，没有其他的目的，由这点看来，孔子学说与宗教就完全不同了。孔子只要现在的问题解决，目的就达到了，并不是死后能否免去轮回，引入天国。所以把孔子作为宗教家，根本是不通的。可是孔子虽然只求现实，但也不是功利主义者。因为实际主义往往

容易变成功利主义，而孔子则不然。《论语》里面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道做不成功，他还是要做，但并不是有利的才去做，无利的就不去做，可能的就做，不可能的就不做，与功利主义完全不同。

第三点，中国国民的思想是讲中庸的，不偏于任何一方面。固然中庸的弊病可以变成骑墙，不过中国国民的思想并不是骑墙，大体上看来，还是比较偏重于儒家，他还是有他的宗旨。中国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还有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商鞅，不过这两派不大发达。法家偏于积极，太拘泥法理，一切照预定方针做下去，一点没有变通，虽然在西洋法家比较成功，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看来，秦，王莽，以及王安石等想求法治，却都没有成功，可知法家在中国社会是不容易成功的。至于道家则偏于消极，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虽然他也不是宗教，不求解脱，但是一切只求敷衍。儒家在法家道家之间，你说他消极，他不消极，你说他积极，他也不积极，只是适乎其中。西洋的哲学家也虽有人说"人生没有极端"，也就是中庸的意思。譬如走路，不动当然不能走，两腿一齐动，也不能跳得很长久，只有两腿一前一后的向前走，才可以达到目的地的。又有一位英国人说，"一个人吃东西可以有两个极端办法，一个是纵欲，一个是禁欲"。所谓纵欲，是今天有好吃的，就尽量的吃，原来吃三碗饭，因为是好吃的就吃五碗饭；所谓禁欲，就是根本不吃。这两极端都是不行的。多吃了胃中容纳不下，会发生胃病；不吃也不能生活。为图生活快活，有好吃的也要少吃一点，今天吃一部分，明天再吃一部分，使我们的口腹之欲天天能满足，少吃虽然也是禁欲，但不是单纯的绝对的禁欲，是纵欲与禁欲两者之间的。这话本来是很简单很平常的，除了少吃之外，两极端是没有人能做得通的。所以人生就是中庸。吃饭，走路，睡觉，都要合乎中

庸，才能生活。中国人从孔子起，至一般老百姓止，都有中庸的思想。希望中国人做大事业，是做不出来的，可是叫他维持长久，他的力量却很大。试看中国过去的历史，倒霉的历史也很多，这就是中国思想的弱点，由于没有宗教家的热诚，希望信仰的缘故；但是因为思想中庸，却能够保持长久，所以在历史上虽有时期长短不一的患难，而中国的思想仍然保存，仍然可以复活过来。

我以为中国国民的思想的特色，就是以上的三点，这三点也就是根据于儒家的思想，上自孔圣，下至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的人生观都是如此，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人本来是生物之一，生物当然要生存，这是最简单的欲望。有一位外国人问我："中国的国民性怎样？"我说："中国人是人，是生物，他要生存，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此外并无什么古怪异常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是人，是生物，要生存，所以你不让他生存他是要反抗的。有许多宗教，不希望现社会的生存，而希望永久的生存，因此性格转变了。中国就没有这种转变，所以中国思想是很平常很健全的。不过后来出了一种毛病，因此有人责备儒家，其实这是出于别一来源的，这就是考试制度。从唐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叶，都靠诗文取士，最近五百年则文章又限于八股，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了，就可以做官。这种制度，把中国好好的国民性都弄坏了。考试本来是很好的制度，据外国人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可是这仅是就好的理论方面来讲，而没有看见考试的流弊。考试制度最大的流弊有[①]两点：第一，因为作文章不肯说真话，完全是说谎。我们平常作文学的文章，自己照自己的思想去作，今天心里高兴，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高兴的，今天有悲伤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悲

① "有"原作"的"。

痛的。但是考试的文章却不能如此，虽然我有很悲痛的事情，在考场上出了庆贺皇太后八十万寿的题目，就非得作颂扬的文章不可。因此千馀年来，中国人作文章的本领很好，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友邦人，说中国人的宣传本领很好，这就是由于千年来学成的遵命文学的缘故。人家说杯子是圆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圆的文章；人家说杯子是方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方的文章；就是有人说这不是杯子，我也照样可以作一篇文章，于是文章完全依据题目去作了。我们从前学作论文，先生就是这样教，若不这样作，文章就作不好。但这种文章，决不是自己的文章，完全是替题目说话，弊病很大。第二，是胡说八道。从前在书房里作什么"汉高祖论"，"管仲论"，谈论一二千年以前的事情，汉高祖怎样与匈奴作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怎样作论文呢？结果只好乱说了。如果向来大家都说汉高祖如何的好，你能翻案，说他如何不好，这便是更好的文章了。有了这样的好文章，一旦考中，点了翰林，做了御史，就更可胡说八道了。从前汉高祖打匈奴都可批评，都可以骂，何况是现代的人？因为有考试，所以要作文章；因为作文章，所以不说真话，胡说八道。这种习气[①]养成之后，于是把中国的国民性弄坏了。中国儒家[②]的思想，原来并不是如此。孔子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真实的知道。可是因为考试制度，把这点精神完全丧失了，变成说谎同胡说八道，因此只在文章上讲空论，真实的学问一齐都不发达了，科学也因此不能发达了。

以上所说，是中国因为考试制度把中国国民思想弄坏了，只知说谎，胡说，把真实的学问都阻塞了，因此中国的科学也不能发达

① "气"原作"的"。

② "家"原作"教"。

了。譬如拿医学来说，从前有人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医生同宰相一样，都可以救人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医学向来就不注重，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医生都不拿医作为专门职业，虽然医生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病人的生命完全交付在医生的身上，而做医生的都是不第的童生，以及失业的塾师，一方面行医，一方面还准备应考；一旦考中，就可飞黄腾达，即使自己考不取，再教他儿子念书，儿子考中了，就可以做老太爷，就可以不再行医了，因此对于医学不去深究，医学就永远不进步，不发达。

我们再拿日本的医学来比较一下：日本很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对于孔孟程朱的思想，尽量的吸收，可是他们对于科学的态度，就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其所以不同的原因，第一，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制度，仍然保持孔孟的思想，一切讲实际，不讲空论，不说谎；第二，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都是封建制度，做医生的人永远做医生，并且他的子孙也大抵是永远做医生，做工的人本人以及他的子孙永远做工人，做工的人要想做官，是绝对不行的。不像中国无论什么人，只要考中之后，就可以做官。并且他们学什么做什么，不像中国学非所用，甚至像前清候补道一样，什么事都办。在日本决没有这种现象，学医的永远做医生，以医生为职业。因为永远做医生，诊治得多，经验也多，并且一代传一代，经验越积越多。以往日本都是汉医，因为他们以医生为职业，所以设法研究，使医学进步，于是又探求西洋人如何医治，最初自己研究荷兰文，看荷兰的医书，逐渐完全转变为西洋医学了。几百年前由中国传过去的中药秘方，有如行军散避瘟丹之流，经过他们几代的研究，也完全改变了。譬如宝丹，是二三百年前的秘方，可是在这二三百年之内，经过他们的研究改良，才成为今日的宝丹。我有一位朋友，是学中医的，他说：“宝丹的好处，在于冰片多。可是冰片的价值很昂

贵，照宝丹里的冰片分量，成本很可观。但宝丹的售价，只二角钱，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代替冰片，而效用完全与冰片一样。”日本能用中国的旧方，求新的方法来改良，所以他的医药能够进步发达。他们何以能如此呢？就是由于两国的国民性不同，虽然同一儒教的根源，但是他们没有阻碍知识发达的考试制度。中国现在虽然已取消了考试制度，可是这种弊病还遗留在那里，依然没有去掉。

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国的身体检查过了，好的部分也看出来了，坏的部分也看出来了，我们要使中国的身体健全起来，当然要发展好的部分，去掉坏的部分，否则是没有方法可救的。中国国民固有的思想是好的，应该加上什么东西，就可以救中国呢？据我想，还是科学教育。我这样说，好像也是看题目做文章，因为各位都是理科教员，所以说科学教育来救中国，其实不然，这是我向来的主张。我觉得中国根本思想是好的，不过是后来变坏了，只要再加上科学文明，就可以把固有的国民性恢复过来。

科学文明现在已不是时髦话了，现在最时髦的是精神文明。可是我说科学文明可以恢复固有的国民性，是有道理的。物质文明的流弊不能说没有，中国因为科学不发达，所以没有感受痛苦，西洋各国因为科学发达，受到很大的痛苦。前几天，有一位日本朋友来看我，他说：

> 中国现在一切事情，关于教育与文化，应该拿日本作为前车之鉴。日本因为偏重科学的物质文明，对于自己的文明不注重，所以发生了流弊，中国不要再踏覆辙才好。好在中国的科学没有发达，还来得及预防。怎样预防呢？那就是一面输入西洋的物质文明，同时还要注意本国原来的文明。

我觉得他这话很可作我们的参考。中国的确还没有充分的物质文明，必须输入西洋的物质文明。可是别国现成的药方不能吃，我们生什么病，开什么方子，吃什么药，西洋的物质文明虽然我们很需要，可是我们只拿西洋文明的一段输入进来，其馀的一段不去过问，势必发生流弊。我们输入十九世纪后叶至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同时也要注意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文明，否则只看见飞机[1]大炮以及各种机器，以为西洋的文明全都在这里了，这是完全不对的。飞机的用途，现在说起来好像只是专门轰炸的利器，但当初发明制造飞机的并不是这种用意，所以我们一方面输入科学文明，一方面还要明白[2]科学文明的历史。

西洋的科学文明发源于希腊罗马，要输入西洋的科学文明，就要了解中古时代希腊罗马的人文科学。从希腊的文明看来，我们觉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文明又同中国很有相像的地方。希腊的宗教，文明，历史，与基督教的国家相比，差得很远，可是与中国相比，却很相近。希腊的宗教，崇拜天地日月，与中国差不多。他的哲学，以苏格拉底(Socrates)为代表，与中国的孔孟相似。孔孟讲到最后是中庸，他们的哲学虽然另有名称，而意思也是讲中庸。希腊的道德观以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情形为基础，譬如夏天很热，但是不能永远更热下去，热至极点，到了大暑，就逐渐凉爽，成为秋天，再逐渐冷下去，就到了冬天，可是冷到极点，也不会再冷，于是又逐渐热起来，成为春天，无论什么事都是如此，不能太过，所以希腊人的道德最重适中，最忌过中，而其根据则以自然律为本，这种观念，完全与中国一样。这样看来，科学源流

① “机”原作“板”。

② “白”原作“文”。

的希腊文明，在我们中国人觉得很容易了解的。

希腊的文化既然与中国相近，何以科学发源于希腊，而中国的科学如此不发达呢？要知道希腊之科学文明，也不是自己创造的，是接受巴比伦埃及的文明，而发扬光大则完全由于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Plato)及再传弟子亚理斯多德(Aristotle)，当时他们的地位与时代，正同中国的孔孟一样，曾子是孔孟的弟子，孟子也可说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理斯多德，除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以外，对于各种科学都有很多的著作；而孟子只著了论道的七篇书。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之中，有四部讲动物学的，后世的达尔文看见他的著作，说他能够在若干年之前研究出后世学者所未发现的学理，非常的佩服他。希望接受巴比伦埃及的文明，发挥希腊的文明，可以作我们很好的教训。

我们再看，日本近代科学非常发达，也是我们很好的教训。

希腊的精神文明同中国不相上下，何以亚理斯多德变成世界自然科学的祖师，而我们的科学落伍呢？日本的文明是根据由中国传达去孔孟程朱陆王的学问，而接受了西洋文明，于是科学发达，但我们何以不能接受西洋文明呢？在这里，我们应该深深的反省。古代因为贤哲只讲哲学，不讲科学，所以科学落后；近代因为我们受了科举制度的流弊，所以就不能接受西洋文明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没有办法了，只有第二步求补救的方法，就是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基础，再尽量的吸收西洋自然科学以及物质文明，现在努力去做，还来得及。

关于以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为基础一点，有人说要保存国粹，提倡中国的思想，这种办法与我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中国固有的国民思想——就是儒教的思想——本来是健全的，只要中国不消灭，这种思想也不会消灭的，没有保存提倡的必要。为什么呢？我

可以拿一个比喻来说:假定中国人是松树,那么孔子也是松树,不过孔子的那棵松树特别高大茂盛,作为松树的代表,但是无论如何,同是一个根,同是一个种,把所有的松树种子松树根都使他长得同孔子的那棵松树一样高大茂盛,那是不可能的,但能好好的培养灌溉,长出来的反正都是同样的松树,也能茂盛起来,不会死的。所以不必怕儒教思想消灭,不必多事的说保存提倡,如果不想法培养灌溉,却去拨弄撮拔他,那是不会茂盛反而要坏的。怎样培养灌溉呢?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饥不寒,再进一步,使他们受教育,一方面把考试制度的流弊去掉,把物质文明的肥料加上去,自然就会茂盛起来了。

考试制度的流弊怎样去掉呢?我以为一方面把物质文明建设起来,一方面从教育方面着手,把自然科学普遍起来,养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①]这种药,才可以医治考试制度的病。英国有一位学者说:"学校里理科的课目并不是给学生预备将来研究专门学问的,而是普通的知识,养成科学的头脑,任何方面都可以应用。"譬如数学是整理思想的方法,平常对于题目怎样解决,训练好之后,就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外交上去,同样的将问题整理之后,就可以把要点抓住。文法也是如此。文法熟悉之后,不但说话都依照文法,将来对于办理事件也就可以用文法即论理的头脑,把要点抓住了。中国向来没有文法,不但八股文章没有文法,就是说话也没有文法。自从施行新教育之后,一般学校都添了英文,可是英文有一缺点,就是文法不密,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似乎可以,所以要学外国语或第二外国语,最好添学老的拉丁文或新的德文,古典文一个动词有一百零八个变化,德文文法也很严密,先多费点心去学

① "只有"原作"这是只有"。

了，后来很有用处。学习文法不仅是为学外国语，是为养成科学的头脑，以便将来应用到任何事件去，所以这种科学训练，可以改变以往不讲实际的弊端。

中国还没有物质文明的流弊，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充分建设起物质文明的原故。可是不能因为物质文明有流弊，我们就不要物质文明，这是不对的。物质文明比如是鱼肉，别人因为吃鱼肉而生病，我们根本吃不起鱼肉，也说我不吃鱼肉，这未免笑话。没有吃过鱼肉，怎会生病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别人吃鱼肉生了病，我们就用别的方法，把他配合起来吃。这是我的主张。

总结以上所说的话，中国的思想本来是好的，可以乐观的，第一是利人，讲仁，讲忠恕，要使大家安居乐业；第二是讲实际，不讲玄虚，死后如何，永生如何，天堂如何，一概不问，只知道现在生活的几十年中好好的过活；第三是讲中庸。中国的思想就是很平凡，可是经过考试制度之后，中国的思想变坏了，我们要补救他，就要吸收世界的科学知识，不偏于物质，同时还要注意科学的根源，一方面发展有用的机械文明，普遍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方面顾到固有的文化，如此则中国的缺点可以补足，原有的优点也可以发扬了。这样办法与从前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因为他们把中学与西学分为两截，中学是人的身体，西学是人的衣服，我的意见不是如此。西学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可是由外国拿过来之后，就不是西学了，譬如拿医学来说，中医与西医当然不同，可是仔细一看，只有时代的不同，中医是十七八世纪的医学，西医是现代的医学，我们把西医拿进来之后，就是我们的医学，也无所谓西医了。我们利用西洋的文明来补救中国的弊病，并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存国粹，还在其次，必须首先将固有的精神思想健全起来，然后再用科学方法选择西洋文明的优点输入进来，这才是最好的

办法。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如此不安定，无从下手，唯一的方法只有由教育机关设法进行了。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教理科的，虽然文科方面的教师责任也重大，可是诸位对于中国的责任更重大，除了使学生得到理科的学问之外，还要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头脑，这是救中国最重要的一点。

我对于科学完全是门外汉，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从前所想到放在心里的几句话和大家谈谈，所说的话平常得很，没有新意见，不过完全是真实不假的意见，应该怎样就怎样说，这一点是可以贡献给诸君的。



题《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

1941年11月4日作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此书刊于光绪十一年，在《日本杂事诗》六年后矣。而见识与趣味均极卑下，殆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当是华商之略识之无者欤？诗中多着眼裸浴等事，良由居心不净，故所见亦是滓秽也。

三十年十一月四日，知堂识。



《沮江随笔》

看书馀记(四十)

1941年3月22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沮江随笔》二卷,朱锡绶著,前有咸丰八年盛徵琪序,盖朱氏为湖北远安县知县时记所见闻也,内容与文笔均佳,可为此类笔记中之佳作。卷下《白菜》一则中有云:

> 余《幽梦续影》有云,真嗜茶者神清,真嗜菜根者志远。粟影师赠句云,神清半为编茶录,志远真能咬菜根。

因从《啸园丛书》取《幽梦续影》查阅,此即是第一则,粟影所拟赠楹帖亦在,惟咬字作嗜。前有潘祖荫序云:

> 吾师镇洋朱先生名锡绶,字撷筠,盛君大士高足弟子也,著作甚富,屡困名场,后作令湖北,不为上官所知,郁郁以没。先生诗集已刊,板毁于火,他著作亦不存,仅从亲知传写得此

一编，原题曰《幽梦续[1]影》。

潘君之意对于此绮语小言似颇不满，惟以不忍使其语言文字无一二存于世间，辄为锓板，以贻胜流，而未知其早有《随笔》之刻，亦大可惜。

序作于光绪戊寅，随笔当刊于咸丰戊午，盖在二十四年前也。潘序称其字擷筠，《随笔》则署啸筠，盛序作小云，当不误，或初字擷筠后乃改作啸筠欤。盛徵琪为大士之子，《随笔》卷上《巨瓠》末有注云，盛稚兰表兄名徵琪，蕴素师[2]之才子也。时同客楚北。然则大士又当是朱氏之舅父也。（三十年三月廿二日）

朱氏《疏兰仙馆诗集》四册，现有光绪三年丁丑重刊本，有潘祖荫同治十三年序，盖是为原刊本所作。《幽梦续影》潘序作于光绪四年，乃亦未知诗集重刊之事，可见当时消息殊不灵通也。编校时附记。

---

① “续”原作“读”。

② “师”原作“帅”。



题影印《琵琶记》

看书偶记（四一）

1941年5月31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词曲均不懂，何能赏识此书，实只喜其以罗纹纸所印耳。卷首图二十幅，刻绘精密，此当是晚明手工，与本文之刊于明初者距离甚远，盖是藏者或影印者所并入，取合锦之意乎。平伯过访借去，云欲一校，未几以校记相示，乃知有如许好处，具如别纸。不佞翻看过罗纹纸，便已满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处，乃即以进上。时在端午节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以食，亦并不可以弹，殆真所谓秀才人情者欤。秋荔亭今不存矣，平伯拍曲之兴致则尚如故，犹如不佞之涉猎杂书，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

（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尔雅义疏》杨氏刊本

看书馀记(四二)

1941年6月11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尔雅义疏》二十卷,旧有同治乙丑郝氏沛上重刊本,以前尚有学海堂及沔阳陆氏本皆不全,聊城杨氏足本为此本所从出,但不易得,故平常欲读《尔雅义疏》者止可得到郝氏本而已。近日有书估以杨氏刻本见示,较郝本贵至五六倍,终收得之。此书有咸丰丙辰胡珽跋,叙刻书始末,云全稿为高均儒所求得,今书面有题字一行云,已未孟冬在袁浦高伯平手赠,又卷首有印五,一云吴兴世家,一云曾植印信,盖沈寐叟旧藏,亦可珍也。咸丰丙辰至同治乙丑,前后才及十年,而书已至不易得,郝联薇跋云,亟觅原本,在济南晤阳湖汪叔明,欣然以所藏杨氏足本相授,始得付梓,可以见之。大抵道咸时江浙刻书,板悉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成为稀本,其价值往往数倍于康乾板书,杨氏板在苏城,自亦在庚辛浩劫中矣。寒斋此本,不但因为是寐叟手泽故可珍重,且以出于兵火之馀,此意亦甚可记念耳。　　　　　　　　　　(六月十一日记)



《文章缘起》

看书偶记(四三)

1941年7月8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文章缘起》一卷，陈懋仁注，方熊补注，列雅书院藏板，卷首有翰林院印，盖是《四库》底本。案《总目》卷一百九十五，《文章缘起》，两淮马裕家藏本，附存陈方两家注，与此正合。序下白文印曰“丛书楼”，少上朱文印曰“结一庐藏书印”，白文印曰“醒梦轩”，本传首行下钤一印朱文曰“彦升”，墨笔小注云，道光壬寅秋得此铜印，附印于此，东卿记。此殆叶氏物耶。卷末有方熊后序，署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旧得方氏刻本《陶诗》，中缝下端刻侑静斋三字，与此相同，或谓是咸同时刻，郭绍虞君根据查世标题字，以为当在康熙中，惟不能确定其年岁，今有此后序，便有确证可凭矣。《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不列此本，可知其不常见也。　（七月八日）



《迷藏一哂》

看书偶记（四四）

1941年8月6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迷藏一哂》抄本两册，题签云“祭酒公著，六世孙允灌谨藏”，印白文一字曰灌，不知何姓也。序为《西江月》二首，末署“癸丑立春，时在前岁季冬望后之二日也，春梦生题于与木石居”。案康熙《万年历》，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与此所记正合，可知此是康熙十二年癸丑，文中弘字不避讳，盖亦是康熙时所抄。全书共谜诗一百首，最初二首为六言，馀皆七言绝句，每句隐花草名各一，全部凡四百种。下册有数首乃是所谓荤谜素猜者，颇多诣诨，此在市井本亦有之，惟祭酒公而为此，乃别有趣味，想见老辈风趣，在康熙时盖尚有晚明的风气存在也。（八月六日）



《唐才子传》

看书余记（四五）

1941年8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唐才子传》十卷，自昔以《佚存丛书》本为最佳，嘉庆中王氏三间草堂重刊本流传最广，近得巾箱本五册，题味古书屋藏板，道光十九年岁在己亥秋七月开雕，卷首录《四库提要》，后有附识，所据亦为佚存原本，署龙溪孙云鸿。案近年影印巾箱《琵琶记》末有题字一行云，“辛亥闰月十九日舟次观，云鸿。”翁松禅附注云，“此孙总戎题字也，总戎雅尚儒术，尝刊香光《笔势论》，今求之弗可得矣。”由是可知即是一人，惟翁氏未提及所刻《唐才子传》，《书目答问补正》亦不载，岂不多见耶。《补正》中列董氏影印日本五山本，寒斋曾得有一册，惟所云光绪间清隐山房巾箱本，惜未能见，颇疑或即是孙氏原板，后为他人所得，因而改名者，但无所依据，甚愿得一见此种刻本，俾释其疑也。（八月十日）

味古书屋又刻有《小石帆亭著录》六卷，时为道光二十年庚子，此外或尚有所刻书，惜未能见。编校时记。



《柳如是事辑》

看书偶记(四六)

1941年11月2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柳如是事辑》一卷，题“雪苑怀圃居士录”，题叶署光绪癸卯，盖是庚子后三年刻也。所搜辑遗事不少，可备观览。惟所录《春浮园集》中与钱牧斋书一则，此类其实尚多，不知何以不取。集中《读牧翁集》七则之五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此一则更是绝好资料，而亦遗之，岂不大可惜耶。（十一月二日）

偶阅赖古堂《尺牍新钞》，见采有萧伯玉与钱牧斋书一首，即是《事辑》所录者，乃知其只依据《新钞》转载，盖未见春浮园原书也。编校时记。



《竹人录》

看书偶记(四七)

1941年12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竹人录》二卷，嘉定金元钰著，嘉庆丁卯自序，距今不过百三十年，余所得一册已残缺，存上半及卷下十叶，惟所缺均是前人诗文，尚无大妨碍。卷上小传三十七篇，所记凡五十七人，皆嘉定之以刻竹名者，亦是工艺史之好资料，而文复雅洁可喜，序言愿得窃附于《印人传》《陶说》诸书，与栎园诸书殆可以相比。金坚斋为钱竹汀弟子，在瞿木夫《古泉山馆诗集》中常有说及，嘉庆庚申有题扇诗，道光庚寅有挽诗，盖坚斋弟为木夫之妹婿，亦与有戚串关系也。民国甲寅义州李放编刊《中国艺术家征略》六卷，卷二竹类中转录金氏小传全部，而易其名曰《嘉定竹人传》，虽亦名实相符，惟随意改写书名，未免稍失谨慎耳。　　　　(十二月十日)



和陶诗

看书偶记（四八）

1942年5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和陶诗以东坡为最有名，曾得民国十一年张朗声等集资翻刻之本，清朗悦目。清代有舒白香、姚春木、孔宥涵诸人和诗，孔集近有嘉业堂刘氏刊本，原刻已不易得。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

> 《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鑅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

予于北京得一竹纸印本，卷端有白文小印曰汉军钟广，盖是杨子勤旧物，又从杭州得白纸本，皆是原刻，白纸本尤阔大，但别无印记。壬午冬日又得一册，白纸初印，卷首有朱文圆印曰蘖宧，白文长印曰消沉文字海，卷末朱文长圆小印曰子培阅。王氏序后空白有墨笔题记云：

惜庵先生为下相名士，藏书甚富，予过宿迁拟访之，未果也。今观是文，殊异流俗，以序宥函之诗，可谓双绝已。诗中投赠多予故人，宥函既逝，诸人亦多零落，五官与季重之书真不堪卒读也。咸丰庚申，丹徒庄棫书。

下有白文印曰蒿庵。又题一诗云：

枨触山阳凄，风流事竟乖，安仁不可作，
公绪又生埋，遗稿谁相颂，高文孰与侪，
佳儿亦我友，拭泪望长淮。

书刊于道光己酉，相去才十年也。予又曾见后印本，虽有破碎漫漶处，而细看乃出于同一板本，《风月谈馀录》所云翻刻本却未得见，不知是何时何人所刻也。（三十一年五月）



《谪麟堂遗集》

看书余记(四九)

1942年6月11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戴子高诗文集各二卷,最初所见为风雨楼活字本,心甚喜之,欲求原刻,得嘉业堂新印本。内有补刊六叶,而文集卷二漫漶处尚多有,甚以为恨。又买得旧本两种,价颇居奇,惟徐有壬周中孚诸传仍有残字,但无补刊叶而已。近日从小店买来一部,乃始完全无恙,大为喜慰。此集刻于光绪元年,至今不及七十年,佳本已难得如此,岂以板本不良之故,故易于残缺耶。戴君治公羊学,推重阳明,诗文中又常有故国之思,亦是清末之一奇士,刘申叔邓秋梅诸人曾加以表章,近三十年来渐就沉晦,后生恐将不复能举其名字,此亦深可叹息者也。　　　　　　(六月十一日)



《恒言录》

看书偶记(五十)

1942年6月15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昨日以六金买得《恒言录》二册，可谓廉矣。此书原有一部，乃十年前从修绠堂得来，照例极贵，书上记有年月，但不书钱数耳。惟凡有可喜之书予见即复留之，有重出二三者，今买此书亦为是故，阅之却复有所得，盖虽同一板本而又有殊异也。旧本题阮长生序，今改作常生，本文中长生案云云亦悉剜改，惟卷末有三处仍作长生，又元字旧缺末笔，今亦补足，间有遗漏未补者散见各处。阮长生不知何时改名常生，乃一一剜改旧文，可谓不惮烦矣，至补足缺笔字，则又何耶。旧本只末页题曰，“后学甘泉阮鸿北渚、仪征阮亨梅叔校”，今于目录后添刻一行云，“仪征阮亨仲嘉校”，或者此本校改乃出仲嘉之手，以避家讳为无谓，为之改正，亦未可知。此等板本之变更其事甚微，却亦甚有意思，值得查考记录者也。

(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记)

《列仙图赞》

看书馀记（五一）

1942年6月16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中国画列仙者向来无甚好手，近世竞称任渭长之《酒牌》，但细看亦只是配景见长，若仙人本身但是其间一部分，且亦不大见得若何仙气也。日前偶从书贾得日本释寂照所作《列仙图赞》三册，安永庚子刻，后归芸草堂印售，却颇别致。每册各四十图，图中大抵一人，略如绣像，只偶或有所执持跨坐而已，其最特别处则仙人容貌多奇古或枯槁衰老，如广成子老子黄石公诸人。酒牌亦有之，而二者极异。凡人固不得见真仙，但如以白云观老道之例推之，即或延年而未必能驻颜，则此所图写者或反近真，亦未可知耳。中国神仙家大约可以分作两派，其一禁欲的，辟谷导引以求不死，与印度外道仙人稍相近。其二服金石以至御女，可以说是纵欲的，秦皇汉帝以来信徒不少，观于举世艳称吕岩，可以知之，吕仙图像固俨然一多福多男子之员外相也。写枯槁的仙人，中国竟已无此观念，即萧山任君亦未着手，思之亦可惜事也。　　（六月十六日）



《樵隐集》

看书馀记（五二）

1942年10月5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樵隐集》五册，丹徒李遵义著，刻于民国癸亥，诗文杂著凡九种，殆因印书不多之故，市价奇昂。但一借阅，以个人偏好论之，则其中亦只《毛诗草名今释》，《鱼名今考》二种一册，差可取耳。《诗存》三卷中，《山居杂事》《岘南杂兴》等绝句四十馀首，写农家风物，亦有佳句，作集序者称其书确为农家云云，诗中只此可为左证，其馀都浑不似矣。《诗存》中有《哀发吟》七解，词既荒恶，而宝爱辫发，有类失心，似竟不知辫之历史者，可谓异事。大抵前清遗老惟知模拟明末隐君子而不能辨别情事之殊异，《西江诗话》载黎祖功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鹫，固堪称强项有骨气，今乃曰，虎豹犬羊一齐鞸，髡奴吾民何罪恶，此岂复成语耶。文人弄笔，纰缪时亦难免，惟赖有益友为校订厘正之，今观诸序亦多梦梦，则自无望矣。古人云，士先[①]器识，正非迂谈，但翻阅别集，深觉此事

① “先”原作“多”。

大难。结果只能反求诸己，惟读者有器识，乃可杂览，虽不希望拣金，披沙之能则不可缺者也。吴衔南《读书论世》卷十二“金代”一则云：

建炎初金人禁民间汉服，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真定太守李邈被执三年，使髡发，大骂，挝击其口，犹吮血噀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华服，契丹破晋，令华人华[1]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绛纱袍，元入宋亦无改服之令，独金人不如式之令何严耶。

《读书论世》以是被禁毁。前后才二百年，衔南之书几不可复见，后人乃盘辨而大言，亦宜也。（十月五日）

① “华”原作“法”。



《憩亭杂俎》

看书偶记（五三）

1942年11月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庚辰旧除夕得常熟鸽峰草堂抄本《憩亭杂俎》二册，海宁许树棠著，凡文三十七篇，末附《十二禽言》，目录未列入。所收皆游戏文章，其位置在尤西堂缪莲仙之间，《海昌备志》曾著录。案海宁郭尧臣著《捧腹集诗钞》一卷，啸园葛氏刊巾箱本，为《闲情小录》之一，蔡绍周著《怪吟杂录》二卷，今存勤艺堂邹氏抄本，自署武林，似此类著作多出杭州，如在江南则须推苏州也。据卷首孙清所录小传，憩亭嘉庆戊辰举人，己巳进士，壬申卒，年二十八，又夫妇生卒均同时日，亦奇事也。案《续夷坚志》卷一"任氏翁媪"一则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今得许氏夫妇，可谓无独有偶，然亦太是偶然矣。（壬午立冬后二日）

《二十七松堂集》

看书偶记(五四)

1942年11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以前只有日本翻刻十六卷本,首有文久壬戌盐谷世弘序,即清同治元年,此板似至近时尚存,故书甚常见,每部十册售价才二金耳。今年偶从杭州得原刻本,凡九册,计文十八卷,诗六卷,似系康熙时刻而后印者。与日本刻本比较,卷首朱蕖序及自序均相同,独多乾隆三年高纲序,曾璟撰传注云载《通志》,盖是后来所加。文卷一至十六亦同,惟有两篇题目上剜去三字,日本刻本不缺,可知所据为早印本,至于此处朱吟石之名为何有违碍,则未之知也。卷十七为《四书私谈》十八则,《答客问》五则,《山居杂谈》六十五则,卷十八则为杂文,编列颇凌乱,诗集六卷而题作卷十七至二十二,原来与文集并算,及文集添刻两卷亦列为十七十八,故看去乃似重出也。书系原装,每卷首叶有朱文直行印曰"戴同寿藏",馀别无印记。(十一月十日)

《栖云阁诗》

看书偶记（五五）

1942年12月8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栖云阁诗》十六卷四册，旧布帙题签下注云，“高南阜手跋，癸亥五月得于胶西故家。”第一册书面上有题字四行馀，文曰：

> 淄川宗家少司寇公念东先生刻集，其文孙绎常弟于壬戌三月廿五日邮寄至，越五日左手识存，翰。

下有白文方印，似是“西园图书”四字，题字左下方有二印，文模糊不可辨。目录后有题字八行云：

> 余向随先大人于淄川时，曾一遥瞻司寇公丰采于栖云阁，又十馀年再入淄川，逢其文孙绎常弟，留榻阁上，复数晨夕，今寄诗至而余老病竟无人理，追想陈迹，何胜惘然。壬戌二月重病左手记。

案高南阜卒于乾隆八年癸亥，年六十一，此为其一年前，计距今正二百年矣。高君左手书画真迹未得一见，今于无意中乃得其手书十馀行，亦大可喜，至于高念东诗亦复别有佳趣，则是别一事，抑亦其次也。（十二月八日）

《清诗初集》

看书馀记（五六）

1942年12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清诗初集》十二卷，蒋玉渊选，康熙二十年辛酉自序，乾隆时列入禁书目。所选有方孝标诗三首，即卷七卷九及卷十二，五七律七绝各一，殆亦是违碍之一原因欤。李文石著《旧学庵笔记》中有“方楼冈诗”一则，录其手书仿唐人拟古乐府百首之三，云方[1]楼冈集已奉旨销毁，其诗与书至不易得，三诗颇有唐贤气息，与褐夫古文可称二妙也。予不知诗，未审《清诗初集》所选者如何，但因此而方楼冈之诗共得有六篇，亦大是好事也。　　（十二月十日）

① “方”原作“按”。

《印人传》

看书馀记（五七）

1942年12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周栎园《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赖古堂原刊本，于市上分两处得来，而大小如一，可以合装一函，亦可喜也。《读画录》无印记，《印人传》卷一有白文印曰，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此书旧有风雨楼邓氏合刻本，白纸铅印，亦颇明净可读，今得原本，自更可珍重耳。栎园平常虽喜骂竟陵派，而究系明末人，流风馀韵固亦尚在，所著书如《闽小记》、《因树室书影》各种，均颇有风趣，此二录虽谈画与印，而不涉艰涩，多记性情事迹，盖实以传记为主而艺术为副也。

《印人传》卷一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云，君大腹，无一茎须，望之类乳媪，面横而肥，不似文人，字画诗文恒多逸致，见其手笔者拟其貌若美好妇人，亦异事也。又云，翻阅诸章，如见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时。此与印章或无甚关系，惟描写极妙，读之真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又书文国博印章后云，公左目虽具，而不能视，

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此种写法亦非普通所有，却是关于文寿承的难得资料，甚可贵也。

卷二书黄济叔印谱前，录其致济叔小札两通，惟阅《尺牍新钞》卷十二，此札具在，而署名周圻，字百安，抚州人，著有《尝实堂集》，则自别有其人，不知何以混合，岂栎园不欲自表暴，故借用其宗人之名耶，疑莫能明也。同日记。



陈授衣诗

看书馀记（五八）

1942年12月1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潘清撰著《挹翠亭诗话》卷一云：

《韩江雅集》，全谢山为序，《田家杂兴》题，陈授衣云："儿童下学恼比邻，抛堉池塘日几巡，折得花枝当旗纛，又来呵殿学官人。"闵廉风云："驴背田翁傍晚回，绕身儿女笑轰雷，城中完纳官租了，带得泥婴面具来。"数诗描写难言之景，可谓体贴入微。

寒斋适有陈氏《孟晋斋诗集》，乃取出翻检两过，尽二十四卷中不见儿童下学之诗，殆未编入集中也。但别又找到几首说及儿童生活，亦均可喜。卷十二《苦雨》云：

水田高下没青秧，一月无多见太阳，儿女不知调燮事，

> 绿窗苦恕扫晴娘。

又《清明二首》之一云：

> 燕子低飞掠草烟，城隅绿浪系红船，溪童三五趁朝雨，
> 偷折柳枝来卖钱。

卷二十《上巳偶书》云：

> 清明杨柳重三荠，采折儿童竞卖钱，可惜一离烟渚畔，
> 竟随葱蒜市门前。

此种景象其实并不怎么难写，只是平常诗人看不上眼，不肯收拾来作诗料，故极少见耳。诸诗中仍以下学一绝为最有意思，因其主意即咏儿嬉，与他诗之偶用作材料者不同。《宾退录》中载路德延《孩儿诗》五十韵，亦是难得之作，唯每句只咏一事，有如百宝衣，少有贯串耳。



角先生[①]

看书馀记(一则)

1940年作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往年译《希腊拟曲》,《昵谈》篇中有"抱朋"一语,曾问胡适之君,拟译作"角先生",无违碍否?胡君笑诺,故书中如是写,而校对者以为是人名,在角字旁加了一直画,可发笑也。民间虽有此称,却不知所本,疑是从明角来,亦未见出处。后读林兰香小说,见第廿八回中说及此物,且有寄旅散人批注云:

> 京师有朱姓者,丰其躯干,美其须髯,设肆于东安门之外而货春药焉。其角先生之制尤为工妙,闻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钱之多寡分物之大小,以盒贮钱,置案头而去,俟主人措办毕,即自来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案此说亦曾经得以传闻,其见诸著录者殆止此一节乎。林兰

① 见《知堂回想录》。

香著书年月未详，余所见本题道光戊戌刊，然则至今亦总当是百年前事矣。友人蔡谷清君民国初年来京，闻曾购得一枚，惜蔡君久已下世，无从问询矣。文人对于猥亵事物，不肯污笔墨，坐使有许多人生要事无从征考，至为可惜。寄旅散人以为游戏笔墨无妨稍纵，故偶一着笔，却是大有价值，后世学人皆当感激也。

日本之再认识[1]

1942年1月1日刊《中和月刊》3卷1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有其评价，但在我个人看来，虽然不过是异域的外行人的看法，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仿佛我们看顶好的作物大都成长——至少也是发芽于那个时期的。那时的东京比起现在来当然要差得远，不过我想西方化并不一定是现代化，也更不见得即是尽美善，因此也很喜欢明治时代的旧东京，七年前我往东京去，便特地找那震灾时未烧掉的本乡区住了两个月。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而且还觉得可喜，所以我曾称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颇多留恋

① 后又收入《知堂乙酉文编》，并删去了附记。

之意。一九一一年春间，所作古诗中有句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即致此意，时即清朝之末一年也。

我所知道的日本地方只是东京一部分，其文化亦只是东京生活与明治时代的文学，上去到江户时代的文学与美术为止，也还是在这范围内，所以我对于日本的了解本来是极有限的。我很爱好日本的日常生活，五六年前曾在随笔中说及，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的性分与习惯。我曾在《怀东京》那篇小文中说过，我是生长于中国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里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适合的。可是此外还有第二的原因，这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我们那时又是民族主义的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从前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着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觉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马褂在民国前都作胡服看待，章太炎先生初到日本时的照相，登在《民报》上的，也是穿着和服，即此一小事亦可以见那时一般的空气矣。关于食物我曾说道：

> 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才得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当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无不可。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更是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

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之黄土萝卜，蒟蒻即四川之黑豆腐，刺身即广东之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

谷崎润一郎在《忆东京》一文中很批评东京的食物，他举出鲫鱼的雀烧与叠鳎来作代表，以为显出脆薄贫弱，寒乞相，无丰腴的气象，这是东京人的缺点，其影响于现今以东京为中心的文学美术之产生者甚大。他所说的话自然也有一理。但是我觉得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这地方，换句话可以说是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假如有人请吃酒，无论鱼翅燕窝以至熊掌我都会吃，正如大葱卵蒜我也会吃一样，但没得吃时决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馋，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点还是白鲞汤一类，其次是鳘鱼鲞汤，还有一种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么的汤，这实在是寒乞相极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这寒乞即清淡质素之中，殆可勉强称之曰俳味也。

日本房屋我也颇喜欢，其原因与食物同样的在于他的质素。我曾说，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又说，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

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厨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馀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门，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向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现在想起来，诚如梁实秋君所云，中国的菜或者真比外国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舒适，但是关于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间，我还是觉得以日本旧式的为最好，盖三十馀年来此意见未有变动也。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在论《圣芳济及其他》(St. Francis and Others)文中有云：

>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

我现今不想来礼赞裸体，以免骇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足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件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足，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Sandala），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Geta），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此亦别无深意，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能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所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见憧憧往来者都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如现今在国内行路所常经验，见之令人愀然不乐者，则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

我对于日本生活之爱好只以东京为标准，但是假如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与时代都不成问题，那时东京的生活比后来更西洋化的至少总更有日本的特色，那么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浅也总不大错，不过我凭的是经验而不是理论，所以虽然自己感觉有切实的根底，而说起来不容易圆到，又多凭主观，自然观察不能周密，这实是无可如何的事。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对于日本文学艺术的了解也只是部分的，在理论上我知道要寻求所谓日本精神于文学上必须以奈良朝以上为限，《古事记》与《万叶集》总是必读的，其次亦应着力于平安朝，盖王朝以后者乃是幕府的文学，其意义或应稍异矣。但是，古典既很不易读，读了也未能豁然贯通，像近代文学一样，觉得他与社会生活是相连的，比较容易了解。我只知道一点东京的事，因此我感觉有兴趣的也就是以此生活为背景的近代的文学艺

术，目前是明治时代，再上去亦只以德川时代为止。民国六年来北京后这二十年中，所涉猎杂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日本的，大抵是俳谐，俳文，杂俳，特别是川柳，狂歌，小呗，俗曲，洒落本，滑稽本，小话即落语等，别一方面则浮世绘、大津绘，以及民艺，差不多都属于民间的，在我只取其不太难懂，又与所见生活或可互有发明耳。我这样的看日本说不上研究，却自己觉得也稍有所得，我当时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特[①]异的国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来，我只径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结果是找着许多与别人近同的事物，这固然不能作为日本的特征，但因此深觉到日本的东亚性，盖因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之思想交流，在东亚民族间多是大同小异，从这里着眼看去，便自然不但容易理解，也觉得很有意义了。在十七八年前我曾说过，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就是这种意思。我向来不信同文同种之说，但是觉得在地理与历史上比较西洋人则我们的确有此便利，这是权利，同时说是义务亦无什么不可。永井荷风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曾云：

>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

① 此处原衍“特”字，已删。

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永井氏的意思或者与我的未必全同，但是我读了很感动，我想从文学艺术去感得东洋人的悲哀，虽然或者不是文化研究的正道，但岂非也是很有意味的事么？我在《怀东京》一文中曾说，无论现在中国与日本怎样的立于敌对的地位，如离开一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之东洋人也。我们现时或为经验所限，尚未能通世界之情，如能知东洋者斯可矣。我们向来不自顾其才力之不逮而妄谈日本文化者盖即本此意，并非知己知彼以求制胜，实只是有感于阳明“吾与尔犹彼也”之言，盖求知彼正亦为欲知己计耳。

这种意见怀抱了很久，可是后来终于觉悟，这是不很可靠的了。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我们如看日本文化，因为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为其东亚性，这里便有一大谬误，盖上所云云实只是东洋之公产，已为好些民族所共有，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再于大同之中求其小异，或至得其大异者，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始能比西

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我在上边说了许多对于日本的观察，其目的便只为的到了现在一笔勾消，说明所走的路全是错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日本文化中之东亚性一面，若日本之本来面目可以说是不曾知道，欲了知一国文化，单求之于文学艺术，也是错的，至少总是不充分。对于一国文化之解释总当可以应用于别的各方面，假如这只对于文化上适合，却未能用以说明其他的事情，则此解释亦自不得说是确当。我向来的意见便都不免有这些缺点，因此我觉得大有改正之必要，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这是什么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说。但是我也很考虑，我猜想，这或者是宗教罢？十分确定的话我还不能说，我总觉得关于信仰上日华两民族很有些差异，虽然说儒学与佛教在两边同样的流行着。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京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的人，却很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徒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师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的而并不热烈或神秘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Kamigakari）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巡，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

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识的动着。外行的或怀疑是壮丁们的自由行动，这事便不难说明，其实似并不如此简单。柳田氏在所著《祭祀与世间》第七节中有一段说得好：

>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感情的经验。有时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是特别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见了也并不一直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Y字，又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起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近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里有相似处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移入的，日本的情形又与此不同。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上层思想界也包含在内。知识阶级自然不见有神舆夫的那神凭状态了，但是平常文字中有些词句，如神国，惟神之道（Kaminagara no michi）等，我们见惯了，觉得似乎寻常，其实他的真意义如日本人所了解者我们终不能懂得，这事我想须是诉诸感情，若论理的解释怕无是处，至少也总是无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可惜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知道宗教之重要性而自己是不会懂得的，因此虽然认识了门，却无进去的希望。我常想，有时也对日本友人说，为的帮助中

国人了解日本，应当编印好些小书，讲日本神社的祭祀与出巡，各处的庙会即缘日情形，乡村里与中国不同的各种宗教行事与传说，文字图画要配列得好，这也是有意义的事。我们涉猎东洋艺文，常觉得与禅有关系，想去设法懂得一点，以为参考。其实这本不是思想，禅只是行，不是论理的理会得的东西，我们读禅学史，读语录，结果都落理障，与禅相隔很远，而且平常文学艺术上所表现的我想大抵也只是老庄思想的一路，若是禅未必能表得出，即能表出亦不能懂得，如语录是也。这样说来，图说亦是无用，盖欲了解一民族的宗教感情，眼学与耳食同样的不可靠，殆非有经历与体验不可也。我很抱歉自己所说的话多是否定的，但是我略叙我对于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剩下一句肯定的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这句话虽是很简短，但是极诚实，极重要的。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虽不敢自附于儒家之林，但于此则不敢不勉也。　　　　（廿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去年适值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计划发刊纪念论文集，除分区征文外，又约人给写文章。该会北京代理人找到我的时候是在三月里，期限年底交稿，我因为在眼前还有十个月工夫，而钱稻孙先生也应允写稿，我若是写不出，有钱先生一篇也就可以应付过去，所以贸然答应了。不料时光全靠不住，忽而已是十二月，钱先生往东京参加纪念典礼，论文不曾写得，我这才着了忙，但是没有法子，只好如老秀才应岁考，硬了头皮做去，考列四等原是觉悟了的，幸而我与国际文化振兴会约定的时候预先有一着埋伏，即以不受任何报酬为条件，这意思就是说，文章写得不好也就莫怪，我的确还声明，文如不适用可以丢到字纸篓里去。乃承

振兴会不弃收下，且交给某杂志将译文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号上。本来我的条件里也有一条，便是付译时须把译文原稿给我看一遍，这回却并没有照办，大约不是振兴会而是杂志社所译的吧。但因此不幸有些误译，最重要的是末一节里，我说在知识阶级中自然不见有神凭状态，而译文却是说有，以否定为肯定，这错得多么滑稽而奇怪。现在我就将原文发表一下，所说的话对不对都以此为准，庶不至以讹传讹也。

（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再记）



《药味集》序[①]

1942年1月24日作
未署名
收入《药味集》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馀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

① 1942年7月刊《古今》第5期。

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馀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①]

1942年2月10日作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梁盛志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治史学，又留学日本，专心于中日文化交流史迹之研究，历有年所矣。近日更就文学方面，寻求两国相互之关系，编为一书，携以相示，且属作序。余年来不写文章，又俗务繁冗，亦苦无暇，唯读梁君之作，不禁有所感触，为书数行。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终致力于日本文化之研究，过去无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为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现在几乎尽人皆言日本文化，梁君仍屹然守其故辙，此寂寞恐亦与前此不相下也。昔曾有言，在非亲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在亲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凡对于日本事情说真实话的，永远难免此难。余读国际文化振兴会征文集中梁君之文，甚为梁君幸，但心中亦实颇为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颇深，而意又甚诚，故所言悉从衷心发出，在现今中国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谈日本文化之时，梁君独真率地发表其中

① 1944年11月刊《文史》第1期，署名十堂。

国人的意见，其不被视为谤书者盖几希矣。乃振兴会独有取焉，审查报告中且有人云，愿得闻诚实的苦言，胜于肤泛的谀词，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夸大言之，谓中日相知以至相和之机即基于此，亦无不可。梁君本此精神，益勉力于交互绍介之工作，为两国造百年和好之因，实为一大事，此书从文学上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之事实，正是此工作之一部分，今得早日出版，大可喜也。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但得见学问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实为大幸，故写此篇以应其需，若文章之芜杂，则固已审知之矣。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钱写本《说文窥管》后记

1942 年 5 月 16 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钱玄同先生手写《说文窥管》十四页，旧藏浙江图书馆，今不知尚存否。偶从杭州书店得照相本一份，因为影印流传，亦聊为亡友作纪念也。玄同写是书时盖在民国元年，正供职浙江教育司，余亦任视学，同住头发巷丁氏三十六峰室楼上。余既不出视，又无办公处所，常倚枕观书，所谓卧治时代是也。转眼三十年，玄同墓草已三枯荣，坐对遗编，过去事迹历历心头，曷胜惆怅。后有刘子庚先生跋语，子庚殁亦十馀年矣。跋称文之著书散佚，盖未确。文之有《柯亭子诗文集》共三十五卷，道光末所刻，子庚殆未之见也。陆氏校记补正缺文，颇有用处，唯其中亦有玄同故意改写者，须分别观之，因原本有此二纸，故仍附于末。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京之苦雨斋。



勤艺堂题跋抄

1942年9月1日刊《中和月刊》3卷9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近来买几册旧书闲看，常遇到勤艺堂邹氏藏本，起初不大注意，但其书多有题跋，觉得颇有意思，因汇抄在一起，聊为邹君略留鸿泥之迹而已。

（一）《梦忆》

《梦忆》八卷，张岱著，道光壬午王见大第二次刊巾箱本。《梦忆》向来有一卷本，乾隆乙未金忠淳刻入《砚云甲编》，光绪初年有《申报》馆铅印本，又八卷本乾隆甲寅王见大刻，咸丰壬子伍崇曜据以刻入《粤雅堂丛书》，若王氏第二次刊本则未之前闻，唯《复堂日记》卷三所云，癸酉春间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甚工雅，或即指此书亦未可知。书四册，卷首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朱文曰“师竹楼主人珍藏”，每卷第一叶下朱文印曰“丽生存淦”，第四册七八两卷系手抄本，末有题跋云：

家藏《梦忆》五册，计八卷，山阴张岱撰，前有王文诰序。咸丰庚辛之间避乱官家埧，失去七八两卷，兹借得南海伍氏《粤雅堂丛书》本录补之，并录《砚云甲编》所载序文及伍崇曜跋，以资考证。据崇曜所见本每条具缀纯生氏云云，且每卷直题王文诰编，而此本无之，伍氏又冠以“陶庵”二字，而此本惟题“梦忆”，意者崇曜所据以刻入丛书者别是后人所重刻者，此则确为王氏原本无疑也。李敏达公《西湖志》载先生尚有《西湖梦寻》五卷，惜未见。光绪己卯十一月，海宁三百有六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白莲花寺前之勤艺堂。

白文印曰“邹存淦印”，朱文曰“俪笙”。

(二)《西江诗话》

《西江诗话》十二卷，裘君弘辑，康熙时妙贯堂刊本。《西江诗话》前已得一部，并附有《妙贯堂馀谭》六卷，唯印工纸张均不及此本，故重复收得之。卷首有白文印曰“杭州邹存淦鉴藏书画之章”，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邹俪笙读书印”，末有跋二，其一云：

先王父星桥公极爱书，虽零缣只字，断卷残编，宝之不啻拱璧。予自束发受书，即亦爱先王父之所爱，粤匪未扰浙[1]西前，尝会计所藏卷至一万有馀，亦云富矣，及贼来半遭窃攘，半付劫灰，所留者仅寄存村舍十分中之一二耳。此书系在山阴斗门市购得者，前有高禹泉先生题字，禹泉为斗门先哲，有能书名。予深惜家藏之书保之不能及身，虽爱之如命，奈金尽床

① “浙”原作“淅”。

头，未必能如前积聚，而又叹高先生之书不能保及子孙，披览之馀，不禁泪随言下，因即泚笔记之。同治五年丙寅长至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山阴客居所居堂。

朱文印曰“俪笙”，偏左又一朱文大印曰“客居所居堂印”。其二云：

《西江诗话》十二卷，新建裘君弘著，略仿《全唐诗话》例，而留意梓桑，亦诗话中之卓绝者。乾隆间访遗书，凡涉逊国事，立论舛谬及语句有违碍者，皆在禁燬之列，是书卷十内黎祖功訾山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鸽”句似触碍，又书内有钱谦益名，亦为江西巡抚郝公查禁，然所禁惟此两句，似不应听其湮没不传。溯自丙寅以后，十八年来积聚之书约得一万八千馀卷，新刊十之七，旧板仅十之三，市上失传之本则百中无一，此书或可首屈一指，吉光片羽，尚足宝贵，况全书乎。兹复重加面页，将第三卷蛀洞修补完整，储诸箧衍，后之人其保之。光绪十年甲申立冬前二日，海宁三百三十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重识于杭州勤艺堂。

印二如《梦忆》跋。高禹泉题字今不存，想是写在书面上，政邹君重加面页以保护之，其后殆均已失去矣。

(三)《兼本杂录》

《兼本杂录》原订一厚册，目录下朱文印曰，“邹俪笙读书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一首页白文印曰，“邹氏家藏”。末有跋云：

右《兼本杂录》四卷，毛西河先生奇龄撰，书名下有“艾堂辑阅”四小字，艾堂不知何人，所存仅传二卷，碑记志铭各一卷，前有目录适满一页，其只此四卷，抑尚有别种，均未知。是书板式与《西河全集》同，确系当时毛氏刻本，惟全集中未载，盖由集辑录之本，原不妨别行也。惜卷端已被鼠啮，三四两卷边上字亦失去。予于同治庚午挈眷回杭时得于清河坊之旧货摊头，为之整理一过，欲补缺字未能也，今又为蠹所蚀，复折补之。按西河所撰《四书改错》及《四书正事括略》今通行本皆未载入，不仅此书也，所足重者，此板久亡，似已无第二本传于世耳。补成，略述数行于后。时光绪戊戌[1]冬至后十日，海宁邹存淦俪笙氏识于杭州寓舍之勤艺堂，时年政七十。

印如前。

(四)《西湖柳枝词》

《西湖柳枝词》五卷，嘉庆辛酉刊，前有阮伯元、王述菴二序。序后空白页有邹氏题云：

西子湖边烟树昏，空城穴蚍阵云屯，钱唐世世无兵燹，冲晦之言奚足论。

读罢乾嘉绝妙辞，感时怀旧几人知，愿教重享承平福，去作西湖泣柳诗。

咸丰辛酉避乱山阴，得王兰泉先生主敷文书院时所辑《西湖柳枝词》五卷，时粤匪窜杭，兵戈载道，读之不胜今昔之感，

---

① “戊”原作“戌”。

因附题两绝句于后。海宁后学邹存淦谨识。

朱文印曰“俪笙”。卷一首页白文印曰“俪笙珍藏”，朱文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卷末白文印曰“俪笙复阅”。

（五）《茹古斋诗文抄》

《茹古斋诗抄》一卷，《文抄》二卷，张复著，邹氏手抄本。卷首有边浴礼序，阮伯元题辞，吴清鹏题诗，高炳麐撰传，谭复堂赞。邹君所作别传，称其精太乙数，知未来事，语多神奇。《诗抄》后记云：

> 甲子秋分前三日，借山阴金氏藏本抄。光绪戊寅初夏，重录一过。俪笙记。

似其原本在山阴也。《文抄》卷上后记云：

> 同治甲子八月，海宁邹存淦手抄于山阴斗门镇之客居所居堂。
>
> 光绪戊寅四月，次儿维祺误用以褙书，幸未散弃，惟答马元伯书磨灭五六字，因复重抄一过。予年才五十，视已茫茫，两手又患风气，故不复能端楷云。四月廿七日，俪笙志于杭州白莲花寺前勤艺堂。

（六）《怪吟杂录》

《怪吟杂录》二卷，蔡绍周著，邹氏手抄本，蓝格直行稿纸，中缝下有字一行曰“师竹友兰室抄”，盖即是师竹庐所专用也。卷首有

白文印曰“邹氏家藏”，前为王闻、张应桂二人题辞，嘉庆甲子自序，署名“土桥一怪”。末有跋云：

> 蔡藕船《怪吟杂录》二卷，兵燹后板已不存，次儿璟得之友人案头，因借录出，以娱暇日，惜卷尾各缺，无从补全为可憾耳。是书与吾乡郭雪帆先生《捧腹集》后先称同调，滑稽玩世，有东方曼倩之风，似出寒山拾得上，是耶否耶，读之者当有以辨之。光绪八年壬午十月望前九日，海宁三百二十有三甲子老人邹存淦俪笙甫识于杭州勤艺堂之南窗。

印文同《梦忆》跋。按《捧腹集》诗抄一卷，海宁郭尧臣著，光绪丁丑啸园葛氏刊，为《闲情小录》八种之一，葛理斋序称为同人所著，然则郭雪帆当是同光时人，与蔡藕船相去约有五十年，若以诗论则不得不许后来居上耳。

（七）《修川小志》

《修川小志》一册不分卷，邹存淦著，原稿本。卷首朱文印曰“勤艺堂邹氏藏书记”，有同治丙寅陈敦彬序，丁卯姚夔序，内分河道、桥梁等十四目，目后有记云：

> 长安镇一名修川，海宁州西北之一隅也，四面无山，方广仅五六里，语焉而详，所见亦小矣。然古人穷愁著书，各有见地，予生于是乡，自非穷愁，曷尝留心于此。后山曰，士大夫见天下不平事，不可懷不平之意。予固非不平而鸣者，况布衣而非士大夫乎。尝记辛酉秋红羊劫至，一镇之人不克保其乡土，携老挈幼，奔走苍皇，幸而获全，已无所归矣。嗟乎，昔之画栋

连云，今则荒烟蔓草，抚今追昔，能不依依，因表其所见所闻，以类分隶之，修川之典故略云备矣。知我罪我，俟之后之君子。同治甲子新秋，海宁长安里人邹存淦述。

末又有跋云：

《修川小志》一卷，辑于山阴斗门镇，当避乱之时，怀古思乡，情有不能自已者，惜艺文一册已付劫灰，不能复称全璧[①]。第修川向无志书，李梁两先生所辑又复不存，虽后之学者自能超越前辈，知所未知，亦宜略存梗概，以备考究，故于暇日重录一过，付儿辈藏之。光绪五年冬十月之吉，三百有五甲子老人邹存淦俪[②]笙氏识。

印文同前，所用亦是师竹友兰室纸，与《怪吟杂录》相同。庙祀类中记金龙四大王庙，书眉有附签，引《矩斋杂记》，文凡七行，末署男寿祺谨补。据此乃知邹君即是邹适庐之先德，觉得亦是一新发见也。邹适庐原[③]名寿祺，光绪己丑举人，后因得一汉铜印，乃改名从之曰邹安，民国初年在仓圣明智大学，从姬觉弥编刊书报，即用此名，其题记文字时有疵累，亡友饼斋常引为谈助。勤艺堂著作惜不得多见，《修川小志》虽只是地志小册，似甚为著者所珍惜，亦竟未得刊行，广仓学窘盖亦不能赏识也。丁丑战后江浙故家书物多散出，杭州书店[④]目录上且列有《适庐日记》多种，可以想见。鄙人所收有勤

---

① "璧"原作"壁"。
② "俪"原作"伊"。
③ "原"原作"未"。
④ "杭州书店"原作"杭书州店"。

艺堂题记之书只此数册，此外无可访求，念之怅怅。唯劫火之馀，金石消铄，尚能有此诸书落吾手中，不可谓非大幸，此正亦值得记念者也。（民国三十一年[1]七月二十八日，记于北京）

〔附记〕 寒斋所收勤艺堂藏本尚有《钝吟文稿》及《杂录》《武陵山人遗书》《清谷文抄》《书契原恉》等，因无题记，今从略。又饼斋曾对太炎先生谈邹适庐事，先生笑曰，景叔是我同门，盖亦是曲园先生门人也。

---

① "年"原作"日"。

《骆驼祥子》日译本序[①]

1942年9月25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新文学之兴起，于今才二十馀年，时间还很短，成绩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大抵在多少有传统的根基存在的地方，新的成就也比较的明显，例如散文作品、小说与随笔都还相当的发达，比起诗歌戏曲来，在量与质上似均较优。这里边当然有好些原因，但是语言问题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学中的事与理，即内容尽可随时变更，只要有"诚"存在便好，可是表现的形式假如不称心，缺少了"达"，那就不能令人领解其佳处了。小说与随笔之发达较快，并不在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不，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更了，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用，不像诗歌戏曲之须要更多的改造。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用语

① 日本"新潮社"1943年3月初版。

有可凭借，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竹中先生精通中国文学与世相，近来费其一年馀之光阴，尽心力以翻译老舍所著的《骆驼祥子》，殆亦着眼于此。近日译成付梓，征序于余，余久不读新文学书，今但就感想所及，写此数行，聊以塞责，若关于文学批评，则当俟之识者，非鄙人之力所得及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周作人识。

《汤尔和先生》序

1942年9月3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幼松君以所写《汤尔和先生》一书见示，嘱写小序，余久不作文，然不敢辞也。汤先生是我们留学日本的同乡前辈之一人，本来前辈很不少，有些也都奔走国事以至于殁，一样的可纪念，但是我对于汤先生觉得特别有所感服，则以汤先生乃是医家也。《汉书·艺文志》曰，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原来医术通于治道。古人又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盖医乃仁术，以解救疾苦为职志，即是圣王之用心，又博通物理与人性，由此出发以向学问艺术，皆能有深远的发展。此是世间周知的事实，汤先生亦正是很好的例。汤先生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半，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若是办学则三十馀年来与医学不曾脱离，中国现在仅有的一点医药新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汤先生建筑下来的。我尝想人类最高的文化无疑的是医学，因为人类最高的道德思想是仁，而医学乃是惟一的救人的学术。

我们看汤先生一生行事彻头彻尾是一个医家态度，即此可知其伟大之所在了。幼松君能以朴实而流丽之笔，把汤先生的事迹记述出来，很值得我们的称赞与爱读，但是这又与一般通行的法国派传记小说不同，形式虽似故事，所记事迹却都是实在，从家族中得来者，此点又极可珍重。我很愿意对于读者报告一声，请大家注意者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周作人识于北京。



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

1942年10月1日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我所喜欢的书籍之一，自从民国九年初次见到，一直如此以至今日。原书刻于光绪丙午，距今才三十六年，市上尚有新印本发售，并不难得，但是我有一本，纸已旧敝，首页有朱文印二，曰铁狮道人，曰姓富察名敦崇字礼臣，篆刻与印色均不佳，所可重者乃是著者之遗迹耳。寒斋所得此外尚有《紫藤馆诗草》《南行诗草》《都门纪变三十绝句》《画虎集文钞》《芸窗琐记》《湘影历史》等六种，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算这《岁时记》，近七八年中英文日文译本都已出来，即此也可见为有目所共赏了。英译本名 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译者 Derk Bodde，一九三五年北京法文书店发行，价十三元半，但是现售加倍了。日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记》，小野胜年译，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发行，价金六十钱也。

日英译者译注此书，有相当的见识，可以佩服，故略加批评，亦

责备贤者之意，若是一般应时投机之物，则自不暇评，实亦并不暇买也。

两译本有一共同的缺点，这便是关于著者生活之道听途说。英译本根据《紫藤馆诗草》卷首《铁狮道人传》的资料，说到著者之死，其文云：

> 传记言在宣统三年七月，他病了，回北京后不久死去，年五十七。

查周承荫著传记原文云：

> 宣统三年七月因病请假就医，甫至京遽遭国变，遂不复出，时或自言自语，时或拍案呼咤，惟遇隆裕皇太后大事，成服而出，缟素二十七日。

案隆裕太后之丧在民国二年癸丑，敦氏尚在，年五十九矣，然则不如译者所说死于辛亥也明甚，是年只是遂不出耳，非是遂不起也。日译本绪言中所说则尤奇，其文云：

> 宣统三年七月因病辞官归北京，十月革命起，自此遂不复出门，宣统帝大婚毕，乃至通州八里桥投水自杀。遗老怀黍离麦秀之叹而死者，王国维之前，有斯人焉，此桥川时雄氏评彼之言也。时行年五十七。

案宣统大婚典礼在民国十一年壬戌，敦崇年六十八。又查《画虎集文钞》，卷末有碣石逋叟周毓之诗序，毓之即周承荫，序文末署甲

子，自称七十老人，可知两年前未曾有跳河之事矣。此序文作于正月元日，又云病中，我们所能知道者止此，即截至尔时止，铁狮道人尚健在耳，若何时逝世，则因现在找不着资料，未能知悉也。

译文误解，在西洋人自属难免，但不知何以无华人为之先一校阅也。英译本“封台”项下，说“甚不闲”以前颇盛，近亦如广陵散矣，译作消散如广陵，注言广陵即扬州，昔繁华而今衰歇。又“端阳”项下，竹筒贮米以祭屈原，以楝叶塞其上，译作荷叶，似误听楝字为莲字音也。日译本自不至再误矣，唯亦偶有疏忽处，略举二三于下：

五十七页“厂甸儿”节，搬指译作指环，按平常指环无加在拇指上者，意有参差，英译本不误。又碧霞玺译作碧霞色玉之印章，按这宝石名称的语源虽未详，但玺字并不如字作印玺解，是无疑的，英译本作柘榴石，虽色彩或不合，似尚较佳。

一四二页“江南城隍庙”节，原文迎赛祀孤，这所祀大抵是孤魂罢，因为期日是中元，清明，十月一日，参考各节亦可明了也。日译本云，迎此城隍神而祀其孤独者。案英译本云，欢迎并祭祀此诸孤独之神们。二本误解处相同，即以孤为孤神，其实这里的神们都不孤独，不但城隍皆有夫人，即从神亦犹官衙之吏胥，徒党甚众也。

但是更大的缺点乃是改字的错误。一四四页“金钟儿”节，原文云，金钟之号，非滥予也。日译本注曰，滥予意稍难通，恐是滥竽之误。附录原文便径改作滥竽，卷末校订表中亦并列入。按滥予不误，英译本作 extravagantly conferred，亦尚不错，若云滥竽，反不通顺矣。

又一七九页“蛐蛐儿”节，原文云：或又谓聒聒儿者即蝼蝈也。日译本注曰，原文为聒聒儿，则意味难通，乃以意改为油壶卢。译文云，或者所谓油壶卢者即是蝼蝈。按原文或谓，本来只说或人有

此一说，自己全不负责，译文则全是著者的意思，口气全不相同。又聒聒儿亦写作蝈蝈儿，因此蝈而连想到蝼蝈，乃有此或说，油壶卢则连搭不上，至于讲事实，《月令》的蝼蝈郑氏注云是蛙，俗语的蝼蝈蝼蛄，河北亦有土名曰拉拉蛄，只能作蚯蚓鸣，无沿街叫卖之价值[1]也。

以上略举数项，非敢吹毛求疵，只是求全责备，希望此种有意义的译者，减少缺点，进于完善，别无他意也。关于二书的插画等，虽亦稍有意见，兹姑从略。　（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北京）

① “价值”原作“值价”。

《白川集》序[①]

1942年10月18日作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认识傅芸子君已有十年，现在北京图书馆及北大文学院任职，更朝夕可相见，但是提及傅君，总即令人想到北白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傅君客日本京都甚久，居于白川之滨，我们平时通讯写熟了这地名，现在傅君结集居东所作文章，题曰《白川集》，觉得这名字是再适切也没有的了。傅君为人敦厚温雅，日本语所谓美也比远，此可云都人士也。其在日本京都与在中国北京同样的相宜，其所研究者为两国之艺文文物，又特注重于相互之关系，如俗语有之，此宁非宝剑赠与钟馗耶。今人盛唱文化交流，此诚为当务之急，唯文化交流其实是古已有之，其年月固甚长远，其成绩因之亦更广大，非后人所能企及。近世中国之注意日本事情者，固亦大有人赞叹其固有之美，然太半对于过去两国间之文化交际特致其留连欣慕之意，实例至多，即傅君此集，其用意盖与《正仓院考古

① 1944年11月刊《文史》第1期，署名十堂。

记》相同，亦正可为最近的一好例子也。窃意异民族间文化相通，自亦各有其饱和之度，今言中日文化交流，似不重在互为炫售，第一当谋情意之交通，如是则言昔年相互之关系，或今日各自之殊异，其用处均极大，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政治之用，谅当为东亚国士所许可欤。我愿傅君或继此而更有《北海集》之作，以北京为中心，为乡土研究之探讨，此于傅君亦是极适切之胜业，且与以前工作相合正如鸟之两翼。古人有言，得陇而望蜀，此殆人之常情，幸傅君勿笑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周作人识于北京。

《越 言 释》

桑下丛谈（六）

1942年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越言释》二卷，茹敦和三樵著，余求之二十馀年，共得两本。一啸园葛氏刻巾箱本，凡有两部，以其一赠钱玄同君，二原刻大本，书两卷不分别上下一二，惟灯之卷居前，筷之卷次之，与啸园本正相反，不知何也。巾箱本有道光己酉杜竹庄序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啸园刻本即从此出，或上下分卷尔时即如此耶。一斋公于余为从曾祖行，幼时犹及见其子揆初公，惜所刻书不可得见，盖毁于太平天国之乱，江浙间道光咸丰年刻书常极难得，殆过于雍正乾隆本，即以此故也。



《越 谚》

桑下丛谈(七)

1942年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范寅啸风著《越谚》卷上《谣谚之谚第七》"九九消寒谣"云,头九二九,相唤勿出手。注云,越呼揖人为相唤,勿出手者冷也。案作揖古有唱喏之称,绍兴称相唤正是此意,如何唱法今虽不可知,唤则犹可解,盖昔时相见必互唤一声,家族中虽不揖亦如是也。陈训正《甬句方言脞记》云,对揖俗称相欢,谓通欢意也,可知宁波亦有此语,惟其解说疑未确,当以唤字为正。又《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东瓜雕猪砦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之词云,冬瓜好雕猪砦么?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罢?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砦即是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砦,若冬瓜本极普通,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为准欤。



绍兴少鱼

桑下丛谈(八)

1942年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徐珂仲可著《可言》卷十有一则云：

> 绍兴今为鱼稻之乡，而宋时少鱼。庄季裕《鸡肋编》，越州在鉴湖之中，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难得。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

案谓越少鱼薪，此事不可信，谚语只是如天上九头鸟等，用以相谤者耳。但有人无义一语实确，此则不必争也。尝读《国语》，见《越语》下记范蠡答王孙满之言曰：

>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陼，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谖谖者乎。

此天下之无义人也，宜为天下人所骂，然而也很伟大，古今竟无第二人，不佞畏而敬之，不敢骂也。若后世庸人们满阬满谷，旁人遂以骂范少伯者骂之，虽亦不能争，然而其细已甚，则又是另一回事矣。孔行素著《至正直记》致慨于鄞不知耻，越薄如纸，又引例云，吾侄婿袁氏子无情尤甚，若非世人类者，其妄诞谲诈，浙西未尝见之。此等细人世常有之，惟人或与遇见或不遇见，亦有幸不幸耳。

绍兴城门

桑下丛谈(九)

1942年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可言》卷一引丁修甫著《小槐簃诗稿》,有句云,杭城十门未游遍,匆匆行年将大衍。余十三四岁时曾住杭州两年,往来多过候潮门,此外则清波门最耳熟,常听妇女子提起,用以骂人,盖其时法场在清波门头也。绍兴城旧有九门,据尹幼莲《地志述略》所举俗称如下,即东郭,都泗,昌安,西郭,偏门,南门,稽山,五云,雷门是也。前六门皆是水门,平时拜岁扫墓都曾走过,馀乃是旱门,雷门早封闭,今只馀地名罗门坂耳,五云俗呼作吴市门,茹三樵云即梅福故迹,稽山门则是至禹陵会稽山之要道,出入尤频繁,不佞居越中不甚久,十八岁后流浪于外,近来且有二十馀年不曾归去,然而城门却都已走遍,即此可以傲丁君矣。此诸城门中最系怀念者为东郭,不但与祖居相近,时常出入,其地亦特僻静,每当黄昏时入城来,城楼半废,墙上满生薜荔,四望荒凉,城内与城外如一,颇有诗味画意,非南门等所能有也。昌安偏门等水门外别有旱门通行,南门独

否，出城者须趁渡船，官设不取资，东郭则沿城门有石塴，可以步行，出门即渡东桥，相传第三洞下流水是神仙水，又为明末余武贞先生殉难处，惟后人都已不甚了了，只于大旱时至桥头取水以供茶饭而已。

东昌坊

桑下丛谈(十)

1942 年 1 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偶阅毛西河文集，见其题罗坤所藏吕潜山水册子云，壬子秋遇罗坤蒋侯祠下，屈指揖别东昌坊五年矣。余家世居会稽东昌坊口，其地素不著名，今知罗萝村盖曾居此，亦可喜也。东昌坊口为十字路，迤南有桥曰都亭桥，北曰塔子桥，有唐将军庙及墓，即狙击琶八者。口之西为秋官第，未尝考秋官为谁；东则是覆盆桥，亦不知中间以何为界，吾家位置近西半，称东昌坊口周家，若老屋与三味书屋寿宅相对，则均称覆盆桥矣。由吾家东行约五十步，折西南曰张马桥，过桥为绸缎巷，或云元作柔遁巷，意当有其故事，今亦不可考。覆盆桥之东即是春波桥，俗名罗汉桥，北岸有禹迹寺，寺前小石碑记季彭山故里等字。沈园遗址在其左近，徐承烈《听雨轩馀纪》中有文记之，盖曾身历其境，故所言翔实，惟所云大禹像高尺馀，余未能见到，深为可惜耳。



茨与莲

桑下丛谈（十一）

1942年2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草部，“茨”下有云：

> 其柄又可为菹，甚美，越人谓之藕梗，其实茨柄耳。

案今绍兴不闻吃茨柄，亦无藕梗之称，七八百年来风俗改变盖已多矣。小时候在秋深菱已将了时，舟过菱荡，偶抽取菱蓬少许，归家摘去叶及茎间海绵似的小块，取梗瀹熟，拌糖醋食之。此乃以菱蓬为菹，亦已忘记有何名称，茨柄吃法，想亦如是乎。又“荷”下云：

> 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而游者多以昼，故不尽知。

所记殊佳，此景今已无有。出偏门至三山，儿时随祖母往鲁墟去，

正走这条道路，但不曾见过莲花，盖田中只是稻，水中亦惟有大菱茭白，即鸡头子也少有人种植矣。杜荀鹤《送人游越》诗：

有园皆种橘，无渚不生莲。

《宝庆会稽续志》云可谓越之实录，至今却已只剩得一半，园中种橘之风尚稍存留耳。



越王峥

桑下丛谈(十二)

1942年2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越缦堂日记》第七册,同治丙寅四月十九日条下,记诣越王峥欧兜祖师道场事,云:

> 案府县志,欧兜祖师为至正间人,本卖菜佣,悟道不娶,入山一年即化。而越人讹称为懊恼祖师,云本钱唐卖鱼者,因妻有所私,愤而出家,传有"扳竹乌鸦叫,钱唐门不开,懊侬出门去,欢喜进门来"一诗。毛西河《越王峥寺田碑记》言师以元至正间从钱唐来,其师雪庭授以橙,属曰,当向月行,即越峥隐语也。

越王峥今俗呼为玉皇峥,峥读若场去声,橙曰新会橙,末字读若场,故橙峥音可通,西河记文盖亦非越人不能解耳。欧兜不知何义,世人转呼为懊恼,义似较长。放下菜担,悟得大道,亦是佳事,但留下

漆身，供人瞻礼，或摸索求愿，落得个不干[1]净，岂不是懊恼乎。杨王孙裸葬[2]，固近于偏激，但是死不如速朽，儒者有言，和尚所应当赞可者耳。

① “干”原作“于”。
② “葬”原作“卧”。



若耶溪[①]

桑下丛谈（十三）

1942年3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王渔洋著《居易录》三十四卷，虽有人谓其步趋《文昌杂录》，似未免可笑，而文章简洁可读，故是清代说部中之佳者。但疏漏处自亦未能免，如卷二十七中一则云：

> 越中若邪溪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游若邪溪，曰，曾子不居胜母之间，吾岂游若邪之溪？因改为五云溪。是读作邪正之邪，类恶溪矣。

案《颜氏家训·文章篇九》云：

> 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飘扬云母舟。简

① 《书房一角·桑下丛谈》本篇之前还有《南国记》一篇，因与《药草堂随笔（三三）》（40·029）重复，已删去。

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沄又飘扬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

上文又引里名胜母，曾参敛衿，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可知徐浩呼若邪正作于遮切，忌其义与胜母相类，此邪即是费旭诗中之耶，与耶娘字同音，故若邪犹云像爹耳。今若邪溪早已改名，绍兴城东北隅却有此地名，路旁有沟宽可二尺，不曾见有流水，不知何以不填塞以便出入，俗呼为辣茄溪，则又真读作邪音，第一字盖从茄音而联想得来，故由日而变为来纽耶。



东昌坊薛五

桑下丛谈(十四)

1942年3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书估以《六红诗话》四卷见示,山阴吕善报著,索价甚昂,以其为乡贤著作,遂收得之。卷三摘录张宗子《快园道古》九则,其一云:

> 苏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封公至署半月即勒归,予金二十,命悍仆押其抵家,临行乞三白酒数色亦不得,半途以气死。时越城东昌坊有贫子薛五者,至孝,其父于冬日每早必赴混堂沐浴,薛五必携热酒三合御寒,以二鸡蛋下酒。袁山人雪堂作诗云,三合陈醑[①]敌早寒,一双鸡子白团团,可怜苏郡林知府,不及东昌薛五官。

案此亦东昌坊之一故实也。城中今少混堂,惟大坊口桥头有一家,

① "醑"原作"希"。

小家新郎于结婚前亦往其处洗浴，不知明末如何，或距东昌坊更近处尚有浴堂乎。



踏桨船

桑下丛谈(十五)

1942年3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四"造船"条下云：

> 中州周沐润，名进士也，宰苏州常熟县。时寇氛满地，米价日昂，大军驻上海，信息难通，周乃创造脚带船，日往上海报米价。其船长仅丈馀，广仅三尺馀，篷高仅二尺馀，内仅可卧二人，不能坐，坐即欹侧，驾船者在船头，亦卧下，用两脚踏棹行，棹长约七八尺，一踏即行二三丈，昼夜可行二百数十里。

案此言踏桨船似是而非，似得之传闻，未曾目睹者，又谓始于周文之亦未可信。此种小船盛行宁波绍兴一带，当是向来旧有，文之特利用之以通苏沪消息，后遂传讹以为周所创始者耳。徐珂《可言》卷八记杜山次语，江伯训权知山阴时，以事赴乡，辄棹划舟往，划舟小如叶，舟子坐舟尾，以足推桨使进，乘者可坐卧，不可立。此写踏

桨船不误，而名亦不合，越中有划船乃无篷者，一人或三数人用楫进舟，不用桨，乡间妇女皆能驾使，非若踏桨船之须专家方可也。同书卷十一引屠倬《是程堂集》题沅江村店壁诗，有云，深山昼啼山鹧鸪，划船拍岸呼卖鱼，十八女儿坐船尾，脚踏双桨如飞盂。谓清乾嘉间踏桨之事有以女子任之者。案据此可知周文之始作之说之非真，唯踏双桨似不可能，实亦只一桨一楫，屠琴坞诗人故如此说耳。

[补记] 案陈画卿《勤馀诗存》卷四《海角行吟》中有诗题曰脚桨船，小注云，船长丈许，广三尺，坐卧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桨行如飞，向惟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并用之以代急足。其时为咸丰辛酉，陈君山阴人，习知踏桨船，故说明不误，江淮采用亦当始于此时也。



《蕉轩摭录》

桑下丛谈（十六）

1942年4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蕉轩摭录》十二卷，山阴俞梦蕉著，旧有《申报》馆活字本，因系越人著作，故欲搜求其原刻，通行木刻多是咸丰年刊本，今得一部，乃道光元年刊，当是最早之本矣。活字本有顾丙辉序及自序，均署嘉庆乙亥，案即嘉庆二十年，而刻本中尚多韩廷辉乙亥序，孙光照丁丑序，潘榞题辞七绝三首，沈潮七古一首，例言四则，活字本均无之。又活字本载题词七绝四首，下署失名，刻本则有印章二方，盖即是韩廷辉作耳。俞梦蕉不知其名，今见刻本自序后有墨色印文二，朱文曰梦蕉，白文曰国麟，又每卷题签上均钤一白文朱印曰俞国麟篆，可知此本尚是作者自藏之书也。

《摭录》似系模仿《谐铎》之作，而思想庸陋，文章亦未能超脱，不佞之搜求实惟以乡曲之见故耳，而道光刻本颇佳，翻看一过，比校看活字本时印象要好得多，不但序题有多少不同已也。由是可

知板本与内容甚有关系，铅字石印虽是便利，但终不能悦目，故只是便于携带与检查，若为细读久藏起见则仍以木刻为宜，而刻之先后与精粗亦殊重要，未可稍忽视也。



松花粉

条下丛谈（十七）

1942年4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蕉轩摭录》卷十二“松花”条下云：

> 吾乡每于春服既成后，入山采松花作粉，色黄味甘，咽之他物无其美也。

案《越谚》卷中饮食部中有松花粉，注云：

> 山松春花，黄细如粉，樵采，入面粉，清香，仙家味。

松花粉平常多和入米粉中为糕干，名曰松花糕干。又糕店作小麻餈如鸡子大，中裹糖馅，外涂松花，名曰松花小鸡，小儿甚喜食之。民家则用以和糯米粉，搓成小团，汤瀹加糖，味最香滑，俗称松花团团，读若土圆切，盖是无馅的汤团，其名字或者亦即从此转出也。

其只就长条摘成小块，不搓圆者，名曰毛脚团团。陈年松花粉夏日以扑小儿身体，治痱子颇良，比天花粉为佳，但不易得耳。



独脚魈

桑下丛谈(十八)

1942年4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蕉轩摭录》卷十"独脚魈"条下云:"吾乡竞传独脚魈之异。独脚魈弗厌贫富,第悦其色,或妇女有美色,独脚魈必营求长物以济其家,妇女为所私,亦秘弗言也,然久久终欲去,去则持一账簿,计算其人,仍聚[①]而去。"《越谚》卷中鬼怪部独脚魈注云,"俗传女鬼来奔求淫,亦能致富,是否陆游诗独脚鬼。"

案独脚魈相传均谓是男鬼,范氏所说独异,《越谚》别出五圣菩萨,注云,"俗传男鬼淫妇致富,事类《龙城录》五通神。"二者其实原是一种,也都是男性,原是出于男子好宿娼的心理,推及异物,只是不知怎的分了等级,或尊之则称曰神曰菩萨,或卑之则称曰魈,此与普通用了爆竹惊走的山魈盖无涉,至于独脚的原因亦不可知矣。

---

① "聚"原作"众"。



梅树牌坊

桑下丛谈(十九)

1942年5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叶腾骧著《证谛山人杂志》卷三云：

越州西郭门外五里许有梅树牌坊一座，历数百年矣。石柱石梁而木心，木甚古，中偃卧老梅，作淡黄色，枝干峭劲，磨不磷，洗不灭，每岁腊月亦开花，逾时则隐。夏初亦结实，梅熟时复隐去，或升梯扪之，无有也。乾隆初夏月疾风迅雷甚雨，石柱折，乡民修整之，旋有道人在坊下默诵移时，不知作何语，亦不解其何意，然自此不复开花结实矣，而古干犹挺然存焉。余少时在家数经其地，见坊中梅树似画非画，似纹非纹，勃勃有生气，而又不在木面，木质亦终不朽腐。又西郭门外洞桥，桥石甚坚固，有一石蟹夜夜离水蚀之，桥旁之石已成坎窞，居民之早起者往往见之，蟹色晶莹如玉，见人即沉于水，好事者多方捕之不获，此亦足怪也。

案牌坊在西郭门外河沿，其地即称梅树牌坊，民国六年顷家居时尚见其屹立如故。横坊上现淡黄色彩，如梅株，仿佛亦具槎枒，惜无人为模写或照相也。牌坊或是明时物，意其上必尚有文字可稽考，开花事已无传。但云梅树系昔年雷电所印，说或近似，坊亦非是木心，大抵仍是石质，惟或因电火而变色耳，传者故甚其词，但后来亦不闻此说矣。



陈念二

桑下丛谈（二十）

1942年5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证谛山人杂志》卷五云：

陈念二者山阴下方桥人，偶忘其名字，世业医，称为妙手，远近就医者不绝。尝语人曰，死生固有命，然所以致死者，一死于医，一死于药。医方不对症者死，对症而药不道地，及炮制不如法者，虽对犹不对也。于是乃设药肆于门首，亲自炮制，不敢以药误人，有贫乏者就医不受礼，并以药施之，全活者甚众。十年之间家道日隆，其子崛起举孝廉。

案陈念义之名亦见于俞万春之《荡寇志》，俞为嘉道间人，盖与叶氏同时。绍兴民间流行之目连戏中，活无常说白有云：

看个是何里个郎中，

下方桥个陈念二啦倪子。

可知此说白之起亦当在嘉道时，其时盖陈正有名，其子由医入于儒，老百姓富于诙谐，故以此调之，遂相沿至清末不改。近来不知乡间尚有目连戏否，此活无常口中之陈念二乃将不可考矣。



溺鬼

桑下丛谈（二一）

1942年5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孙德祖著《寄龛甲志》卷四云："《续新齐谐》云，溺鬼必带羊臊气，信然。"因举半塘桥茹氏园池溺死数人，云惟时皆闻水有羊膻，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时未尝有也。又《丙志》卷二云："俗传妇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当有脂粉气。"此两种俗信今尚存在，脂粉气盖因妇女之故，意思可解，羊膻则不知何故，岂民间以河水鬼为异物，虽鬼而近于水怪，仿佛又似兽之一种欤。方旭晓卿《蠹存》上云，鬼作纸灰气，惟水鬼作羊臊气。孙彦清袁子才方晓卿皆浙江人，说皆一致，不知他处亦有此说否。以上所说大抵亦只是原则而已，各鬼出现时未必一定每次如此，盖述者如不记得则也就不提及以为点缀也。



古今俗语

桑下丛谈（二二）

1942年6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草部菰菜下云，今谓之茭首，盖茭心生苔，至秋如小儿臂，其白如藕，而软美异常。又茄下云，一名落苏，越人乃止谓之落苏。木部柿下云，会稽谓之椑，故有油椑马蹄椑。鱼部虾下云，越人谓杜鹃曰社豹，社豹啼时渔人卖小虾，名社豹虾。案今绍兴称茭白茄子柿子，并无茭首等名，越中不见杜鹃，鸟中亦无称社豹者，小虾极细者名糊虾，与糊鱼相对，亦不闻呼社豹虾也。嘉泰至今已七百五十年，或者语言不无改变，陈仅馀山著《扪烛脞存》卷八《方谚脞》有一条云，“越俗谓新妇为女婶，其泛相呼则曰婶，稍年长者曰老婶，音女裙切，见毛西河《古今通韵》。”毛氏《越语肯綮录》第五条说此更详，云是会稽甬上二郡方音，不佞反复寻思，却想不出类似语来，岂近二百年中又倏已消灭耶。今越中女人称呼，人妻贵家称太太，民家则云太娘，姑称其媳曰大娘，妓曰小娘，但泛称又有太太们，乃别于室女而言，无复敬语意味，越语无们字，此盖外来语，犹云堂客也。



糊　鱼

桑下丛谈(二三)

1942年6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俞国琛著《风怀镜》，为朱竹垞《风怀诗》作注，凡例之十云：

注书之难，陆剑南早已言之。余按《风怀诗》外另有《食鲇鱼》一首，起四句云，白小休论小，奇珍信可珍，炎天来积雪，入馔总如银。白小，面条银鱼，见《金壶字考》。竹垞此诗作于顺治已亥，是年客越中，则所咏之鲇鱼正指吾郡昌安门外之鲇鱼而言。盖鲇鱼最白最细，见于端午后，今浙西人游越每津津道之，乃杨孙两家之注咸引《尔雅》，以为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鲇云云。无论绍兴夏日并无大鳞多鲠三尺长之鱼名鲇鱼，即万一有之，则起首五字白小休论小竟作何解？若竹垞以三尺者为小鱼，必且以吞舟者为大鱼矣，顾可入馔耶，岂不令人失笑。不玩字句，惟填故实，一诗之注如此，他诗可知。又按鲇鱼今俗写作糊鱼，言烹熟时如面糊搅成一块

也，于义亦通。

案范啸风著《越谚》卷中水族类写作鳠鱼，注云："细多如糊，四五月出山阴大桶盘湖中，放面食极鲜。"其实此只是糊鱼，《尔雅》之鲄乃是鲥鱼，鳠则似鲇而大，二者虽同有糊音，而决非长不及半寸之白小，甚为明显。老百姓不读《尔雅》《说文》，其命物名，如不是世俗相沿不可解的称呼，大抵就所闻见取材，读书人纪录时加以古雅化，或反失之，范君通人且亦不免，他无论矣。

素火腿

桑下丛谈(二四)

1942年6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王渔洋《香祖杂记》卷六云:“越中笋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师极难致。”案越俗以炒花生与豆腐干同食,名素火腿,传说金圣叹临刑遗书说此事,云此法若传,死无恨矣。所谓笋脯只简单的称笋干,不闻有何别名,或是京师人所锡与之佳名欤,亦未可知。

[附记] 王渔洋谓笋干俗称素火腿,案张宗子《瑯嬛诗集》咏方物五律有兵坑笋干,注云土名素火腿,然则昔时原有此称,惟近已不甚闻知矣。校正时记。



吴越语相同

桑下丛谈（二五）

1942年7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顾张思雪亭著《土风录》卷五云：

> 旧《苏州府志》，刺猬，注云，俗名偷瓜窅。按窅当为蝇字之讹，蝇音血，凿穴居也，以其好窃瓜，常负以入穴，故名。窅音杳，目深貌。

案吾乡呼刺猬正作刺蝇，《越谚》卷中禽兽部有鼠獝，注云，次血，猬也。此未免好奇之过。又《土风录》卷十一云：

> 贵重曰值钱，轻贱曰不值钱，钱音如田，于小儿亦然。见《史记·魏其侯传》，灌夫云，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直与值通。乐天诗，荆钗不值钱。

案越中称爱抚小儿尚云值钱，惟读如成田，又作云为字用矣。吴越语相同处盖极多，杜荀鹤诗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念之良然也。

莫元英

桑下丛谈(二六)

1942年7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清宗室遐龄著《醉梦录》卷上《记莫疯子》云：

莫切崖元英行七，浙江山阴县人也，其人古貌古心，不修边幅，见人辄跪拜不已，虽仆役亦然，以此人皆以莫疯子呼之。然其学问渊博，凡医卜星相堪舆之术，以及诗古文词，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多不循古方，寓京师已三十馀年矣。

此亦於越之一奇士，惟乡人知之者盖已甚鲜。录又云：

诗不多作，曾记其一联云，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其不克还乡之苦况，已露于言表。

久居燕山，而不忘杨梅与笋，此意甚可了解，不佞亦素有此感，近时

北方虽有笋来，但终无鞭笋及猫笋，洋莓只可与桑葚相比耳。录称莫君没于咸丰甲寅，去今已将九十年矣。



门档灰

桑下丛谈(二七)

1942年7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王绍兰著《许郑学庐存稿》卷四,《〈示儿百六字〉恭跋》中有云:

> 忆不孝八九岁时,居洛阳署后院,院旁有小门,其门两扇,皆有横档数层。不孝一日用手攀援,足随以上,至最上层,失足堕地,血流被面,吾母急取门档灰敷糁其上,蒙以绸帕,府君见之叹恨良久。

案越中常用门档灰为止血剂,闻宜昌友人张君言,鄂中亦如此,可知通行甚广,亦有用衣袋中所积贮之棉屑者。小时候又见有血忌药,色微红,用药拌炒石灰为之,颇有效力,药名已不记,惟云其中须用初生未开眼小鼠,亦不知真否也。



鸣榔

桑下丛谈（二八）

1942年8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杭大宗《订讹类编》卷六引施愚山《矩斋杂记》云：

> 诗词多用鸣榔，或疑为扣舷击楫之说，非也。榔盖船后横木之近舵者，渔人择水深鱼潜处，引舟环聚，各以二椎击榔，声如急鼓，节奏相应，鱼闻皆伏不动，以器取之，如俯而拾诸地，饶州东湖有之。吾乡泰州湖内或击木片长尺许，虚其前后，以足蹴之，低昂成声，鱼惊窜水草中，然后罩取，亦鸣榔之义。

幼时随祖母住鲁墟，常闻渔舟击木声，盖沉网水底，驱鱼入其中而取之，俗称赶棒槌头鱼，所获似多系细鳞，不忆有佳鱼入馔，云得自棒槌头鱼者也。古人诗中之鸣榔则不必定是捕鱼，因本非渔人，或只是击舵旁横木，与扣舷同意，亦未可知。



《越中金石记》

桑下丛谈(二九)

1942年8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越中金石记》十卷，山阴杜春生编录，道光十年詹波馆刊，因印本流传不多，市价颇高，曩得一部，在二十金以上。近年得见新印白纸本，末有陈遹声吴隐二跋，吴跋署己未仲秋，盖是民国八年，有云：

> 是书以道光庚寅付梓，距今九十馀年，传本稀如星凤，乡邦之雅故，翰墨之伟观，惧其久而失传也，拙藏有初印精本，爰与同里陈文蓉曙，吾宗善庆，集资重付剞劂，以广其传，阅数月而工竣。

似是近日重刻，而翻阅书中断烂处比比皆是，因知此实是原板新印，非新刊也。其实修补旧板印以行世，亦何尝不是好事，如会稽徐氏之小李山房本《札朴》是也，今观漫漶之处并不补正，虽自称新

板，实则一目了然，即欲欺近视者亦不可得。《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观妙斋金石文考略》下云，道光丁酉盛氏印本，原雍正中刊本，盛氏得其板片，诈为重刊，正是同一的例，此等事盖亦古已有之也。



王见大本《梦忆》

桑下丛谈（三十）

1942年8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陶庵梦忆》"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中刻，王本重刊入"粤雅堂丛书"中，时则咸丰己卯矣。近从杭州得王氏巾箱本，有王文诰道光壬午序，云甲寅雕板已失，爰重授之梓，惟原刻纯生氏案语已悉不存。昔读《复堂日记》，云《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初得甲寅本以为是矣，今始知乃是指此本，盖壬午序自署王文诰见大，甲寅本则只题叶有一印，白文曰见大二字而已。

余所得者为海宁邹存淦氏旧藏本，有印章六枚，第七八卷系邹君手抄，后有题跋。邹君又著有《修川小志》一卷，手稿未刊，余亦从杭州得之，中有浮签署男寿祺谨补，乃知其为邹适庐之先德。丁丑兵火延及两浙，故家图书多散失，偶从估人购得一二，间一披览，但有怅惘，惟邹君手泽于无意中乃获得数品，亦是有缘可喜慰也。



春波桥

桑下丛谈(三一)

1942年9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平定浙东纪略》一卷，五知书屋藏本，书签云著者无名，惟查第五叶有附记署康熙戊辰，云右先子日记也，末云先子讳自远，字子望，会稽县儒学生，自称不肖男易，不知其姓。书记甲寅耿精忠攻浙事，前五叶自远所记，后十四叶则易所续成。七月十三日纪事云，日晡贼从南门渡河攻稽山门，门做僻隘，又城垣多倾颓处，不足以守，乘城者咸股栗，知府许弘勋介马疾驰，亟命燃炬运石堵塞，并撤春波桥以遏其冲。案春波桥在东郭门内禹迹寺前，据此则稽山门外亦有此桥也。又其后叙归顺者多人，小注云，其伪官姓名爵里载在《保越录》，兹不具录。元末徐勉之著有《保越录》，傅节子有校刊本，此录不知何人所撰，亦未知此书曾见著录否。



龙虎瓦

桑下丛谈(三二)

1942年9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三十年冬在北京得瓦当拓本,文为龙虎各一,右题字曰:"汉仓龙白虎瓦",又二行曰:

> 瓦旧藏吾乡王氏,咸丰庚申假拓数本,光绪庚辰复于故纸堆中得此,先后二十一年,中遭寇难,尚未散亡,幸焉。㧑叔记。

印白文曰赵之谦印。傅节子《华延年室题跋》卷中有《题汉龙虎二瓦》云:

> 龙虎二瓦金石家罕见著录,此本乃赵㧑叔明府手拓见贻,藏之二十年矣。㧑叔少余三岁,幼同里闬,潜心汉学,书画篆刻尤有盛名,以孝廉议叙县令,需次江右,叠权紧望,乃甫登荐

刿，遽归道山，惜哉。

案罗振玉编《秦汉瓦当文字》卷四画瓦类第一图青龙瓦，文与此正同，但稍大耳，注云齐吉金室藏，白虎则别是一枚，图样工整，与龙相称，疑所载四灵原是一组也。此虎笔画简略，圆目屈尾，状甚诙诡，在瓦中或当属罕见之品欤。



南齐造象拓本

桑下丛谈(三三)

1942年9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近日得旧拓《维卫尊造象铭》一纸,下左有题字二行曰,“子重先生鉴,南齐造象海内只此一石,㧑叔持赠。”石隙着朱文小印二,文曰“稼孙所拓”,一直一横,下朱文印一曰,“与石居主人玖聃清玩”,裱装右侧二印,朱文曰“专祖斋”,白文曰“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下端白文印曰“柽之”,左侧题字二行云,“石今存浙江馆,此会稽赵益甫赠大兴刘子重本,同治初元旧拓也,甲辰腊月,震旦第一山樵玖聃记。”白文印曰“朱九丹”。案此石佛在绍兴五云门外塘下金,民国五年余曾亲往拓得数纸,朱记称存浙江馆自系误传,但现今何在则未可知耳。此魏氏拓本成于同治三年,据《续语堂题跋》“书汉三老碑后”云,“同治丙寅正月四日游法相寺,拓南齐石佛背字,㧑叔皆为题记。”距余拓时已是五十年前,自更可贵,比校读之,甚易明了也。



沈桐生

桑下丛谈(三四)

1942年10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民国初年沈桐生在绍兴自称大书家，门前立大旆，闻其写字时用力极大，每写一笔，辄呻呼以足顿地，传以为笑。近阅张在辛著《隶法琐言》，署雍正五年七十七岁，自述康熙辛未学书于郑谷口，有一则云：

> 初拜郑先生，即命余执笔作字，才下得一画，即曰，字岂可如此写。因自就坐，取笔搦管作御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始知前辈成名原非偶然。

因此知沈君所为亦非无据，惜所作字极笨重，不似谷口之飞跃跳动，可见大匠之规矩虽可遵循，而才力所限，其巧亦不能必至也。



冯黔夫

桑下丛谈(三五)

1942年10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四云：

> 冯黔夫世定，山阴人，游幕章门，善画山水，每署款必在石壁上。谓予曰，此摩崖也，若空处即天，岂可写字。语奇而确，予颇赏之。

绍兴师爷中向来颇多奇人，惟大抵偏倚，如徐文长可以称祖师，金冬心袁子才则过江支派也。天空不可写字，此于山水画固绝确切，其实乃是所谓死话，特借此以保留必需的空白，不使画面狼藉难看，亦是甚有用也。

叶柳亭

桑下丛谈（三六）

1942年10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从杭州得旧册页若干开，有一纸云：

> 一秋闲过风雨日，三客癖成书画诗，剩有床头半瓶酒[①]
> 不妨潦倒菊花时。

丁亥九秋苦雨，与华亭陈少逸逸、山阴叶柳亭青夜话于止止轩，柳亭口号此绝，次句盖谓陈善画，余工书，而已豪于诗也。一时狂态，书而志之。句曲笪以烜晓山甫识。

朱文小印曰晓山。又一纸云：

> 竹声花影透疏怀，尊酒清宵事未偕。梦即有因还费解，

---

① “床头”原作“床酒”。

诗虽□意欠安排[①] 玉关杨柳愁飞将，金屋芙蓉醉艳娃，
计取前生太常便，仙前供奉礼清斋。

计隶书三行半，其下小字夹行云：

此旧友柳亭诗隶也。忆岁丁亥随任柯桥，负笈舟山，从拜亭夫子学诗隶，见同砚柳亭此咏，爱而属其作隶，而其人豪放率略，诗书不惬意辄弃之，此其一也。劫馀灰剩，基儿拾得，执以为请，爰缀数言，以志故人手笔。友姓叶原名青，号柳亭，更名盖，号发山，山阴湖荡人。诗题忆似“春夜书事”，第四[②]句脱无字，同治乙丑嘉平十二日，志于萧斋，不禁为之黯然。晓山氏。

白文小印曰以炟。案丁亥为道光七年，距同治乙丑二年已将四十年矣，其间经过洪杨浩劫，区区纸片竟得保存，叶君虽名字翳如，而诗书手迹得以流传至今，不可谓非幸事。商嘉言《荓亭诗草》卷十四有“枕上口占待示柳亭同学”七绝二首，时为丁亥四月二十六日，商君已疾革，可知为其得意弟子，惟此外材料不复可得矣。

① □为原缺字。
② “四”原作“五”。

陶七彪

桑下丛谈(三七)

1942年10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近日得陶七彪尺牍十二纸,字体怪异,纸墨暗敝,不易按读,却亦有致。陶七彪为清末绍兴名人之一,世竞传其能造陶公柜,渐益神异化,谓从小柜中能抽绎布置成一小舍,设备悉具。薛炳朗轩为作传云,所作有陶公柜陶公床,美国人笃大哥林司赏誉之,亦未能详其形制。尺牍有一纸,上文缺,云"弟去年创造陶公床陶公柜,床柜一人可以肩挑,轻便仍复结实,制造秘法即当续写"。似亦只是折叠轻巧,未必甚奇,惟下文又云:

弟拟造铁鹰,离地升举,高瞻远瞩,东西南朔,随意所之,此事功费浩大,弟寄图式往泰西格致机器两院,彼都人士之有(六字缺)能按图仿造,此鹰一出,实有益于国计民生,不徒与西儒斗巧争工也。

下缺，署名“愚弟陶在宽顿首，己丑二月二十二日申刻”。据此书可以考见其制作之年为光绪戊子，即西历一八八八年，其时泰西已多有人热心于航空，惟其实现亦至二十世纪初始见有头绪，此中铁鹰之说未免有过于浮夸处，殆未可尽信。但陶君在举世方沉迷于时文小楷之时，有志于形而下之技工，壬辰尺牍中又见其书有英吉利文字，则其见识超出凡众，亦自可佩服也。



杨　花

桑下丛谈（三八）

1942年1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恐高寒斋刊《历朝七绝正宗》一册，宛平袁励准选，民国壬申年序，蓝印小本，每半页六行，行十三字，精致可喜。所选诗凡一百首，作者自唐王翰至清李慈铭共七十人，李诗选两首，其末章为鉴湖竹枝词之一，文云：

> 家家门巷正啼莺，取次轻阴间嫩晴，满院杨花人不到，秋千撩乱作清明。

诗自当不恶，惟此亦只是说诗境耳，若说鉴湖则实少此景象。说来未免有似高叟之固，但只谈风物而非说诗，当亦无妨。越中杨颇少见，读诗常见柳絮榆钱，而实物难得遇见，若满庭蓬蓬如飞雪，或大小数团沿阶乱滚，在北方乃有此景。又秋千亦绝少，小时候在绕门山东湖学堂仿佛曾一见，惟亦只从舟中远望见之耳。城内无松树，

离山又颇远，而春时松花粉随风飘扬，往往入水缸中，水面现鹅黄色，此系实景实事，未知有人咏入诗中否，因其非是既成的诗料，或恐未必有此机会也。

骑猫狗

桑下丛谈（三九）

1942年1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孙德祖《寄龛丙志》卷四云：

越俗患顽僮之好狎畜狗若狸奴而或为所爪啮也，曰，骑猫狗者娶妇日必雨。患其好张盖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张盖者躯体不复长。皆投其所忌，缪为之说以惧之，然寻常鞭挞所不能止者，无勿帖然不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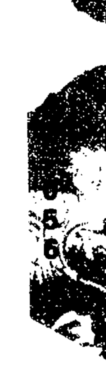
王筠菉友《臆说》中云：

故老相传，教戒小儿女之词曰，不出门而写水，出门必遇雨。非诚遇雨也，以水向门外写之，在己为惰，又恐适有过者污其衣也。然戒惰则乐于勤于少，污人又小儿所喜为也，不如惧以遇雨之为直截也。

此二节语皆有致。孙君又引《淮南泛论训》曰，

> 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故因鬼神机祥而为之禁。世俗言，飨大高者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法令，圣人所不传。

其说明今不具录，大旨与上文所言相似。民间俗信固未必能悉下唯理的解释，惟此数事说当可通，若涉及小儿者则教戒之意自更易见，孙王二君之言盖亦可信也。



胡小二

桑下丛谈(四十)

1942年12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山阴吕善报《六红诗话》卷四云：

> 南之南词，北之鼓儿词，只足以娱村夫妇孺，若少有知识之士，便不屑听，以故操斯技者绝无雅人。会稽胡嗣源秀才文汇，幼工韵语，稍长即善唱南词，点窜旧本，都成妙文，名满士夫间，皆谓可与昔柳敬亭之说书、苏昆生之昆曲鼎立，然不事生产，晚境颇窘，而耽饮好洁之性愈甚。

案此所谓南词盖即越中之平调，又称平湖调，或是从湖州传来者耶。唱者无专业，大抵为平人或大家子弟之游惰者，近于北京之子弟书，世称平调先生，招请者须相当敬礼，饮食亦必精洁。当时擅此技者不乏人，惟没后皆身名黯如，胡秀才殆是唯一人矣。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卷四有“胡小二”一则，记述更详，亦更琐屑有趣，

文云：

会稽胡小二倜傥不羁，好修饰，善诙谐，能文多技，其音清越柔脆，如唱艳词，能使人人骨醉，唱哀词，能使人人堕泪，为越郡南词第一。聘请一日必洋银二元，唱不过一二出，最多三出，断不肯逾限也。饮食不丰洁不食，桌椅不明净不坐，延之者颇难。然时人祝寿完姻生子诸喜事，必以胡小二南词为体面，伶人演剧不足数也。以是声价愈重，胡亦专心于是而无志上进，恐采芹后不能为此技。父母督其应试，胡必潦草塞责，以取进为忧，一日院试，以“权然后知轻重”为题，胡视全篇明顺，恐取入，乃改承题云，“夫权，称锤也”，犹恐不妥，又添二字曰，“夫权，一个称锤也”，始畅然大笑。次年院试为“祭如在”三字，承题云，“祭而不尽其诚，虽祭如不祭也”，以为明犯下文断不能进，及榜发竟取入，乃放声大哭。父母切责之，小二曰，“秀才举人如何做得，苦字上头矣。”然自此竟不唱曲，惟以教读糊口，特诙谐愈甚，每亲朋雅集，小二一启口，必四座倾倒。

下文记其乾隆丁未在徐秀才家设帐时所说笑话，寿星头长，买富，夏雨似馒头，匪我求童茄等四则，虽原有出处，而即兴应用，诚如所云，可以见小二诙谐之一斑矣。《六红诗话》又选抄其诗云：

余曾于胡之好友王某处，见胡少时自写《藻湾诗钞》，存其“吼山访高五清烟萝书屋”一律云：“不识高贤馆，迷津唤渡频。湿云溪路晓，芳草野塘春。山近猿窥户，庭闲鸟伴人。到来尘事息，无愧葛天民。”又“解下鹔鹴聊贳酒，吟成鹦鹉孰怜才”，“苍茫树底山精出，历乱坟前野兔奔”，皆有宋元人笔意。

叶吕皆越人，杂志说及乾隆丁未年事，诗话成于嘉庆甲戌，盖均是乾嘉时人，与胡君约略同时，所记当有可信，惟诗不多选存数首，未免可惜耳。



《左腴》周氏刻本[1]

桑下丛谈（四一）

1942年12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左腴》十四编，系讲《左传》之书，分上中下三卷，会稽潘希淦著，有道光戊申杜煦序，男尚楫序，同年十二月刊，下卷末页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锡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孙婿周以墉鸿卿校刊，此盖是覆盆桥周氏刻本。书估索高价[2]，以其为吾家故物，乃收得之。潘跋云，去夏沈墨庄周一斋纂修县乘，购访遗书，查道光《会稽县志》稿，艺文部分已缺，卷十七人物儒林下有潘希淦传，语多与杜序相同。一斋公为曾祖八山公之从弟，曾重刊《越言释》，鸿卿公则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同治壬戌死于寇难，谱载名之镈，以墉之名反不著录。

---

① "左腴"原作"左腹"。

② "价"原作"物"。

王止轩藏书印

桑下丛谈(四二)[1]

1942年12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秦汉瓦当文字》上下各一卷，续一卷，程敦著录，乾隆丁未刊，盖是铸锡拓本，共有一百三十九品。上卷首有朱文印曰子献，又一大印朱文七行，行七字，惟第三行六字，其文曰："王继香，子献父，号止轩，生丙午，家镜湖，官玉署，好金石，及图谱，懒读书，好藏弆，祝长恩，永呵护，辟水火，驱蟫鼠，传子孙，俾学古。"每卷均有白文印曰，止轩所得金石书画。卷上目下有字一行曰，辛巳六月通州葛青伯所贻，朱文印曰醉庵，当是王氏手笔欤。卷头题叶右方框外，有红印木戳文曰，每部英洋五元，在光绪辛巳以前售价已甚不廉，今只以数倍之值得之，今昔相比，不可谓高矣。

其后收得安越堂刻本《寓山注》一册，亦有此四十八字印。

---

① 《书房一角·桑下丛谈》共四十四篇，《小引》一篇移往1943年(43·007)，《南园记》一篇与《药草堂随笔》第(三三)篇(40·029)重复删去，故只存四十二篇。



中国的思想问题

1943年1月1日刊《中和月刊》4卷1期
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杂文》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

这中国固有的思想是什么呢？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他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这又不能说的太简单了，盖在没有儒这名称之前，此思想已经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为专业之后也还标榜儒名，单说儒家，难免淆混不

清，所以这里须得再申明之云，此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举实例来说最易明了，《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后者所说具体的事，所谓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说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别之为忠恕，而仍一以贯之，如人道主义的名称有误解，此或可称为人之道也。阮伯元在《论语论仁论》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齐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

> 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

这里解说儒家的仁很是简单明了，所谓为仁直捷的说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当做人看待，不但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以己所欲施于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而以人之所欲施之于人，那更是由恕而至于忠了。章太炎先生在《葑汉微言》中云：

>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鸮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识[1]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爰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

忠恕两尽，诚是为仁之极致，但是顶峰虽是高峻，其根础却也很是深广，自圣贤以至凡民，无不同具此心，各得应其分际而尽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盐味，自一勺以至于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还有一点特别有意义的，我们说到仁仿佛是极高远的事，其实倒是极切实，也可以说是卑近的，因为他的根本

---

[1] “识”原作“职”。

原来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馀籥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案《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说的本是同样的道理，但经焦君发挥，意更明显。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为人的根苗，为人类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进于求永生以至无生，如犹太印度之趋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转为求权力，如罗马之建立帝国主义，都是显著的例，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从高处说，使

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我说健全的思想便是这个缘故。这又是从人的本性里出来的，与用了人工从外边灌输进去的东西不同，所以读书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识一丁字，并未读过一句圣贤书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礼法，无不合于圣贤之道。我说可以乐观，其原因即在于此。中国人民思想本于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孔子创立儒家，殷殷传道，所以如此，无宁倒是翻过来说，因为孔子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代表中国思想的极顶，即集大成也。国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阳光与水似的养料，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紧，因为属于先天的部分，或坏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变动的。中国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这是极可喜的事，在现今百事不容乐观的时代，只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乐观，可以积极的声明，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乐观的话是说过了，这里边却并不是说现在或将来没有忧虑，没有危险。俗语说，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国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这也是难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与大火之祸害亦最烈，假如对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养人者害人。中国国民思想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不但过去时代相当的应付过来了，就是将来也正可以应用，因为世界无论怎么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不过这说的是正面，当然还有其反面，而这反面乃是可忧虑的。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

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经说明了，就是乱。我尝查考中国的史书，体察中国的思想，于是归纳的感到中国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我们只就近世而论，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虽然读史者的批评各异，但同为一种动乱，其残毁的经过至今犹令谈者色变，论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实足为殷鉴。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决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可是这又怪谁来呢？俗语云，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现在我们重复的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们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也总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去造成乱的机会与条件，这虽是消极的工作，但其功验要比肃正思想大得多，这虽然与西洋外国的理论未必合，但是从中国千百年的史书里得来的经验，至少在本国要更为适切相宜。过去的史书真是国家之至宝，在这本总账上国民的健康与疾病都一一记录着，看了流寇始末，知道这中了什么毒，但是想到王安石的新法反而病民，又觉得补药用的不得法也会致命的。古人以史书比作镜鉴，又或冠号曰资治，真是说的十分恰当。我们读史书，又以经子诗文均作

史料，从这里直接去抽取结论，往往只是极平凡的一句话，却是极真实，真是国家的脉案和药方，比伟大的高调空论要好得多多。曾见《老学庵笔记》卷一有一则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麨[1]，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

这一节话我看了非常感服，上官道人虽是道士，不夭不乱之说却正合于儒家思想，是最小限度的政治主张，只可惜言之非艰，行之维艰耳。我尝叹息说，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在是件奇事，但是展转仔细一想，现在何尝不是如此，正如路易十四明知洪水在后面会来，却不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岂非天下之至愚乎。书房里读《古文析义》，杜牧之《阿房宫赋》末了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当时琅琅然诵之，以为声调至佳，及今思之，乃更觉得意味亦殊深长也。

上边所说，意思本亦简单，只是说得啰嗦了，现在且总括一下。我相信中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所以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别的民族的最高理想有的是为君，有的是为神，中国则小人为一己

① “麨”原作“麪”。

以及宗族，君子为民，其实还是一物。这不是一部分一阶级所独有，乃是人人同具，只是广狭程度不同，这不是圣贤所发起，逐渐教化及于众人，乃是倒了过来，由众人而及于圣贤，更益提高推广的。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思想并无什么问题，只须设法培养他，使他正当长发便好。但是又因为中国思想以国民生存为本，假如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也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此非理论主义之所引起，故亦非文字语言所能防遏。我这乐观与悲观的两面话恐怕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因为这与外国的道理多有不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话是极确实诚实的，我也曾虚心的听过外国书中的道理，结果是止接受了一部分关于宇宙与生物的常识，若是中国的事，特别是思想生活等，我觉得还是本国人最能知道，或者知道的最正确。我不学爱国者那样专采英雄贤哲的言行做例子，但是观察一般民众，从他们的庸言庸行中找出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持与英雄贤哲比较，根本上亦仍相通，再以历史中治乱之迹印证之，大旨亦无乖谬[①]，故自信所说虽浅，其理颇正，识者当能辨之。陈旧之言，恐多不合时务，即此可见其才之拙，但于此亦或可知其意之诚也。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 “谬”原作“胶”。



《文史丛著》序[①]

1943年1月12日作
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谢刚主先生以所撰《文史丛著》见示，属写小序，不佞于专门史学系门外汉，何敢赞一词，唯重违谢先生之雅意，若承允许以不切题的文章缴卷，则亦何敢固辞。不佞平日喜杂览，对于四部各有部分的兴趣，又曾闻先贤有六经皆史之语，觉得凡所涉猎亦悉是有用的史料，不特有时想用作解嘲之词，亦实欲以自勉，期于下笔矜慎，无失学问之本意耳。中国史字古文为手执册，西洋则推源于古希腊语，谊云研求，实为学问之总体，此二义夙为不佞所喜，盖就自然万物寻其现象与原则，世称科学，就文献以求其因革之迹，是为历史，史与学其实是一而二，若人文科学则正是史之正名也。我看中国杂书，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太专门化，书既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职官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艰于自立，遑论及物。能惧思者当知及今之世复兴

① 1944年11月刊《文史》第1期，署名十堂。

史学实为要图，而文史撰述凡有利于此事者，流传推广，亦不容缓。往年读《心史丛刊》三集，以史事为材料，写为随笔，合知识趣味为一，至可益人神智，念之至今未忘。今见谢先生此著，其佳处亦正相同。谢先生尝从心史先生游，又曾闻任公静庵诸先生之绪论，有所著述，自能集三先生之长，裨益学子非浅鲜，抑亦庶几足以补从来之缺憾，满足时代之要求，其责任尤大矣。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于北京。



《文史通义》逸文二篇跋

1943年1月21日作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右《文史通义》逸文二篇，其一《士习》，据嘉业堂刘氏刻本《章氏遗书》目录，列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其二《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列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均注云："王目有，文缺。"按目录中注文缺者共有十二篇，后刘氏刻《补遗》一卷，所缺已十得八九，唯此二篇终未能得。刘君附识，有"异日当广为搜辑，以更期无憾"之语。

兵火以后，浙中书籍散出，偶从杭州购得安越堂平氏旧藏杂书若干种，中有十万卷楼王氏抄本《实斋全集》十六册，于第五第九两册中，乃发见右记逸文二篇居然在焉。因谋诸瞿兑之先生，倩人写出，在编译馆刊上发表，以快先睹。

寒斋藏平景孙手抄《实斋杂文》数卷，有《丙辰山中草》篇目，实斋自识及臧镛堂识语已刻入刘氏《补遗》，篇目则未前见。将来如有机缘，颇欲据目辑文，付之剞劂，不独可复《山中草》之旧观；其中

有《论学十规》、《古文十弊》诸篇，诚如臧君所言，精细入神，切中文学之弊，即在现代亦是切实有用之作也。

中华民国壬午大寒节，知堂记于北京。

《樱花国歌话》小序[1]

1943年1月3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钱稻孙先生译日本《爱国百人一首》既成，易名《樱花国歌话》，将付印刷，命鄙人序其端。关于日本诗歌之鉴赏，解说，翻译，为事择人，无过钱先生者，鄙人于此何能赞一辞。唯以私交论，重违钱先生之雅意，又不可以无言，则仍以不切题法出之，故虽似序而实不成其为序也。此选原名《爱国百人一首》，盖仿照通行的《小仓百人一首》之形式，而专取爱国的诗歌，作者百人，人各一首，故名。鄙人少时涉猎西洋近世文学评论，颇不喜政治文学，以其无永久性，又易雷同，故似欠真实，反观本国著作正亦如是，拙性顽固，至今未改此意。唯此乃非所论于日本，日本有其特殊之处，不可与他民族等论者，爱国诗其一也。日本之国体特殊，因地理历史种种关系，人民特具尊王爱国之热诚，与别国不同，其发现于文学正是当然。尝观俳人中如芭蕉者，本属武士，或不足异，一茶则是真正老

① 《樱花国歌话》1943年5月出版。

百姓，而亦多有爱国之句，故知此实为其一种国民性，吾辈外国人不可不知者也。钱先生此译，根据彼邦学者公选定本，古用古语，今从今体，达旨造词，备极美善，以此一卷包举日本爱国精神，绍介于中国，诚为有益之事。抑由此言之，此选乃是史书，作者披其赤心示人，如岳鹏举之《满江红》，文文山之《正气歌》，读者当正襟危坐对之，有如读忠义列传，不祗作文学观。原本“百人一首”之名，令人联想日本之歌牌，为新年儿女之玩具，译本今易其名称，允矣。

中华民国壬午岁不尽五日，周作人识于北京。



留学的回忆

1943 年 2 月 15 日刊《留日同学会季刊》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我到现在来写留学的回忆,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无论在中日哪一方面,不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不会了解,或者要感觉不喜欢也说不定。但是因为记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却,勉强答应了下来,写这一回,有许多话以前都已说过了,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请原谅。

我初到东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现在中国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尝切实的知道,那时日本曾经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1]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

---

① “维新的”原作“维的新”。

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派留学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我们留学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铁道警察之外，也自然都受了这影响，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即是都热烈的抱着兴亚的意气的。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现在想起来实在不禁感觉奇异，率真的说，这比去年□□□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假如近来三十年内不曾发生波折，这种感情能维持到现在，什么难问题都早已解决了。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是像我们年纪的人，明治时代在东京住过，民国以来住在北京，这种感慨实在很深，明知无益而不免要说，或者也是可[①]恕的常情罢。

我在东京是在这样的时候，所以环境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我后来常听见日本人说，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多变成抗日，大约是在日本的时候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于反抗的罢。我听了很是怀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并不曾遇见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过不愉快的事，也何至于以这类的细故影响到家国大事上去，这是凡有理知的人所不为的。我初去东京是和鲁迅在一起，我们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卧床，至于爬上壁橱（户棚）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非笑，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我们是官费生，但是低级的，生活不能阔绰，所以上边的主张似乎有点像伊索寓言里酸蒲桃的话，可是在理论上我觉得这也是本来很有道理的。我们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张半席子的一

① “可”原作“只”。

间，书箱之外只有一张矮几两个垫子，上学校时穿学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但是后来我也改用高齿屐(足驮)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记得在顺天堂左近东竹町住的时候，有一年多老吃咸甜煮的圆豆腐(雁拟)，我们大为惶恐，虽然后来自家煮了来吃也还是很好的。这其实只是一时吃厌了的缘故，所以有这一件笑话，对于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吃，别无什么不满。点心最初[①]多买今川小路风月堂的，也常照顾大学前的青木堂，后来知道找本乡的冈野与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么店里得到寄卖的柿羊羹，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装在半节青竹里，一面贴着竹箬，其风味绝佳，不久不知为何再也买不到了，曾为惋惜久之。总之衣食住各方面我们过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没有什么不便，惯了还觉得很有趣，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校时还曾经受到种种激刺，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会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但是后来却明白了。留学过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见日本之西洋模拟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当时间与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触之后，大抵都发生一种好感，分析起来仍不外是这两种分子，即是对于前进的新社会之心折，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实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之影响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国来，见到有些事与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那么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觉不满，此其一。还有所谓支那通者，追随英美的传教师以著书宣扬中国的恶德为事，于记述嫖赌鸦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国以及三国志故事为资

---

① “初”原作“利”。

料，信口谩骂，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为外国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学生则知日本国内不如此，对于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渐由小事而成为大问题矣，此其二。本来一国数千年历史中，均不乏此种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敢为耳。古人云，蚁穴溃堤，以极无聊的琐屑事，往往为不堪设想的祸害之因，吾人经此事变之后，创巨痛深，甚愿于此互勉。我因为回忆而想起留学生抗日之原因[1]，故略为说及，以为愚者一得之献也。

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是本乡与麻布两处，所以回忆中觉得不能忘记的也以这两区的附近为多。最初是在汤岛，随后由东竹町转至西片町，末了远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馀。我们那时还无银座散步的风气，晚间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与书摊，所以最记得的是本乡三丁目大学前面这一条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里街道。从东竹町往神田，总是徒步过御茶之水桥，由甲贺町至骏河台下，从西片町往本乡三丁目，则走过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树，渡过旱板桥（空桥），出森川町以至大学前。这两条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来还如在目前，神保町的书肆[2]以及大学前的夜店，也同样的清楚记得。住在麻布的时候，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离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车行要三十分钟左右，走过好些荒凉的地方，颇有趁火车之感，也觉得颇有趣味。有时白昼往来，则在芝园桥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车，进了山门，从[3]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称得起城市山林，别有风致，但是一到傍晚后门就关上了，所以这在夜间是不能利用的。我对于这几条道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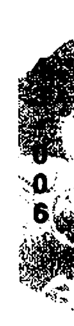
① “留学生抗日之原因”，原作“留学□日生之原因”。

② “肆”原作“肆”。

③ “从”原作“等”。

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到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阴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蹿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记得，约略可以相比耳。

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说是日本，其实除东京外不曾走过什么地方，所以说到底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这在当时或者不妨如此说，但在现今当然不能再是这样了。我们明白，三十几年来的日本已经大有改变，进步很大，但这是论理的话，若是论情，则在回想里最可念的自然还是旧的东京耳。民国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学校休假同内人往东京闲住了两个月，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我的书架上有一部《东京案内》，两大册，明治四十年东京市编纂，裳华房出版的，书是很旧了，却是怀旧的好资料。在这文章写的时候，拿出书来看着，不知怎的觉得即在大东亚战争之下，在东亚也还是“西洋的”在占势力，于今来写东洋的旧式的回忆，实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壬午小寒，于北京）



《枝巢四述》序

1943年2月24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目前有一件事，本极重要切实，而世间容易忽略或忘却，忽略忘却时甚不成话，而郑重提出来说，又太平凡了，或者觉得可笑，此亦是大奇也。此一事为何，即中国文用汉字所写，是也。中国人用汉字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又极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后关于国文学之研究或创作，我们对于汉字都应特别加以认识与重视。四五年前曾写过一篇《汉文学的传统》，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

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与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的发生出好些文章上的花样来。这里除了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之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边，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边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寄托在汉字

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会做诗钟之类，但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势力，这会得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多改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那里去，而且变的一小部分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笔者的不同，可以把《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能够比从前改好得多少，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是努力减少那腔调，要与八股策论愈相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加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问题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但是我总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

以上所说多偏于写作，在研究上也正是同一道理，总之离不开汉字，故关于汉字的性质及由此发生之文章上各种变化式样，我们须得了知大概，这才可以着手于研究或写作的工作。这类预备知识，现今不易获得，这是一种困难。但是现在《枝巢四述》出版，也就可以补此缺恨，鄙人根据上述的私见，深信此书之公刊不独有益于在校的学子，即于国文学前途亦至有关系。枝巢先生学问渊深，著作宏富，《啸盦诗词文稿》及《旧京琐记》各种均已梓行，曾得快读，此“四述”者乃近年授徒之作，就骈文诗词曲四门，详为说明，在

先生虽只是绪馀，但其意义则至重大。鄙人尝言，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窃本此意，为《枝巢四述》作跋语，至于言之不文，固自知之，亦正不能计也。

周作人识于北京，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桑下丛谈》小引

1943年3月8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余生长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说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无异于吃腌菜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偶见越人著作，随时买得一二，亦未能恣意收罗，但以山阴会稽两邑为限，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欲编书目提要，尚未成功。平常胡乱写文章，有关于故乡人物者，数年前选得三十篇，编为《桑下谈》，交上海书店出版，适逢战祸，未知其究竟，今又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只是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古人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恐发生留恋也，鄙人去乡已久，而犹喋喋不已，殊为不达，深足为学道之障。二十七年冬有诗云：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

流水斜阳太有情。

旧友鲍瓜庵主人其时在上海，见而悯之，示以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此种缺点非不自知，但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二十六年九月寄废名信中云，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即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桑下未必限于故乡，由此推广正亦无边，惟乡里自当为其起点耳。

民国癸未三月八日。



李越缦家书[①]

名人书简抄存甲

1943年3月刊《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三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小　记[②]

去年秋天偶从杭州书店得会稽李氏藏书简三十三纸，整理之乃越缦老人家书两通，潘伯寅书廿七通，据云郑盦字不值钱，故此二十九纸较四纸家书为廉，才及三与四之比耳。夜坐无事，因录出之。潘书无年月，姑以内容略为次第。李书皆系月日，但查《荀学斋日记》十集，自光绪己卯至己丑凡十一年，不见记事，或当在为樊山所没收的数册中耶。家书之一详语气疑是致其夫人者，唯日记中曾有寄二妹或三妹书之语，亦未敢定，姑如文录之。潘书大抵寥寥数语，虽只是平常的小简，而即此可以窥见二人交际情形之一斑，不失为有趣味的资料。《越缦堂日记》己卯四月初五日条下云，

① 原题《名人书简抄存》，副题"甲、李越缦家书"。
② "小记"原为"附记"，在全文之末。

得伯寅宫保书，其后录有答书，中云，又叹《鲒埼亭诗》甬上无人为之重刻，此与潘书第九所言相合，可以考见时日。又记四月二十九日上谕，以工部尚书潘祖荫为刑部尚书，由是可以推知第二五书当作于庚辰辛巳，而第二七书或是任工尚时所作欤。如能细查日记，必有许多材料，可相印证，惜无此馀闲，念之怅怅。又有潘伯寅致吴仲怿书，凡百十馀纸，多谈金石，亦颇可喜，当俟有暇再抄录也。

民国壬午小寒日，药堂记。

(一)与四妹书

四妹平安如晤：

八月五日僧寿到京，一切平安。在此将近一月，与灏斋、僧宝朝夕聚处，甚觉相安。僧喜兄弟怡怡，同居一室，彼此交勉，颇肯读书，妹与少奶奶俱可放心也。灏斋以明日赴天津，即令高升随之，到津以后便航海南归，已给盘川二十元，(旁注，由僧寿给发，)赏以银三两，京钱十二千，亦可敷衍矣。妹独立支持门户，甚为辛苦，宜小将养，略略点补，身子最为要紧，切不可过惜钱物。僧寿新妇年少循谨，喜于侍奉，亦甚可喜，妹亦当格外怜爱之也。兹寄上蜜枣一匣，妹可暂为早晚点心。又顶花一朵，小圆花五朵，送僧寿新妇。兄七月廿二日忽然痰厥，一二时不能言语，似近中风，幸调养渐愈，昨赴安徽馆音乐筵席，坠马被跌，尚无伤损，然年老人究不可恃也。外有羔皮磨本缎女袄，连平金挽袖，送小姑太太，为琴姑添奁；圆头扎珠花一朵，边花一对，送二姑太太，为荷姑代针黹；俱交高升带回，望妹分送。琴姑所要包金首饰，俟月底托东浦金庶吾太守带回，馀不一一，即问

阃安。

兄慈顿首，九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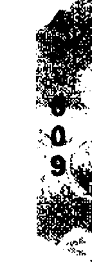
(白文印曰李慈铭字悉伯)

(二)与僧喜书

我自入闱,伤风渐愈,两日来惟苦咳嗽,夜间尤甚,至达旦不寐。(旁注,在至公堂东头,与海都统前后居,与褚侍御对屋居,乃乡试满监临所居之地,一切点名封门多褚[1]侍御偏劳。)闱中一列尚顺,供给每日两顿,四盘四盌,点心两巡,俱尚丰美。我因忌油腻,故自营馔,兰厨子尚能烹饪得法,林儿伏侍亦能小心。昨已考毕,并无公事,惟俟初三日覆试点名后即可出场,是日须令车马一早来接。(旁注,亦不必太早。)今日咯血一口,家中桂圆西洋参可送一团。(旁注,并带现钱二串来,即交去人。)

僧喜吾儿知悉。　　　　　　十月廿九日灯下,越缦老人手书。

① 此处原衍"偏"字,已删。



潘伯寅与李越缦[1]

名人书简抄存乙

1943年4月刊《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四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一

手教敬悉，费神极矣，容细读再行申谢。尊体已康复，甚念甚念，伏维珍卫。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敬使十千。

二

外一册，祈于九月前捉刀一文，彼不甚知文字也。又一册，乞赐题，不拘何时掷还可耳。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三

承为捉刀，感谢之极。敬呈龙井四瓶，伏乞哂纳。敬上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

① 原题《名人书简抄存》，小题"乙、潘伯寅与李越缦"。

四

画二幅乞赐题,(旁注,各题一诗,)家君五月初旬寿辰,以备家宴时张挂也,语祈吉祥字为感,渎神容面谢。敬上爱伯仁兄,荫顿首。

五

莲士集印来十部,先送呈。昨临钟读了如箝在口,真闷闷也,兄有所释,尚祈示及。腹疾尚未走谢为歉。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六

画诗及肴,无以为报,再赠龙井四瓶,今年当不缺矣。此谢,爱伯仁兄,荫顿首。

家君现服徐君药,并按摩,尚未愈,知念附及。家君不欲服他人药也。十五。

七

家君尚未愈,仍服亚陶药,并延人按摩,承念谢谢。敬复爱翁仁兄大人,荫顿首。

八

一文数诗,乞为改之,勿改其韵,乃和人诗也,费神之至。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挽诗可并韵改之。第一首语语实事也。

九

日记及谢山诗奉缴。谢山诗庚申失于淀园，何鄞人不为重刻也。此致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十

日记遵命交若农，霞川词呈缴。大集及小志剞劂之事，一千日中弟当任之。骊歌在即，能无惘惘。明日午前后走谈，不尽。敬上莼客仁兄大人，荫顿首。

十一

新词直是井华水上人句，贱子附名以传，幸矣。月杪月初拟续极乐之游，容再布闻。敬上莼客仁兄大人，荫顿首。

十二

先祖文集二分奉上，（旁注，匆匆尚未细校，）一赠肯甫兄，又一书一帖奉赠。闻兄有庄珍艺先生遗书，欲借观，归来奉缴如何。此上爱伯仁兄大人，荫顿首。

十三

（上缺）刻少分拨清楚再复。林所著《三礼通释》系其业师所著，据为己有，进呈后其业师之子欲揭告，为人劝阻乃止，此敝师陈颂南师之言也。书若要看，容再送。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十四

《逃虚类稿》及分宜贵阳怀宁三相国尺牍奉阅。圆海仅在黄得

功军中拜东阁之命一日耳，次日则福王被获矣，其福气最差也。若分宜之福，似尚在元长之上，以为如何。（旁注，不如会之远甚，福自以史卫王为最。）莼客仁兄大人，蔭顿首。

十五

孙子宜来当恭候，过申刻后则睡矣。丛书无钱未印，《洗冤录》奉去二部。警石书未到，亦未见，不知其故何以刻也。其何以刻何不问之？爱伯仁兄大人，蔭顿首。

十六

子宜适来，（旁注，十八九日或来见乎，）令人对之惘然，几为陨涕。然念及珊士，尤令人怆恨，莲士之福不已多乎。病惫日甚，草此奉致爱伯尊兄大人，弟蔭顿首。

十七

贱恙总未愈，仍时作痛，不能多行步，承念并惠豕肩，谢谢。忌口月馀，于此味最宜也，感荷感荷。此上爱伯仁兄大人，弟蔭顿首。

十八

鹅卵豕肩奉赠。日来病作生涯，颓唐益甚，除勉强入直外，人事尽废，已三年矣，如何如何。越缦仁兄大人，蔭顿首。（方印白文有边，似是“无有好处”四字。）

十九

弟因去年陵差未完，于明日请训起行，初一归。归来再述一切，现在收拾行李，匆匆不多赘。越缦仁兄大人会状，蔭顿首。（大

方印，白文曰“丹枫草阁”。）

赐果狸，谢甚，无人能制之，以移奉衰小午矣，彼有佳庖也，惜弟即行，并不得食耳。

二十

越缦仁兄大人阁下，承惠食珍佳醞，故人雅意，何敢却之，敬领谢谢，并敬呈家君也。清况为之浩叹，同病相怜，可笑，早晚即为兄筹之也。敬谢，即颂年安，弟荫顿首，二十八。

二一

刻因惠陵奉安，演龙辖车始归也。来示未复，诗已转呈。家君小愈，尚未十分轻减。菲敬二十四金乞收。（夹行）今年竟无馈岁者，二十八九如稍可为筹，必筹之也。爱翁仁兄，荫顿首。

二二

有门人来，薄有所赠，敬以奉贻，聊佐赏花载酒之一局，知不足当一笑也。幸勿掷还。此致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白文印曰“丹枫草阁”。）

二三

菲敬十二金奉呈，勿哂其棉薄也。肯夫近通信否，能宽为资助否？清况固无时不在念耳。旧疾频发，兼苦头风，委顿之至。越缦尊兄大人，弟荫顿首。

二四

来示具悉。即刻赴天坛，明日子刻将事去矣。新年来尚未得

眠,其他可知,秋间决计引疾去矣。越缦仁兄,荫顿首。

二五

自正月初二即到署,至今无一日不在署。疑难案件纷至沓来,去年一年结七百七十五案,其如划尽还生,芜于秋草。兹有奉求之事,能否见允,不胜铭感。敬上爱伯仁兄大人,弟荫顿首。

二六

手书具悉。弟并无不见之客,若其过申[1]正则已睡,至每日入直,不能在家候客,(旁注,亦无不入直之日,)当亦共知之也。始归,即复莼客仁兄,弟期荫顿首。(白文印曰,“雲自无心水自闲”。)

二七

手示敬悉。弟前以目疾肿痛乞假,是以来客不能见也。今以沟渠工已销[2]假,(旁注,尚未全愈[3],是以字迹潦草,)来者在寓则必见,过今明二日,恐当奔走沟渠间,不知何日了也。(旁注,计共百五十五处,且与敬少宗伯同行也。)敬复爱伯仁兄大人,期荫顿首。

---

① “申”原作“中”。

② “销”原作“锁”。

③ 原无“愈”字,今增。



怀废名

1943年4月16日刊《古今》20～21期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妙，但此是隐居西山前后事，《莫须有先生传》与《桥》皆是，只是不易读耳。废名曾寄住余家，常往来如亲属。次女若子亡十年矣，今日循俗例小作法事，废名如在北平，亦必来赴。感念今昔，弥增怅触。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写此小文，他日如能觅路寄予一读，恐或未必印可也。

以上是民国廿七年十一月末所写，题曰《怀废名》，但是留得底稿在，终于未曾抄了寄去。于今又已过了五年了，想起要写一篇同名的文章，极自然的便把旧文抄上，预备拿来做个引子。可是重读了一遍之后，觉得可说的话大都也就有了，不过或者稍为简略一

点，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补充，也可以说是作笺注罢了。

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现在原信存在故纸堆中，日记查找也很费事，所以时日难以确知，不过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距今已是二十年以上了。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废名最初写小说，登在胡适之的《努力》周报上，后来结集为《竹林的故事》，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这《竹林的故事》现在没有了，无从查考年月，但我的序文抄存在《谈龙集》里，其时为民国十四年九月，中间说及一年多前答应他做序，所以至迟这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事吧。废名在北京大学进的是英文学系，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馀，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黄旗村里，至北大开学再回城内。这一期间的经验于他的写作很有影响，村居，读莎士比亚，我所推荐的《吉诃德先生》，李义山诗，这都是构成《莫须有先生传》的分子。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哪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房居住，其时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做讲师，生活很是安定了。到了民国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

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当然大家觉得他大可不必，及至芦沟桥事件发生，又很羡慕他，虽然他未必真有先知。废名于那年的冬天南归，因为故乡是拉锯之地，不能在大南门的老屋里安住，但在附近一带托迹，所以时常还可彼此通信。后来渐渐消息不通，但是我总相信他仍是在哪一个小村庄里隐居，教小学生念书，只是多"静坐深思"，未必再写小说了吧。

翻阅旧日稿本，上边抄存两封给废名的信，这可以算是极偶然的事，现在却正好利用，重录于下。其一云：

> 石民君有信寄在寒斋，转寄或恐失落，信封又颇大，故拟暂留存，俟见面时交奉。星期日林公未来，想已南下矣。旧日友人各自上飘游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匆匆。九月十五日。

时为民国二十六年，其时废名盖尚在雍和宫。这里提及《明珠》，顺便想说明一下。废名的文艺的活动大抵可以分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以上都是小说；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都是短文。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如何，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得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

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其中废名写了很不少，十月九篇，十一二月各五篇，里边颇有些好文章好意思。例如十月份的《三竿两竿》，《陶渊明爱树》，《陈亢》，十一月份的《中国文章》，《孔门之文》，我都觉得很好。《三竿两竿》起首云："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中国文章》也劈头就说道："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后边又说："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这些话虽然说的太简单，但意思极正确，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边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我的第二封信已在废名走后的次年，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其文云：

> 偶写小文，录出呈览。此可题曰《读〈大学〉〈中庸〉》，题目甚正经，宜为世所喜，惜内容稍差，盖太老实而平凡耳。唯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给朋友们一看，虽是在家人亦不打诳语，此鄙人所得之一点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达耶，匆匆不多赘。三月六日晨，知堂白。

所云前寄一二信悉未存底，唯《读〈大学〉〈中庸〉》一文系三月五日所写，则抄在此信稿的前面，今亦抄录于后[1]：

---

① 《读〈大学〉〈中庸〉》(38·017)全文已收，因文字微有不同，仍复全录。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很难懂，懂得的地方也只是这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多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多矣。不知道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诧，此其三也。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①]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覆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

此文也就只是《明珠》式的一种感想小篇，别无深义，寄去后也不记得废名覆信云何，只在笔记一页之末录有三月十四日黄梅发信中数语云：“学生在乡下常无书可读，写字乃借改男的笔砚，乃近来常觉得自己有学问，斯则奇也。”寥寥的几句话，却很可看出他特殊的谦逊与自信。废名常同我们谈莎士比亚，庾信，杜甫，李义山，《桥》下篇第十八章中有云：“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此可为一例。

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评述了。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赞一辞，所以回

---

① “下中”原作“中下”。

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关于废名的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记一二。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1]，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废名曾撰联语见赠云，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今日找出来抄录于此，废名所赞[2]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记于北京）

---

① “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原作“大声争论，二则忽而静止，人已扭打在一处”。

② “赞”原作“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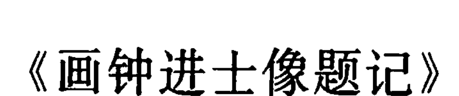
先母行述

1943年4月1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母鲁氏，讳瑞，为外祖父咸丰辛亥科举人户部主事鲁晴轩公希曾之三女，生于咸丰七年丁巳十一月十九日。光绪六年归于我先君伯宜公。生子四，樟寿、櫆寿、松寿、椿寿；女一，瑞姑，幼殇。先君为会稽县学生员，屡应乡试不中式，以酒自遣，久之遂病咯血，继患水肿，卧病三年，先母竭力调护，形神为之销损，终不起，于光绪丙申九月去世。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居间尝言：吾有子四人，当遣其出海外求学，一往西洋，一往东洋耳。先母闻而识之。及先君殁，家计益穷，先母乃遣樟寿往南京，易名树人，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时人尚迷恋科举，多以改途为非，相率阻止，先母弗听焉。戊戌冬，四弟椿寿以急性肺炎卒，年六岁。先母痛之甚，令画师追写其像，悬之室中，今存作人处。庚子变后一年，辛丑，令櫆寿往考江南水师学堂，易名作人，入管轮班。丙午，奉派

往日本留学。时树人亦已先在，至庚戌、辛亥，相继归国。盖自丁酉至辛亥十馀年中，树人、作人均游学在外，在南京时尚得乘年假时一归省，及往东京，则六年内未曾一归，先母唯与松寿即建人居守老屋。民国建立，树人供职南京教育部，旋移往北京。六年，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八年冬，先母遂率家人北迁，定居北京，以至于今。先母性弘毅，有定识。待人宽厚，见有急难，恒不惜自损以济人，以是为戚邻所称。平时唯以读书自遣，古今说部，无所不读。又读阅报章，定大小新闻数种读之，见所记多单调虚假，辄致愤慨。关心时事安危，时与儿辈谈论，深以不能再见太平为恨。近年目力稍减，不便读报纸细字，乃辍读，改而编织。尝卧疾而两病，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笹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及半月后，自南京返，则肺炎复发。据医师言病本不剧，而年老气虚，虑不能胜。先母见作人归，即曰："这回与汝永别了。"复述两次。作人深讶其语之不祥，而不图其竟实现于五日之内也。时为四月十八日酉时，乃遂长逝，享寿八十七岁。临终之日，神志清明，不诉苦痛，不见秽恶，渐以人灭，如就安眠，世所谓得往生者非耶。作人不能为文，猝遭大故，心绪纷乱，但就记忆所及，略记数行。凡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亲。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当世仁人，读其文而哀其心，则作人之愿不虚矣。

次男周作人泣述。



《画钟进士像题记》

1943年4月25日刊《风雨谈》创刊号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金冬心杂著六种》，寒斋有巾箱小品本，种榆仙馆刻本，当归草堂刻本，最后乃得桐西书屋刻本。当归草堂本目录后有魏稼孙题记，末云：

>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氏刻题画记五种时在同治壬申，比丁氏本才早六年，有王鸿朗跋，不言所据何本，略一比校，似反多鲁莽删改处，唯末附刻王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题记》一卷，却颇可喜。王笈甫即鸿朗，前有光绪丁丑潘介繁序，画钟馗题词世多有之，但只散见各人集中，今汇为一卷，一人之作而有二十二则，可谓难得矣。今年夏日乃又得

一册，则上有红蓝二色批语及墨笔题识，语多可取，且亦有足资考据处，因择要摘录之。卷首《画竹题记》自序后墨笔题云：

> 光绪三年丁丑之夏，余客楚北，椒坡舍弟以需次在彼相见，各出行箧书互观，贻我此卷，盖[1]镌板武昌郡中者。是岁九月余归吴郡，椒坡亦往湘楚，匆匆分手。今检箧，此种乃有两本，因分一以贻楱伽先生，先生善画工诗，古趣奇趣，与昔邪居士殊不相让，且与舍弟亦素交，想必展卷一笑也。香禅居士记于二鱼龛，时光绪六年庚辰，端午后三日。

朱文印曰香禅，曰瘦羊，前一印曰二鱼龛。《画竹题[2]记》第一叶栏外朱文印曰惟德堂，曰化生，白文印曰香禅居士，又白文曰顾芸台印，朱文曰鞾翁，曰駮老，白文曰顾曾寿，曰顾亮基印。第一则题记首云，饥凤非竹实不饱，余画竹，竹之实岁无所收，末云，余之常饥又何怪乎。书眉蓝笔批曰：

> 第一条即是江湖口吻。

又朱笔批曰：

> 王渔洋朱竹垞批杜诗所谓乞相。黄山谷云：开口辄言穷，其意欲何为，又云，客来献穷状。张山来曰，其意但求布施耳。

---

① “盖”原作“盍”。

② “题”原作“类”。

卷末空白处朱笔题曰：

先生胸襟故高，惜激而不广，干青云而直上之意未见也。庚辰五月，棱伽山民。

又蓝笔题诗云：

精玉两呈人各见，鱼熊兼爱性难同[1]光芒太露缘何事，
未免胸怀欠抱冲。　　　　　　　　民又书。

《自写真题记》上亦有眉批两则，不具录。《画马题记》卷末朱笔题曰：

为人学问，不宜愤激，不宜炫耀，冬心先生才气虽优，德器终不足也，惜哉。棱伽山民。

又蓝笔题曰：

冬心题画诸诗皆不见佳。

案香禅是潘钟瑞，棱伽则顾氏也，所评虽严切，然亦深中冬心之病。《画钟进士像题记》序后亦有识语，墨笔云：

曩余游鄂渚，值丁丑端午，曾以素纸乞笈甫先生画钟进士

① “难”原作“鸡”。

像，未得也。去年闰春复往，笈甫见余即言负君债未还，余因索之，遂出戊寅端午所画壹帧携归，刚及端午，悬诸斋壁。今又逢端午，而笈甫下世已数月矣。重展画幅，又诵斯编，辄忆老馗霑醉奋笔时也。庚辰五月七日，香禅记。

又朱笔云：

笈甫先生不得意，画出终葵吓小鬼，题诗无乃太疏豪，棱伽山民为嘘唏。先生海盐人，大才不售，在湖北闽幕，奉事主稿，豪于诗酒，年五十馀而卒矣。

据此可知王氏卒于光绪庚辰，唯云海盐人而不确，题记自署古盐官，实为海宁州也。卷中有眉批五处，其一云：

诗意极是，而诗之旨终不是，言尽意穷，失之于薄，才大量狭故也。

末蓝笔总批云：

此公才气比冬心开阔，然器量亦狭。

所评大旨亦不差，唯此本笔墨游戏，自然语多尖新或涉排调，如欲以温柔敦厚相期，未免失之太高。题记第一则为张樵野作，原本小注云：

图中古木槎枒，霜叶半脱，老馗倒戴纱帽，沉醉不能步，张

天师星冠象简，掖之而行。一小鬼于路侧屈半膝，持手板作通谒状。下临深潭，潭中月影与天际光相射。

第十二则为芝舫作，小注云：

图中石床一，竹炉旁设茶具，一鬼汲水，一鬼持扇①。老馗反袂侧立，作凝睇状，背有小鬼提酒壶，戟手揶揄之，山径转处，两鬼扛一竹篮，红签标题八分书四字云，六安春茗。

又第十四则画作年少钟馗图，第十八则作柳岸纳凉图，具旖旎风流之致，记云：

虬须飘然，梨涡夹侍，老子于此，兴复不浅矣。

观此诸例，可以想见图之一斑，题诗在上头，那得不嬉笑怒骂耶。

王笈甫著作不知有几种，寒斋所得此外只有《游蜀纪程》上下二卷，有时乃风序及自序，鲍瑞骏等六人题辞，时氏序署庚午，盖同治九年刻也。书记同治八年七月随李鸿章由湖北入四川，十月仍回武昌，棱伽②山民所云阔幕，盖即指此。记文清丽可诵，如记七月初六日事云：

初六日晴，好风送帆，百二十里。帅舟峨峨，胶于浅沙，百夫推挽，江湖上迎，天人交助仅而得达。抵老鹳嘴，日暮遂泊。

① "扇"原作"扁"。

② "棱伽"原作"枷棱"。

侧有木筏，修广盈亩，茅茨鳞比，俨如江村，试登其上，匠方锯材，邪许之声，与波相答。

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近人日记游记中常有之。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六朝的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自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游蜀记略》本不是大著，不过因为是王笈甫之作，所以收得，文章也只是带便说及而已。

潘介繁字椒坡，曾得其所著《晓梦春红词》一卷，有吴嘉淦许赓飏二序，许序署同治己巳，或即是刻书之年，盖在刻冬心题画记之三年前也。（民国壬午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蒉轩笔记》序

1943年6月20日刊《华北作家月报》第6期
署名药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蒉轩者，书斋名，小时候常闻先君说及，盖是曾祖八山公所居，与兰花间相对。吾家老屋在会稽东陶坊，地名东昌坊口，张宗子《快园道古》中记东昌坊贫子薛五官事，毛西河文集中叙与罗萝村揖别东昌坊，可知在明季已如此称，近来乃闻为妄人改号鲁镇，今亦不知其如何究竟矣。先君去世已四十八年，与老屋别亦二十五年矣。一蒉轩虽改筑后亦阴湿多蚊，不能久坐，未曾读书其中，今并屋亦不存，而记念仍在，甚爱此名，乃沿用之，其实轩固未有，只刻有石章曰“一蒉轩”而已。轩名出于《论语》，案《子罕九》中一章云：

>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

今本蒉字从竹，何氏《集解》：包曰，土笼也，朱氏《集注》同。黄式三《论语后案》乃云：

> 《说文》，蒉，草器，而无从竹之篑字。《汉书》何武诸传赞，以一蒉障江河，注蒉织草为器，所以盛土，是包注蒉训土笼，即是蒉字。又《礼乐志》引《论语》，未成一匮。《王莽传》，纲纪咸张，成不一匮。颜氏两注俱云，匮者织草为器，所以盛土。是蒉又通作匮。匮假借字，篑讹字。

今从其说，用从草之蒉字，《说文》段氏注引《孟子》曰，不知足而为屦，吾知其不为蒉也。由此可以推知蒉之形状，大略盖如簸箕畚斗耳。朱氏《集注》又云：

> 《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蒉。夫子之言盖出于此。

案此二语见于《旅獒》，乃是伪书。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卷四上注其出处云：

>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论语》文也。掘井九仞，《孟子》文也。但七尺曰仞，周尺当今六寸，九仞不及四丈，何足为山。且孔子譬语，今用之竟去譬字。

据此可知一蒉之语其出处即在《论语》，别无更古的根据，至其教训则如《集注》所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鄙人今无此轩而用轩名，理由亦甚简单，其一以此名为先人所有，得以承袭，其二则意含警策，起

人惧思，而草鞋似的土笼，形甚质朴谦退，用却实在，此物此志亦殊可爱重耳。

以上是说一蒉轩的名字。但是，《一蒉轩笔记》与别的名称的笔记有什么异同可说么？这未必然。自己的文章自然知道的最清楚，一面也诚如世俗所说，有时难免会觉得好，在别人不觉到的地方，但其实缺点也顶明白，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我所写的随笔多少年来总是那一套，有些时候偶然检点，常想到看官们的不满意，没有一点新花头，只是单调，焉得不令人厌倦。但是思想转变不是容易事，又听说宣传的效力发生在反复重叠上，因此又觉得那一套也未始不是办法，虽然本没有怎么要想宣传，虽然所说的多含有道德的意义。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虽反对人家跟班传话似的载道，自己却仍是随时随地的传道，因为所传是出于私见的道理，故一时亦曾以为即是言志。写自序时是民国乙丑，于今已是十八年了，结果还是别无进步，也少改变，诚恐于单调之外加上顽固，《一蒉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厚而已。

我写文章大概总是眼高手低的一路，因此自己觉得满意的几乎没有一篇。并不是什么谦虚客气，实在只是平常标准定的稍高，而自己短长也知道的稍清楚，结果便自如此。至于对人大抵也是一样。丁丑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比较选得多的为刘献廷《广阳杂记》五卷，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五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六卷，王侃《衡言》《放言》《江州笔谈》共八卷，李元复《常谈丛录》九卷，玉书《常谈》四卷，马时芳《朴丽子》正续四卷，其次则顾炎武《日知录》，尤侗《艮斋杂说》，梁清远《雕丘杂

录》，如屈大均、李斗以记事物多所采取，则又别一例也。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我相信中国道德政治上有两样思想，甲是为人民，孟子所谓民为贵的思想；乙是为君主，韩公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是也。乙虽后起，但因帝制关系，几千年来深入士大夫的心里，急切不易除去。甲虽一时被压倒，但根本极久远，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少数有识之士随时提倡，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概。到了现在，民国早已成立，在中国最适合，最旧也最新的，无疑地是这民为贵，为人第一的仁的思想。无论思想应得如何的自由，在民国的道德与政治思想上总不能再容颂扬专制的分子，凡有志述作者对于此点当别无异见。其次中国文章中向来神异的成分太多，讲报应，如逆妇变猪、雷击字纸衬鞋底，谈变化，如腐草化为萤、雀入大水为蛤，说教训，如枭食母、羔羊跪乳。这些关于自然物的传讹，当然是古已有之，不足为怪，但是有见识的人也未必信。汉的王充便已不信雷公，晋的陶弘景说桑虫不能化果蠃，直至近代还是相信这些奇迹的读书人在我看来不能不算是低能了。怪事异物说了非不好玩，但这须得如东坡姑妄言之的态度，也自有一种风趣，是佳妙的轻文艺，只可惜极少见，至少在清朝一朝里，可以说比有常识的还要少。做文章并不一定要破迷信，但自己总不可以迷信，譬如在学堂听得点生理知识的人，原不必带在口边随处卖弄，不过他知道无论怎样的炼，总之无路通过横膈膜，再

从颅骨钻孔出去，以这态度去谈炼[1]气，怎么样说都好，我相信那就得了，如文章写得通达，即可算是及格，我愿把他记入那簿子里去。这些条件仔细想来并不怎么苛，只是这样的人不很多，则是如孟子所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自己写文章当然不敢不勉，因为条件中消极的意味相当的强，所以还比较好办，不像对于人家的未免多有不客气的挑剔，这大抵也就止是谨耳。对于世俗通行以至尊信的事理不敢轻易随从，在自己实在是谨慎，但在世俗看来未必不就是放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老百姓所谓没有法子是也。有些平易讲理的文章，往往不讨好，便是这个缘故，虽然也会得少数识者之理解，却是没有什么力量。个人既是这样的意见，能力也有所限，自然难有新的成就。这里借机会略为说明对于文章的要求，若是自己的文章原来还是旧的那一路，这未见得悉与要求相合，唯消极方面总时时警戒，希望不触犯也。一蒉轩是新的名字，理应解释一番，笔记则并非新的文章，本无再加说明之必要，现在只是顺便说及，而乃占了三分之二的字数，已是太多，不可不赶紧结束矣。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五日记）

〔附记〕　去年夏天松枝君游历至绍兴，访东昌坊口则已无有，盖改名鲁镇云。咸亨酒店本在东昌坊口，小说中不欲直言，故用代名，今反改地名从之，可谓妄矣。在南京闻浙东行政长官沈君言，绍兴现今各乡有徐锡麟镇蔡元培镇等名称，则其荒诞又更加一等，似亦为别处所未有也。

（六月十日又记）

---

① “炼”原作“练”。



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①]

1943年7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1期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我们平时读书，往往遇见好些事情，觉得意见纷歧，以至互相抵触，要来辨别决定，很费一番心思，而其结果则多是倾向于少数的，非正宗的方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是有些怪人，如李卓吾俞理初等人，喜欢发为怪论，而这又能惑世诬民么？我想这未必然。据我的意见来说，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这里最好借黄梨洲的现成的话来说明，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云：

>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

① 1943年4月13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讲演。

为君也。

"原臣"篇中云：

>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又"置相"篇中云：

>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

这几节话已经说的很简要，现在再引经书来加以证明，重要的还是在《孟子》里，如"尽心下"云：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离娄下"云：

>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

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万章上”说伊尹云：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此外如“万章上”之说天下之民讴歌舜禹，“梁惠王上”“尽心上”之叙五亩之宅等办法，“离娄下”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都是这宗主张的表现，可以说即是黄黎洲说的根源。孔子并未明白说过，《尚书》多载政事祭祀，也未见说及，但是在传说上很有许多留存，如舜与禹之受禅，许由务光之逃避，禹稷之辛劳，以及汤之祷雨，皆是。据《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云：

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

查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古代君王与野蛮酋长一样，负有燮理阴阳的责任，如或旱干水溢，调整无功，往往有为牲之虞，有如晒城隍神相似。又据说君长的坐立衣食也多有拘束，如坐高座，足不着地之类，我们看《月令》中对于天子之衣的颜色，食的种类，有不近人情的规定，似乎有点近似。所以有些地方找人做酋长，候补者不愿

意，有时竟至拒捕。这些《金枝》上的零碎话，虽然都出在非澳[1]各蛮地，却颇可帮助我们证明传说中事实之可能，即使时代与人物未必便那么可以明确认定。在中国有文字纪录的时候，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很久了，事实上君权十分确立，其思想当如《洪范》所说，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那是殆无可疑的了。但是在想象中还存留着这么一个影子，成为传说，一直流传下来，而一般思想家中之特殊者也就由此传说而成为理论，于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遂以成立，如孟子，如王介甫，如李卓吾黄黎洲，如俞理初，都是属于这一系的。至于为君主的主张则为君权时代之正宗思想，千百年来说的很是堂皇，但分析起来，大旨只如《明夷待访录》所说，"原君"篇云：

> 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又"原臣"篇云：

> 世之为臣者，以为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

---

[1] "澳"原作"奥"。

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

这里批评的很彻透，不过事实上一直具有绝大势力，这大抵起于有史以来，至秦而力量更加大，至宋而理论更加强，以至于今，民国成立以来犹未能清算。但是向民间去看，那里的思想相当保有原来的纯朴，他们现实方面畏惧皇帝的威力，理想方面却仍归依于治水的大禹，养老的西伯，一般老百姓所期待的所谓真命天子，实在即是孟子所云天与之人与之的为人民治事的君，若说弥勒菩萨转世，乃是附带的装点而已。这样看来，现今觉得对立着的两种主张，为君主的思想乃是后起，虽然支持了很久的时间，但其根柢远不及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之深长，况且在民国建国以后，这最古老的固有思想也就最为适宜而合理，此其重点当然在于政治道德上，有加以扶植之必要，惟在一般从事于文史工作的人也是[①]很值得注意的事也。

上面所说都是泛论，现在且就文学方面来一看，究竟这两种思想占的势力如何。据理来推测，为君主的主张既在实际上占着势力很大也很久，应当各方面都已侵入浸透了，至少也有相当的根基，但是实在未必如此。文学上现今且只以诗歌为例，据我浅陋的知识说来，大约只有《离骚》一篇可以说是真是这种为君的思想的文学，此外就不大容易再去找寻。这实是无怪的，屈原据[②]《史记》说是楚之同姓，别的诗人忧生悯乱，感念身世，屈子则国事亦即是家事，所以那么特别迫切。可是我们仔细想来，《离骚》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此么？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上说得好，叙情怨则郁伊而易

---

① 原无“是”字，今增。

② “据”原作“把”。

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语虽简略，却能得其概要。我们回过去再看《诗经》，差不多也可以这样说。现在且依据《小序》去看，“大雅”与“颂”本来是以政事祭祀为主的篇什，倒是合例的，但以文学论这部分不占重要的位置，正如后来的郊祀歌一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是很好的诗了，然而其中也有差别。据本文或序语看出确有本事的若干篇中，美少而刺多，诗人之意也只是忧国为主而非思君，至于后世传诵，很有影响的诗则又大都是忧生悯乱的悲哀之作，别一部分是抒情叙景的，随便举例，前者有《黍离》《兔爰》《山有枢》《中谷有蓷》《谷风》《氓》《卷耳》《燕燕》等，后者如《七月》《东山》《野有死麕》《静女》《绸缪束薪》，《溱洧》《风雨》《蒹葭》是也。这里所说极不精密，但大概情形也就是如此吧。

关于古今体诗，这里也只得草率的说一下。不能广泛的去查考，只好利用一二选本，如闻人倓的《古诗笺》，张琦的《古诗录》，暂且应用。《古诗十九首》有些评家都以为是逐臣或失志之士之词，这个我们实在看不出来，恐怕大家也有同一感想。阮嗣宗的《咏怀五十首》，陶渊明的大部分的诗，照例是被归入这一类里去的，我们可以重复说关于《诗经》作者的话，他们诚然是忧时，但所忧者乃是魏晋之末的人民的运命，不是只为姓曹的或姓司马的一家也。以后我们且只看唐诗，而且唐诗中也只看杜少陵，因为唐诗固无从谈起，而杜少陵足为其代表，且亦正以每饭不忘君的诗人著名也。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芸叶盦[1]的二十卷本《杜工部集》，可是恰巧有名的古诗都是早年之作，收在前几卷里，检阅甚便，据我看来，《咏怀》

① “盦”原作“盒”。

《述怀》与《北征》诸诗，确如东坡所云，可以见其忠义之气，但如说其诗的价值全都在此，那有如说茶只是热得好，事实当然未必如此。老杜这类诗的好处如自己说过，正在其“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如上述诸诗外，有《哀江头》《哀王孙》，“新安”“石壕”二吏，“新婚”“垂老”“无家”三别，《悲陈陶》，《兵车行》，“前后出塞”，《彭衙行》，《羌村三首》，《春望》，《月夜忆舍弟》，《登岳阳楼》，这些虽然未能泣鬼神，确有惊心动魂之力，此全出于慈爱之情，更不分为己为人，可谓正是文艺的极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们现在读了，能不感到一种怅惘。我不懂得诗，尤其不敢来讲杜少陵的事情，这里只是乱抓的抓到他，请他帮我证明一下，为君主的思想怎样的做不成好诗，结果倒是翻过来，好诗多是忧生悯乱的，这就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的产物。这也就可以说是中国本来的文学思想的系统，自《诗经》以至杜少陵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可以一直把民国以来的新文学也算在里边。

散文方面的例我没有引，因为这事情太是繁[1]重了，一时来不及着手。在那里面为君主的思想当更占有势力，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话头在诗中难免稍为触目，文中便用得惯了，更肉麻些也还不妨，所以那边的情形自然会得稍有不同，须待查考了再说。但是我相信，至少是依据我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意见来说，这种一切为君主的思想本是后起的，因了时代的关系一时间大占势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现在又因了时代的关系明显的已失势力，复兴的应该是那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不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这里的例证与说明或者还不

---

① “繁”原作“系”。

甚充足，有待于将来的补订，但我想这两种思想的交代总是无疑的事实，而且此与普通思潮之流行变化不同，乃是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运动密切相关，现今从事于文学工作的人正有极须注意之必要。

末了觉得又须加上一点蛇足的说明，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之一种观察，应用的范围自然就以中国为限。自然科学的定理世间只有一个，假如有了两个，其中之一必将被证明为假，若在人文方面便可以容得不同，不好用了一条定例去断定一切，所以论中国的事情，其结论即使正确，其通行范围亦姑且限于本国，不当以此结论妄去应用于外国事情之上，亦不可以外国之结论拿来随便应用。人的头脚虽同，鞋帽却难通用，此小事人无不知者，而吾于此乃犹哓哓费词，此其所以为蛇足也。

（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



关于日本画家

1943年8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2期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近几年来常听见人说，日本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很多，日本古典介绍到中国来的却还几乎没有。又有人说，日本很能赏识中国的名画，中国人却不知道日本画家的名字。第一个问题的理由说来话长，暂且不提，第二个问题比较的简单，现在不妨来谈一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画家，其理由有好几个。其一，本国画家本来也就少有人知道，博物院美术馆差不多还没有，无处可看古画，画集画史近于专门，未易普及，少有美术评论家，后来虽然渐有介绍赛尚、古诃的文章见于杂志，而写得不高明，不能引起读者兴趣。其二，中国画家向不注意日本画，内行既然不提，外行自然更不知道。清末上海石印的《古今名人画稿》中，有好几幅人物画颇诡异，后来见北斋的画谱，才知道是他的手笔，可是石印本上并无署名，所以同时无从知道是谁所画。照这样情形，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假如他家里不是旧有收藏，他对于本国画的知识也就难得及

格，自然更不必说外国了。其实就是在日本，以知道外国画家作为文化人的一资格，恐怕也起于现代，或者是大正以来三十年间的事亦未可知，因为据我所知道，这种风气似是自《白桦》发起，而对于此点的注重似乎也是武者小路君为主，至于别人大抵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吧。

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有机会与日本画接近，问他们知道几个日本画家的名字么，这是可以的。不过知道虽然会知道，而懂得与否却是别一问题。我自己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和我不懂得诗而仍想买诗集诗话闲看一样，我并不懂得画，但也喜欢收集一点画集之类，随便翻看。我的确很受过《白桦》的影响，不过这还是在文艺一方面居多。此外又因初见这种高尚的同人杂志，觉得很特别，创作之外还谈宗教艺术，有这许多好的插画，但是赛尚、古诃等西洋绘画于我终是有点疏远，不曾发生大关系，虽然也曾因此而买过后期印象派等等几种洋书。关于日本画我所受的影响乃是从同时在大阪由《雅俗文库》发行的浮世绘杂志《此花》而来的。其时审美书院或者已经刊行浮世绘集，但此乃是贵重的专门书，一般的书籍还不大有，杂志则恐怕未有，大概当以《此花》为嚆矢。《此花》先后一总出了二十四期，我都得了来收藏至今，我因《此花》不但认识了日本的浮世绘，又因此认识了《雅俗文库》与其主人废姓外骨，此后“雅俗”的刊物我大抵都搜求来，这给予我许多知识，引起我许多兴趣，我则反报以三十年不渝的敬意。以前关于日本板画家只知道葛饰北斋，有他的十几册画集，两本饭岛虚心著的《北斋传》，现在就知道了好多，至今还背诵得若干名字。依据各书铺翻刻的种种板画集，看了至今还记得而且爱好的，最早的是菱川师宣，其后有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歌川丰国，葛饰北斋，他们的特长固是仕女画，但是歌麻吕的《画本虫撰》，北斋的《隅田川两岸一览》，《富岳

三十六景》,《富岳百景》,安藤广重(加了姓反而觉得有点面生了)的《东海道五十三次》等,却更有意思。最近去世的小村雪岱,他给《笠森阿仙》作的插画,载在邦枝完二的小说里,我也很喜欢,近日得其画集,其中不少可喜之作。我是不懂画的,但于日本浮世绘感到兴趣者,其理由只是如此:一,对于线画,着色画,木板画,有儿童时代爱好之情。二,这些画家自称大和绘师,离开了正统的画派,自成一家的风格。三,所画的是市井风俗,可以看作江户生活一部分的画本。在那时候我也用力读"川柳",这个理由很有关系,但第二理由也颇重要,在浮世绘之外我亦因此爱好别的画家,例如鸟羽僧正,池大雅堂,耳鸟斋,尾形光琳以及光悦宗达这一流人,近时则如小川芋钱子,是也。我又爱民间艺术之大津绘,以及各类民艺品,大抵我所能知道的不是美术史上的大宗支派,所以前读武者小路君的《东西六大画家》,如雪舟等篇虽有兴味,仍[1]未能促进我的了解,柳宗悦君亦是白桦派之一人,著有《初期大津绘》,近又致力于民艺运动,则鄙人或觉得更是气分相近也。

永井荷风在大正初年写过一篇《浮世绘之鉴赏》,登在杂志上,后来收入《江户艺术论》中,揭载卷头。这篇文章我很喜欢,其第五节说得尤好,我曾经引用过好几次,今又抄录于后,其文曰:

>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着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子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

① 原无"仍"字,今增。

> 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异国文人的感想，未必能够字字与我们的意思一致，但是这里可以说差不多十九同意，特别是提明我们是生来就和他们白人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这个东洋人或亚洲人的自觉，即使与现时局离开了说，在知识人士也是必要，不但去搜取世界新文化知识须以此[①]作准衡，就是研究本国的艺文思想，亦不可无此反省，固不欲以此自划，只是有如悬镜于侧，时时引照，勿自忘形而已。我对于[②]艺术是外行，爱浮世绘的原因与所得自然也都是在美术埒外的，他人宽恕或以为不足怪，在我自己则是很满足的了。

个人意见以为，知道外国的若干画家，可以作为个人教养的一点资料，若在该外国的整个了解上大概没有什么用处。有人问起的时候，勉强回答二十来个画家的姓名，或者于必要时从尘封的书架上取出几十册画集来做证明，这也不难，可是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可以记得好些诗人文士画家陶工镜师的名字，但是对于其国民性仍是一无所知，如鄙人在数年前所曾自白，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也。

---

① "以此"原作"此以"。

② "于"原作"及"。



俞理初论莠书

1943年8月25日刊《风雨谈》第5期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从前我屡次说过，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这在其馀的两人也是共通的，虽然表现的方式未必一样。关于俞理初我已经写过好几次文章，现在再来提起，别无何种新的意见，只是就他指斥莠书这一点上，想来略为谈谈罢了。

近几年来常看笔记一类的书，没有详细计算，想起来实在也已不少，其中特别以清朝的为多，可是结果非常的不满意。本来我看笔记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所谓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读一部书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满足，有时觉得无味，亦不甚嫌憎，对于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足供我一时披读耳，古人云只图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但是有时遇见有些记

录，文字未必不佳，主张也似乎很正大，可是根本上不懂得人情物理，看了时觉得遍身不快活，这时候的不满意便已超过了嫌憎，有点近于恐惧了。好比尝药辨性的老祖神农氏，把草根树皮放在口里咀嚼，烁的一下觉得怪辣，他会直觉的感到，这可不是毒？我们未敢以老祖自居，但是从经验上也会有时感觉，这说得有点蹊跷，便很有莠书的嫌疑。笼统的说莠书，似乎有语病，假如这里有点感情用事，那么就与随便评定思想不正确相似，含有很大的危险性。我根据俞理初的例，所说的莠书当然不至于如此，这里所据的标准是简单的人情物理，如在这上面有讲不过去的便有问题，视为莠书也不为过。而且说也奇怪，被归入此类的并不是世间公认的邪说异端，倒反是普通正经的话为多，这是极有意思的事。盖天下多乡愿，其言行皆正经，常人无不佩服，然若准以情理，则其不莠者鲜矣，唯有识与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难与其功之大盖远过于孟子之攻异端也。《癸巳存稿》卷十五《胡先生事述》云：

> 正燮记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恶乡愿，因以所记遍求所谓乡愿者下意延问，凡经指示许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呜呼，此先生之所以贤欤。

寥寥的几句话，差不多把指斥莠书的精神表现得很好，我们也可不必多赘了。

俞理初论莠书的文章共有六篇，收在《癸巳存稿》卷十四内，计《酷儒莠书》《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是也。其中以一二两篇为最精，可为代表，今先就《酷儒莠书》引例于下，第一节云：

夹谷之会，盖齐以兵来，鲁以兵应之，《史记》齐鲁世家所载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史记》“孔子世家”云：倡优侏儒为戏而前，孔子曰，“匹夫荧惑诸侯者罪当诛”，有司加法焉，首足异处，齐侯[1]惧而动。陆贾《新语》云：优施舞于鲁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瞿然而恐。《后汉》张升传：守外黄令趋明威戮，曰，“昔孔子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后升以诛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穷儒，忮鳌之心无所泄，造此莠言，上诬圣人，不可训也。优人笑惑乃其职，于礼宜却之，于法无死罪。且鲁岂当杀齐优？实其说是行不义而杀不辜，齐人怒而鲁君不返也。

末节云：

高欢与长史薛琡言，使其子洋治乱丝，洋拔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夫违命不治丝，独非乱乎？其意盖仿齐君王后以椎解环，不知环破即解，乱丝斩之仍不治也。《汉书》龚遂传云，臣闻治乱臣犹治乱丝，不可急也，缓之然后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论，然欢在，洋之愚憨不至此，其状迂而很，乃无知酷儒之莠言，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愚儒莠书》第一节云：

---

① “侯”原作“候”。

朱弁《曲洧旧闻》云：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乞剪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指能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弁亲戚有见此状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闻见录》则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言已近妄。王巩《清虚杂著》则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状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其爱物如此。周密《齐东野语》则谓手指言文弱无气象，太祖以三司请截模枋大材修寝殿，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将来，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气象，盖以《史记》汉高谩骂而仿以为书，其愚如此。

第四节云：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

上边所引已足见其大概，对于向来传为美谈，视为故实，而与情理不合的事，不客气的加以指斥，对于初习读书的学子甚为有

益，只恨所举太少，唯望读者自能举一反三[①]耳。

同时有马时芳著《朴丽子》，语多通达，其《续朴丽子》卷下中有一则云：

>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

这一则就可以补入《愚儒莠书》篇里去，其直揭曲儒的心理，不客气处亦与俞氏不相上下。鄙人前读《礼记》中《檀弓》一卷，亦曾有同样的意见，觉得关于原壤的事，《论语》"宪问"所记殊不高明，读《檀弓》文乃极佳，比校之下乃益明显。《檀弓》云：

>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②]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③]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论语》则云：

>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

① "三"原作"之"。
② "已"原作"己"。
③ "失"原作"夫"。

看所说的老而不死这句话，可知那时原壤已经老了。据戴望注《论语》，《礼》，六十杖于乡。那么孔子也一定已是六十岁以上了罢。动手就打，圣门中只有子路或者未免，孔子不见得会如此，何况又是已在老年。我们看《檀弓》所记，孔子对待原壤并不如此，可见这以杖叩其胫的事很是靠不住，大约是主张严酷者之所为，亦正是附会之言耳。执女手之卷然下，据孔颖达《正义》云：

> 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说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

假如这里疏家没有将他先祖的事讲错，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孔子的年纪并不老，因为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执斤斧，总不会是六十岁后的事情。把两件故事比较来看，觉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么宽和，到老后反发火[1]性，有点不合情理。本来《论语》与《檀弓》里的故事都是后人所记，真假一样的不可知，但是准情酌理来批判，就自然分出曲直来，此间自有区别俨然存在，一见可辨也。

此类辩论仿佛有似致堂史论，无非对古人之[2]事妄下雌黄，实则不然。史论不必要的褒贬古人，徒养成不负责任的说话之陋习；此则根本物理人情，订正俗传曲说，如为人心世道计，其益当非浅鲜。若能有人多致力于此，更推广之由人事而及于物性，凡逆妇变猪以至雀人大水为蛤之类悉加以辨订，则利益亦益广大，此盖为疾虚妄精神之现代化，当不愧称之为“新论衡”也。

---

① “火”原作“大”。

② “之”原作“己”。



汉文学的前途

1943年9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3期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今天所谈的是中国新文学之将来，题目却是汉文学，这里须稍有说明。我意想中的中国文学，无论用白话哪一体，总都是用汉字所写，这就是汉文，所以这样说，假如不用汉字而用别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也好，反正那是别一件东西了，不在我所说的范围以内。因为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写下去，与这传统便渐有远离的可能了。

汉文字的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时也答不上来，现在只就[①]我感到的一部分来一说，这就是对于人生的特殊态度。中国思想向来很注重人事，连道家也如是，儒家尤为明显，世上所称中国人的实际主义即是从这里出来的。孔孟的话不必多引了，我们只抄《孟子》"离娄"里的一节话来看。

---

① 此处原衍"就"字，已删。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我想这禹稷精神当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孔孟也从此中出来，读书人自然更不必说了。在诗歌里自《诗经》《离骚》以至杜甫，一直成为主潮，散文上更为明显，以致后来文以载道的主张发生了流弊，其形势可想而知。这如换一句话说，就可以叫作为人生的艺术，但是他虽执着人生，却不偏向到哪一极端去，这是特别的一点。在自家内有道家与法家左右这两派，在外边又有佛教与基督教这两派，他在中间应酬了这两千年，并未发生什么动摇，可知其根本是很深稳的了。其特色平常称之曰中庸，实在也可以说就是不彻底，而不彻底却也不失为一种人生观，而且这也并不是很容易办的事。大抵这完全是从经验中出来的，道家的前辈经验太深了，觉得世事无可为，法家的后生又太浅了，觉得大有可为，儒家却似经过忧患的壮年，他知道这人生不太可乐，也不是可以抛却不管了事的，只好尽力的去干了看，这即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道家与佛教，法家与基督教，各站在一极端，自有他的理想，不是全便是无，儒家不能那样决绝，生活虽难，觉得不必绝粒饿死，也难望辟谷长生，馀下的一条路还只是努力求生，如禹稷者即其代表，迨生尽死至，亦便溘[1]然，以个人意见言之，正复恰合于生物之道者欤。

---

① "溘"原作"嗑"。

中国民族的这种人生观，在汉文学上可以说是伦理的传统，我看一直占着势力，不曾有什么变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木本水源，从这里可以长发出健全的艺术以及生活来，将来的文学自必沿着这道路前进，但是要紧的一点是在强固地立定基础之外，还要求其更切实的广化。中国的伦理根本在于做人，关于这个说明，孔子曰，仁者人也。近世焦理堂云：

>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为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这一节说得极好，当作生活南针的确已是十分好了，但是在学术艺文发展上，对于人其物的认识更是必要，而这在中国似正甚缺少。本来所谓人的发见在世界也还是近代的事，其先只是与神学思想的对立，及生物学人类学日益发达，人类文化的历史遂以大明，于是人的自觉才算约略成就。又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固是千古名言，确实足为中国固有思想的代表，唯此但为政治道德之大纲，而其目或尚有未备。《庄子》"天道篇"云：

>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这里嘉孺子而哀妇人一句话，恰补充得很好，此固是仁民所有事，但值得特别提出来说，这与现代的儿童研究和妇女问题正拉得上，

我想在将来中国的道德政治学术文艺上，这该有重大的地位，希望中国文化人肯于此予以注意。过去多少年间中国似乎过分的输入外国思想，以致有类似流弊的现象发生，但稍为仔细考察，其输入并未能及日本前例之三分一，且又未能充分消化吸收，所谓流弊乃即起因于此，盖不消化亦会中毒也。吾人吸收外国思想固极应慎重，以免统系迥殊的异分子之侵入，破坏固有的组织，但如本来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与知识，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产之一部分，则正应努力赶上获得，始不忝为文明国民，通今与复古正有互相维系之处。中国固有思想重人事，重民生，其发现于哲学文艺上者已至显明，今后则尚期[①]其深化，于实际的利用厚生之上更进而为人间之发见与了解，次又由不敖无告之精神益广大化，念及于孺子妇人，此亦是一种新的发见与了解也。由此观之，将来新文学之伟大发展，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如或不然，虽日日闭户读《离骚》，即有佳作亦是《楚辞》之不肖子，没有现代的意味。在现今的中国，希望将近世生物人类儿童妇女各部门的学者学说全介绍进来，这件事显见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文化界至少不可不有这么一种空气，至少有志于文学工作不可不有此一点常识，简单的一句话，也只是说文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事，须得出至人生的十字街头罢了。中国新文学不能孤立的生长，这里必要思想的分子，有自己的特性而又与世界相流通，此即不是单讲诗文的所能包办，后来的学子所当自勉而不必多让者也。于今不必多征引外国旧事以为左证，但闻近时有日本文学批评家推举本国文人，以夏目漱石、森鸥外、长谷川二叶亭三氏为代表，以其曾经世界文艺之磨炼，此言大

① “期”原作“明”。

有见解，中国文人正大可作为参考也。

在《论语》里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曰，修辞立其诚，又曰，辞达而已矣。这两句话的意思极是，却也很平常，不必引经据典的说，一般人也都会赞成，认为写文章的正当规律，现在却这样郑重的征引者，别无什么重要缘故，实只是表明其有长久的传统而已。从前我偶讲中国文学的变迁，说这里有言志载道两派，互为消长，后来觉得志与道的区分不易明显划定，遂加以说明云，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了。本来文章中原只是思想感情两种分子，混合而成，个人所特别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见得是人生共同的，到了这里志与道便无可分了，所可分别的只有诚与不诚一点，即是一个真切的感到，一个是学舌而已。如若有诚，载道与言志同物，又以中国思想偏重人世，无论言志载道皆希望于世有用，此种主张似亦相当的有理。顾亭林著《日知录》卷十九有"文须有益于天下"一则，其文曰：

>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又文集卷四"与人书二"中云：

>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

顾君的正统思想鄙人深所不取，但这里所说文须有益于天下，却说的不错，盖中国人如本其真诚为文，结果自然多是忧生悯乱之情，即使貌若闲适，词近靡丽，而其宗旨则一，是即是有益于世，谓之明道殆无不可矣。孔子删述六经未为定论，不敢率尔附和，但如云古来贤哲述作，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则鄙人亦甚同意，且觉得此比喻下得极妙。安特勒也夫曾云，文学的伟大工作在于消除人间所有种种的界限与距离，案是即仁人之用心，正可为顾君之言作为证明。由是言之，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苟出于此种用心，其文学的价值亦仍重大，未可妄意轩轾，唯剿袭谀佞，自是有损无益，其故正由于不诚耳。若注虫鱼命草木乃是学者所有事，与立言固自无关也。统观中国文学的变迁，最大的毛病在于摹仿，剿说雷同，以至说诳欺人，文风乃以堕地，故镜情伪一事，诚如顾君所言，至为重要。《日知录》中曾论之曰：

>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

此论本为钱谦益而发，但语甚有理，读中国古文学者固可以此为参考，即在将来为新文学运动者读之亦未为无益也。

再从诚说到达，这里的话就只有简单的几句。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别人知道，那么怎么尽力把意思达出来自然是最要紧的一件事，达意达得好的即是好文章，否则意思虽好而文章达不出，谁能够知道他的好处呢。这些理由很是简单，不必

多赘，只在这里将我的私见略述一二点。其一，我觉得各种文体大抵各有用处，骈文也是一种特殊工具，自有其达意之用，但是如为某一文体所拘束，如世间认定一派专门仿造者，有如削足适履，不能行路，无有是处。其二，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应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其结果即为白话文，或曰语体文，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汉文，亦可云今文，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其与唐宋文之距离，或尚不及唐宋文与《尚书》之距离相去之远也。这样说来，中国新文学为求达起见利用语体文，殆毫无疑问，至其采用所谓古文与白话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汉字写成者也。如由各个人的立场看去，汉字汉文或者颇有不便利处，但为国家民族着想，此不但于时间空间上有甚大的连络维系之力，且在东亚文化圈内亦为不可少的中介，吾人对于此重大问题，以后还须加以注意。

我想谈汉文学的前途，稿纸写了七张，仍是不能得要领。这原来是没法谈的问题。前途当然是有的，只要有人去做。有如一片荒野，本没有路，但如有人开始走了，路就出来了，荒野尽头是大河，有人跳下去游泳，就渡了过去，随后可以有渡船，有桥了。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问题。现在只就文学来谈，我记起古时一句老话，士先器识而后文章，我觉得中国文人将来至少须得有器识，那么可以去给我们寻出光明的前途来。我想这希望不会显得太奢罢。

〔附记〕 民国二十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1]，今说明一

[1] “之意”原作“意之”。

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翻史书，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力[①]，必先能树立了国民文学的根基，乃可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

（民国癸未七月二十日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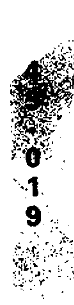
① 原无“力”字，今增。

《书房一角》新序

1943年9月24日作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本书所收凡四部分，即是一、《旧书回想起》二十八则，二、《桑下丛谈》四十四则，三、《看书偶记》六十一则，四、《看书馀记》五十八则，共计一百九十一则也。《药堂语录》后记所云读书消遣，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便是这些东西，其五十则编为《语录》，已于年前付刊，如将这些合算起来，那么这二百馀篇已差不多完全了。其中也还有些比较太枯燥，或是写得太率直的，留下了不曾编入，不过这里可以说一句话，我所写的于读者或无兴趣，那是当然的，至于强不知以为知的那么说诳话，我想是没有。至于知道得不周全，说错的话，那自然是不免的。语云，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又云，过则勿惮改。此一节甚希望在读者能加以指教，在著者亦不敢不加勉也。

民国癸未九月，旧历秋分节，知堂记于北京。



关于祭神迎会

1943年10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4期
署名药堂
收入《药堂杂文》

柳田国男氏所著《日本之祭》(译名未妥)是这一方面很有权威的书,久想一读,可是得来了很久,已有三个多月,才得有功夫通读一过,自己觉得是可喜的事[①]。但是我虽然极看重日本民族的宗教性,极想在民间的祭祀上领会一点意义,而对于此道自己知道是整个的门槛外人,所以这回也不是例外,除了知悉好些事情之外,关于祭的奥义实在未能了解多少。我只简单地感到几点与中国特别殊异,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日本祭神须立一高竿,以为神所凭依降临之具,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据说满洲祀神典礼有神竿,或者有点相像。日本佛教一样的尊崇图像,而神道则无像设,神社中所有神体大抵是一镜或木石及其他。非奉祀神官不得见知。中国宗教不论神佛皆有像,其状如人,有希腊之风,与不拜偶像之犹太教系异,亦无神体之观念,所拜有木石之神,唯其像则仍是人形也。其

① "事"原作"会"。

二，祭字在日本据云原意是奉侍，故其事不止供奉食品，尤重在陪食分享，在中国似亦无此意义。盖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而中国则务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以世间事为譬，神在日本于人犹祖祢，在中国则官长也。日本俗称死者曰佛，又人死后若干年则祀为神，中国死人乃成罪犯，有解差押送，土地城隍等于州县，岳庙为臬司或刑部，死后生活黯淡极矣。二者历史不同，国体尤不同，其殊异随处可见，于此亦极显然也。日本神社祭赛，在都市间亦只祭祀，演神乐，社内商贩毕集，如北[1]京之庙会，乡间则更有神舆出巡，其势甚汹涌，最为特别。在本国内，亦稍见闻民间的迎神赛会，粗野者常有之，不甚骇异，惟见日本迎神舆者辄不禁悚惧，有与异文化直接之感。鄙人固素抱有宗教之恐怖，唯超理性的宗教情绪在日本特为旺盛，与中国殊异，此亦正是事实，即为鄙见所根据者也。

中国民间对于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要更多，且更离奇，但是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这如结果终出于利害打算，则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其与人事相异只在于对象不同耳。大抵民众安于现世，无成神作佛的大愿，即顷刻间神灵附体，得神秘的经验，亦无此希求，宗教行事的目的非为求福则是免祸而已。神学神话常言昔时神人同居，后以事故天地隔绝，交通遂断，言语亦不能相通，唯有一二得神宠幸者，如巫觋若狂人，尚能降神或与相接，传达神意于人间耳。在中国正是道地如此，其神人隔绝殆已完遂，平时祭赛盖等于人世应酬，礼不可缺，非有病苦危急不致祈请，所用又多是间接方法，如圣筊[2]签经，至直接的烦巫师跳神，在北方固常有之，则是出于萨门

① “北”原作“化”。

② “筊”原作“茭”。

教，或是满洲朝鲜西北利亚的流派，亦未可知。据个人的见闻经验，就故乡绍兴地方祭神迎会的情形，稍为记述，用作实例，可以见民间敬神习俗之一斑，持与日本相较，其间异同之迹，盖显然可见矣。

外国祭神大抵都在神社，中国则有在庙里的，也有在家里的，如灶神不必说了，岁末[1]的祝福元旦的祀南朝圣众，祭火神用绿蜡烛，祭疫神用豆腐一作，称豆腐菩萨，皆是。外国敬神用礼拜赞颂，以至香花灯烛，中国则必有酒肉作供品。平常祭神用方桌木纹必须横列，谚曰，横神直祖，香烛之外设三茶六酒，豆腐与盐各一碟，三牲为鸡鹅均整个，猪肉一方，乡人或用猪头，熟而荐之，上插竹筷数双，又鸡血一碗，亦蒸熟者。主人从桌后再拜，焚金银纸元宝，燃双响爆竹十枚送神如仪。这好像是在家里请客，若往庙去祭，有如携樽就教，设备未免要简单一点了，大抵是茶酒盐腐从略，三牲合装在大木盘里，鸡血与脏物仍旧，反正这也可以放在盘内的。绍兴神庙祭祀最盛者，当推东岳，府县城隍，潮神张老相公，但是以我的经验比较地记忆最深的乃是别的两处，一是大桶盘湖边的九天玄女，一是南镇的会稽山神。老百姓到这两处祭祀的理由为何，我不知道[2]，大约也还是求福罢。总之据我所亲见，那里致祭的人确实不少。这事情大约已在三四十年以前，但印象还很深刻明了，站在南镇内殿的廊下，看见殿内黑压压的一屋的人，真是无容膝之地，只要有这一点隙地，人就俯伏膜拜，红烛一封封的递上去，庙祝来不及点，至多也只焦一焦头而已。院子里人山人海，但见有满装鸡与肉的红白大木盘高举在顶上，在人丛中移动，或进或出，络绎不绝。大小爆竹夹杂燃放，如霹雳齐发，震耳成聋，人声嘈杂，反不得

① “岁末”原作“末岁”。
② “道”原作“者”。

闻。虽然没有像《陶庵梦忆》记陶堰司徒庙上元设供，水物陆物，非时非地，那么奢华，却也够得上说丰富，假如那种赠送移在活人官绅家，也够说是苞苴公行，骇人听闻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即此可见人民对于神明供奉还是全用世间法，这在外国宗教上不多见，或者与古希腊多神教相比，差相似耳。

诸神照例定期出巡，大约以夏秋间为多，名曰迎会，出巡者普通是东岳，城隍，张老相公，但有时也有佛教方面的，如观音菩萨。据《梦忆》卷四记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似在明季十分的热闹，但我所见是三百年后的事情，已经很简单了，特别是在城里。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馀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但世俗如此称呼，此与高照同，无定数，以多为贵。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①]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昔时有马上十番，则未之见。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②]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读如国音之喜无上。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即再醮妇前夫之子，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

① “舁”原作“升”。

② “砻”原作“笼”。

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梦忆》记杨神庙台阁一则中有云：

> 十年前迎台阁，台阁而已，自骆氏兄弟主之，扮马上故事二三十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三换之。其人与传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时，一指点为某似某，非人人绝倒者不之用。

似骑者亦即是台阁，又其时皆以成人扮演，后来则只用少年男女，大抵多是吏胥及商家，各以衣服装饰相炫耀，世家旧族不肯为也。若出巡者为东岳或城隍，乃有扮犯人者，范寅《越谚》云：

> 《梦粱录》，答赛带枷锁，是也，越赛张大明王最久而盛。

则似张老相公出巡时亦有之，不知何意，岂民间以为凡神均管理犯罪事耶。随后是提炉队，多人着吏服提香炉，焚檀香，神像即继至，坐显轿，从者擎遮阳掌扇，两旁有人随行，以大鹅毛扇为神招风。神像过时，妇孺皆膜拜，老妪或念诵祈祷，馀人但平视而已。其后有人复收神马去，殆将聚而焚送，至此而迎会之事毕矣。

以上所述是城里的事，若在水乡情形稍有不同，盖多汊港又路狭，神轿不能行走，会伙遂亦不能不有所改变，台阁等等多废置，唯着重于划龙船一事。《越谚》云：

> 划龙船，始于吴王夫差与西施为水戏，继吊屈原为竞渡，

隋炀帝画而不雕，与此异。《元典章》云，划[1]掉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合移各路禁治。然皆上巳端午而已，越则赛会辄划，暮春下浣，陡亹安昌东浦各市，四月初六青靛[2]湖，六月初七章家衖桥，十四五六等日吴融小库皇甫庄等村，年共三十馀会，不胜书。船头则昂竖龙首项，尾撅在舵上，金鳞彩旗锣鼓，扮故事。

这是记绍兴划龙船的很好的资料。鄙人不曾到过龙船上，只是小时候远远地看，所以不能比范君讲得更详细，实在大家对于龙船的兴味也就如此而已，我们所觉得更为有趣的乃别有在，这便是所谓泥鳅龙船是也。此船长可二丈，宽约二尺许，船首作龙头，末一人把舵，十馀人执楫划船，船行如驶，泥鳅云者谓其形细长而行速也。行至河中水深处，辄故意倾侧，船立颠覆，划者在船下泅泳，推船前进，久之始复翻船戽水，登而划船如故。龙舟庄重华丽，泥鳅龙船剽悍洒脱，有丑角之风，更能得观众之欢喜，村中少年皆善游水，亦得于此大显其身手焉。神像坐一大船中，外有彩棚，大率用摇橹者四五人，船首二人执竹篙矗立。每巡行至一村，村中临河搭台演戏以娱神，神船向台蓦进，距河岸约一二尺，咄嗟间二篙齐下，巨舟即稳定，不动分寸，此殆非有数百斤力者不办，语云，南人使船如马，正可以此为例，执篙者得心应手，想亦必感到一乐也。未几神船复徐徐离岸，向别村而去。鄙人所见已是三十馀年前事，近来如何所不能知，唯根据自己的见闻，在昔时有如此情形，则固十分的确，即今亦可保证其并无诳语在中者也。

---

① “划”原作“桦”。

② “靛”原作“田”。

看上文所记祭神迎会的习俗,可以明了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这或可以说礼有馀而情不足的。本来礼是一种节制,要使得其间有些间隔有点距离,以免任情恣意而动作,原是儒家的精意。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亦即是以礼相待,这里便自不会亲密,非是故意疏远,有如郑重设宴,揖让而饮,自不能如酒徒轰笑,勾肩捋鼻,以示狎习也。中国人民之于鬼神正以官长相待,供张迎送,尽其恭敬,终各别去,洒然无复关系,故祭祀迎赛之事亦只是一种礼节[①],与别国的宗教仪式盖迥不相同。故柳田国男氏在《祭礼与世间》第七节中所记云:

>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感情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是特别的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见了也并不一直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起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礼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了解别国固是大难,而自己的事须要先弄清楚的亦复不少,兵荒马乱中虽似非急务,但如得有人注意,少少加以究明,亦为有益,未始不可为相互之福也。 (民国癸未七月三十日)

① “节”原作“物”。

岛崎藤村先生

1943年10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4期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今天午前看报，忽见中华社东京二十二日电云，岛崎藤村氏于本日午前零时三十分在大矶逝世[①]，享年七十二岁。突然看见，也还不怎么惊骇，却是很迫切的觉到一种寂寞之感。《月明文库》里的一小册《雪天的纸窗》正放在手边，拿起来翻着，心想能写这样文章的人于今已没有了，很是可惜又仿佛感觉自己这边阵地少了一个人，这寂寞便又渐近于心怯了。

我们最初听见藤村先生的名字，还是在东京留学的时代，这大约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长篇小说《春》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登载，其时作者年纪还只是三十六岁，想起来也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但是与藤村先生相见，却一直在后。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三年甲戌秋间，利用暑假，同内人到东京去住了两个月，徐耀辰先生也在那里，承东大的中国文学会发起，在山水楼饭庄招待我们，其时

① "世"原作"也"。

来客中间有一位是藤村先生。这是八月四日的事，徐先生因为翻译《新生》，曾屡次通信，便去拜访一次。

后来藤村先生差人来约小饮，邀我同去，于二十日晚在麻布区六本木的大和田，这是第二次的见面。那天在坐的，除徐先生和我外，还有和辻哲郎、有岛生马二氏，连主人共计五人。藤村先生带来一本《岩波文库》中的冈仓觉三著《茶之书》送给我，题曰："赠周作人君，岛崎生。"还客气说，是一本旧的，很对不住。其实我倒是比新的更觉得喜欢。饭后，主人要了来几把摺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详细记不得了，只就我所分得的一把来说，中间有岛氏用水墨写了一片西瓜，署款十月生，即是"有"字的字谜。右边藤村先生写短歌一首云：

なつのよは、
しのの小竹の
ふししけみ、
そよやほとなく、
あくろなりけり。

署款藤字。案此系西行法师所作，见《山家集》中，标题曰"题不知"，大意云：

夏天的夜，
有如苦竹，
竹细节密，
不久之间，
随即天明。

在《短夜的时节》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约是作者所很喜欢的一首，只是不可译，现在只好这样且搪塞一下。徐先生写了两句唐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和辻氏与我只简单的署名，各写两个字而已。

第三次见面又在七年之后，即民国三十年四月，我往日本京都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的时候，开会后我于十四日由京都到东京，住在帝国旅馆，十七日中午应日本笔会之招，至星冈茶寮，晤见好些旧相识的文人，其中最年长者便是藤村先生。这回又承以大著《夜明前》二册见赠，卷首题字曰："呈周作人君，昭和十六年四月，于东京麹町，岛崎生。"附有信笺一纸云：

> 此拙著稍经执持，已略旧，唯系留置家中之初版本[1]，因不复顾及失礼，持以奉赠，如承收纳作为纪念，幸甚。四月十七日。

"藤村文库"定本《夜明前》，我早已有了一部，但是重版后印，今得到作者持赠的初版本，回来以后便把原来的一部送给了别人了。总计我见到藤村先生，最初是在甲戌，那时他六十三岁，最后是辛巳，那时七十岁了，因此我所有的印象仿佛是一个老哲人，《夜明前》第一册在昭和十年乙亥出版，上边的照相觉得最与我的印象相合。藤村先生是东亚文学界的大前辈，文章与智慧远出我们之上，见面时只是致敬，并未多谈，但我们直感得这是和我们同在一条线上的，所以平时很感到亲近，因此对于逝世的消息也就会觉得有一种近于恐慌之感了。

---

① "本"原作"木"。

藤村先生在文学上的绩业，自有日本文学史家会加以论定，我不能说什么，这里只是略述自己的印象以及感叹之意而已。藤村先生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集为多，在这里我[1]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雪天的纸窗》中还有几篇随笔，反复的读了很是喜欢，再去查原书，在昭和五年庚午出版的《在市井间》一册里找到了几篇，如《小诸的回忆》，《短夜的时节》，《养生》，几回想起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因为觉得这事情太难，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创作中富有思想的分子，而这又有空间的与时间的博大性的，这是我所尊重的作品，藤村先生的感想随笔，就是小篇也多有此特质。而今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在这里正可谓之东亚的一损失，没有方法可以弥补的。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① “我”原作“这”。

苦口甘口

1943年11月1日刊《艺文杂志》1卷5期
署名药堂
收入《苦口甘口》

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来信，说自己爱好文学，想从这方面努力做下去，我看了当然也喜欢，但是要写回信却觉得颇难下笔，只好暂时放下，这一搁就会再也找不出来，终于失礼了。为什么呢？这正合于一句普通的成语，叫做"一言难尽"。对于青年之弄文学，假如我是反对的，或者完全赞成的，那么回信就不难写，只须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够了。但是我自己是曾经弄过一时文学的，怎么能反对人家，若是赞成却又不尽然，至少也总是很有条件的，说来话长，不能反复的写了一一寄去。可是老不回复人家也不是办法，虽然因年岁经验的差异，所说的话在青年听了多是落伍的旧话，在我总是诚意的，说了也已尽了诚意，总胜于不说，听不听别无关系，那是另一问题。现今在这里总答几句，希望对于列位或能少供参考之用。

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

职业的，只是农工商这几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为学乃是他的事业，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达则为官，现在也还称公仆，穷则还是躬耕，或隐于市井，织屦卖艺，非工则商耳。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惟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惟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借以餬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章先生自己是懂得医道的，所以他的意思以为学者最好也是看点医书，将来便以中医为职业，不但与治学不相妨，而且读书人去学习也很便利容易。章先生的教训我觉得很对，虽然现今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教学相长，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业，与民国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但是这在文学上却正可应用，所以引用在这里。中国出版不发达，没有作家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文学职业就压根儿没有，此其一。即使可以有此职业了，而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此其二。因此之故，中国现在有志于文学的最好还是先取票友的态度，为了兴趣而下手，仍当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决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戏不是好玩的事也。

第二，弄文学也并不难，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说写文章的秘诀，是多读多作。现在即使说是新文学了，反正道理还是一样。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自然要先有文学而后乃成家，决不会有不写文学而可称文学家的，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学的人要紧的是学写文学作品，多读多作，此外并无别的方法。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家也是实力要紧，虚声是没有用的。我们举过去的例来说，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胡陈鲁刘诸公那时都是无名之士，只是埋

头工作，也不求名声，也不管利害，每月发表力作的文章，结果有了一点成绩，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这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种气风或者也已改变，但是总值得称述的，总可以当作文人作家炼成之一模范。这有如一队兵卒，在同一目的下人自为战，经了好些苦斗，达成目的之后，肩了步枪回来，衣履破碎，依然是个兵卒，并不是千把总，却是经过战斗，练成老兵了，随时能跳起来上前线去。这个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对的，总之文学家所要的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多读多作未必一定成功，这还得尝试了来看。学画可以有课程，学满三四年之后便毕业了，即使不能算名画家，也总是画家之一，学书便不能如此，学文学也正是一样，不能说何时可以学会，也许半年，也许三年，也许终于不成。这一点要请弄文学的人预先了解，反正是票友，试试来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罢了，对于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的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因此中国文学的道德气是正当不过的，问题只是在于这道德观念的变迁，由人为的阶级的而进于自然的相互的关系，儒道思想之切磋与近代学术之发达都是同样的有力。别国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馀的只是辞句，虽是写的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对的一方面，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国

的物事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学颓废派，写几句象征派的情诗，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在中国却是还未办到，要学人自己费力去张罗，未免辛苦，不过这辛苦也是值得，虽然书中未必有颜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粮总可得到不少，这于弄文学的人是比女人与酒更会有益的。前一代的老辈假如偷看了外国书来讲新文学，却不肯译出给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现今青年讲更新的文学，却只拿几本汉文的书来看，则不是自私而是自误了。末了再附赘两句老婆心的废话，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以上所说的话未免太冷一点，对于热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是这在我是没法子的事，因为我虽不能反对青年的弄文学，赞成也是附有条件的，上边说的便是条件之一部分。假如鸦片烟可以寓禁于征，那么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寓反对于条件罢。因为青年热心于文学，而我想劝止至少也是限制他们，这些话当然是不大咽得下去的，题目称曰苦口，即是这个意义。至于甘口，那恐怕只是题目上的配搭，本文中还未曾说到。据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卷三十，鼷字下所引云：

《玉篇》：鼷，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鸟兽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鼷，鼠之最小者，或谓之甘鼠，谓其口甘，为其所食者不知觉也。

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三十九引《本草纲目》鼷鼠条，亦如此说，和名阿末久知祢须美，汉字为甘口鼠，与中国相同。所谓甘口的典故即出于此。这在字面上正好与苦口作一对，但在事实上我只说了苦口便罢，甘口还是“恕不”了吧。或者怕得青年们的不高兴，在要收场的时候再说几句，——话虽如此，世间有《文坛登龙术》一书，可以参考，便讲授几条江湖诀，这也不是难事，不过那就是咬人不痛的把戏，何苦来呢。题目写作苦口甘口，而本文中只有苦口，甘口则单是提示出来，叫列位自己注意谨防，此乃是新式作文法之一，为鄙人所发明，近几年中只曾经用过两次者也。

（民国癸未二月十日，写于阴雨中）

武者先生和我

1943年12月10日刊《天地》第3期
署名药堂
收入《苦口甘口》

方纪生先生从东京寄信来，经了三星期才到，信里说起前日见到武者小路先生，他对于我送他的晋砖砚很是喜欢，要给我一幅铁斋的画，托宫崎丈二先生带来，并且说道，那幅画虽然自己很爱，但不知道周君是否也喜欢。我在给纪生的回信里说，洋画是不懂，却也爱东洋风的画；富冈铁斋可以说是纯东洋的画家，我想他的画我也一定喜欢的。在《东洋六大画家》中有铁斋的插画三幅，我都觉得很好，如《献新谷图》，如《荣启期带索图》，就是缩小影印的，也百看不厌，现在使我可以得到一张真迹，这实在是意外的幸事了。

我与武者小路先生初次相见是在民国八年秋天，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武者先生（平常大家这样叫他，现在也且沿用）在日本日向地方办新村，我往村里去看他，在万山之中的村中停了四天，就住在武者先生家的小楼上，后来又顺路历访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前后共化了十天的工夫。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三

年，我利用暑假去到东京闲住了两个月，与武者先生会见，又同往新村支部去谈话一次。第三次在民国三十年春间，我往京都东京赴东亚文化协会之会，承日本笔会的诸位先生在星冈茶寮招待，武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今年四月武者先生往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转至北京，又得相见，这是第四次了。其时我因事往南京苏州去走了一趟，及至回来，武者先生快要走了，只有中间一天的停留，所以我们会见也就只在那一天里，上午在北京饭店的《庸报》社座谈会上，下午来到我这里，匆匆的谈了一忽儿而已。这样计算起来，除了第一次的四天以外，我同武者先生聚谈的时候并不很多，可是往来的关系却已很久，所以两者间的友谊的确是极旧的了。承武者先生不弃，在他的文章里时时提及，又说当初相识彼此都在还没有名的时代，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其实这乃是客气的话，在二十四五年前，白桦派在日本文学上正很有名，武者先生是其领袖，我的胡乱写些文章，则确在这以后，却是至今也还不成气候，不过我们的交际不含有一点势利的分子，这是实在的事情。事变之后，武者先生常对我表示关心，大约是二十六年的冬天吧，在一篇随笔里说，不知现在周君的心情如何，很想一听他的真心话。当时我曾复一信，大意说如有机缘愿得面谈，惟不想用文字有所陈说，盖如倪云林所言，说便容易俗，日本所谓野暮也。近来听到又复说起，云觉得与周君当无不可谈者，看了很是感动，却也觉得惭愧。两国的人相谈，甲有甲的立场，乙有乙的立场，因此不大容易说得拢，此是平常的情形，但这却又不难互相体察谅解，那时候就可以说得成一起了，惟天下事愈与情理近者便愈远于事实，故往往亦终以慨叹。我近来未曾与武者先生长谈深谈过，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满足，盖谈到最相契合时恐怕亦只是一叹喟，现在即使不谈而我也一样的相信，与武者先生当无不可谈，且可谈得契合，这是

一种愉快同时也是幸福的事。最初听说武者先生要到中国来漫游，我以为是个人旅行，便写信给东京的友人，托其转带口信，请他暂时不必出来，因为在此乱世，人心不安，中国文化正在停顿，殊无可观，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偿失。嗣知其来盖属于团体，自是别一回事了。武者先生以其固有的朴诚的态度，在中国留下极深的好印象，可谓不虚此行，私人方面又得一见面，则在我亦为有幸矣。惟愿和平告成后，中国的学问艺术少少就绪，其实再请武者先生枉驾光来，即使别无成绩可以表示，而民生安定，彼此得以开怀畅聚，将互举历来所未谈及者痛快陈之，且试印证以为必定契合者是否真是如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事也。

至于我送给武者先生的那砖砚，与其说是砚，还不如说是砖为的当，那是一小方西晋时的墓砖，有元康九年字样，时为基督纪元二百九十九年，即距今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前也。我当初搜集古砖，取其是在绍兴出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不能再如此了，也只取其古，又是工艺品，是一种有趣味的小古董而已。有人喜欢把它琢成砚，或是水仙花盆之类，我并不喜欢，不过既已做成了，也只好随它去。我想送给武者先生一块古砖，作为来苦雨斋的纪念，但是面积大，分量重的不大好携带，便挑取了这块元康断砖，而它恰巧是琢成砚形的，因此被称为砚，其实我是当作砖送他的，假如当砚用一定很不合适，好的砚有端溪种种正多着哩。古语云，抛砖引玉。我所抛的正是一块砖，不意却引了一张名人的画来，这正与成语相符，可谓巧合也矣。　　　　　　（民国癸未秋分节）

上边这篇文章是九月下旬写的。因为那时报上记载，武者先生来华时我奉赠一砚，将以一幅画回赠，以为是中日文人交际的佳话。我便想说明，我所送的是一块砖，送他的缘因是多年旧识，非

为文人之故，不觉词费，写了三张稿纸。秋分节是二十四日，过了两天，宫崎先生来访，给我送来铁斋的那幅画，这是一个折扇面，裱作立轴，上画作四人，一绿衣以爪杖搔背，一红衣以纸捻刺鼻，一绿衣蓝褂挑耳，一红衣脱巾两手抓发，座前置香炉一，茶碗三，纸二枚。上端题曰：

经月得楼飕，头懒垢不礦，树间一梳理，
道与精神会。
痒处搔不及，赖有童子手，精微不可传，
挂齿一转首。
呿口眼尾垂，欲喷将未发，竟以纸用事，
快等船出闸。
耳痒欲拈去，猛省须用明，注目深探之，
疏快满须发。
　右李成德画理发搔背刺喷明耳四畅图赞，
　觉范所作，铁斋写并录。

赞一末句会字，赞四次句省、用字，均脱，今照《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原本补入。按南唐王齐翰有《挑耳图》，似此种图画古已有之，列为四畅，或始于李成德乎。据《清河书画舫》云，王画法学吴道子，李不知如何，惟飘逸之致则或者为铁斋所独有，但自己不懂画更甚于诗，亦不敢多作妄言也。铁斋生于天保七年（清道光十六年），大正十三年（民国十三年）除夕卒，寿八十九岁，惟《荣启期带索图》为其绝笔，则已署年九十矣。　（十月一日再记）

《药堂杂文》序

1943年12月30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药堂杂文》

本集所收文共二十七篇，计民国廿九年作十五篇，近两年所作十二篇，最初拟名《一蒉轩笔记》，今改定为《药堂杂文》。编好之后重阅一过，觉得这些杂文有什么新的倾向么？简单的回答一个字，不。照例说许多道德的话，这在民国十四年《雨天的书》序里已经说明，不算新了。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说到古文，这本来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裤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新文学运动的时候，虽然有人嚷嚷，把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像我也是其一，赤条条的先在浴

堂洗了一个澡，再来挑拣小衣衬衫等洗过了重新穿上，开衩袍也缝合了可以应用，只是白细布夹袜大抵换了黑洋袜了罢，头上说不定加上一顶深茶色的洋毡帽。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服色改变，原来也便是这样，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地方。朝服的舍利猕成为很好的冬大衣，蓝色实地纱也何尝不是民国的合式的常礼服呢。不但如此，孔雀补服做成椅靠，圆珊瑚顶拿来镶在手杖上，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补服缀在胸前，珊瑚顶装在头上，用在别处是无所不可的。我们的语体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副样子，实在是怪寒伧的，洋货未尝不想多用，就生活状况看来还只得利用旧物，顶漂亮的装饰大约也单是一根珊瑚杖之类罢了。假如这样便以为是复古，未免所见太浅，殆犹未曾见过整本的古文，有如乡下人见手杖以为是在戴红顶了。还有一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现今的语体文是已经洗过了一个澡来的，虽然仍旧穿的是大衫小衫以至袍子之类，身体却是不同了。这一点是应当看重的，我看人家的文章常有一种偏见，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在家人家也不打诳话，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都是经过考虑的，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处，其内容却不是普通古文中所有。语云，文学即是宣传。今写序文，如此声明一下，有似起首老店的广告，亦正合式，或当不至为读者们所笑也。

民国癸未十二月三十日。

女子与读书

1943年12月31日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口甘口》

十一月间凌女士来访，接到佐藤女史的信，叫我给杂志写文章。我很想帮忙，可是很有点儿为难。这并不是因为没有闲暇，大抵费一两天的工夫写篇小文，也还有这机会。所说的困难乃是缺乏好的题材，因为一种杂志假如是特殊性质，或读者限于某范围内的，那么这文章也就不大好写，至少为了受这性质与范围的拘束，不能够随意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为了这个缘故，一连耽搁了两个月，不曾写得出一点东西来。近日忽然想到，略为介绍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文章吧。这题目倒是恰好，可是怎么办才好呢？我在日本留学还是在明治时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因此我所知道的日本文学也以那时代为主，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很是隔膜，要问现今的女作家谁最有名，我都回答不过来，此其一。正式的讲介绍，自以评论为重要，这个固然不敢下笔，就是说翻译，也是极不容易，莫说诗歌，即小说也是如此，此其二。这样的一归结起来，那么可说的

自然就限于明治末期，文学的种类也只是散文中的感想文与随笔而已。

明治四十年前后是日本新文学很发达的时期，我们所注意的女作家有好几个。佐藤俊子女史的小说《她的生活》还是记得，在二十年前我们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此外还有一位是森茂子夫人，笔名写作森茂女，在杂志《昴》的上边发表小说《狂花》等数篇，后来印成单行本，就以此为书名。本来女小说家也并不少，但是她们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或是贤媛，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畴范，但总之不是女子的天然本色。我读中国闺秀的诗文集，往往有此种感觉，假如有美这也是象牙美人之美罢了。上边所说的两位所写的却不是这种意味的小说，即使不能说达于理想之域，总之是女性自身的话，有许多是非女人不能知不能言的，这一点乃是极可珍重的事。可是小说翻译很不容易，既如上述，那么这也只好搁下，等候将来适任的人来做。与谢野晶子夫人本是歌人，却也多写批评感想的文章，歌集不敢以不知为知，只买得《晶子歌话》与《歌之作法》两种，感想文集有十四册，则差不多都陆续得到了。其第一册书名《从角落里》，系明治四十四年出版，即是辛亥那一年，已是三十二年前事了，现在拿出来一看，仍旧觉得很可佩服，其见识深远非常人所能及。与谢野夫人的第五册感想集名曰《爱与理性及勇气》，这可以代表感想全部的内容，实在是最适切的评语。我在民国六年译过一篇《论贞操》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至今重阅这最早的感想集，里边好议论还是不少，但是要想整篇的翻译，却又一时不易做到。译者的懒是一个原因，其次是文章是旧了而意思可以仍新，有时候历时愈久而新的意味增加，因此也就是不合

时式。馀下来可做的事，是找一篇平常点的文章，摘要叙述，以见一斑。原来这一册《从角落里》的感想集里列着二十个题目，惟末尾的《杂记帐》一目实在乃是总名，收容长短文章甚多，占全书分量之半，约有三百馀页。其中有一短篇，是劝人读书的，现在便介绍过来，也说不清是抄是译了。

对于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有一件希望的事，便是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温雅开阔，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养成读书的习惯。外国的女人就是在火车里也不放下书籍，日本则平安朝以后的女人大抵不爱读书，虽然男子也是一样。近时年青的女子在结婚以前还在读书，及至做了家庭里的人，便是心爱的小说也再不拿起来了。说是家庭的事务烦忙么，其实说废话所耗费的时间着实不少。或者因为职业关系，全无馀暇的人也会有的，但是只要用心，在一星期中省出一两小时的读书时间并非不可能。故樋口一叶女史在家中做着副业，供给一家数口，却也能够那么样的著作和读书。

关于所读书籍的种类，最好还是多取硬性的书物。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这些书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细密的观察与精确的判断力，于今后的妇人均为必要。哲学书可以先读三宅博士著的《宇宙》，心理学有元良博士的讲义，自然科学则丘博士著《进化论讲话》与《物种由来》，石川博士的《动物学讲话》，日本历史有久米博士的《古代史》等，顶好不要读断片的东西，只取有信用的专门家所写的整册大著，孜孜砣砣的看下去，养成这种习惯最为要紧。古典书中也可以

从《古事记》那里起，顺着时代去读历史及文学的书，汉文所写的似乎有点不容易读，可是只要字面看惯了，自然意味也会懂得，譬如《庄子》、《论语》、唐宋的诗集，或是佛教的书，找人指教了读下去也很有意味。像我这样关于汉文或国文一行半句都没有跟人学过，可是在母家的时候偷了店务的馀闲，独自学读，实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办法，也渐渐的懂得意义了。

我劝大家读硬性的书，不大劝人读软性的文学书的缘故，便是因为先从文学读起，则硬性的书便将觉得难读，不大喜欢，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炼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本来女人容易为低级的感情所支配，轻易的流泪，或无谓的生气，现在凭了硬性的学问，使得理性明确，自不至为卑近的感情所动，又因了高尚的艺术，使得感情清新，于是各人的心始能调整，得到文明妇人的资格，对于夫可为贤妻，对于子可为贤母，在社交界可为男子的好伴侣。大家都以此种抱负，各自努力去养成读书的习惯罢。即使没有这些大抱负，儿女们不久将进学校了，大家不可使儿童单只依赖学校的教育，须得使他们觉得父母所知道的事比学校教育更为广大，对于家庭的教育信用而且尊敬才好。因此磨炼自己，可以成为儿童们的学问的顾问，正是必要。假如真是深爱儿童，父母先自成为贤明，再将儿童养育成贤明的人，那是很切紧的事吧。

以上的话虽是三十多年前所说，但是我觉得在现今还是都很对，所以抄了出来，以供现代中国诸位女士们的参考。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如梦记》译者附记

1943年12月刊《艺文杂志》1卷6期
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上文[①]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所写，曾收入《药堂语录》，盖已是三年前事矣。那本红面小书在我手边，则已历三十三四年之久，虽是常常想起，却总未能决心着手，至于今日。翻译不易，才力不及，这理由是容易明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想要翻译的呢？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或有互相理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语学与文才俱优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来未必没有，只是他们所知的大抵是近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对于明治时代恐怕有点隔膜，有如请西装的青年陪了穿茧绸夹袍的老人谈话，这其间有三四十年的空气间隔着，难得谈的投机的。我之所

① “上文”指《如梦记》(40・040)，兹不复录。

以不顾能力不足，或闲暇不多，终于决定自己来动手者，其原因即在于此。文章译得很粗糙，未能把本来的趣味恰好的传达出来，但是凭了平时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写生文与《如梦记》的好感，总之想以理解之心，运笨拙的笔，一句句的写下来，至于力不从心，那是没法子的事。全书共计九章，希望每月能译出一章来，那么到了明年夏天，全部译完了，可以出一小册单行本子。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成，这已写了一部分三万字，下馀的大约也还有十万字之谱吧。这工作中途搁下来，一转眼就已是五个年头，想起来更有岁月不居之感，亦正是所谓如梦也。（民国癸未九月十日）



如梦记[①]一

1943年12月刊《艺文杂志》1卷6期
[译文]署知堂译述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也来试写一下子小时候的事情吧。那是我极幼小的时代的事了。

自己本来是乡下人，生在日本海海岸的一个渔村里。可是，并不是渔夫之子，也不是农夫之子。假如在从前，也还是武士的子弟哩。维新之后，我们一家没有住在城内之必要了，便移住到这渔村里来。我的社庙神乃是本村的八幡老爷。我在这村里生长，一直到了三四岁，但是明确的记得的事情一件都没有。不过回溯至今日为止这三十几年来很长的岁月的川流，到了源头去，在那里总有什么像梦似的，可是某一点上却又极明了的，一点记忆留存着。我现在便想把这记忆就照那么样的写下来，但是所留存的也只是比梦还不得要领，或可说是只有幻影似的一种感觉，所以这里边事件是什么都没有的。

---

① 日本文泉子原作。

我们家的后边是小竹林，板廊的前面即是田地。隔着砂山，后方是海。澎湃的波浪的声音，不断的听到。无论道路，无论田地，全都是沙，穿了木屐走起来也全没有声响。不管经过多少年，木屐的齿不会得磨减。建造房屋的时候，只在沙上泼去五六担的水，沙便坚固的凝结，变的比岩石还要硬。在这上边放下台基石，那就成了。这自然是长大了以后听来的话，但是我们的家是沙地中间的独家，这事却至今还好好的记忆着。家是用稻草盖的。在田地里有梅树，总有两三株。竹林里有螃蟹。泽蟹很多，像是乱撒[①]着小石子一般。人走过去，他们便出惊，沙沙的躲到枯竹叶底下去的声音几乎比竹林的风雨声还要利害。不但是竹林子里，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爬，也在天花板上头行走。夜里睡静了之后，往往惊醒，在纸隔扇外边，可不是有偷儿的脚步声么，这样的事也不止有过一两次，这是后来从母亲听来的话。

有一回，忽然的醒了。独自一个人被安睡在暖火笼的旁边。看时，母亲也不在，父亲也不在，就是平常总是在这屋里的祖父也不在。正像空屋一样，很是寂静，忽然觉得悲苦了，因为觉得悲苦了，所以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哭了起来。谁都不出来，现在想起来，这房间正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睡着的右边的纸门有点阴暗，已经熏旧将成红青色了。头的左近有个黑亮的带着竖门的衣柜，柜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佛坛。吊着的黄铜灯盏的肚脐闪闪的发着光。我哭着，哭得几乎哭不出声了，在后面房间的廊下有点声响，仿佛是有谁来了的模样。略为停住哭声，侧着耳朵听着。慌慌张张的拉开纸隔扇走进来的，以为是母亲，原来却是祖父。大概是正在田地里吧，一双手里他拿着一把柴刀。说什么母亲刚才在解手，略等一

① "撒"原作"撤"。

等吧，等话来哄我，可是因为来的不是母亲，很是不平，我又大声的哭了。

祖父的面貌至今还好好的记得。是高鼻梁，长面庞的脸，左颊上有一处凹进去，仿佛是用手指戳过的样子。据说有一回牙齿大痛，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凹处。那时祖父站在我的头的前面，拉开佛坛的抽斗，在找寻什么东西。一面哭着，撑起眼睛来看，祖父的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祖父每年从冬天到春天总穿着狐皮的背心。坐在被火笼前面靠火的时候，这条尾巴总是横拖在席上，我轻轻的去从后边拉拔，于是祖父便说，啊，好痛好痛，祖父的尾巴要拔掉了。听这样说很是好玩，所以只要看见尾巴就走去拔，但是今天因为母亲不在，大为不平，当然并无起来去拔的意思。只是尽仰卧着，更举起大声来哭。

祖父从抽斗里给取出来的乃是煎饼，这是称作马耳朵的一种大的饼干。把一头捏一下，作成漏斗似的形状，背脊上卷着三个旋涡。这种煎饼是用在有法事的时候，同馒头一起发给人的食物，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放在佛坛的抽斗里的呢，这个缘故至今还不懂得。总之，我拿到这个，觉得非常高兴了。但是煎饼好吃这一件事，也总不能作为看见母亲的面之替代。因此且吃煎饼，且仍大哭。假如母亲因了某种事情，到了晚上，到了早上，经过一年，经过两年，也总是这样的不回家来，那怎么样呢？于是祖父总是从佛坛取出马耳朵来，慰藉这拼命哭着的自己，那又怎么样呢？这样的例，世上尽是多有。在身为祖父的人，这种无可奈何的难局是再也没有的吧。幸而现今不是如此，但我自己的悲哀却与如此情状别无所异。因为是无所异，所以一面吃马耳朵，还是哭着，末了，把马耳朵丢掉，只是哭了。

祖父现在也已别无办法，就在狐皮之上把我背了，说给带到母

亲那里去，好好的止哭吧，便走出门外。母亲不在解手，那是不必说的了，看来今天家里的人全都外出，只祖父和我被留下了看家。背上之后，哭是止住了，可是好像被灸后那样的哭呃却还不停止。出到外边，觉得很是[1]爽快。不单是有了被母亲抱的希望，海岸边的明丽的春色也将我小小的胸中的不平给和缓下去了。不久，呃逆也止了。田地的那边，高一点起来，从那里起便是沙山的松林。被背着在松树底下走道，使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祖父大约并不怎么高兴，只是沉默着，在松树中间曲折着急速的前行。有一日曾经被后边邻居的阿幸带着，到这松林里来掘过蘑菇。掘蘑菇是很容易的事，只找仿佛会有的地方用竹耙去扒，便有像圆面筋似的圆东西滚滚的应手而出。

离开松树林，就是海岸了。这是无边无际的沙滩。防风草微微的露着一点儿红的茎，正在沙中萌长出来。碧绿的海可以看见。拗过来望后边，松林已隔得遥远，看去正如屏风上的图画。祖父的脚迹从松林起，斜着一直线的连续着。还有[2]不知道是谁的脚迹，也有三道蜿蜒的连续着。海岸的沙是桂黄色的。凡是海边，一定有沙滩，凡是海滩，一定是桂黄色的，向来总是这么想，到别处来一看，有的完全没有沙滩，即使有了，沙的颜色也是浅黑的为多，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的。海面看去渐渐的宽广了。普通像这海岸的样子，从有人家处到水边有两町三町，有时候竟有七八町之远都是沙滩的，这种地方很不大有。（案：日本六町约合中国一里。）有地方成为小山，长着稀疏的茅草。或者被风所刮，有地方像擂钵似的成为大的洼地。祖父仍旧不则一声，走过沙的小山，渡过沙的谷，

① “是”原作“甚”。

② “有”原作“是”。

渐渐下降向水际走去。海广大得眼睛都望不到头了。微温的风从松树林那边吹来。颊上感觉到雨点打着了似的冷，那是因为停着的眼泪给风吹了的缘故。

日本海的波浪很大。海是在不断的作大浪，这个观念也是从这样的小时候起，就深深的印进心里去的。看见须摩之浦，以及品川的海，心想这样的什么海，大有轻蔑之意，这也全由于海之观念相异之故。绿色的水的一条看着渐渐的膨胀起来，波浪的肚皮变成微暗，向前崩溃着，嘈嘈的滚上来。澎的打上去的波浪，好似陆续融化的雪一样，斑驳的发泡，一时平坦的漂荡着。暂时漂荡着之后，忽然似乎想起的样子，急忙缩到正在卷来的波浪下去。退回去的水与等着的浪合作一起，比从前加倍猛烈的又打上来。水的烟像雾似的四起。有时回去的势头太大，声势汹汹拥向前来的波浪受了挫折，水面上反而意外的能保持平和的事，也常有之。像今天虽说是晴丽软风之日，这样的活动一瞬间都并未停止。

祖父沿着水际，急速向西走去。要走到那里为止，也不知道。有时候，波浪的泡沫直爬到祖父的草履边去。恰似老虎什么，肚皮贴地的爬着，要来咬祖父的脚的样子。祖父一点都不管，只是向着西走。路上谁也没有遇着。只有软风轻轻吹动祖父的鬓发，抚摩我的面颊而过去罢了。眼泪是早已干了。背上像是蒸着的暖，觉得很舒服。靠着皮衣微微睡去的时候，耳朵里听见什么人声了。张开眼来看时，好不高兴，原来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说什么是高兴，这样高兴的事情是平常不大有的。我也等不及祖父把我放下来，便伸出两只手，蹦了过去，给母亲抱着了。祖父诉说，尽哭尽哭，窘极了，把我交给了母亲，擦额上的汗。母亲是卷起了衣裙，站在水里，头上宽缓的包着的白手巾，与丰艳的面颊相映，脸上湛着微笑，每说什么话的时候，染着铁浆的牙齿比漆还黑的鲜明的发

光。现在想起来，母亲在此时正是盛年，原来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脸皱纹的老太太。母亲的面貌到现今为止也已经看熟了，可是像这时候的那么亲爱的美丽的面相，却此外不大记得。母亲是帮了邻居的阿幸等，到岛上来采裙带菜的。那巉岩的母岛隔着一段路在前面屹立着，可是走到母岛之间，有几十个子岛散在，近处都是浅滩。在这里波浪也并不大，给女人小孩做游戏场，是再好也没有的地方。

我关于这天的事情其实是除了见了母亲的面高兴的差不多要跳起来了这一件以外，什么也都不记得。或者母亲抱着，含了奶吃奶了吧，或者是被哄着，在母亲的膝上睡着了，又或者由阿幸背着玩耍，都一点儿不记得了。我望着祖父穿了皮衣，在水边走回去的后影，渐渐变小了，也未可知，但是当然这也不记得。不记得的事情没有法子来写。就只在这样茫漠的记忆之中，在春天的海边采着裙带菜，接我过去的母亲的脸，直至现在还在眼前历历如见，这件事我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



《左庵诗》

旧书回想记(十三)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刘申叔遗书》近已上市，因购得一部，铅印白纸七十四册，价颇不廉，闻且有上涨之趋势，至其原因则未详也。申叔卒于民国八年，十五年后宁武南氏乃为编刊遗稿，及钱玄同君参与编订，常来谈及，始知其事，盖已在民国二十四五年顷矣。当申叔避难居东时，余亦在东京，曾数为《天义报》撰稿，惟终未相见，后来同在北京大学教书，除在校遇见外亦无往来，对于申叔绝学不能了知，故亦无悔，但于编《遗书》时余亦得有一二贡献，殊出望外，如《鲍生学术发微》，是亦寒斋之光荣也。买到遗书之后，无意中却又得到几种申叔著作的刻本。其一是《周书补正》六卷，后附《周书略说》一卷，板心下端刻"左庵丛书"四字，题叶为秦树声署，未记刻书年月。案《遗书》中所收《周书补正》据总目注明系用抄本，在后记中亦未说及曾经刊刻，但取两本比校，别无大异，后与赵斐云君谈及，则所云抄本即是赵君手笔，昔年在南京据刻本移写者，乃知此刻本实是祖

本，其无异同宜也。（其偶异处恐是遗书校字者之误。）其二是《左庵诗》一卷，题叶书辛未八月，李植署，背面云华阳林氏清寂堂刊。前有林进思“校刻左庵诗序”，时为辛未，目录后又有癸酉题记，盖初刻于民国二十年，至廿二年补刻十九首，别有自序，乃无年月。《遗书》中《诗录》四卷，为玄同所编定，卷二即名《左庵诗》，系据刘氏家藏抄本编入，后记云，《匪风集》与《左庵诗》似皆有刻本，但从未见过。后记作于廿五年五月，刻本早已出版，卷首有朱印曰成都茹古书局印行，可知亦是发客者，不审其时何以不至北京，不克供编集者之参考，而余乃于无意中得之，奇矣。刻本系根据申叔自定本，与《诗录》相较，除续刻十九首外，全本相同，惟《诗录》有阙字，《从军行》之二第三四联原文云，“为惜卿忧惕，慭我瑶华遗，鸿虬递南北，且舒刀环思。”今缺“为惜”至“鸿虬”十二字，借刻本得以补正，亦是可喜事也。玄同为申叔编诗文集，备极辛勤，而未及见此二刻本，念之怅惘，今乃归于余，得无有明珠投暗之叹邪。

《消寒新咏》

旧书回想记(十四)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我不喜看戏,却常收集些梨园史料,此殆如足迹不入狭斜者之读《板桥杂记》《南浦秋波录》乎。近日得《消寒新咏》四册,乾隆乙卯年刊,题三益山房外编,以时代论,仅后于《燕兰小谱》十年,亦是极好资料。数年前张次溪君编刊《燕都梨园史料续编》,所收只是目录,似其书不多见。全书四卷,卷一二为正编,选优伶十八人,以花鸟比其声色,分题合咏,为消寒之计,故名。卷三为纪实,就诸伶擅长之戏,加以诗评,所举以正编十八人为限,此外复选京中诸大班旦色,为卷四曰杂载。每人每篇先有短序,往往比诗更有意思,令人有买椟还珠之感。作者三人,曰铁桥山人,姓李,案即李澐,山阴人,曰石坪居士,姓刘,曰问津渔者,姓陈,又有讷道人等十一人时贤佳作,汇为集咏一卷,附刻于后。这里边最有兴味的,我觉得是第三卷的纪实,因为如正编杂载那种写法,许多同性质的书大抵如此,若是咏剧的诗似乎还不多见。本来观剧诗古已有之,金桧门

三十绝句最有名，王朱皮叶诸家和作共有二百馀，见于《双梅影闇[1]丛书》。宣瘦梅《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为《申报馆异书四种》之一。棠梨馆主何青耜有《戏寄》一卷，诗一百首。但是这些只是以剧名为诗题而已，其注重伶人技术者，恐只此《新咏》一卷，此外则《日下梨园百咏》吧。《百咏》一册，光绪辛卯天津石印书屋印，钱江醉薇居士著，目录上每一戏题均注明戏角姓字，又或系以堂名小字，虽品评不详备，但亦有史料的价值，与普通观剧绝句有异。此诗又有一特色，即是百首皆是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亦是仅见。不佞曾搜罗[2]清代试律，昔得铭岳所著《咏物全韵》抄本，分咏北京儿戏玩具共三十首，陈其泰编《宫闺百咏》，诧为试帖中珍品，今得此册，乃鼎足而三，更可喜矣。

---

① "閣"原作"盦"。

② "不佞曾搜罗"，"佞"原作"倿"，"搜"原作"蒐"。

《河渭间集选》

旧书回想记(十五)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河渭间集选》[1]十卷,钱价人撰,魏耕序。此书一见似亦寻常,偶于北京市上得之,却甚可珍,亦可喜也。案杨凤苞《秋室集》卷一钱瞻百《河渭间集选序》云,嘉庆甲戌戴比部金溪得之吴山书肆,不知瞻百出处,介许武部周生以问余,为据旧闻疏其大略以复之。钱瞻百为允武族人,与魏雪窦为友,及康熙辛丑允武为孔孟文首告,瞻百亦为吴之荣所搆,谓其连络山海,妄思吹烬,为之主谋,至壬寅二月三人遂同及于难。集中纪年至己亥止,是刻成未几而被祸,故流传绝少。杨君在百二十年前已如此说,余今乃得见,不可谓非眼福矣。魏雪窦遗文除此集序外恐已无有,《集选》诗题常及魏氏,卷二有《春暮拟陶和雪窦》,惜原诗不可得见。《竹垞文类》卷三有《梅市逢魏子》诗,《曝书亭集》卷六亦载,列在上章困敦即康熙庚子年,题改作"梅市逢魏璧"。案《海东逸史》卷十四忠义一,魏耕原名璧

① "河渭间集选",原作"河渭集间选"。

字楚白，甲申后改名。一死一生，交情未变，朱十亦是君子也。前清康熙乾隆两朝禁书，不知总有若干。文字狱古已有之，阅《乌台诗案》，其情形亦颇相似，惟乾隆中因修四库书，搜查禁毁，其数乃尤多，咫进斋虽有重刊书目数卷，尚不完备，安得有笃学之士，仿安阳谢氏《晚明史籍考》之例，肯以数年辛苦，搜编为清代禁书考，其有功于学问当非浅鲜。惟此等书籍不堪为贾人所利用，若凭此以为居奇之证据，则吾辈书生反将大受其害。寒斋所有《河渭间集选》，即以坊刊禁书目中不曾列名，故尚能以平价买得，如同时所得之蒋玉渊编《清诗初集》，便不能如此矣。



《圭庵诗录》

旧书回想记(十六)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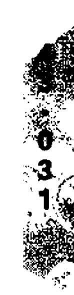
近代写刻书籍中，林吉人之三部作与沈芥舟之三跋最有名，几尽人皆知矣，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明文在》条小注云：

> 秀水朱梓庐先生《小木子诗三刻》《梓庐旧稿》为同邑辜启文书，仿柳诚悬体；《壶山自吟稿》嘉兴陈寓新然书，用文衡山体；《俟宁居偶咏》为先生兄子声希吉雨书，体兼颜赵，亦吾乡一佳刻也。

又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

> 《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鑅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

此二书寒斋幸皆得到，雨窗兀坐，时一展览，亦殊可喜。但此外一二小册，虽不是有名的书，亦可算作一类，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是《叶石农先生自编年谱》，本文自称则曰“跛奚年谱”，咸丰五年刊，高均儒书。叶君著作我只有一册《跛奚诗法浅说百篇》，乃是试帖诗入门书，上有朱批圈点，书贾云是梁鼎芬笔，亦未能详。年谱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共二十八页半，读之顷刻即尽，惟字甚肥大悦目，高君手迹亦可重也。其二是《圭庵诗录》一卷，题叶背面云，光绪五年己卯正月，萸斋校刊韬庵写本。圭庵本名吴观礼，仁和人，我不知其生平，诗又所不懂，此一册书七十二页，有诗二百七十首，翻开看时实在只是看陈伯潜写的字而已，此盖与说茶热得好无异，但是没有别的法子，盖假如我不是为的看所刻的字，则此诗集就也未必买也。后来又见秦树声自笔写刻的《乖庵文录》，体杂行草，颇觉虽致，但是笔画似乎太细，不甚好看，所以未曾收存。



《诗经新注》

旧书回想记（十七）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数年前买得《日本古典丛书》本《万叶集品物图绘》二册，是《毛诗名物图说》一流书，第二册卷首解题追记中说及此外还有山本溪愚的《万叶古今动植正名》，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订，也是很有价值的书。我便留意搜求，不久也收得一册，乃是著者死后二十三年纪念出版，全书不分卷，但分列草竹木鸟兽鱼虫等十部，共计二百五十二品，附绘图二十九幅。山本溪愚世为儒医，精通本草学，善绘画，所图画动植凡千四百幅三千馀种，皆极精美，又能诗文，著有《对竹斋诗集》及七经解，俞曲园先生见之，曾贻书称其能诠明古学，真有志之士也云。动植图惜未得见，惟寒斋有《蠕蠕集》二册，一为《百虫诗》五十五首，山本鸿堂著，即溪愚之犹子，二为《百虫画》，自蚕至蚯蚓凡六十六图，竹川氏模写溪愚原画，木板着色，其他各种虽云将续刻，似未实现，故遍觅不可得。经解只有《诗经新注》一种三卷，铅印三册，明治癸卯出版，著者是时

年七十七，即以是年卒。真下氏跋言先生兼精于本草，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无所不识，辨识名物诚为新注之一特色，其说诗亦时有新意，如绪言末条云：盖尝论之，诗之三体，颂不及雅，雅不及风，以其益文而远于质也。卷端有拟小序，以《野有死麕》《静女》《桑中》《采葛》《大车》《丘中有麻》《山有扶苏》《褰裳》《丰》《东门之墠》《溱洧》《东门之枌》《东门之杨》为淫诗，云孔子所尝删去，再入选中者，盖淫哇之诗常存于口碑，如"玉树后庭花"在盛唐犹存是也。于《静女》注中又云，此盖秦火散佚之馀，学者欲存三百篇之数，所谬混入也。虽孔子删诗之说现已知不可信，惟其解说亦复新颖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学，然及注经，"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此种学者态度甚可佩服。余虽非经生，惟四书五经曾经读过，其中对于《诗经》与《论语》一知半解，时常翻阅，得山本氏《新注》，亦颇有用处。前日偶从东京得真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传，见所载犬樱黄鸡二图及著作目录，因记寒斋所有诸书，由《动植正名》而归结到《诗经新注》，亦是奇缘也。



《尔雅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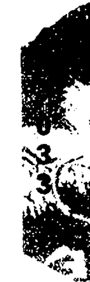
旧书回想记(十八)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郝氏《尔雅义疏》余最初所得为同治丁卯郝氏家刻本,末有刊误一纸,可知是早印者也。次得咸丰丙辰聊城杨氏刻,即同治本所从出,此二者皆是足本。后读殷礼《在斯堂丛书》中《尔雅郝注刊误》,见罗振玉序盛称王念孙删本之善,因再求得道光庚戌沔阳陆氏刻本藏之,即木犀香馆本,有石印本未见。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二,有陆刻本《尔雅义疏》二十卷,云五本之中杨胡本希见,次则陆刊,此即陆本也。叶氏记此时为民国己未,今又过十馀年,寒斋却能全都得到,亦正可喜。至于删本与足本二者孰优,此问题未易一口断定。据陆本陈奂跋,删节出王氏手当无疑义,服膺王氏之学及主张谨严者推重固是当然,但或以为新说假设不妨多有,又或著者原意多宜保存,亦均合理。若如家刻本郝联荪跋中所云,先大母临终犹谆谆以亟觅原本为诫,则婉佺夫人亦未满意于节本也。但以形式论,鄙意以为陆刻本最佳,清疏悦目,为各本所不及。陈氏

跋叙著者自道其治经之难，云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与老妻焚香对坐，参证[①]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止，语甚有风致，此亦《世说》中之好资料也。邵氏《尔雅正义》昔曾有之，惟见《释虫》果蠃蒲芦注下仍主化生之说，私意甚不满，亦备品而已。去年又得一部，白纸早印，清洁疏朗，为望江倪氏旧藏，有大雷经锄堂藏书及倪模诸印，卷中《释宫》以下朱批甚多，大抵有所纠正，此亦不愧为二云之诤友也。

① "证"原作"征"。



《山海经释义》

旧书回想记(十九)

1943年9月1日刊《古今》第30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小时候在书房里读书,虽然背得很熟,后来大抵不感到什么兴趣,但是自己随便看的却时常想起,即使是极平凡的书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山海经》便是其一。那时最初见到的《山海经》不知道是什么版本,总之是极粗糙的坊刻,中本黄纸印刷,每半页一图,雕刻拙劣,但心甚喜爱,其中龙首马蹄的"彊良"图像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以后又见过仿佛是广百宋斋的一种石印本,图用红绿套印,亦是中本而半页有四图,殊不明晰,故记忆不清,此两书均早已失去,不复可踪迹矣。经过了三十年之后,重新再买《山海经》来看,却是别一路的东西了,如毕秋帆的《新校正》,郝兰皋的《笺疏》,都是纯正的学术书,没有图像,吴志伊的《广注》虽说有图五卷,现在却也不见,汪双池的《山海经存》石印本有图,但是重描得不好,觉得还不如坊刻粗本尚有古拙之趣。最近所得有王德徵的《山海经释义》,明万历丁酉年刊,在今三百四十馀年前,有图七十五页。据

《四库总目》卷一百四十四"小说家类"存目二云，是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作，不为典据。案《山海经》多记怪物，毕氏书序虽力说未尝言怪，亦只是唯理的解说，未足凭信，因此图多怪相正是当然，即使根据唐宋人画本，也未必便足为典据，所可重者只是古耳，今《释义》本在我所见已是最古之图，虽出自俗工亦无妨碍也。《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六云，是编就郭景纯注本，于每节后各为之释义，词多肤浅，于经注无甚发明，间有驳及经文，尤为乖谬。此评语盖本于《四库存目》，别无新意，惟特别提出驳及经文，是已能知《释义》之要点，但持与毕郝诸氏之书相较，则明清学风不同，自难以并论矣。《释义》郭璞序后蒋一葵识语中有云，景纯语怪专信物，德徵语常专信理。此语极得要领，盖《释义》非笺疏而是批评，往往反驳经语为不可信，其实此唯理主张与毕氏本无二致，但与经生家法不合，为郑堂所不喜正是难怪也。我颇喜《释义》的话，但也更爱那些俗工的画，《海内经》云南方有神曰延维，人首蛇身衣紫衣，大为王君所笑，而其图观之亦复有趣（惜未画紫衣），盖论事理应疾虚妄，若作小说看时，姑妄言之姑听之，正亦不恶也。

《容膝居杂录》

旧书回想记(二十)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容膝居杂录》六卷,昆山葛芝著,自序云丁巳年六十矣,为顺治十四年,书则是康熙初刊也。葛字龙仙,崇祯时诸生,书中记乙酉春曾至绍兴访刘念台,又多说及徐俟斋,共有五六处。卷三中《论志墓之文》云:

> 及吾之生存,当求吾友俟斋先生为作一传。余六十年中排纂生平行业,作纪年录,已成书矣,亦不欲出之以示俟斋。盖俟斋知吾深,但须凭空结撰,必能得吾精神意思之所在也。

同卷中《记轶事之一》云:

> 姜行人如须鼎革后隐于吴中,一日与徐孝廉昭法酒间相谑,姜忽送一纸于徐云,"桓温鸱张,尚有枋头之败",以昭法名

枋也。徐不假思索，立答一纸云，“项羽虎视，不免垓下之亡”，以如须名垓也。坐客绝倒，叹为风流蕴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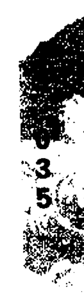
罗叔言编《徐俟斋先生年谱》中则引《池北偶谈》载：

姜吏部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枋善，一日行阊门市，姜顾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徐应声曰，“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相与抵掌大噱，市人皆惊云云。

罗氏按语云：

如须先生卒于顺治十年，乙酉以后五年居吴，而先生乙酉以后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宁有抵掌吴市之理，此记事之小失实也。

不佞拿出《池北偶谈》来查看，乃遍觅不得，恐怕是在渔洋山人别的著书中吧，一时也不及再查。葛龙仙与徐昭法既相知甚深，所记当可信凭，渔洋山人得之传闻，又加以藻饰，遂不免有失实处，盖酒间原可在山在野，不必一定在阊门市也。寒斋未有《居易堂集》，不知其中有葛君所云之传在否？又年谱注中说及葛瑞五，疑即葛芝之字，亦未能明。葛君与顾亭林同时同县，而书中不一提及，则因顾氏北游不返，或不相知也。



《柯园唱和集》

旧书回想记(二一)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柯园唱和集》不分卷,序一页,本文百十六页,题《柯园十咏》,王衮锡首唱,主人沈檦元五和之,此外和者五十二人,共得七言绝句五百八十首。鄙人不解诗,读之亦觉得无甚好句,但是对于此集感到兴趣者,则以柯园乃是沈园故址故也。作序者亦为王衮锡,为谑庵居士之孙,署戊戌秋,盖是康熙五十七年。序中云,柯园在蠡城东南,墨莲桥之阳,地接稽山,巷隔深辙,沈子宜士卜居焉。末又云,或云柯园地即沈园旧址,陆放翁梦游处,果尔,此十咏数百篇恨剑南不及见之。《越风》卷九沈檦元条下云:

> 沈翁家有园亭,在春波桥畔,放翁逢其故妇诗,曾见惊鸿照影来,即此地也。少时觞咏其下,有和主人柯园诸景诗。内一方池澄泓,可鉴毫发。

今案十咏之二为淡影池，殆即此。各诗注云，相传青海鲁公见魁星于此，或云，人有十影，至四五则乱，数尽者大贵。又云，额系王山阴先生书，案即谑庵也。惟商宝意云曾和诸景诗，查集中并未见，但有商元柏，则是宝意之父，案宝意生于康熙四十年，在戊戌才十八岁，或者觞咏尚在其后，故诗亦遂未得刻板欤。《越风》记王衮锡著有《十三楼诗集》，沈槱元有《柯亭诗草》，陶元藻《全浙诗话》引录，寒斋有安越堂校本，改亭为园字。惟同书又引杨鲁藩《国朝诗话》，称其著有《吹竹集》，据《贩书偶记》卷十五，原书名《柯亭吹竹集》，初二集共九卷，则似柯亭字不误。集中余石帆诗注亦称主人为柯亭，当系其别号也。



《荆园小语》

旧书回想记(二二)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少时在族人处见石印小本《笃素堂外集》，借读一遍，颇觉可喜，倏忽已是四十馀年，更求得而读之，则石印不精，近始获一木活字本，语亦平平，有似儿时果饵，再尝亦殊不甚甘也。读《荆园小语》，却觉得颇佳，胜于《聪训斋语》，此比较亦难细定，大旨岂不以艰难与安乐所处之异故耶。《荆园小语》向为世所重，多刊入丛书中，最近者为平步青之《葛园丛书》，光绪癸未年刻，有汝南常抱杞序，即平氏别名。中有云：

> 《葛园丛书》类取浙东先正暨师友遗著，今开雕《小语》旧本，颇讶重复可已，读至第二十八条，《冬夜笺记》所采者，慢然作而喟曰，嗟夫，意在斯乎，何闵人之深也。

此序今收入《安越堂外集》中，《小语》第二十八条论《金瓶梅》，序文

则指《野叟曝言》之翻刻，所谓抱杞盖即此耳。寒斋得平氏门人杨宁斋藏本，《小语》全本有圈识，末录识语云：

> 癸丑徵君年五十五，则当生于万历己未，端愍甲申殉难，徵君年二十六耳，杜门课弟，发名成业，此卷尤为修齐之要，岂第幼学指南。仆幼时先大夫以此诲读，谓一切格言善书无不赅括，读此可无须更读他书，守之终身可也。今年予亦五十有五，徵君之品诣万不敢望，其学亦岂能涉其万一哉。丙戌嘉平三日，霞外人。

此文未发表，但于此可以看出重刻《小语》的意思，更为明了。乾隆中平原张予觉辑录先正嘉言，可与《小语》互相发明，或足备参观者，分条笺注，名曰《荆园小语集证》，分为四卷，至咸丰七年始由张氏后人刊行。修养之书，有人为作笺证，事不多有，可知此类书中《小语》之独为人所重也。张氏《集证》意见多通达，可供阅览，惟征引不著所出，不但有失传述之本意，亦并减少读者之兴味耳。

《三不朽图赞》

旧书回想记(二三)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张宗子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不分卷,寒斋所得最早一册为乾隆乙卯慕村余氏印本,末有白文印曰“栋山读过”,盖是平景孙旧物。此外有一本似是后印,而内容次第与目录稍不同,“立德”忠谏之五徐龙川公像前别有一幅,后署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

案徐迪惠字鹿苑,上虞人,嘉庆戊午举人,故此本应是庚辰板归朱氏后所印,唯末无朱松山跋,不知何也。朱端侯校勘语于徐龙川像上批云,此像不准,予有徐氏藏本,戴五岳冠,执笏,项有锁,下注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此乃真像,若是则古剑老人所称沿门求像,其真确乎否,抑未能遍也。案所称徐氏盖即徐鹿苑之诸孙文若,住东郭门内徐立刚故室内,为会稽廪膳生,民国初尚存。古剑老人求像未能真与遍,此殆不能免,如姚长子本乡曲穷民,死于寇难,岂能有遗像可得哉。光绪戊子山阴陈氏重刊此书于湖北,改窜失真,殊不足取,唯图像尚可看耳。

民国七年王子馀以铅字重印，文字一仍陶庵之旧，且收录平景孙李越缦二家校语，甚为有益，像有铜板，令李元昉缩小摹写，不脱真容气味，殊不可耐，王君亦是有识者，何以乃有此失也。十二年又印三板，校正误字外，并加入李越缦跋及朱端侯校勘语，唯铜板则愈益模糊矣。

宗子著作，此外寒斋所得有：《梦忆》八卷，乾隆甲寅又道光壬午巾箱本，均王见大所刻，粤雅堂重刊本，“砚云甲编”一卷本。《西湖梦寻》五卷，康熙丁酉本，光绪丁氏重刊本。《古今义烈传》八卷，天启年刊，惜有一卷抄配。《史阙》十五卷，道光甲申郑氏刊本。《瑯嬛文集》六卷，光绪丁丑王氏刊本。《瑯嬛诗集[1]》不分卷二册，光绪辛丑虞山周氏抄本。《评东坡和陶诗》一册，汉阳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笔，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书眉亦有评语，或是王白岳等人手笔耶。

---

① “诗集”原作“集诗”。

《萝庵游赏小志》

旧书回想记(二四)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李越缦杂著》抄本一册,从杭州书店得来,内为《萝庵游赏小志》、《霞川花隐词抄》、《乐府外集》,共三种。书面题龙集光绪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庐主人志庚甫假傅氏抄本录竟题面,朱文长印曰太原公子,内又有印曰志庚珍藏。卷首附粘任秋田手札,文曰:

> 志庚仁仲如握,月前由润田交到《越缦堂杂著》一册,见系手钞,足见浓意文囿,孟晋无量。记此三种曾于都门奉读一过,假钞未果,今复展诵,弥觉寻味不置。间有校讹处订正处,笔之简首,请阅后一印证之,即撕去可也。手此鸣谢,藉颂著祺,不尽缕缕。愚小兄塍顿首。

审其语气,当是师弟关系。案任君《倚舵吟》遗稿章琢其跋语中说及王君子馀,为昔日门下士,然则志庚即王子馀世裕无疑。王君关

心越中文献，曾于《绍兴公报》社印行《文献辑存》书第一二辑及《越中三不朽图赞》，此稿云从傅氏传录，或是节子原抄本欤。

《霞川花隐词》刻入《二家词钞》，《乐府》有萧山钟氏刻本，《游赏小志》仅由番禺沈氏刊入《晨风楼丛书》甲集，铅字光纸，脱误满目，今得此本，据以校正，佳处甚多，共改正百三十馀字，添小注九处，又本文一则，差可披诵矣。任秋田批注八条，最重要者为第四，文云：

> 破产一节是先生恨事，曩在都谈次每裂眦言之，然余以为事关前定，即不结社不交一人，未必不破家也。烟云过眼，付之太空最妙。此注似亦可删。秋田注。

案此盖指壬子二月条下原注，断断诉比匪破家事，似当时读《小志》者多注意及此。《越缦堂日记补》壬集，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项下录有复潘伯寅书，起首云：

> 顷奉手谕，并蒙掷还《萝庵小志》，奖饰逾恒，遂使腐札回荣，枯词溢润，语林未出，见赏庾郎，本论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愧昔流，虽知过情，能无感发。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蛇，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

但以后接叙二周前事，凡费四百馀言，岂独裂眦，且复切齿，其无意于删削注语，盖已显然可知矣。



《天籁集》

旧书回想记(二五)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二云：

康熙初钱塘郑扶羲旭旦[①]撰《天籁集》，计诗四十八首，自序谓如来趺[②]莲台，矢四十八愿，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读是集者，当作如是观。余细读之，词虽鄙俚，饶有奇趣，其书不甚流传，余偶于友人胡松坪大宇处见之，摘录数首以见大凡，正不得以小儿女嬉戏之词少之也。

此书光绪丁未有活字小本，题郑旭旦评，又有卷二则署钱塘悟痴生编，初意二者皆是今人，及见诗话，乃始省悟。集中所录皆是江浙间通行童谣，什九与现今相同，可知是诚实的集录，未经文人加点，

① "旦"原作"且"。
② "趺"原作"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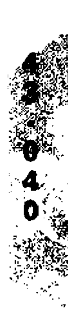
故可贵也。其评语则颇有唱经堂意味，中有数处对于缠足加以痛骂，当初亦疑为留学生口吻，今乃知是康熙时人语，盖其时思想界亦颇有新气象，故曾有禁缠足与废八股文之事，非是偶然。近又从杭州得同治壬戌芝秀轩刻本，有许之叙许郊二人序跋，得见原书面目，甚为可喜，惟序中只云郑君旭旦，不及扶羲名，未知诗话何所依据，或康熙刻本如此作欤。活字本所据当即是芝秀轩本，惟原有郑君自作序跋各一篇，今只有跋而无序，又误郑为陈，疑或是据传抄本乎，殊未能明了也。商嘉言《葊亭诗草》卷十有诗云：

> 八月五日风雨舟中读郑扶曦先生《天籁集》题后：万木响刁调，扁舟一叶飘。两间自天籁，千古乃童谣。情最苍苍重，魂都恋恋销。有心人不见，风雨正潇潇。

小注云：

> 首自序云，将质之苍苍者。末自跋云，恋恋于中而不能已也，故及之。先生自谓古之有心人。

此诗作于嘉庆庚辰，可知其时所见本序跋俱存，诗话则编定于嘉庆甲戌，相距才五六年，似尔时《天籁集》原本尚有流传，但至今日而同治重刻本乃亦甚稀有矣。



《越妓百咏》

旧书回想记(二六)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壬午年中从杭州书店得安越堂平氏藏书十馀种,其中有红格抄本两册,皆杂录诗词,以会稽韩氏作为多,计所记时日大抵在乾嘉之交十七八年间,卷首为嘉庆癸亥韩慕樵与侄予良书,末有平景孙题字五行。册中所抄多极凌乱,惟其中有九页首尾完具,题曰《越妓百咏》,下注云,自壬戌起至戊辰止共七年,蕚桴氏未定草,后附《吴妓二十咏》,亦蕚桴作,末有《题越妓杂咏诗后》二首,署名鸿轩氏。案抄本中韩汝韡[①],亦名昶,字蕚不、蕚桴、鹤夫,韩昂字鸿轩,又字芸沚、秐子。曾见《胭脂牡丹尺牍》六卷,道光乙巳年刊,题韩鄂不著,因知其人盖是游幕者,韩昂亦有嘉庆戊午新城官署与王楷堂唱和诗,可以为证。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三云:

会稽韩蕚桴汝韡与从兄鸿轩昂集王次回句为无题七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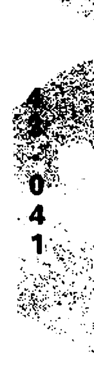
① "韡"原作"鞾"。

> 八十首，较张云轩制所集多至十倍，真奇观也。莩桴诗以清丽为主，佳句如：帘额寻香飞凤子，墙腰抛箨长龙孙，春日偶成句也；天遥万里杳无迹，人静一村微有香，月下寻梅句也；禅关悟道心偏淡，闺阁吟成姓也香，咏柳絮句也，皆不让元人。

此百二十咏本系游戏之作，中多狎亵语，亦正是狭斜恶少之本色，惟在诗中却甚少见，又因此得知其时越中游女之姓氏与人数，不失为绝好史料也。《越缦堂日记补》丙集，咸丰丙辰六月初七日条下记夜中微行，三叩夜度娘家，虽记述简略，差可比拟，此外则不易寻找矣。六七年前题张亨甫《南浦秋波录》有云：

> 近来想稍收集关于冶游之书，而既不专精，又复吝啬，结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书中看去，则此册要算是最好的一种，文情俱胜，《板桥杂记》或在其次耳。

《百咏》只是七言绝句一百首，别无记述，岂足与名著抗衡，但艳史所记都是堂子里的事，而此则是一府城里的私门子，正是极难得的记录，在寒斋旧书中甚值得提出来一说者也。



《妄妄录》

旧书回想记(二七)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偶买得《妄妄录》十二册,卷首有王季烈题记一页,文曰:

《妄妄录》十二卷,朱海撰,海字蕉圃,吴县人。此书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甲寅,自序云,头颅渐老,多病多愁,行将与鬼为邻,则非少年之作可知。至道光十年庚寅付刊,观凡例语气,其时作者尚生存,是已寿逾耄耋矣。笔墨修洁,可资劝惩,记吾吴琐闻,间亦有关掌故,其姓名不载方志及诸生录,殆毕生潦倒,落魄天涯,以终其身者欤。卷首有道光壬午闽抚叶世倬序,自称乡同学弟,叶字子云,上元人,乾隆间举人,道光间抚闽,服官甚久,所在以兴教化美风俗为己任,作者与之同学相友善,则亦非庸庸之士矣。然生前既沦落不遇,死后遂姓名翳如,吁可悲矣。此书刻本罕见,今春祝嘏行在后,游京师海王村肆见之,索值甚昂,余以乡先生之著作,不忍释手,费十锾得

之，携以归里门，询之纂修县志之诸君子，无有知其人与书者，因记之于此。宣统辛亥后二十年，春王正月既望所得，阅三月，螾庐记。

案朱氏自序中有云，效坡仙谪黄州时故事，日强人说鬼，绝不作治生计，半年来妄言妄听，并追忆旧闻，随笔记十二卷，名曰《妄妄录》，神仙诡幻之事不载，惟鬼则记之，盖士不得志，笔下即有神，亦当化为鬼耳。故王君重其为吴郡文献，在不佞则取其专门说鬼，颇足为欲知鬼之情形者之参考，此类资料搜集不易，乃为可贵也。如卷二《河水鬼》一则，记溺鬼化为坛浮水面，诱人拾取，指入坛口遽被拖住，是时水发腥气。又卷三《溺鬼喜豆》[1]一则，言在武林曾见有夫溺于河，妻以炒豆为祭品，散之溺所，佥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此类记录尚不少，皆可甄采。惟书中嬉笑怒骂亦多有之，如卷三《鬼公子》一则，似系故意造作以骂人者，所云汪近涛即是江声，江字鲸涛，文中明言其苦攻《尚书》，又书小札或购物开账必用篆字，所记与钱梅溪牴牾或系事实，至于受鬼公子种种侮弄，则当是著者所编造，盖即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痕迹。至卷七之《报怨鬼》，丑诋汪容甫，但化名为汪蓉圃，乃尤为显明矣。

（癸未九月二十日）

---

① “溺鬼喜豆”原作“溺喜豆鬼”。



《吴歈百绝》

旧书回想记(二八)

1943年9月16日刊《古今》第31期
署名知堂
收入《书房一角》

三十六七年前在东京旧书店买得顾禄著《清嘉录》十二卷，日本天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记吴中一年间的风俗，觉得很有趣味，其中多引蔡云《吴歈》，亦多佳作，不知共有若干首。后来又搜得蔡云《吴歈钞》二卷，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即从《清嘉录》抄出者，上下卷共得七十四首，以为蔡氏之作尽于此矣。近来于无意中收得原本《吴歈百绝》一册，乃是全本，末有同治十一年石渠跋，云道光初其诗文集已刻，乱后散失，今据抄本重刊。案蔡氏《月令》卷首有小传，记所著有《月令》两卷，《癖谈》六卷，《借秋亭制艺》，诗文集不及《吴歈百绝》，或者原系诗集中之一卷欤。《清嘉录》刊于道光十年，意其时所引即据《借秋亭集》本，惜只采其四分之三，又原诗均有小注，录中亦不及引，今得见原书，极可喜也。《吴歈钞》所缺诗共二十六首，计春秋各七，冬夏各六，其中颇多有趣味之作，如春之二云：

潜投红刺姓名轻，安步时防裂爆惊，深巷乱鸡更迭叫，
村童结队卖芦笙。

注云：

俗甚重贺岁，然非素相习者，止以名刺投门隙，甚无谓也。群儿聚嬉，爆声连路。芦笙吹以娱小儿者，葭管箬簧，饰成冠羽，名曰叫鸡。

又其九云：

耍煞儿童十数天，夺魁入阁快争先，铮铮排户投琼响，
半掷床头压岁钱。

注云：

夺魁谓状元筹，入阁谓升官图，小儿局戏，以骰掷者。除夜将睡，以钱掷小儿女枕边，名压岁钱。

写新年风俗，兼及儿童生活，殊有情致。传称其家居酒一棬[1]，书一卷，或篆刻小印，摩挲古泉以自娱[2]，盖其人亦是很有风趣者也。

（十月末日）

---

① "棬"原作"卷"。

② "摩抄古泉以自娱"，原作"摩抄古泉以有自"。